

主编 李秉勤 贡森

社会政策译丛

[英] 莱恩·多亚尔 著
伊恩·高夫

REN DE XUYAO LILUN

人的需要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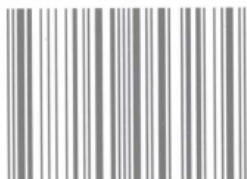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张胜纪

网址：www.cp.com.cn

ISBN 7-100-05317-X



9 787100 053174 >

ISBN 7-100-05317-X/C·153

定价：28.00元

社 会 政 策 译 丛

李秉勤 贡 森 主编

人 的 需 要 理 论

〔英〕 莱恩·多亚尔 著
伊恩·高夫

汪淳波 张宝莹 译

李秉勤 董明珠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8·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需要理论/(英)多亚尔,(英)高夫著;汪淳波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社会政策译丛)

ISBN 7-100-05317-X

I. 人… II. ①多…②高…③汪… III. 需要—研究 VI. B84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 第 16193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社会政策译丛

李秉勤 贡 森 主编

人的需要理论

[英] 莱恩·多亚尔 伊恩·高夫 著

汪淳波 张宝莹 译

李秉勤 董明珠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龙兴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5317-X/C·153

2008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4

定价: 28.00元

《社会政策译丛》出版说明

经过不懈的努力,《社会政策译丛》终于面世了。作为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学者,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协助广大同行学者、学生、政策实践者以及对社会政策有兴趣的朋友,在浩如烟海的学术著作中,找到一些可供学习或借鉴的线索。

1

“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的概念一般有三个涵义:(1)政府用于福利和社会保护的政策,特别是有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的政策;(2)福利在一个社会中发展的方式。其涵义比(1)更为广泛,大大超出了政府行为的范畴,包括福利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在内的诸多社会及经济条件;(3)针对上述主题的学术研究。

作为政府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如何为其公民提供必要福利和保障的问题,并不可避免地遇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约束,但是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社会政策并没有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发展。当然,这一现象的存在与“社会政策”概念形成的历史和发展有关。

学术界对社会政策的密切关注,始于战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建构。由于各国在意识形态、历史、经济,以及社会条件等方面均存

在较大差异,对福利国家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于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因而,早期针对福利国家的研究带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并多半针对具体的政策。例如,在最先开始系统性研究社会政策的英国,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工作与行政管理。主要针对专门从事福利提供、管理和政策执行的人员。实践的发展对理论建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同时,随着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在很多欧洲国家受到挑战,以福利国家的社会工作和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社会政策研究首先遇到理论方面的挑战。传统社会福利体系为什么会面临危机?到底什么样的福利体系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福利体系背后的意识形态标准是什么,又如何影响福利体系的构成?这些问题都不断困扰着社会政策研究人员。

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政策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外延在扩大。其中涉及了社会服务领域的政策及管理实践(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就业、社区照顾和住房等),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犯罪、身残智残、失业、老龄问题等),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包括种族、性别、贫困等)以及对相关问题的集体性社会反映。二是理论向纵深拓展。突破了国家-市场的简单对立,进一步探讨国家-市场的结合(如准市场、公私合营、合作等),加强了对各种非国家因素在社会保障和救助过程中的角色(如志愿及互助机构的福利提供、亲朋及邻里等非正式的救助形式)的研究,从以补偿收入为目标的福利提供向非收入补偿转化(如对社会排斥问题的关注),等等。

迄今为止,社会政策已经发展成一个跨学科的应用研究领域。它广泛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史学、哲学以及法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社会对社会需求的反应。它主要

关注经济、社会及政治领域中与人类所必需的生存条件及其提供方法有关的问题,所涉及的人类基本需求(或福利)包括:食物及居住、可持续性及安全的环境(包括就业、犯罪、环境等)、增进健康及医治病患、对无独立生存能力者提供照顾和支持(包括社区服务)、对个人提供教育和培训,使其有能力融入社会。

2

伴随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新型社会关系的产生和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政策理论研究正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会。

首先,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策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转型国家和若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使它们需要且可能对社会政策给予充分的关注,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度的扩大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如何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进行协调,进而实现国际合作,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方面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如,移民管理、反贫困、最低工资待遇、最低劳动保护标准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完善的社会保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在国际发展中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其次,对国际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尽管较早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对不同国家社会政策的比较,但比较研究的意义历来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和社会特点均有不同,把两个或多个国家的政策进行横向比较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但随着国际或地区间经济一体

化的加强,社会政策的相互隔绝似乎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合作的障碍。特别是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跨国流动已经不可避免地要把社会政策纳入一国国际竞争力的组成中来。在社会政策领域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是艾斯平-安德森(G Esping-Andersen)。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把福利国家划分为三种主要模式:以工作和个人贡献为主导的法团模式(corporatist regimes),遵循普遍原则的社会民主模式(social democratic regimes),遵循补余原则(residualism)的自由主义模式(liberal regimes),^①为国际社会政策的比较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使其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并引导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除此以外,在艾斯平-安德森前后还有一些对具体政策的比较,对政策投入产出的比较,对政策执行和政策效果的比较等。^②

3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许多经济及社会问题已经难以以为经济快速增长这个单一的指标所涵盖,摸索中的改革实践显然已经大大超前于理论的发展。当前,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改革的推进要求跨学科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要求针对我国的特点,对改革提供具有预见性和实践意义的指导,从而达到建设小康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目的。

如前所述,当今社会政策研究的动态体现了社会政策自身的跨学科、开放和适应性的理论灵魂。作为本丛书的编者,我们力图

^① 参见艾斯平-安德森,《福利国家的三种模式》,Polity,1990;该作者又于1997年撰写了《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全球经济中的国家适应性调整》一书。

^② 参见米歇尔(D. Mitchell),《十个福利国家的收入转移》,1991。

在选题过程中体现当前国际社会科学(不仅限于社会政策)发展的这些特征,向人们展示各国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如何面对社会政策研究的需要,跨越学科壁垒,追求实现社会保护的共同目标。

值得指出,社会政策与一国的文化、历史、经济、社会背景紧密相联。各国社会政策方面的学术文献不计其数,由于人力及财力所限,本丛书只可能使读者对这一庞大领域窥见一斑。参与编译工作的各位同仁,以及积极支持本丛书出版的海内外学者的一个最大愿望是,本丛书能够激发读者的兴趣,并鼓励他们沿着书中所提供的线索攀登社会政策研究的重重山岭。同时,我们以及丛书的若干作者都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够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评论和批评指正,在探讨的过程中共同进步。

借此机会,我们特别感谢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会政策系的 Alan Walker 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系的 Howard Glennerster 教授、Julian Le Grand 教授、德国 Bielefeld 大学社会学系的 Lutz Leisering 教授、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熊性美教授。他们在本丛书的选题和出版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无私的帮助。商务印书馆的张胜纪先生,在丛书的筹划阶段抱病坚持工作,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最后,编者对商务印书馆在关注并推动社会政策研究方面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表示崇高的敬意。

李秉勤 贡 森

2002 年 4 月 5 日

《社会政策译丛》代序

—

近年来,社会政策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一些大学开设了有关的专业,培养学术和专业人员。但是,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引入和一个新专业的形成往往会面临着如何界定研究范围和如何确立相关的方法论体系的问题。似乎在国内学术界,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我作为一名多年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总要提出一些问题:到底什么是社会政策?它和经济政策又是什么关系?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有什么不同,又有哪些联系?适逢李秉勤和贡森两位打算推出这套社会政策方面的译丛,并要我写一篇序言。我希望结合我对国内与“社会”有关的政策实践的观察,并以学习和了解社会政策为出发点,完成这篇序言。

无论在社会福利长期发展的欧洲,还是在广泛利用商业保险的美国,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可以说,社会政策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领域不断扩大。横向上,它包括了社会服务的方方面面,如社会保障、医疗、就业、住房、教育等等。纵向上,其研究的主线是阐述在各个社会政策领域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看,二者之间的角色划分,特别是严格按照意识形态的对立确立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已经不可能适应现

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许多国家都在寻求不同程度的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如在社会服务领域中引入准市场、公私合营等。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大量对社区、邻里、家庭在提供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方面作用的研究。其总的趋势是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和提供手段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社会政策的目标体系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从以往比较单一的收入标准,向更加多元化的能力培育指标体系发展。另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环节,政策本身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伴随政策的调整,政策执行体系的运行也受到了不断的考验。以往的一些用于企业管理和企业组织的理论,也越来越多地用到政府管理、新型公私合营的公共服务机构的管理以及政府与各类合作方的关系中来。稍加比较,不难发现,经济学中其实已经包括了对几乎所有上述问题的探讨!但是,是不是可以说社会政策就可以由经济学代替了呢?想必从事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学者在追溯各自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势必也发现了各自学科在上述领域的贡献。是不是他们也可以说社会政策可以由某一个学科所代替了呢?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尽然。

当然,每一个学科的应用研究或政策研究都会涉及到现实的社会问题。然而,以往的经验证明,学科壁垒限制的是政策分析的视角。社会政策可以说是为开阔视野,实现跨学科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现代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得任何一个学者很难实现过大的跨越,即使在本学科范围内。因此,这里并不是要提倡学者放弃各自的学科基础,转向大而全的泛泛治学,而是鼓励创建依靠坚实理论基础的开明学风。《社会政策译丛》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思想。

二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些“社会”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例如:一方面传统的国营企业承担着沉重的社会包袱,不得不寻求出路减轻负担;另一方面,大批新型企业迅速发展,而职工却不享有基本的劳动保障,劳资关系受到严峻的考验。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这些问题特别是经济转型对政府和企业、个人的关系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改革初期,这些“社会”问题的负面效应往往被刚刚冲出旧体制束缚的快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所掩盖。即使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也基本局限于零敲碎打的以应对为主的措施。然而,改革的深入使企业(包括国营企业)能否长久生存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它们的市场竞争力。不同程度上承担着社会保障任务的企业被置于不同的起跑线上,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同时,国企改革必然导致大批劳动力分流到非国有部门,一方面国营企业职工下岗,需要有一定的缓冲机制,以便使他们顺利渡过难关,实现再就业;另一方面更多的劳动力进入不能提供传统类型保障体系的部门,需要有社会化的保障机制与之配套。而针对上述一系列的问题,继续推行零敲碎打的调整似乎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新经济形势下社会保障机制,必须有深入系统的考虑,既照顾到我国现有的经济条件,又注意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社会基础。

从我国改革的经验看,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不可能局限在对最低收入的保障范围内,计划体制下的福利制度的各个方面,包括: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新的保障因素,如最低劳动保护、城

乡一体化等,都必然在新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占有相应的地位。而上述诸多方面的改革也面临着如何相互配套和协调的问题。

三

这套《社会政策译丛》推荐给读者若干国外社会政策的代表性著作。欧美各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社会政策方面已经取得丰富的实际经验,并有一定的理论探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认真研究国外的经验和教训,才能为我国社会政策研究和改革实践提供更广阔的视角和平台。

丛书的编者希望能够通过这套丛书,对社会政策的学者、学生和从业人员提供一些思路上的启示。我衷心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获得一定的成效。

熊性美

南开大学

2002年5月7日

Len Doyal and Ian Gough

A THEORY OF HUMAN NEED

© Len Doyal and Ian Gough 1991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1

本书根据麦克米伦出版社 1991 年版译出

“荒谬产生于人的需要与世界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冲突。”

——阿尔贝·加缪

目 录

前言	1
简介	4
第一部分 相对主义与人的需要问题	11
第1章 谁需要人的需要？	13
正统经济学：需要就是偏好	13
新右派：需要是危险的	15
马克思主义：需要是历史形成的	16
文化帝国主义的评论：需要具有群体特征	19
极端民主主义者：需要是漫无边际的	23
现象学的观点：需要是社会造就的	26
第2章 人类需要的必然性	30
正统经济学：评价的循环	30
新右派：终究还是普遍性	33
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愤世嫉俗的目光	36
文化帝国主义的评论：压迫的客观性	38
极端民主主义：群体道德的浪漫化	40
现象学的观点：社会现实的回击	42

2 人的需要理论

第3章 “需要”的基本原理	46
需要是驱动力	46
需要是目标和策略	51
需要、相对主义与道德	55
第二部分 人的需要理论	61
第4章 健康和自主:人的基本需要	63
需要是人类行为和互动的前提	64
生存/身体健康是基本需要	73
自主是一种基本需要	78
比较需要满足中出现的问题	91
第5章 满足基本需要的社会前提条件	99
个人自主的社会层面	99
四个社会前提条件	104
第6章 人类解放与满足需要的权利	117
义务、权利和道德互惠	118
特殊义务与需要满足的最优化	135
相对主义与人类解放的前景	141
附录:敌人需要满足的权利	145
第7章 理论上的最优化需要满足	151
哈贝马斯与理性交流	156
罗尔斯、正义与最优化的需要满足	164
修正罗尔斯	171
对罗尔斯的评论	175

国际主义、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	182
第三部分 实践中的人的需要	189
第8章 需要满足的测度	191
社会指标和其他人类福利的直接测度	191
满足物与“中间需要”	196
基本需要满足的标准	202
中间需要满足的标准	204
设计需要满足的社会指标所遇到的问题	207
第9章 身体健康与自主	216
生存与残疾	217
身体疾病	223
自主与精神病	228
学习与认知技术	230
社会职责与参与机会	234
批判性自主	237
第10章 中间需要	242
食物和水	245
住房	248
无害的工作环境	252
无害的自然环境	253
保健	255
童年安全	259
重要的初级关系	262

4 人的需要理论

经济安全·····	265
人身安全·····	268
教育·····	271
安全的节育和生育·····	274
第 11 章 最优化需要满足的社会前提条件 ·····	280
再论人权的普遍性·····	280
消极自由的程序性前提条件·····	283
积极自由的物质前提条件·····	290
经济可持续性与子孙后代的权利·····	305
第 12 章 描绘人类福利的蓝图:三个世界中的需要满足·····	311
描绘客观福利的蓝图·····	312
基本需要与中间需要·····	314
社会前提·····	329
需要满足的性别差异·····	334
结论:全球福利模式 ·····	339
第四部分 人类需要的政治 ·····	345
第 13 章 建立需要满足的政治经济学 ·····	347
第三世界中的经济发展与需要满足·····	347
第二世界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需要满足·····	354
第一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需要的满足·····	359
全球性的困境·····	366
建立一种需要满足的政治经济学·····	368

第 14 章 双重政治战略	371
理论上的双重战略	372
支持权力集中的论点	375
支持权力分散的论点	382
实践中的双重战略	386
参考书目	391
索引	412

表

9.1	导致残疾的疾病频率(英国)	224
9.2	我们建议的基本需要满足指标	240
10.1	我们建议的中间需要满足指标	277
11.1	我们建议的实现最优化的社会前提的指标	308
12.1	三个世界的实质性需要满足	315
12.2	世界主要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	320
12.3	三个世界的最优化需要满足的社会前提	329
12.4	需要满足的性别差异	336
13.1	三个西方国家需要满足的比较	360

图

8.1	中间和基本需要满足之间的关系	206
8.2	理论提纲	215
9.1	参与、健康和自主的关系图	217
9.2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1977~1978)主要传染性疾病和 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比例图	227
10.1	抑郁症的社会因素	243
11.1	一种物质生产模型	292
13.1	1979年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关系图	348

前 言

1982年,在熊熊煤火前的一次促膝交谈中,我们发现彼此都强烈感受到普遍的人的需要的存在,并且认为反对该观点的理论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学术领域——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但是我们都相信,如果没有一套连贯的人的需要理论的支撑,我们从事的许多政治事业都将会变得毫无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新右派”(New Right)在政治上的成功得益于其对手在理论上模糊不清,这一点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念。

我们旨在澄清该事实的最初的尝试是一篇与本书同名的论文,1984年发表于《社会政策批评》。延展这些观点所耗费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以及许多其他同行的预期。原因在于这个主题本身十分庞大,加之作者工作繁忙,相距遥远,给学术合作造成了许多困难。在某些方面,我们对该书的拖延深表遗憾。例如,我们在早期书稿中论证了东欧和苏联将发生一些变化,而现在许多变化都确实已经发生了。的确,这种变化发生得如此猛烈,以至于我们把计划中的第二部关于需要的政治经济学的书推迟到尘埃落定之后。

然而,该书酝酿良久也有两个很大的好处。第一,1984年以来出版了一些关于人的需要的精辟的研究著作,我们从中受益匪浅,而且有充足的时间认真研究、深刻思考这些学者的著作。我们

2 人的需要理论

尽量在所有适当的地方对这些学者们表示感谢。但是在这样一部规模宏大内容复杂的著作中,我们难免也会有所疏漏。对此我们提前表示歉意。

第二,这些年的合作也给我们带来了工作中最大的快乐——我们之间以及我们两个家庭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如此长期的合作项目不可避免地成为合作伙伴一个沉重的负担。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如果没有莱斯莉·多亚尔和玛格丽特·琼斯为此付出的劳动和爱,本书根本无法完成。莱斯莉两次编辑了全书的书稿,并在内容和风格方面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玛格丽特也在学术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不懈的支持。在许许多多的周末我们紧张的讨论和写作过程中,她们俩在感情和物质上都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最重要的是,在频繁的交谈和辩论中,她们使我们坦诚相见,忠实于我们四个人共同的理念。出于爱和感激之情,我们将此书献给她们。

许多同事和朋友都参与了我们的项目,我们应该对他们公开表示感谢,人数如此之多,我们简直不知道从谁开始。在密德萨斯理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乔纳森·鲍尔斯和保罗·怀尔丁一直是我们坚定的支持者,尽管他们经常表示怀疑,不知我们的努力会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一所英国的高等学府,写一本书不再是一件易事,更不用说这样一本野心勃勃近似荒唐的巨著,但是多亏了乔纳森、保罗以及密德萨斯理工大学哲学与宗教研究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系的同仁们,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没有可能。伊恩·高夫也对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在1984~1985年冬季提供的两个月的个人科研假期表示衷心的

感谢。

我们要特别感谢罗杰·哈里斯、哈里·莱塞、伊安·迈尔斯、雷蒙德·普兰特、乔纳森·鲍尔斯、戴维·珀迪、劳伦特·范德梅森和格伦维尔·沃尔，他们阅读了全书的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们还要感谢梅纳德·德赛，他在我即将定稿之前审阅了全书。此外，我们还对保罗·坎马克、罗伊·卡尔—希尔、帕特·迪崴恩、黛安娜·埃尔森、伊安·福布斯、卡洛琳·格伦丁宁、杰夫·霍奇森、菲尔·利森、艾琳娜·利文、彼得·奥斯本、罗斯玛丽·普林格尔、索菲·华生和丹尼尔·威尔舍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都不厌其烦地认真阅读了该书的部分章节，并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我们还得益于出版商选定的至少六位匿名读者的评价。没有一个人对他们阅读的内容表示完全赞同。我们从他们的帮助中获益匪浅，但是当然为存疑之处承担所有的责任。

马丁·鲍德温·爱德华兹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帮助，编制并计算了第12章和第13章中的数据，萨拉·简·埃文斯一丝不苟地校对了书稿，杰基·巴特利为我们编写了索引，本·琼斯认真核对了本书的书目，在此，我们对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最后，还有一个人，我们最终得以完成本书，完全得益于他的鼓励和耐心。他就是斯蒂夫·肯尼迪！他的编辑工作给了我们很多的启迪，成为我们力量的支柱。他的友善、他对我们基本需要的关心，让我们永远感激不尽。

莱恩·多亚尔

伊恩·高夫

简 介

“人的需要”这个概念使用非常广泛,有时人们用它来证明社会政策的合理性(如身体虚弱的老年人需要更多的住房保障),有时被用来批评社会政策(如英国的学校教育满足不了孩子们的需要)。这个概念用途如此之广,我们简直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它,我们的各项工作如何能够进行下去。我们根据需要作出决定,把某些事情,而不是其他事情,置于优先地位,这些决定难道不是必然的吗?然而,需要这个概念也一直遭到滥用。计划者根据他们关于满足人的需要的专业见解,论证并且实施了许多灾难性的社会政策,例如不得人心的公共住房政策,或者那些强加于人的、爱管闲事的福利金管理者。这种滥用在东欧国家的制度中最为显著,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被称为“对需要的专政”(费赫尔(Feher)等,1983)。确实,我们观察到的这些滥用非常广泛,以至于许多人拒绝承认共同的人类需要的存在,而我们可以用一种统一的、成功的方式来计划如何满足这些需要。

与这种观点相提并论的是一种更加普遍的态度,怀疑那些标榜普遍和客观的理性或现实概念的连贯性。有些评论家强调语言和文化差异对于人们推论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否认或尽量抹煞那些主张所有人的需要从根本上相同的理论的重

要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自由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和其他社会批评家越来越把人的需要看做一种主观的、与文化相关的概念,这种信念对“新右派”在 1980 年代的知识界占据统治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如果客观需要的概念没有根据,那么人们除了相信只有个人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除了鼓励他们追求自己的主观目标或偏好,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要想达到这一点,还有什么机制比市场更好吗?

有一点很清楚。涉及评价人的状况的一系列概念与普遍和客观的人类需要确实存在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联系。例如,我们很难看出支持提高人类福利的政治运动如何可以不赞成以下相关的观点:

1. 可变的社会环境可以使人受到**严重伤害**,导致深重的苦难。
2. 社会正义的存在与严重伤害和苦难成反比。
3. 旨在最大限度减轻严重伤害的社会变化得以持续实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发生了**社会进步**。
4. 当最大限度地减轻严重伤害的社会变化没有得以实现的时候,它所导致的社会环境与受害者的**客观利益**相互冲突。

当然,严重伤害这个概念并不是唯一的起点。批评政治和道德现状的理论和实践同样可以很好地从更为乐观的、根本性的人类繁荣(human flourishing)出发,并且涉及鼓励并保持这一过程的各种不同社会环境。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支持社会平等的最重要的论点关注的是,在什么程度上人有同等的受伤害或繁荣的可能性。假设这种可能性存在,人们经常认为,偏袒某个个人或群体而宁可武断地伤害其他个人和群体是不公正的,因此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改革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著作中历来充满了否定和肯定的思想。要点在于,它们明确表达的理论和实践在本质上具有批判性,并且包含了一系列用于在道德上评价人类事务的标准。

- 3 因此,明确以上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的前提是:我们有可能确定人类客观、普遍的目标,个人如果想要最大限度地优化他们的人生机会,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实现这些目标——即所有的人在哪些方面都有基本的需要。同样,当人们对不公正的待遇表示愤怒的时候,背后的某个地方隐藏着这样一个信念:人的基本需要是客观存在的,本应该得到满足,但是却没有得到满足。基本需要的满足理所当然地优先于想要(wants)的满足,正是这个信念使人们在这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产生了抱怨。总的来说,当我们认为基本需要(而不是想要)——言论自由而不是免费糖果——没有得到满足时,我们会在道义上感到更为不安。然而,如果没有客观人类需要的概念以及人类需要自身就能产生的道德作用,就不可能迈出从“是这样”到“应该这样”的一步。

因此,我们可能会指望至少在批评现状的评论家之间,就什么是人的基本需要以及应该如何满足这些需要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一个在社会政策实践和许多政治言论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却经常被理论界拒之门外。结果只能是给福利提供

者和那些为了增加福利提供而进行政治斗争的人们造成困惑。

为了改正这种状况,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一套连贯、严密的人类需要理论,恢复一种人们可以接受的社会进步的前景,为新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提供一个可信的替代性理论,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新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已经给许许多多的人造成了严重伤害。然而,这种理论必须从家长式的福利制度、斯大林式的集体主义以及其他以共同需要的存在为前提的政治实践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些错误有的很可怕,有的很愚蠢。一套可信的、在道义上有吸引力的人类需要理论必须借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它必须绘制出第三条前进的路线,既抛弃市场个人主义也抛弃国家集体主义。我们希望这本书将会提供这样一种理论,而且建议应该如何把它付诸实践。

总的来说,我们将论证,存在着人的基本需要,个人有权利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需要,衡量所有人类解放的标准应该是评估这⁴种满足的程度。然而,我们在赞美人的基本需要这个概念的合理性和重要性的同时,不要忘记这个概念的使用有时会导致严重伤害。在设计任何可以接受的需要观念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保证不能以独裁主义和家长式的方式使用这种观念。福利制度必须以某种方式把个人满足需要的权利以及决定这种满足如何得到实现的参与权结合起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福利提供问题和有效的民主制度密切相关,无法分割。一套成功的人类需要理论必须既要说明“为什么”又要说明“怎么样”。换言之,在建立这样一种理论并且说明其在实践中的用法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实质性和程序化的。

第一部分仔细分析并且拒绝了人的需要可以简化为个人或集体偏好的各种论点,提出了个人和文化相对性的问题。同时,我们还探讨了普通言论中“需要”的基本原理,说明了它与相对主义的一些更广泛的论点之间的关系。

第二部分论证了“健康”和“自主”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并且进一步证明所有的人都有权优化需要的满足。要想实现这一点,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先决条件——政治、经济和生态等方面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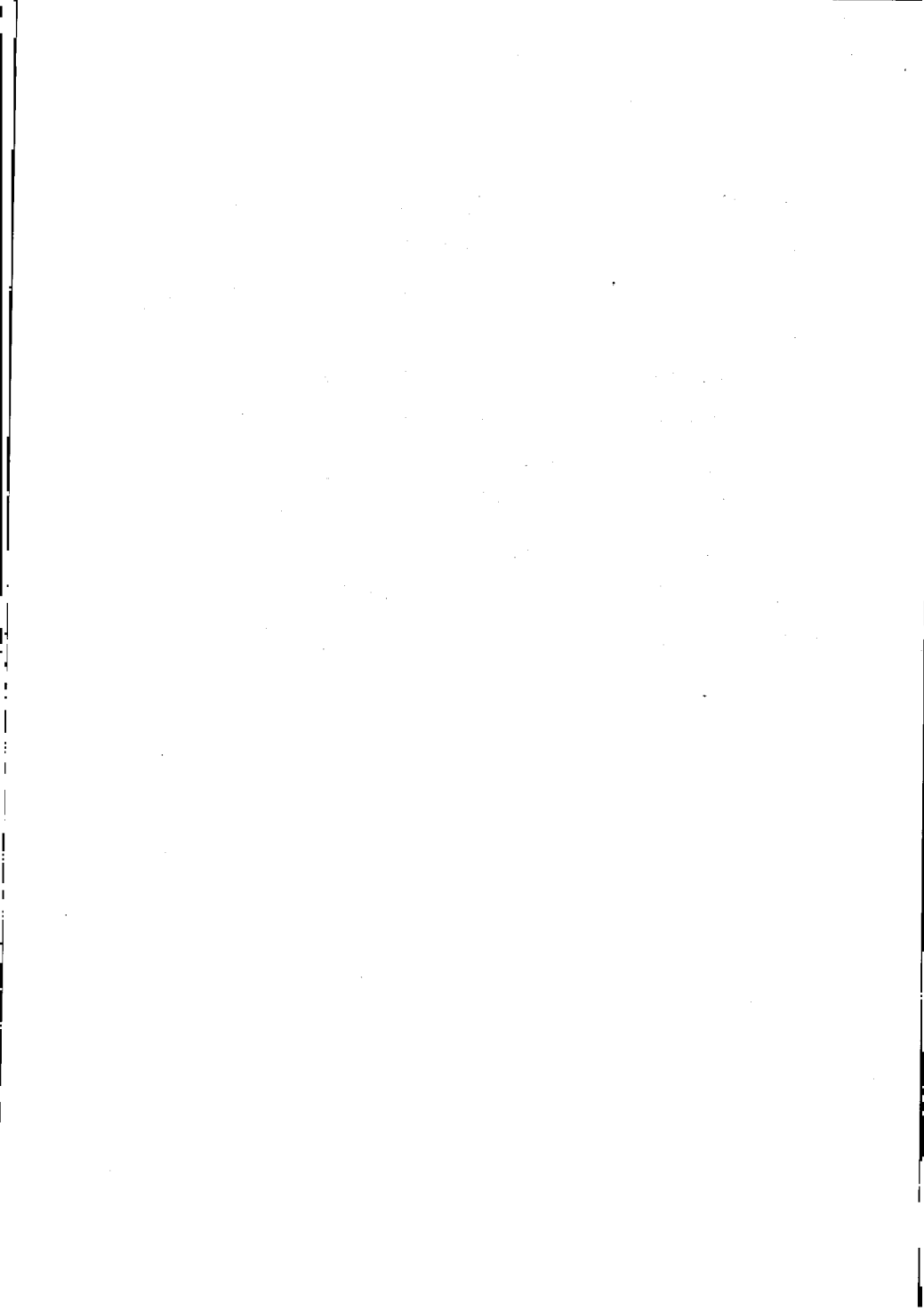
在第三部分里,我们把这套新的需要理论进行了实际操作,分清普遍需要和与文化相关的满足需要方式之间的差异,明确了基本需要指标和“中间”需要指标,并且运用这些指标绘制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人类福利图。

我们认为,人的需要既不是莫衷一是、见仁见智的主观偏好,也不是计划者或政党官员心目中的静态内容。需要具有普遍性和可知性,但是我们对于需要本身以及对于满足需要所必需的条件理解是动态的、开放的。本书第四部分作出结论,赞同最近提出的混合经济的建议。混合经济结合了中央计划和民主决策,是一种优化需要满足的“双重战略”。

- 5 在探讨这些思想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处境,个人在关乎人的需要的政治中的重要性。有时人们认为,当个人需要的道德重要性在政治上被减小到最低限度时,集体将会从中获利——例如,通过强制实行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然而同时,如果以集体的名义过于忽视个人的自由和隐私,那么就会有因小失大的危险。如果没有清楚明晰、安全可靠的参数来衡量个人的自我

表达和私人所有权,就会失去实行再分配的理由——即失去了个人作为一个人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可能性。

在介绍下文中人的需要理论时,我们不满足于强调这种矛盾冲突,还要以某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努力做到这一点的同时,还希望声援一种论点,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接受的观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许多经典原则之间水火不容,是一个虚幻的错觉。国家社会主义的不断崩溃已经表明,如果不尊重个人的权利,社会主义原则就会成为危险的抽象概念。然而,剥削和剥夺权利的现象在整个西方世界普遍存在,这种状况也表明,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形式保证如果忽视了个人表达的物质前提,也可能以同样的方式破坏自由主义的原则。



第一部分

相对主义与人的需要问题

卷一

卷一

第 1 章 谁需要人的需要？

9

滥用客观、普遍的人的需要概念导致了怀疑论和幻想的破灭。这种状况促使人们对成功的社会主义政治前景丧失信心、使福利公民权受到威胁、导致反抗各类压迫的政治斗争分崩离析，并且因为上述所有后果，增强了“新右派”在知识界的影响力。许多人认为，把需要等同于主观偏好在道义上更稳妥，在思想上更完备。他们还认为，只有个人或某些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可以决定对自己的需要作出优先选择。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我们都有相同的需要，显然与这种相对主义的说法不一致。因此，我们必须从探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相对主义观点着手。

正统经济学：需要就是偏好

在正统经济学家看来，需要的“客观性”值得怀疑。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关于“谁需要什么”这个问题意见不一，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认为“偏好”(preference)和“需求”(demand)这两个概念足以满足实证和规范经济理论的需要。所以，仅仅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对食物的偏好高于对时装的偏好，并不意味着服装意识较强的少数人可能不会作出合理的、相反的选择。这些选择有相同的本体

论和道德上的地位——它们是消费者的需求,收入支出可能、也有
 10 可能不能对其产生影响。有人认为,需要不过表示了许多人共同拥有的偏好并劝说政府接受了它们,这种观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社会需要就是社会确定的需求,这些需求很重要,是经过社会认可、通过政府干预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内维特(Nevitt),1977,第115页;参考威廉斯(Williams),1974)。

因此,正统福利经济学阐明了两条根本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利益的主观概念:即前提是一个人(或者常常是家庭)是判定自身利益正确性的唯一权威,这种利益从狭义上说也就是他们的想要(wants)。根据这个前提,第二个原则是私人主权: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产品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应该由个人的私人消费和工作偏好决定(彭茨(Penz),1986,第55页;参考第40页)。在上一个世纪里,这两个原则都受到了众多非议。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为新古典经济学忽视需要的概念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理论基础。

人们采取了多种途径把第一条原则转变为一种可操作性的评价福利的方法。早期理论依赖于功利主义思想,并假定能力是平等的,分析物品对主观快乐或幸福的贡献。^① 后来,该理论得到了调整,改为评价愿望的达成,而愿望的达成通过市场环境中所提供的选择来表达。从这里再向前迈出一小步,就是把福利直接等同

① 这种“感情平等”的观点并不是意味着每个人对于同样的快乐刺激作出相同的反应。例如,业已富足的人得到的快乐要少于穷人。因此,它不是基于市场原则的再分配计划,似乎是通过幸福最大化的要求以及计算边际效用提出来的。支持自由市场的古典功利主义者,例如本瑟姆(Bentham),反对这个结论。他们的根据是,如果没有自由市场提供的激励机制,就不会有如此多的财富,每个人的幸福感就会大为减少(古特曼(Gutmann),1980,第20~27页)。

于人们的富裕程度和实际收入,用人们消费的商品向量来测度(森(Sen),1985,第3章;1987,第5~17页)。这样就可以断言,主观想要的满足可以科学地计算出来,所以可以用主观想要的满足来评价事态或政策。这些途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彻底否定客观普遍的需要概念。

新右派:需要是危险的

与这种把需要隐晦地等同于偏好的理论有关的是最近出现的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的论点。他们认为,一旦接受了一些人有权通过立法决定其他人需要什么¹¹的观点,就很有可能沦为专制主义。如果人民的心声一开始就被政府当做败坏了的商品,因为不闻不问或自利而受到了糟蹋,那么就不难想象接下来就会是(政府)滥用权力并侵犯个人的自由。这种做法有些情节相对轻微,例如,为了未经民主通过的目的而小幅度增加税收;有些则非常严重,例如,以满足公众实际需要的名义实质性地限制政治自由(弗卢(Flew),1977,第213~228页;参考麦金尼斯(McInnes),1977,第229~243页)。新右派理论家们都认为,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求助于市场,而不是广泛的国家福利,这是一种道德高尚而且更为有效的分配资源和确定目标的方法(格林(Green),1987,第一部分)。

接受这个论点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在正义原则方面没有集体认同的基础,在判定某种财富分配方式的正确性上缺乏一致认同的标准。例如,保守主义理论家(如哈耶克(Hayek)和诺日克

(Nozick))认为,福利最终必须采取慈善的方式才能在道德上得到认可。必须让个人或多或少地或完全选择他们的需要、让他们根据自己对别人需要的看法选择应该承担的支出。新右派理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格雷(Gray)强调了这一点:“基本需要的客观性同样令人迷惑。需要不能被赋予合理的跨文化内涵,但是人们却认为在不同的道德传统中,需要各不相同……正如哈耶克所言,当代社会正义理念的一个主要功能可能就是要产生一种道德一致性的幻觉,而实际上各种价值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格雷,1983,第182页)。换言之,基本的人类需要只不过是一个危险而教条的、形而上的幻想。

如果富人的偏好被认为与穷人的偏好具有相同的道德合理性,那么将会强化鼓励个人资本积累的社会制度。对于右派的功利主义者来说,具有道德优先权的是大多数人的财富和消费力。对于诺日克的自由意志主义追随者来说,道德力转变为个人随意处置私有财产的权利,即使会导致大面积的贫困和苦难。然而,对于两者来说,人需要和不需要什么是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决定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需要是历史形成的

支持毫无拘束的资本主义的人应该赞同上述观点,这一点毫不奇怪。令人惊奇的是一些社会主义者也能够赞同由此派生的文化相对论。为了探讨这个悖论,我们必须从马克思开始。一方面,他相信客观人类需要的存在,这似乎没有什么问题。马克思雄辩

地谴责了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劳动者通过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劳动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压迫”、“降低个人的尊严”、“积聚苦难”、“摧残肉体和精神”、“无耻地引导和野蛮地剥削”、“现代奴隶制”、“镇压”、“恐怖”、“折磨”、“野蛮地”延长劳动时间以及“以谋杀的方式血腥地”追求经济利益,资本“浪费并且滥用”了劳动力,“无休止地强迫人们作出牺牲”(卢克斯(Lukes),1985,第11页)。在20世纪,那些进一步奠定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的人也都持有相同的观点。所有的人有一些共同的要求,这些要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将会使个人受到的伤害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显然,如果没有这个信念,如此谴责资本主义制度在道义上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然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同样认为,试图使人性听命于生物或文化限制的做法是一种误解,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一系列研究相同问题的当代哲学和社会学方法出现之前他就认为,个性的形成与语言、与我们学习的广泛行为规范和手脑技能的方式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联系(多亚尔和哈里斯(Doyal and Harris),1986,第80~88页;埃尔斯特(Elster),1985,第62~64页)。自我意识和个人身份正是从这些社会应用中产生出来的。对于马克思而言,在塑造人的身份方面,社会环境的经济因素是迄今最为重要的。如果这些条件不同,那么个人对于自我的概念也将不同——自然还是不自然、可能还是不可能、有害还是有益、好还是坏、正常还是不正常,都会有所不同。这将意味着,出于同样的原因,个人对于需要的认识也会存在最深刻的差异。

可以理解,这种立场对于马克思和所有社会主义者来说颇具

- 13 吸引力。用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确定人性的界线的做法,似乎毫无必要地把人的意识冻结在特定的文化和时间中。换言之,如果使人的需要具体化——具有一种像事物一样、静态的或物理的性质,那么个人就会在改变那些抑制他们自我探索的物理、个人和社会环境方面受到约束。把社会“经济基础”方面的改造置于优先地位、使其成为这种变化的主要动力的思想,打开了通往人类所期望和想象的根本改变整个上层建筑的道路,尤其是针对那些人类相信自己需要并且有权利需求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结构独特,确实导致了人类生产力和物质期望爆炸性地提高,结果招致一套“不断丰富的需要制度”。^①而这些新需要不仅仅是人类精神创造力的证明,通过强调可能会怎么样——富足充裕的前景和创造财富者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它们还在大面积的贫困和剥削之中,播下了反抗的种子。

赫勒(Heller)把这种关于普遍人类需要的怀疑论的观点推向了逻辑上的极端。她认为,恰恰是因为社会对人的意识以及判断人类基本需要的标准的整体影响,我们不可能比较各种文化在最大限度满足需要方面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结构只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它不能被用来评判任何其他社会,最不适宜用来评判‘相关生产者’(associated producers)的社会”(赫勒,1976,第96~97页;参考斯普林博格,1981,第198~213页)。总

^① 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斯普林博格(Springborg)(1981),第6章;埃尔斯特(1985),第71~77页。索珀(Soper)(1980)在第2~8章中阐明了马克思似乎否认客观需要概念的一系列方式,但是又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杰拉斯(Geras)(1983,第49~54页)总结了一系列其他评论家的观点,他们都认为这是唯一的一面。

之,人的需要与社会相关,它规定的只是一些人群相对于其他需要的偏好。处在某种文化和社会形式中的人试图把自己的基本需要观念强加给其他人,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在追求特定群体的利益。

文化帝国主义的评论: 需要具有群体特征

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关注以不同形式广泛存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观点受到欢迎反映出人们对于一些事实非常敏感:那些掌权者认为他们知道什么对无权者来说是最好的,因此总可以使其任意行使权力的行为合法化。也就是说,被统治者的偏好被降¹⁴格,低于统治者为他们确定的“实际”需要。这些论点描述了一种意识形态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资本主义不断蹂躏那些被它在经济和文化上殖民的传统社会。殖民者通过灌输一种在西方“进步”面前相形见绌而又无可奈何的观念,使他们的经济统治合法化。摒弃普遍需要的概念也是当代更多反抗压迫斗争背景的一部分。在此,人类解放等同于被压迫群体重新争取决定他们自己将把什么偏好当做需要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中,有时人们认为普遍需要的概念必然会有利于实行独裁统治的压迫者(里斯特(Rist),1980,第233~253页)。

这个论点从需要等同于个人自主偏好的观点转向接受客观需要的存在的观点,但是又认为客观需要只能由特定的被压迫群体决定。人们要求有关人类需要的真理,但是不同的群体对真理有不同的认识。再往前迈出一小步就是把群体需要等同于群体偏

好。它表面上似乎承认特定群体的客观需要,但实际上却倒退为一个集体而不是个人差异的主观主义。这种倒退可以进一步通过三个关于需要的政治实例加以说明:极端反种族主义、反性别主义和反科学至上主义的观点。

让我们从反种族主义开始,基本要点非常清楚。大量材料证明,来自许多不同背景的黑人受到了各种方式的歧视。种族主义的典型实例众所周知,无需在此进一步描述。然而,在对所有这些种族主义的表现深恶痛绝的同时,一些当代理论家们——既有黑人也有白人——走得更远,他们似乎否定所有种族和民族之间存在任何共同的人类需要基础。这种观点是沙阿(Shah)提出的,她曾经这样写道:“每当白人……尝试评价黑人,他们总是提出一种歪曲的分析结论。因为黑人的方式与白人不同,白人就是不屑于花费功夫去得出一个正确的理解,所以黑人的经历总是被曲解、被忽视”(沙阿,1989,第183页;参考史密斯(Smith),1983,第113页)。

- 15 文化/生物决定论就像一把覆盖一切的巨伞,令人无法逃避。它不仅影响那些我们都知道的、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者。它损害了所有白人的形象——甚至那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盟友的白人。例如,许多女权主义者批评一些文化习惯,如包办婚姻、深闺习俗和妇女割礼,认为这些习俗是对黑人女性的压迫和客观伤害。然而,这些观点受到了一些极端反种族主义者的抨击,他们认为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论调,损害了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的尊严,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显然受到了攻击。这些极端反种族主义者公开或含蓄地表示,这些评论家采用这种带有偏见观点的背后是他们的“白

人身份”，他们明确指出的基本需要实际上只不过他们自己的文化偏好。这些观点所暗示的只是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个白人统治的世界里，只有黑人才可以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①

在一些反对性别主义的“极端女权主义”观点中，存在类似的现象。毫无疑问，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在各种文化中，女性都受到了男性的剥削和虐待。在反抗所有这些不平等待遇的斗争中，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性天生好斗，具有暴力、统治和剥削的倾向。不同的理论家解释这些倾向的方式各不相同。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生物学方面的原因和形成男性意识的父权文化。据说，文化的决定作用和心理/社会生物学方面的原因结合在一起，可以解释父权制的普遍性以及男性为什么明显不能采取其他的行为方式。

对于这个问题，德沃金(Dworkin)(1980,第288页)的观点在逻辑上走到了极端，他认为：“一个人可以知道一切，但是心底仍然拒绝承认毁灭女性是男性意义和身份的根源”。戴利(Daly)(1984,第363页)同样悲观，声称在男人和女人共同生活的“男权制度”中，前者“彻底脱离了宇宙万物自然的和谐”，受到“恶魔般的占有欲”的驱动。这种观点甚至被人发挥到极限，认为存在一种女性“理性”和“女权主义方法论”，必须用它们来代替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因为传统方法也由于父权背景而受到玷污。例如，斯坦利

① 有关白人女权主义者的这种评论受到抨击的例子，请参看：利斯(Lees)，1986，第92~101页。这种评论不仅限于白人女权主义者。例如，参看古苏布(Ghous-soub)，1987，第16~18页以及卡比尔(Kabeer)，1988，第100~108页。最近的与女权主义和社会工作有关的极端反种族主义的例子，参看沙阿，1989，第178~191页。在威廉斯1987，第4~29页中有一个有用的参考书目和对类似观点表示同情的总结。当然，我们并非暗示在此列举的所有对种族主义的批评都是完整和激进的。

和怀斯(Stanley and Wise, 1983, 第 117 页)认为,“女性的经历形成了一种对现实不同的看法,一种完全不同的本体论或了解世界16 的意义的行为方式”。如果这些观点被人们接受,那么,和反种族主义的情况一样,结果就是“群体相对主义”,这次是以本质论(essentialism)的伪装出现,从种族问题转换到性别问题。在一个男性统治的世界里,只有女性才可以知道她们自己需要什么。^①

的确,科学知识本身可以被看成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科学知识的发展产生于“社会关系”之中,它不过是对社会关系的反映。这将意味着,所有试图用科学方法决定人类需要性质的做法也是殊途同归。例如,阿罗诺维茨(Aronowitz)认为,“知识的科学目的与现行的社会和技术的劳动分工密切联系”,这意味着“既然科学、魔术和宗教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系,因为它们都声称要对自然和社会现象提出一种满意的解释,那么如果没有明确社会一历史背景,任何断定孰优孰劣的观点都属于种族中心主义之列,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一历史背景倾向于把所有的论述都归入其理性目的行为体系之中”(阿罗诺维茨,1988,第 320、340~341 页;参考扬(Young),1977,第 65~118 页)。

总之,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达到了令人可怕的地步,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科学技术的结构和内容中明显包含了资本主义破坏性和剥削的关系。我们再也没有普遍性的科学了;我们只有“资产阶级的”、“白人的”、“男性的”科学。因此,科学也许能够清楚地表

^① 关于这种极端女权主义思想,参看格里姆肖(Grimshaw)(1986)和西格尔(Segal)(1987)。与极端反种族主义一样,我们在此只不过是强调一些极端的倾向,一些(但并不是全部)极端女权主义论著中,或多或少地显示出这种倾向。

明如何最好地确定和满足人的需要,这一点被视为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大骗局。只有在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产生出这项任务所必需的根本科学之后,个人的“根本需要”(赫勒的说法)才可能被人们正确理解(赫勒(Heller),1976,第4~5章;莱博维茨(Lebowitz),1979,第349~355页)。根据这种观点,至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似乎没有任何人真正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极端民主主义者:需要是无边际的

只有个人或特定社会群体能够最终确定他们“需要”的范围和实质,这种观点还涉及更广的范围。例如,一些当代社会评论家如 17 沃尔泽(Walzer)、莱克劳(Laclau)、莫夫和基恩(Mouffe and Keane)在否定前者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后者各种决定论的同时,似乎对彻底的民主改革更感兴趣。他们赞同民主和多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似乎是不同群体决定各自需要的观点所固有的。因此,它与马克思以及当代许多哲学和心理学的观点有相同之处,认为个人的身份(包括个人选择的界限)必须被理解为来自社会环境。集体的成员应该通过创造性地探索那些把他们作为成员约束在一起的语言和规则,来享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够扩展自己个人身份的界限,最终提高集体自身合乎规范的丰裕程度。

沃尔泽用他的“综合平等”(complex equality)理论总结了这些观点,他的这个理论最近在政治理论家之间引起了许多讨论。在确定人类需要的问题上,他强调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

的重要性：

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分开。但他们能够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一起生活……他们认可而且创造彼此的需要，并且因此规定了一种特定的形式，我将称之为“安全和福利范畴”（沃尔泽，1983，第65页；参考拉斯廷（Rustin），1985，第3章）。

这就是为什么归根结底个人需要最终不可避免地要与集体就如何得到满足需要的共同目标和信念（即偏好）联系在一起。个人需要的实质内容由于“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观念”而各不相同。应该承认，沃尔泽的相对主义是有所保留的，因为他也承认，人类需要的属性有一些客观的界限，在文化方面不容忽视。^①

莱克劳和莫夫没有这种疑虑。他们认为，对于不同的群体，是语言“构成”了他们理解自然和社会世界的方式——而且不同群体使用语言的方式不同。因此，通过语言设置的各种现实都有同等的合理性，因为除了可以在不同的解释之间作出裁决的经历之外，并没有什么“真理”，也没有什么“普遍性”。莱克劳和莫夫把这种认识论的不确定性和类似于沃尔泽的那种支持政治多元论的观点
18 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一种毫无拘束的相对主义，背弃了一切认为某种生活方式比另一种生活方式更优越或更“进步”的“决定论”

① 尽管这样说，但是沃尔泽不清楚如何使这些约束概念化，因为他还十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概念化本身发生在规范的结构中（沃尔泽，1983，第3章）。

和“实质论”的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观点:“多元论只有一点比较激进,即这种身份多元性的每一项都能在自身找到其有效性的原则”(莱克劳和莫夫,1985,第167页)。有人认为在评价不同的社会形式时,应该把它们在满足普遍利益方面的成功考虑在内,这种观点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否定:“利益……是一种社会产品,并不独立存在于承载这些利益的代理人的意识之外”(莱克劳和莫夫,1987,第96页)。因此,他们认为需要包含在一种“漫无边际的立场”中,这种立场在不同文化中是可以变化的,它构成了个人的主观意识。

另外有些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和个人之间寻找一种更健康的平衡,他们提出了一个更为谨慎的相对主义的观点。例如,基恩在论述公民社会的著作中设想出许多把自己的个性(即他们各自定义的不同需要)与国家的集中性对立起来的群体,并且认为这对于所有人的福利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像莱克劳和莫夫一样,他也明确接受文化相对论,这种文化相对论的根源是否认这些定义之间存在任何普遍适用的联系:

捍卫相对主义要求有一个完全现代的社会和政治立场。它意味着必须建立和加强一个包括公共领域多元化的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其中个人和群体能够公开表达与其他人一致的(或对立的)理想。如果按照这种新的方法理解,民主化的概念将会抛弃徒劳地探索……不再寻求确切的人类存在的真理。它将教我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告别一种假定的“人类解放的历史动因”,因为它将永远抛弃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意识

形态概念——秩序、历史、进步、人性、自然、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基恩,1988,第238页)。

这正是我们要找的。虽然基恩并没有对细节进行辩解,他认为相对主义与所有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不一致,这一点肯定是正
19 确的。他唯一的省略就是,不公开否定普遍人类需要的存在,尽管他在写“人性”的时候,心里可能有过类似的想法。基恩的想法代表了各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劳森(Lawson),1985)。^①

现象学的观点：需要是社会造就的

最后,一个非常不同的理论学科——当代社会学范畴内的现象学和人种方法学思潮——对一些抽象的范畴提出了类似的质问,他们认为在这些范畴内构成日常生活现实的复杂谈判(complex negotiations)和个人意义受到忽视和歪曲。在此,那些客观和普遍特性的观点,例如认为存在把我们作为人联系在一起、不考虑文化因素的客观需要,再一次遭到否定。根据这种观点,社会科学应该主要研究构成日常生活的意义的复杂谈判。如果不是这样,关于社会现实的观点就是一个“由科学观察家虚构的、不存在的世界”——这又是一个帝国主义式的、强加于人的观点,不过是

^① 这并不是否定基恩在《民主与公民社会》(*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中的其他论点。他书中的其他章节的确有利于我们在本章中的观点。

反映了相关社会科学家的偏见和利益(舒茨(Schutz),1965,第58页)。一些人种方法学家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认为,“每一个现实同等真实”,而且“没有一个现实比其他任何现实包含更多的真实性”(梅安(Mehan)和伍德(Wood),1975,第37页)。这些学者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目的非常清楚:质疑所有由一些群体(在此是一些专业学者)强加给其他群体的解释性和道德范畴。在这种程度上,他们将会赞同罗蒂(Rorty)的辩辞:“最终……重要的不是我们拨乱反正的希望,而是我们对其他团结在一起与黑暗无知斗争的人们的忠诚”(罗蒂,1980,第727页)。

史密斯的著作与这种传统一脉相承,他认为,在研究人的需要时,人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尽可能地准确描述各种常见话语中发现的不同主观需要观念,描述它们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使用方式(史密斯,1980,第68~75页)。在关于社会福利的话语中出现的“传统”需要观念受到了批评,被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它们赋予了“客户”(client)“客观的”、可以衡量的、静态的特征。相反,他认为,需要是一种动态的社会构成,在实际中密切依赖于职业实践。在一项有关苏格兰的社会服务部门的研究中,史密斯向人们展示²⁰了不同的职业群体如何解释和构造客户的需要。这表明“需要”反映了特定职业的意识形态、官僚机构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过程中受到的某些实际约束(史密斯,1980,第5、6章;福斯特(Foster),1983,第32页)。至此,我们应该非常熟悉这个含蓄的信息:只有客户才真正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

关于剥夺和贫困的现代研究也经常松散地运用现象学的观点。这些研究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直接相关,因为剥夺经常被定

义为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贫困被定义为缺乏满足需要所必需的物质和金钱资源。从汤森(Townsend, 1962)和朗西曼(Runciman, 1966)开创先河的著作开始,人们广泛认同剥夺与时间和空间有关。剥夺的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依赖于剥夺所处的社会状况(群体、社区、社会)。的确,需要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成员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协作和习俗。因此,汤森认为,不同商品和状况的意义有必要具有可变性:

住所(shelter)概念不只是与气候和温度有关,而且与社会会为住所确定的用途有关,难道不是这样吗?三只小猪对住所的意义就有不同的看法。住所包含了做饭、工作和娱乐空间以及隐私的概念,还包含了更高层次上的文化概念,如温暖、湿度、特定家庭成员的隔离以及诸如睡觉、做饭、洗衣、排泄等不同的功能。

即使“饥饿”也有广泛的解释余地,而且“足可以证明是一个相对的社会概念”(汤森,1985,第667、664页)。由于这些原因,“‘绝对需要’的概念应该被抛弃”(汤森,1981,第21页)。

因此,在现代思潮中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共识,认为普遍和客观的人类需要并不存在或无法合理地阐明。至此,读者肯定会纳闷,

21 这本书后面还有什么可说的?从政治上的右翼、左翼到中间派,从传统学科到后现代主义思想,从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到话语理论,从极端女权主义到反种族主义,指控完全一致:追求普遍和客观的

需要无异于寻找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然而,更加深入仔细的研究表明,所有这些学派的思想都存在问题,他们含蓄或公开谴责的东西又恰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在下一章里,我们将探讨这个尴尬事实的深刻含义。

第2章 人类需要的必然性

“社会进步”这个概念的合理性依赖于一种信念，即一些社会组织模式比其他模式更适合于满足人的需要。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声称促进社会进步的政策可以增加需要的满足，否则，它们的道德意图将会很模糊。从维护和改善福利制度的各种尝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根据各国在福利提供方面的差异以及各国国内不同等级的福利待遇，我们需要某种标准来鉴别什么是好的福利制度，什么是不好的福利制度，以便能够维护某种福利制度，改革其他福利制度。这再一次说明，似乎只有一个合理的客观需要的概念才能担此重任。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在本书中探讨并且解除相对主义对这个概念造成的威胁。在此，我们首先针对前一章中列举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相对主义，揭示它们的内部矛盾和紧张关系。虽然它们都拒绝接受普遍的人类需要的概念，但是实际上这些立场全都在暗地里把这个概念作为自己的先决条件。

正统经济学：评价的循环

从表面上看，如果说有任何学科能够摒弃“需要”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学科必定就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及其规范的对应学科——

福利经济学。但是它果真如此吗？事实上，在想要的满足(want-satisfaction)和消费者主权原则中的相互矛盾太多，衡量对想要的满足的标准也存在太多的问题，福利经济学不能没有某种其他的、存²³在于个人主观偏好之外的福利标准。让我们逐一考虑这些问题。

一旦我们承认人的知识和理性的局限性，那么个人是判断他们自身想要的正确性的唯一权威这个观点就要大打折扣。“基于无知的想要在认识上是非理性的”，而且关于未来事件和远期偏好的实用理性也存在进一步的局限(彭茨，1986，第63页，第5章；森，1970)。“评估的循环”带来了另一个严重问题。如果想要是由制度和满足那些想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所决定的，那么它们就不能提供一个独立的、用以评估那些制度和过程的运行状态的立足点。“被评估的对象部分地决定了评估的标准”(彭茨，1986，第87页；参考斯蒂德曼(Steedman)，1989，第11章)。虽然想要可以直接地创造出来，就像现代广告宣传所做的那样，但是更加普遍深入的是社会化和以往的想要模式的间接影响(彭茨，1986，第6章)。

即使我们暂时把这些弱点搁在一边，我们也会发现，在比较想要结构有所不同的人的想要满足以及在排列想要满足层次的高低时，还存在许多问题。森利用图形表明，衡量福利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传统把福利等同于欲望的满足，忽视了人们降低自己的欲望、接受命运安排的所有方式：

我们对于实际得到了什么和合理地期望能够得到什么的心理反应可能经常需要对严峻的现实作出妥协。赤贫者沦为乞丐，劳动者没有土地，脆弱不堪，为了维持生计而艰难地挣

扎,佣人整天超时工作,家庭妇女忍辱负重,接受命运安排的角色,所有这些都屈从于各自不同的困境。平凡的生存需要忍受,剥夺的问题就这样被悄然无声地压制下去(森,1985,第21~22页)。

相反,如同解释福利的“富裕论”那样,把个人状况等同于他或
24 她财产的多少是不能允许的(森,1985,第23页)。无论根据哪一种解释,福利经济学都缺乏一个比较人的福利的客观基础。

最后,许多著名的评论家攻击市场作为满足个人想要的安排。他们破坏了消费者主权的原则。例如,他们引用了一些“市场失败”的例子,如个人行为对第三方和环境的外部影响,以及寻求通过市场解决“社会”想要和隐性偏好时出现的问题。效率和分配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不利于把效率测度与分配决断分离开来。此外,“囚犯的困境”问题对于把自由市场作为一种选择条件的好处提出了疑问。个人也许更希望控制枪支,而不愿拥有枪支,然而,前者的缺乏表达了市场对后者的偏好(彭茨,1986,第3章)。

在此,我们主要依赖于彭茨的分析。他从这类问题和矛盾中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如果没有额外的规范性评判标准,既不包含在偏好原则中也不为偏好原则所需,那么想要的满足就是一个无法衡量的原则”。第二,如果要制定这种外部的规范性评判标准,就需要:

在想要的满足原则中插入这些标准将会改变这种原则根本的开放性和主观性特征。然而,如果不插入这些标准,无知

与非理性的问题、评估循环的问题以及不相容的问题就会悬而未决。这种两难的困境完美地反映了想要满足原则以及基于这个原则的主权概念的缺陷(彭茨,1986,第132、136页)。

彭茨认为,这些“额外的规范性评判标准”的最佳选择就是某种人类需要的概念。

新右派：终究还是普遍性

当我们考虑新右派理论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一个隐含的非偏好标准——认为某些偏好在客观上比其他偏好更重要。这个观点²⁵的支持者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在道德上并不是中立的。他们相信资本主义是一件好事——资本主义所能够产生的生产力和自由是值得鼓励和维护的。从一种更为复杂的角度看,这不仅回到了挑战个人偏好的某些价值观上,而且还回到了代表严重伤害和需要的价值上。其论点是,从长远看,个人和/或集体将会更加富裕——他们的利益将会得到更好的服务——如果他们偏爱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其他制度(格里芬(Griffin),1986,第31~37页)。

但是这个论点暗含着某种客观目的,这个目的本身并非一个理性偏好的问题。因为与这个目的相矛盾的任何偏好,无论它是什么,都将被视为非理性的。假设某人宁愿最大限度地使自己或他人不幸福,一个保守的功利主义者不可能把这种偏好视为理性的。如果将其所采取的行动作出无论多么正确的计算,——因而在狭义上得出“理性”的结论——也不会改变这个保守功利主义者

的看法。假如一个人成功地计划将自己的税赋任意提高,以便尽可能频繁地使自己的自主权不断受到相应的侵害,像诺日克这样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对这个现象的看法会大致相同。我们最终又一次碰到了另一种形式的“评价循环”——在人们看来,理性偏好可以变为客观公正的标准,让它们自己决定偏好的合理性(霍利斯(Hollis),1987,第5~6章;参考彭茨,1986,第5~6章)。

走出这种循环的一个方法就是明确区分巴里(Barry)提出的“注重想要”(want regarding)原则和“注重理想”(ideal-regarding)原则,相对主义者可能会选择这个方法(1990,第3章第3节)。注重想要的原则在评估政策的时候把人们偶然的想要当做既定的,而不关心其他标准。注重理想的原则包含其他标准,对于避免上述评价循环至关重要(巴里,1990,第44~52页)。但是后者有必要采用类似需要这样的概念吗?巴里和许多支持这种分类的人都认为没有必要。他们并不认为在所有的生活方式中存在共同的评估标准的观点可以由此得到证实。假如某些理想被采纳而且与想要区别开来,那么合理的行为仍然可以从不合理的错误中区别开来。

这个论点的困难在于,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错误有相同的
26 客观后果,与发生错误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无关。例如,股票市场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中才能看到。在市场上损失少量的金钱的后果是不能通过这些方式得到理解的。在许多文化中没有股票市场,也没有亲身经历的机会。然而,一个很小的、具有文化特征的、无关紧要的错误与一个导致连饭都吃不起的错误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后一种情况下,人受到了客观的伤害,这种伤害类似于在其他形式的社会里其他类型的错误可能带来的伤害。这种伤害

的原因——最终也就是错误对于受害者的重要性——就是基本需要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需要的概念使人们能够比较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中的伤害。因此,新自由主义强调自我决定的个人权利的观点不能通过使需要等同于偏好得到论证——然而这种权利可以根据其他观点加以证明。

最后,新右派对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效率和道德正义性的证明依赖于经济竞争对手之间可比的适应性(fitness)概念。一匹精心喂养、训练有素的纯种马和一匹饿得要死、未经训练的弩马之间的比赛根本不能称之为比赛(布朗(Brown),1986,第96页)。然而,这种适应性的可能性以及竞争者之间的公平性,预先假定身体、感情和教育方面的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而这些需要不能简化为主观偏好。正如赛马需要燕麦而不需要方糖,成功的商人和工人需要的可能是充足的食物和适当的教育。

诺日克支持这样一种假说,认为应该彻底废除个人通过侵犯他人过去的权利赢得的不公平市场优势(诺日克,1974,第231页)。有什么别的原因使得这种侵权很重要吗?当哈耶克认为国家应该提供一个防止贫困的最低“安全网”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哈耶克的观点是从绝对而不是相对意义上构思出来的。因此,这个观点必须与某种客观需要的概念相符,关于这个概念应该可以达成共识(哈耶克,1960,第303页)。正如普兰特(Plant, 27 1989,第14~15页)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需要是一个开放的、富有弹性的概念,在社会中没有一致的支撑点,但是,他们自己把贫困看做一种绝对的需要标准,或者把福利看做对这种绝对标准的满足,这种观点假定有某种清晰、一致的需要标准”。

换言之,明确否定基本需要的存在却是常常在暗地里接受这个观点。当然,否定是可以理解的。既然个人的自我决定是这个信念的核心,即资本主义制度是在道德上最公正、在生产方面最高效的社会,那么,承认任何可能证明个人偏好本身有问题的标准都不利于他们的政治目的。

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愤世嫉俗的目光

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历史、文化和经济的决定作用否认普遍的人类需要,这种意愿也同样容易理解。然而,这样做导致了类似的问题。批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某种区别需要和偏好的评估标准——认为并非人性的一切都与历史有关。其结果导致了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有关需要和人性的两个观点之间的对立,一个是毫不妥协的相对主义观点,另一个是含蓄或明确的普遍主义观点(索珀,1981,第2章)。直到最近,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一直附和并且阐述相对主义而不是普遍主义思想(杰拉斯,1983,第1章)。如李(Lee)所言,这使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中对需要的满足时产生了一种“愤世嫉俗的目光”(李和拉班(Lee and Raban),1988,第4章)。

什么算是需要满足?应该由市场还是由国家提供?认为这些问题中包含了一些有害的、降低人格和压迫性的因素是一回事。但是谴责全部和大多数的国家行为显然非常愚蠢,而且在实践中很难证实,无论这些行为有多么明显的消除苦难的价值。事实上,福利制度很矛盾,从某些角度有利于改善人的状况,从其他角度又起

到相反的作用(高夫,1979,第11~15页)。否认这一点,即把“真实需要”的表达和满足与体制革命性的变化联系起来,但同时又宣称明确这种变化想要达到的目的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将会造成将来缺乏实质内容。早期的基督徒着迷于身后世界,黑格尔称之为“不幸福意识”。上述观点正是黑格尔这个观点的世俗对应物(黑格尔,1977,第126~138页;参考诺曼(Norman),1976,第59~64页)。

如果否认人们在取得革命性成功的前后有相同的需要——如果只有在取得成功以后才能合理确定“根本需要”(赫勒)——那么怎么能够确定成功本身呢?毫无疑问,针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全部要点在于将生活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的生活作出极大改善。然而,只有通过对比人们对此时此地没有实现的需要的看法,才能衡量革命进步的潜力。基本需要的概念对于准确说明这些不足之处到底是什么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可以补救是至关重要的(索珀,1980,第213~218页;杰拉斯,1983,第107~116页)。要使他们的政治纲领观点明确,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信奉人类需要的存在,这种需要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任何地方、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政治认识到并且吸收了人的自由和潜力受到普遍约束的思想,在20世纪末这个观点也越来越被人们接受。在此,源于心理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困境至关重要。关于心理学,弗洛伊德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社团政治(communal politics)必须考虑个人内心中普遍的精神冲突,这种冲突不会被化解为某种后共产主义的“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索珀,1981,第8章;拉斯廷,1989)。关于人的能力在生物

方面的局限性,廷帕纳罗(Timpanaro)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975,第50、45~54页):“爱、人类存在的短暂和脆弱……年老体衰……对自己死亡的恐惧以及对别人死亡的悲哀”,所有这些都是常数,都是人类状况(human condition)的特征,尽管它们在不同文化、不同时期里有不同的经历方式。

现在,在这两个约束中又增加了一个生态约束。“如果生态学假说是有效的”,恩岑斯贝格尔(Enzensberger)写道:

29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也许抛弃了实现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解计划的机会。资产阶级社会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已经被同时释放出来的摧毁力赶上并且超过……社会主义曾经是人类解放的希望,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生存问题。如果生态平衡被打破,那么自由规则将会比以前更加遥远。

今天的绿色意识再一次强调了人性、人的需要以及我们试图满足需要而面临的困境的共性。这些潮流合在一起,说明了人类需要的难以驾驭及其连续性。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已经被唯物主义的悲观主义所替代,然而,这种悲观主义仍然认识到人在克服这些障碍、获得更大成功方面所具备的潜力(廷帕纳罗,1975,第20页)。因此,任何重新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方案都不能缺少需要的概念。

文化帝国主义的评论: 压迫的客观性

现在,让我们转向一些极端反种族主义者和极端女权主义者

的多元论观点。他们确实相信,在此时此地,需要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但只是那些具有共同文化和生物背景的人。事实证明,这种分隔的相对主义观点没有连贯性,而且在政治上具有破坏性。不连贯的原因在于普遍需要一会儿遭到否认,一会儿又被作为先决条件。有时候,不同的文化所表达的需要概念相互冲突,它们对公共和私人物品的制度化标准也各不相同。然而,如果在这些模式中,群体真正拥有完整的道德自主权,那么,一个群体的成员就绝不可能公正地批评其他群体的行为。然而,这正是那些把真理局限于特定文化范围之内的人所做的。例如,英国或美国帝国主义的批评家们正确地认为这两个国家都造成了大面积的苦难:极度贫困和健康恶化、受教育水平很低或根本没有、政权制度中包含了掌权者长期凌辱他人的成分。他们没有因为受害者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就认定他们的苦难的性质不同。确实,他们是否受到³⁰的压迫和剥削必须按照范农(Fanon)的说法看他们与“被剥夺者”(dispossessed)是否有共同之处——即他们的基本需要和相关的权利以相同的方式遭到侵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在人们就谁好谁坏已经达成共识的时候,以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为名义的相对主义观点才会听起来合理。然而,当人们意识到压迫文化仍然具有自身的、内部一致的道德或“有效性原则”(这是莱克劳(Laclau)和莫夫(Mouff)的说法)时,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英国的帝国主义是一个连贯的文化。那么,为什么极端多元主义者认为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除非他们相信有一些东西无论在什么文化中在道德上都是不可接受的?当这些批评家不愿意谴责与他们自己有某种

文化亲和关系的社会或社群环境中践踏人类需要的行为时,这种不一致性变得尤其厉害(利斯,1986,第97~98页;参考唐文(Tang Wain),1991,第1~22页)。一些社会主义者不愿意支持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出版他的小说《撒旦诗篇》,这背后也隐藏着同样混乱的思想。一旦为了文化容忍荒谬自由主义思想而牺牲了鉴别暴行的能力,就会闸门大开,使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受到更严重的伤害。霍梅尼判处拉什迪死刑则完全符合伊斯兰教教义。

极端民主主义：群体道德的浪漫化

正是这最后的一点给沃尔泽、莱克劳和莫夫、基恩的相对主义观点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在民主制度中个人通常享受着各种政治权利,集体也应该被赋予这种权利。表面上,这个观点似乎非常合理。它可以在多数派群体的统治下,保护少数派群体的利益,而且,假设每个群体都关心其成员的基本需要,那么就会最大限度地激励文化和个人的创造力。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需要满足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必须超越群体本身的文化界限,我们怎么能够肯定这个群体所采用的需要定义不会危害到对此感到不安的一些人的利益呢?没有一个优先的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特定群体——或者更精确地说,那些群体内部掌权的人——可能会放弃其成员提出的许多并不对基本需要构成危害、从而不在其利益范围内的要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想一想,许多群体实际上是由男人控制的以及这个事实所造成的后果。还有许多其他的例

子,比如一些在心理上摧残教徒的邪教的所作所为,教徒们虽然在物质方面受到剥削,在情感方面遭受虐待,但是自己还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至少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必然存在群体之外的标准来评价群体内部在道义上什么是可以容忍的,什么是不可以容忍的。这个思路也可以用来评价基恩的理论。基恩提倡公民社会的创造性潜力,并且主张国家不应该对结果进行干预。创造力再一次具有双刃作用。他在公民社会的定义里包含的特定群体——如家庭——也可能对其成员具有破坏性和伤害性(参考钱纳(Channer)和帕顿(Parton),1990,第105~120页)。只有某种形式的公共监管才能够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如果没有一套连贯的人的需要理论来指导这种规则——尤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加上它带来的对需要的曲解——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陷入一种乐观而危险的理想主义,认为在不受干预的时候,个人和群体都总能明白自己最需要什么(哈里斯,1987,第13~22页;参考奥斯本(Osborne),1991,第201~225页)。^① 他们现在不知道,将来也不会知道。

① 对于多元社会的法则,德沃金(Dworkin)恰好也有相同的观点:

对于我们的社会,确立一种在知道绝对清白的时候不会被判决有罪的权利没有任何意义,除非这个社会认识到,道德伤害是一种明显的伤害,必须特别保护人民免受这种伤害。但是成本效率社会用以制定犯罪程序的功利主义计算方式里可以没有道德伤害的位置……因为道德伤害是一个客观概念,如果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受到惩罚而遭受道德伤害,即使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怀疑,甚至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这种道德伤害也确实确实发生了(德沃金,1985,第81页;参考第81~89页;参考格沃斯(Gewirth),1982,第5章)。

现象学的观点：社会现实的回击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在此探索社会学领域中现象学著作中的问题及其研究人类需要的相对主义方法(特里格(Trigg), 1985,第5章)。舒茨曾经是纳粹时期的难民,他否认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在评价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欣迪斯(Hindess)嘲笑道:

32 不可能有舒茨政治学,也确实没有任何种类的理性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可能建立在社会世界的“知识”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知识”仅仅包括众多关于这个世界的故事中的一个系列。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某个讲故事的人偶然编造的一种形式,是他碰巧感兴趣的一些事实和事件。那么(舒茨)为什么逃往美国?(欣迪斯,1977,第76页)

我们无法通过把一切都简化为日常生活中关于偏好的个人之间的谈判来解释自己行为的意义(例如,成为纳粹迫害的受害者),无法解释有助于形成这些意义的制度性因素(例如,导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得成功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也无法解释当这种意义以特定形式(例如,骇人听闻、后患无穷的大屠杀)在制度上强加给个人的严重伤害的客观性质。

有时,研究剥夺的社会学理论家坚信人类需要的定义要求某种客观性的核心,并以此证明其名义上的相对主义。汤森尽管希望抛弃绝对需要的概念,但是他也认为,根据需要的“独立性、可以

量化性、可再生性、系统的可比性和确认性”的性质(1972,第48页),客观需要可以与“传统认识上的”需要区别开来。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贫困者的客观困境强烈的、始终如一的关注,不论他们自己的偏好是什么,也不论其他人的偏好是什么。

因此,他批评了英国评估贫困线的“一致”(consensual)方法,英国的方法让抽样人口中的大多数来决定哪些商品和服务是必需品,哪些不是(麦克(Mack)和兰斯利(Lansley),1985,第2章)。他认为这样忽视了“谬误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问题。人们并不总能认识到决定他们偏好的社会力量,而且这会“迫使我们到社会视界之外去寻找需要的标准”。他甚至接着说:

经过局部群体、国家或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或信仰过滤或培育的视界绝不能充分代表“既存的事实”。必须有各种形式³³的“客观”社会观察、调查和比较,以此对它们进行核对(即使这些标准必然不够完善,而且必然是在社会中形成的科学思想模式的产物)(汤森,1972,第48页)。

但是,这一点与他的大多数其他作品的理论基础不太相符,后者始终坚持从文化而不是用普遍主义的角度来定义剥夺:“如果对于社会对需要的决定作用进行任何严格的概念化,都会瓦解‘绝对’需要的概念。而且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适用于任何时间和地点”(汤森,1979b,第17页)。最好的结果是模糊不清,最坏的结果是思想混乱,摇摆不定(森,1984,第14章)。仅用相对的概念定义权利剥

夺——进而定义需要——将会导致一种悖论，即提高对饥饿者的需要的满足的一种方式就是销毁温饱者的食物，直到缩小两者的差距（森，1984，第330页；参考古丁（Goodin），1990，第15~20页）！

至此，我们分析了许多相对主义的例子，目的一方面在于抨击普遍性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在于利用这些标准来认可一些受欢迎的世界观。坚定的相对主义者不应该以这种方式大刀阔斧地改变。一个坚定的相对主义者——把整个社会生活视为“人为构造的”，认为它的每一面的真实性比其他任何一面都不多或更少——则进入了一个极少数人害怕踏入的道德荒原。费拉本德（Feyerabend）（1978，第8~9页）就是这极少数人之一，他毫不留情地写道：

理性不再是一个指导其他传统的因素，和其他传统一样，它本身就是一个传统，与其他任何传统具有同等的要求中心地位的权利。作为一个传统，它既不好，也不坏，仅此而已。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所有传统——只有从某种其他传统的角度看待的时候，它们才可能成为好的或坏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虔诚或不虔诚；先进或“原始”；人道或邪恶的传统等等）。客观地说，在反犹太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人道主义者认为种族主义很邪恶，而种族主义者认为人道主义索然无味。相对主义……为这种状况的出现提出了一个满意的解释。^①

① 在这些方面，费拉本德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相对主义的观点，我们很难从他闪烁其词的论述中作出估计。有关他这种观点的证据，请参看费拉本德（1978）第138~140页。

根据这种理论,我们被自己的文化围困在一个概念和道德的 34
壁垒中。究竟能否突破这个壁垒?这正是我们在下一节中必须面
对的问题。

第3章 “需要”的基本原理

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客观的人的需要,这种假定至少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毫无疑问,至于需要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们基于常识的理解各不相同,而且经常是混乱和模糊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需要”这个词语在日常语言里用法多样。其中一个最常见的用法把需要当做驱动力,对于这种驱动力,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顺从。另一个用法把需要当做目标,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每个人都要么实现、要么应该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大概正是这种普遍性把需要和偏好或“想要”区分开来。我们将证明,因为前者过度的人类生物学决定论的概念,它最多只会令人误解。因此,我们首要关心的问题是澄清后者,说明有关需要的各种说法的基本原理与我们此前对相对主义进行的讨论之间的关系。这个基本原理对于我们理解第二部分中阐述的我们自己的人的需要理论至关重要。

需要是驱动力

“需要”经常被用来表示一种驱动力或产生驱动力的某种内在状态(例如,“人需要睡觉”或“兔子需要打洞”)。在此,“需要”指的

是一种**动机力量**(*motivational force*),这种力量是由于特定的缺乏在体内产生的不平衡或紧张状态造成的(汤普森(Thompson), 1987,第13页)。这个研究方法导致了马斯洛(Maslow)的需要理论,这也许是关于基本需要最著名的分析理论。马斯洛把需要“按先后顺序”划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感和爱的需要、受到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人如果长期饥渴,获得食物和水的生理动机就会最为强烈。然而,一旦肚子饱了,就会出现其他“更高”的需要,身体就会受到这些需要的支配,而不是饥饿。对于成年人来说——对于儿童更是如此——下一步就是需要一个安全、有序、可以预见的世界。这些目标一旦实现,又会受到更高需要的支配,依此类推,直到最终满足一种开放性的情感和智慧的动机(马斯洛,1943,第370~396页)。

在本书的余下部分,由于两个原因,我们所用的“需要”概念不是这个意义。首先,即使我们承认马斯洛的分类详尽无遗(这一点远非明确),有关动机的严格的时间顺序显然是错误的。有些人对于自我实现的重视程度似乎远甚于安全——例如,登山者。同样,我们在考虑作出生活中的许多选择时,马斯洛的各种分类要么是结合在一起的,要么有时候相互冲突(斯普林博格,1981,第184~190页;参考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1977a,第43~51页)。但是其次,也是切中要害的,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把作为可以普遍化目标的需要和作为动机或驱动力的需要彻底分开。

汤普森认为,一个人可以有消费某种物品的驱动力而没有需要,如酗酒,但同时有做另一件事情的需要而没有任何驱动力,如锻炼身体和节食。在前者之中,驱动力与以某种可以普遍化的方

式防止严重伤害之间没有关联,即使如果这个人一直得不到满足,久而久之可能会受到伤害。例如,有某种毒瘾的人,如果毒瘾得不到满足,就会生病。然而,如果他们从未开始使用毒品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而且从长期来看,满足他们的毒瘾将会在许多方面对他们造成伤害——对任何人都是如此。总之,采取某种特定方式的强烈愿望不应该与这种行为的实证或规范的合理性混为一谈(汤普森,1987,第13~14页)。

尽管如此,强调驱动力和动机确实可以让我们注意到人类需要的生物背景:我们的基因结构对需要造成的限制。如果需要与人的机体的驱动力不一致,那么它们与“人性”,也就是智人(homo sapiens)的生理和心理构成,也不是分离的。论证这种分离也就是把人性等同于人的理性,并且把人类与其他动物世界分开。

传统的存在主义学者——尤其是萨特(Sartre)——确信人类的自由为这种分类提供了依据,米奇利(Midgley)从同样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精彩的讽刺:

如果我们除了自己以外不知道任何其他有生命的形式,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对于自己来说完全是神秘未知的。这也为我们了解作为个人的自我增加了巨大的难度。任何事物,只要能够使我们置身于一种相互关联的背景中、能够表明我们是一个连续体的一部分,都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存在主义的荒谬之处在于……它认为似乎世界只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事物),另一方面是理性、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似乎除此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生命

形式。我相信,存在主义学者那种**遗弃**或**抛弃**的印象不是由于抛弃了上帝,而是由于他们轻蔑地抛弃了几乎整个生态圈——包括植物、动物和儿童。生活退缩到几间城市的房间里,难怪它变得这么怪异(米奇利,1979,第18~19页;参考第1~3章)。

虽然作为两足的哺乳动物,我们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动物有联系——我们是温血动物,哺乳喂养,是猿的无毛后代,直立行走,而且有一双灵巧的手。但是我们也有容量较大、高度发达的大脑,具有相应的、其他动物无法相比的各种能力,如相互交流、判断推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由于我们的大脑容量,人类婴儿的出生相对较早,其直接后果就是我们童年时期的依赖期相当长。这些特征大致把人类的本性和其他动物(如狗和鲑鱼)区别开来,为人的需要划定了自然的界线(本顿(Benton),1988,第8~15页;参考韦格尔(Weigel),1986)。我们作为哺乳动物的身体构成决定我们需要解决温饱问题,以便能够生存和维持身体健康。我们儿童时期的认知天赋和情感基础决定了我们的许多其他的需要,例如,我们需要其他人的支持并且与他们保持亲密的关系。

弗洛伊德和许多其他心理学家都认为,意识生活的所有方面在童年时期受到的影响不可低估。童年时期压抑和情感自我保护³⁸的过程连接了生活中生物、情感和认知等各个方面,建立了无意识的动机结构。这些结构在以后的日子里将会以隐秘的方式影响个人的日常活动和思维过程。有关这些过程以及它们对有意识活动产生实际影响的方式,争论非常激烈。然而,毫无疑问,在理解人

类行为的时候,更多的是需要解释而不仅仅是个人对其行为提供的有意识的理由,精神分析可以有助于揭示表象没有展示出来的事实(弗罗什(Frosh),1987,第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但是,罗斯(Rose)等人(1984,第9章)曾经论证,许多问题现在已经属于社会生物学范畴,问题是它把约束(constraint)和决定(determination)混为一谈,而且过高地估计了先天的生物、情感和认知“法则”决定我们应该还是不应该有某种愿望的程度。假设妇女有一种遗传性的、对年幼的子女表达强烈母爱的倾向,或者用米奇利的话说,一种“公开的本能”,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叫做需要(米奇利,1979,第51~57页)。在没有谈到就业之前,没有任何问题。她们需要就业,要么因为希望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要么因为生活所迫。在这种情况下,是这个妇女而不是她的基因必须选择按照她本能的哪个方面行事,在这种程度上,萨特是正确的。关于人类行为和幸福的遗传背景,很少有科学的定论——例如,不同妇女母爱的强烈程度差异很大——除此以外,作为人类,我们独特的认知能力也给我们带来了决定我们到底需要什么的问题,无论我们感觉自己想要什么。

社会生物学的这些见解主要说明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作出某些决定比其他决定更加困难——有时会困难得多。他们没有阐明的是,我们不断进化的过去能够而且应该超越我们选择和行为的能力(特里格,1984,第93~101页)。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下定决心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我们显然应该把自己以往生物“需要”的经验考虑在内——在努力实现我们设定的目标的时候,做好准备面临任何困难,恐惧和与之相伴的焦虑感就是很好的例子。勇

敢的行为表明人能够强迫自己做一些他们的本能拼命反对的事情,只要他们认为理由充足。但是事实上,理由和行为的选择取决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生物属性。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号召人们抑制自己的生物属性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例如,让男人克制他们从狩猎为生的祖先那里遗传的攻击性的遗传倾向。因此,剩下的问题是,我们(相对于我们的基因)在生活中应该怎么做?

需要是目标和策略

“需要”这个词语还被公开或含蓄地用来表示一种特定的目标,人们相信,这种目标可以被普遍化。例如,“这个人需要(并以此为目标)更多的蛋白质”或“这些家庭今年冬天需要(并以此为目标)合适的住房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需要通常与“想要”形成鲜明的对照,“想要”也被描述为目标,但是来源于个体的特殊偏好和文化环境。与需要不同,想要被认为是因人而异的。人们对这两种目标认识的方式截然不同,下面这句话无可争议地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我想要一支烟,但我需要戒烟。”

把需要称为可以普遍化的目标有一种危险,即掩盖了为什么某些目标具有普遍性而其他目标不具有普遍性的原因。确定谁具有普遍性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如果需要不能通过一种适当的“满足物”(satisfier)得到满足,那么将会导致某种明确、客观的严重伤害(范伯格(Feinberg),1973,第111页;参考威金斯(Wiggins),1985,第153~159页)。因此,不努力满足需要将被视为危害相关

个人的客观利益,因此也被看成是不正常和不自然的。^①当目标被描述为“想要”而不是需要,恰恰是因为人们并不认为这些目标与这个意义上的人的利益有关。

所有关于需要的论点都符合这样一个关系结构:“A 为了 Y 需要 X”(巴里,1965,第 5A 节)。在此,X 是不是一个需要与普遍性无关,而是与为了达到某个明确的目标 Y 的战略有效性(strategic efficacy)有关,无论 Y 是什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充足的营养和一套
40 新的高保真音响都可以被当做是需要:营养可以维持健康,音响可以提高欣赏音乐的效果(汤普森,1987,第 7~8 页)。显然,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概念,以区分(1)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2)需要和想要。

当需要被视为可以普遍化的目标时,上述结构中的 Y——避免严重伤害——常常没有得到明确表达,追求需要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去得到 X。例如在发达国家,对于获取食物这个目标,人们常常没有想到如果不成功就会造成伤害。这个目标至多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想法:采购是必须要做的,人们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佳的策略去采购。其他许多常见的需要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不一定需要明确公开,所以这些需要本身就被认为是目标,而不是它们的实际内容——与人们认为可以普遍化的一种共同目标相关的各种策略。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目标的东西,在其他情况下则可能被描述为策略。例如,食物、住所或衣服既可以作为目标也可以作

① 生物学家或植物学家也会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动物或植物的身体需要没有得到满足,那么这些需要也会遭到破坏。

为策略。需要的描述具有等级特征。从某种总体目标开始——如身体保暖——达到目标的方式(例如,某种衣服)本身也可以成为目的。如果它们与目标之间的战略关系仍然不明确——例如,如果得到一件新衣服的目标和身体保暖这个更加基本的目标之间没有有意识的战略联系,这种情况尤为可能。正如衣服既可以被描述为目标也可以被描述为策略,对于特定种类的衣服以及购买衣服所需要的钱,也是同样的道理。总之,关于人类需要的各种论点,如果没有提及驱动力,则其遵循的原理只是一种手段罢了。

某种其他目标 Y(既可以是可普遍化的也可以是不可普遍化的)必须总是处在特定需要 X 的背景中,而 X 本身是一种目标。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确定该目标被确定为需要以及我们相信这个目标值得追求的理由。例如,为了弄明白把身体保暖或一顿饭称为需要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预先弄明白,如果我们要实现避免严重伤害的目标,为什么这些东西是我们必须努力得到的。如果有人 41 说:“我需要身体上的温暖,因为我就是需要而已”或“我需要一顿饭,因为我只是觉得想要”,他们所使用的“需要”意思并不清楚。我们会觉得这些话和某人出于同样的“理由”说他们需要“一盘子泥巴”一样不可理解。这些不是任何平常意义上的“理由”(参考安斯库姆(Anscombe),1957,第 71~72 页;普兰特等(Plant et al.),1980,第 26~29 页)。需要(或在这个问题上“想要”)的理由在本质上是公共的,因为它们利用了人们都能理解的概念,即哪些策略确实能够避免伤害,或者应该通过哪些实证研究来增进这种理解(多亚尔和哈里斯,1986,第 4 章)。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会混淆需要和想要的概念,而在他们需要什么方面犯错误(沃尔

(Wall), 1975, 第 505~506 页)。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不会在想要上受到误解,条件是有人对此给出了某个可以理解的理由。例如,如果你说你还想要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包,因为你喜欢它的味道和质地,其他人也许不会同意。然而,我们并不清楚他们说你错了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提出了自己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非常明白易懂。然而,如果对某人说“你应该把戒烟作为目标,而不是再买一包烟”,这句话就会有意义。因为这句话参照了一个理由,人们公认这个理由是维持个人不受严重伤害、处于“可以接受”的状态中所必须的。让我们再举一个老生常谈的例子,糖尿病患者也许特别想要糖,他们感觉这是一个需要。他们也许觉得除非把它作为一个目标来实现,否则就不能“继续”。但是他们需要的是胰岛素——即使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个名称,也没有能力把它作为一种偏好。实际上,对于在发现胰岛素之前那些在历史上死于糖尿病的人来说,这正是他们自始至终所需要的——胰岛素本身以及认识到缺少胰岛素是他们得病的原因(普兰特等,1980,第 25~33 页)。

证明这个相同的论点还有一个更为正式的方法,那就是注意在我们既想要又需要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考虑对这些东西特定的描述方式。因此,如果“我需要水”这句话是真的,那么如果我们用“水”的任何同义词(如 H_2O)替换这个词语——这个词语可以用来指相同的事物,这句话具有同等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我是否想要某个东西取决于我对这个东西的看法,而不是它的实际属性。

42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一个东西,经过一番描述(例如,“我面前这个漂亮的荷包蛋”),我也许特别想要;但是经过另一番描述(例如,

“我面前这个漂亮的但有可能受到沙门氏菌污染的荷包蛋”),我也许就不想要(怀特,1971,第114页)。换言之,关于想要的论点是有意图的(*intentional*),其参照系是不透明的,因为它们的真实性依赖于“经历的主体如何看待世界”(格里芬,1986,第41页)。你不能想要某种你没有任何概念而且你没有以某种方式“试图得到”的东西(安斯库姆,1957,第68页)。这种主观性的观点与关于需要的客观性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是无意图的(*extentional*),它们的真实性依赖于“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依赖于“我的思想的作用”(威金斯,1985,第152页)。你可以需要某种你不想要的东西,不仅如此,即使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你也许还是需要它。

当然,想要和需要有可能恰巧吻合。一些想要是普遍被人们接受的需要的满足物,另一些则不是。因此,你可以需要你想要的东西,想要或者不想要你需要的东西。你不能始终不需要避免严重伤害所必须的东西——无论你可能想要什么。

需要、相对主义与道德

然而,关于需要的客观性,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果有的话,哪种需要是所有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都应该努力满足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明的只是在需要和想要之间有一种人们经常利用的区别,这种区别来源于一种信念,即一些目标在手段上与避免严重伤害存在着普遍性的联系,而其他一些目标则不然。因此,需要和想要之间的区别的连贯性——以及可以用任何客观

方式加以区别的观点的连贯性——基于某种有关严重伤害本身的认同。但是为了达到这种认同——使我们能够认识伤害——还必须对正常、生命旺盛和未受伤害的人类状况有一个一致的看法(汤普森,1987,第3章)。

- 43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认同该怎么办?对于个人而言,对于一些需要是否“自然地”存在有很多争议。例如,性就常常被人当做这样的—一个共同目标。然而,特定的性行为不能在同样的意义上像其他一些“基本”需要那样被普遍化,如最低数量的食物。事实上,被视为正常的性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在相同文化中不同的关系之间可以各不相同,一些人与其他人的性接触很少或根本没有,他们似乎照样生活得很好。许多其他的活动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些活动的规范性与其说是某种生物需要,倒不如说是文化传统的一个功能(伦肖恩(Renshon),1977,第58~64页)。

进一步说,人为了生存,某些需要(例如蛋白质、水)必须得到满足,即使这个观点被接受了——大概应该被接受——人们仍然可以认为,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非常多,在实践中需要和想要之间的区分向我们揭示得更多的是做出这种区分的人的情况,而不是它对人类状况的影响。因此,需要和想要之间的区别似乎在本质上具有规范性(normative):如果关于价值观的认同不存在,那么似乎就没有进一步判别的根据(菲茨杰拉德,1977b,第195~212页)。例如,如果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水平上制定住房的标准,进而对可以接受的伤害水平形成不同的判断标准,则什么才是“更高”和“普遍性的”标准呢?有人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关社会政策和道德问题的许多争论似乎在原地打转。

当然,相对主义者必须公开或暗地里认可需要和想要之间区别的规范性特征。什么被视为需要,连同满足需要的权利,并不是取决于理性或现实的普遍标准。因为可以理解的经验界线被认为是由文化决定的——赋予社会生活方式个性化的概念规则。温奇(Winch)用两个经典的句子总结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并不是现实赋予了语言意义。由语言揭示出的什么是实在的,什么不是实在的和事物自身所揭示的一样”(1974,第82页)。

因为一个人无法逃避自己生活方式的规则和话语,所以在评价哪种满足需要的方法是“最好的”时候,没有一个可供参照的中立的现实。例如,对纯洁和危险的不同概念可以导致人们对于什⁴⁴么食物干净而且是需要、什么食物不干净而且是有害的产生相互冲突的看法(道格拉斯,1966,第1~3章;参考道格拉斯,1975,第47~59页)。事实上,身处不同文化的人们确实觉得不同的事情在道义上无法容忍,有时候在同一个文化中不同的个人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差异。因此,在相对主义者看来,为文化或个人偏好寻求一个普遍和客观的基础无异于追求一个虚无缥缈的幻觉。^①

简而言之,需要和想要之间的区别一开始还相对清晰,但是一

① 认为相对主义只有一个哲学面孔可能是一个错误。近年来出现了两种经典的观点,分别是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1972)和巴恩斯(Barnes)、布卢尔(Bloor)(1982)。阿林顿(Arrington)(1989,第5章)对更新的论述作了精彩的总结。有关人类学领域中的好例子,请参看道格拉斯(1975)和奥弗林(Overing)(1985)的几篇文章,特别是她的简介。伦特恩(Renteln)(1990,第3章)比较了哲学和人类学。赫斯特(Hirst)和伍利(Woolley)(1982,第1~2部分)同样比较了社会学和心理学。最后,麦金太尔(MacIntyre)(1988)通过西方司法和理性理论的进化,提供了一个精彩绝伦的相对主义历程,尽管他不希望用这样的话来描述他的理论——参看第18~20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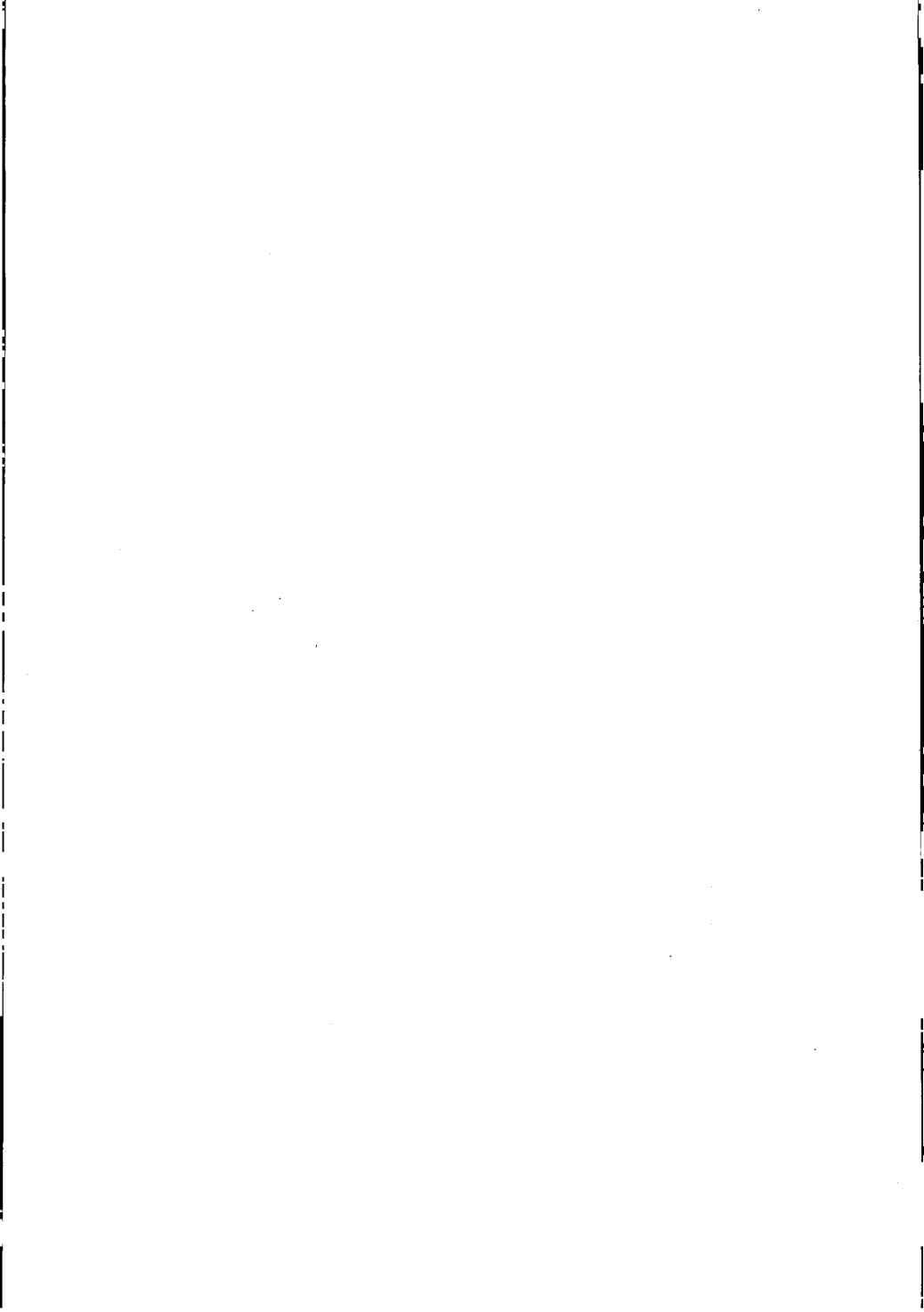
且其基础受到挑战,立刻变得极度杂乱无章。关于人类状况或特定的人群,什么可以普遍化,什么不可以普遍化,如果没有合理的方法解决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那么一些人的需要对另外一些人就仅仅是想要——反之亦然。同样,道德权利在明确的需要面前就会变成一个文化偏好或个人感觉问题,而不是理由。相对主义究竟是否正确?

就现在而言,加上我们在前一章中所做的批评,我们的回答只能是指出这样一点: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违背了深层次的道德信念。如果需要只不过是文化或个人偏好的功能,那么我们会发现赫胥黎(Huxley)的勇敢的新世界没有任何错误,在这个世界里,一道毒品、性爱和无知的大餐可以提供主观的满足感,既非常糟糕又高度统一。进一步说,关于需要的论点当然似乎远非对实际事态的简单描述——无论它们的性质是物理的还是社会的。它们还带有一种规范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容忽视,而且能够理所当然地让人觉得,它和没有道德内容、真实的描述性论点一样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布雷布鲁克(Braybrooke),1987,第61页)。许多慈善团体和国际援助机构都证实了这种道德力量。在群体被认为极易受伤害的地方,满足需要的义务(ought)通常的确似乎以某种方式追随需要本身(is)。

在第二部分里,我们将试图通过建立一套有关人类状况的理论来阐明这种紧张关系。这套理论与我们的“本性”相关,但又不取决于“本性”,而且因此承认个人主观幸福的重要性,但不认为

45 它决定了对错或谁对什么享有权利。我们将证明,客观普遍的人

类需要这个概念在这项任务中占据有核心地位。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是:如果这种需要存在,则必须证明它们构成了所有人为了避免严重伤害都必须达到的目标。为了我们这本书的目的,我们把达到目标的过程中所涉及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生物力量的驱动和无意识意志的约束这个问题,留作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第二部分

人的需要理论

卷之八

卷之八

第4章 健康和自主：人的基本需要 49

事实证明,否定需要客观性的尝试非常普遍,而且显得很有道理。的确,人们对于自己的需要特别在意。他们的感觉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在不同的时期可以大相径庭。例如在英国,汤森发现,在他界定的权利受到严重剥夺的人当中,高达44%的人自己并没有觉得受到剥夺(1979a,第423页)。然而,对于构成贫困线的必需品的范围(任何人都不应落到贫困线以下)人们似乎又有一种共识。这种相互冲突的现象表明,主观感觉不可靠,不能决定人的需要。我们可能对严重伤害性的东西有很强的欲望,尽管由于我们的无知,却对为了避免这种严重伤害所必需的东西没有什么需要,这个事实进一步强化了主观感觉不可靠的论点。但是对这个事实的理解似乎取决于人的需要具有某种客观性和普遍性的信念。所谓“客观性”,指的是其理论和实证的规范独立于个人偏好;所谓“普遍性”,指的是对每个人来说,严重伤害的含义都是一样的。

最近,一些学者在哲学领域中开拓性的研究涉及了这一点,特别是普兰特和莱塞(Lesser)(普兰特等,1980,第3~5章)、布雷布鲁克(1987)和汤普森(1987)。在这场争论中,我们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尤其受到了前者的影响,我们后来的研究同样如此(多

50 亚尔和高夫,1984)。在伦理学方面,关于需要的客观性,一些学者,特别是美国的格维尔思(Gewirth)(1978)和英国的威金斯(Wiggins)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哲学交叉的领域,森(1984、1985、1987)关于人类能力的综合概念(allied notion)的研究也很有影响。在本章中,我们将在建立自己的人类需要理论的过程中引用这些不同的观点。

需要是人类行为和互动的前提

在普通的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基本需要与避免严重伤害相关联——无论如何定义伤害的概念。以上提到的所有学者,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用他们各自认为能够避免这种伤害所必需的条件,确定什么是基本需要。严重伤害本身被或明或暗地理解为在个人追求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目标时受到的重大伤害。因此,受到严重伤害就是使某人从根本上丧失了对自己的美好愿景(vision of the good)的追求能力。如果这样考虑,那么伤害的客观性就可以保证不会简化为偶然的主观感觉,如焦虑或难过。因为一个人可以既焦虑又难过——更不用说许多其他不愉快的感觉——但仍然能够成功地达到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目标(汤普森,1987,第35~54页)。因而,基本的人类需要确定人必须达到什么目标才能避免在这个意义上的、持续而严重的伤害。

描述这种伤害的另一个方法涉及不尽如人意的需要满足对成功的社会参与(social participation)造成的影响。除非个人有能力

参与在试图实现目标时不受任何任意而严重限制的生活，否则他们在私人和公共事业方面获得成功的潜力将不能得到发挥——无论他们实际选择的内容是什么。^① 无论我们在私人和公共事业上的目标是什么，这些目标的实现总是要基于与其他人之间在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成功互动。我们的一生——即使在独处的时候——都受制于我们从他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受制于他们如何评价我们认为自己学到了什么，受制于他们如何对我们根据这种评价发生的变化所做出的反应。换句话说，通过发现我们有能力干什么和没有能力干什么，我们建立了一个关于“我们是谁”的自我概念，这在我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在本章和以后的章节⁵¹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人类行为和根本性损害所导致的严重伤害的社会特征。

重要的是，就目前而言，在这个意义上的伤害不仅仅是对某人愿望满足的程度低于在伤害发生之前的满足程度。它指的是有关个人的能力受到损害的程度足以妨碍他取得新的成就，而如果没有受到伤害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米勒(Miller, 1976, 第134页)的解释如下：

对于任何个人来说，所谓伤害，指的是对某人的人生计划

① 如果这样考虑，那么缺乏基本需要的满足就会对个人构成某种伤害，汤森将其定义为权利剥夺：“如果他们根本没有或者没有充分的生活条件……而作为社会成员必须享有这种条件，以便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参与各种关系，遵循习俗性的行为规范”(汤森，1987，第130页)。这种根本性的、长期的权利剥夺所导致的严重伤害将会随即而来，无论特定文化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也无论任何个人行为者有什么样的认识、信仰或实际选择(普兰特等，1980，第37~38页；参考威金斯，1985，第157~159页)。

中至关重要的活动进行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干涉；相应地，他的需要也必定包括使这些活动得以实现所必需的一切。因此，为了确定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必须首先确定他的人生计划，然后再确定什么活动对于这个计划至关重要，最后搞清楚使这些活动得以实现的各种条件。

因为米勒强调了这些条件的客观性，所以他的定义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然而遗憾的是，因为这个定义把个人需要的内容与他们的人生计划联系起来，需要满足的道德意义就需要我们预先接受这些计划的道德价值。这又把我们推回到了相对主义。

我们必须找到可以普遍化的前提条件。这种前提条件在最低程度上损害个人对各种生活方式的参与，可以是个人现在所处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他们发现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不对，并进行重新选择后确定的生活方式。如果不能发现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对特殊的道德意义进行解释，而我们正是希望把这特殊的道德意义归于基本的需要满足（古丁，1988，第32～33页）。哈里斯把社会政策形成的结果总结如下：

社会政策的导向应该是保证一个社会的公民得到一系列的人生机会。与此相关的人生机会是为了保护个人作为一个社会的正式成员的地位所必需的。目的是为参与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质机会。需要的定义是，为达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一切。一个个人“需要”社会政策的目的，是因为他缺

乏必要的资源,无法作为一个正式的社会成员参与该社会的生活方式(哈里斯,第101页;参考威尔(Weale),1983,第35页)。

那么,这种“资源”包括什么呢?

是什么使人成为“人”而不同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都认为理性(reason)是至关重要的。亚里士多德则特别强调追求美德的重要性,而如果没有理性和抉择能力,任何动物都不可能追求美德(麦金太尔,1985,第11~12章;参考诺曼,1983,第2~3章)。后来在17世纪,笛卡儿把这个观点重新组织为一种严格的二元论,把人形而上学地分为物质躯体和非物质思想。康德的研究仍然继承了这个传统,他用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人的构成问题。他把身体看做决定性过程,试图寻找一些人必须具有的条件。只有有了这些条件,他们才能够采取行动,并对其行动负责。尽管他并不直接关心人类需要的性质,但是他确实提出了许多有关建立人类需要理论的概念和论点。康德表明,如果要让个人采取行动和承担责任,他们必须具备必要的体力和脑力方面的能力:至少有一副受所有相关的因果过程所支配的、活着的躯体,而且有思考和选择的思维能力。我们就把最后这种选择能力看成最基本的个人“自主能力”(林德利(Lindley),1982,第2章)。

身体的“举止”(behavior)必须和与之“相伴”的“行为”(action)区别开来,康德对自由的分析预见到了这个当代的论点。因此,假如一个人在路上跑,生理学家或生物化学家可以对她身体的

运动作出一个因果说明。但是无论我们收集了多少关于跑步者动作的信息(证据),也无论我们多么成功地对此做出机械学方面的说明,我们就是不能确定和解释她在干什么。在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的理解相同的条件下,跑着赶公共汽车,逃避别人的折磨或跑步

53 锻炼身体只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三种。要决定选择哪种可能性,就要进一步解释当事人跑步的理由。这意味着我们要发现她的目的和信念(belief)——她的目标和她为了努力实现这些目标所选择的策略。因此,如果她是跑着赶公共汽车,该当事人正在表达她的自主意识,她本来可以不这样做。在许多其他原因当中——这也是康德首先提出这个论点的主要理由——这正是为什么如果她的行为不合理我们会责备她,而如果她达到了自己设计的目标我们就敬佩她(多亚尔和哈里斯,1986,第3章)。

这种最低意义上的自主意味着,对于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去做,可以作出明智的选择。这需要有能力制定目标并且对实现目标的行为方式充满信心,同时还有根据实证结果评价这些方式成功与否的能力。目标和信念——即“我们自己的”理由——在逻辑上把我们和“我们自己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犯“我们自己的”错误的能力在关乎我们行为的成败方面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在这些最低层次上,自主就相当于“能动性”(agency)。它显然是认为自己——或者被其他任何人认为——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以及对任何事情负责的一个前提。表示它的存在的是一个独特的清单,里面包括成功和不成功的体力和脑力活动,这些构成了我们如何变成现在的我们的故事。正是这个故事使我们具有作为一个人的、个性化的、不同于其他人的身份(帕菲特(Parfit),

1984,第3部分)。

如果这样考虑,那么自主与自我的所有权这个更强的概念没有多少关系——后者的意思是能够控制行为的目标和信念(德沃金(Dworkin),1988,第15页;参考霍沃思(Haworth),1986,第1章)。例如,关于奴隶主想要奴隶做什么,如果他们给奴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如果奴隶主允许奴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自己的方式服从这些命令,那么两者都有前面谈到的自主。在本章的结尾,我们还展示如何通过强化自主的概念来区分这两个群体。

因此,一个人的自主受到了损害,意思是他的行为能力以某种方式受到约束,从而导致他暂时而且严重缺乏行为能力。例如,一个人被迫去做违背她自己意愿的事情,或者由于受人欺骗,认为自己做了某一件事情,而实际上做的却是另一件事情。遭人强暴属于前者,而受人欺骗做了自己原本不想做的事情(如犯罪)就属于后者。^① 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以下观点:由于身体的存活和个人自主是任何文化中、任何个人行为的前提条件,所以它们构成了最

① 在此,我们不清楚那个行为如何成为你的行为。一方面,只要是你的理智(无论如何受到误导)告诉你选择做什么,你的行为仍然是有意识的。另一方面,你又不被称为你的行为的发起人,或为此承担责任。因为,由于受到欺骗,你正在做的事情不是你心目中想做的事情。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因为其他人给你的行为设置了不同的意义。你实施的行为——相对于你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发起人就是欺骗你的那个人,这样说确实似乎是对的(法登(Faden)和比彻姆(Beauchamp),1986,第10章,第256~262页)。当然,这种情况的先决条件是,没有适当的理由认为你理解或者应该理解这个(些)相关行为社会公认的意义。简而言之,如果是由其他人控制,那么你和你的行为之间意图上的关联被削弱,导致这种在最基本意义上的自主相应受到削弱。

基本的人类需要——这些需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行为者才能有效地参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实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

然而,表面上看,这个论断似乎有循环论证之嫌。一方面我们认为,需要是当事人为了避免客观性的伤害所必须达到的可以普遍化的目标,而这种伤害就是没有做他们自认为应该而且可能做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还已经说明,在当事人能够采取行动实现任何目标之前,他们的生存和自主必须得到保障。但是这肯定意味着,把对生存和自主的需要当做目标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除非已经得到了生存和自主,否则又怎么能得到它们呢?关于生存问题,汤普森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你需要生存吗’和‘你需要避免严重伤害吗’这样的问题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它们与‘死亡致命吗’和‘伤害有伤害性吗’这种问题犯了同样的类型错误”(汤普森,1987,第21页)。我们似乎是在做循环论证。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当然,如果被视为固定状态的生存和自主提供了其他目标和战略的有意关注点(intentional foci),而这些目标和战略又被视为需要,那么汤普森关于生存的观点很有道理。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在我们想到人类行为能力的现实是个程度问题而且随着时间而变化时,这种表面上的循环论证,即认为我们需要得到的东西正是以我们得到这些东西为先决条件,就会得到解决。关于生存,我们似乎非常清楚在采取行动时脑子里想着生存的目的意味着什么。例如,当我们鼓励病人战胜疾病时,我们还在做什么——为了延长他们的寿命?当我们努力帮助那些精神抑郁或受剥削的人去更好地掌

握自己的命运时，把自主看做一个基本需要，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竭尽全力保全⁵⁵性命，除非我们有意决定不想活了。如果一个人正在拼命与死神搏斗，而你告诉他，他必须活着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不会因此而感谢你。他也许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健康，但是他还是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争取比现在更健康。与之类似，一位妇女为了提高她对自己行为及其后果的认识，白天工作晚上上学，她这样加倍努力工作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自主能力，如果你告诉她，她已经拥有了这种自主能力，那么她肯定也不会高兴。她的目标是具备比现在更强的能力，能够做更多她认为在她的文化中很重要的事情。

简而言之，从现在开始，当我们谈到作为基本需要的生存和自主，我们指的是个人或群体在实践中能够采取行为以维持或提高这两种需要满足的具体方式。尽管为了使一般的行为成为可能，这些需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满足，但是未来行为的成功也依赖于行为者(们)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已经得到的生存机会和自主程度。在这种程度上，继续把延长寿命和提高自主的目标称为基本需要似乎是合理的。

这样看来，汤普森关于避免伤害的论点可以毫无保留地被接受。如果伤害相对于基本需要的定义来说是属于最终状态，那么我们就应该把避免伤害称为一个需要。因为它成了所有人的最终目标——在“A为了Y需要X”中的最终的“Y”——把它描述为

我们最基本的人类利益更有意义。^① 就现在而言,注意到以下这一点就足够了:在通常意义上,生存和自主是避免严重伤害的基本前提条件,其中严重伤害的意思是对参与一种生活方式造成巨大损害。当然,满足这些需要并不能保证成功地参与。由于许多其他原因,参与仍然可能失败。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恐怕真是在循环论证了。然而,很明显,无论是谁,无论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如果任何个人有更大的生存机会和自主,则其成功的实证可能性将会增大。现在,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实践中这种提高成功的可

① 汤普森以如下方式给“利益”下定义:

当我们受到伤害时(因为缺乏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被剥夺的最重要的事物(goods)很好而且有价值,因为它们满足了我们的利益,而不是因为它们是我们想要的。一种利益的概念确定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的活动和经验的范围和类型。它还确定了它们的价值的性质。这些类型的活动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事物很好,所以把它们从我们手中剥夺去的事物就是坏的、有害的(汤普森,1987,第76页;参考第4章)。

让我们把这种人的利益的概念与范伯格(Feinberg)(1984,第45页)的概念进行对比,后者与我们的基本需要概念几乎完全一样:

我们所谓的最终利益与C. L. 史蒂文森(C. L. Stevenson)的“焦点目标”特点相似。所谓焦点目标,指的是一些目的(而不是特定目的)同时是许多其它不同目的的方式。我们认为一些更重要的(在“最终”意义上的)目的可以满足关于焦点目标的正式定义:“这个目的对于其它许许多多不同的目的来说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式。如果其它任何别的东西并不能成为它的方式,那么它将不会有支配一切的价值”。

范伯格继续定义出不良(undesirable)事物。他认为“只有当它(不良事物)的存在足以阻碍一个利益”,或者,换言之,当它阻碍基本需要的满足时,就是有害的东西。

能性需要什么条件。

生存/身体健康是基本需要

56

让我们从生存开始谈。身体生存的需要本身不能公正地评价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读者们也许已经为此感到不安。以下例子能够说明其中的原因:一场车祸的受害者处于深度昏迷状态,靠生命支持系统而生存,没有独立的行为能力。这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哲学观点。受害者能否恢复行为能力最终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尽管身体存活,但是如果最好的医生的建议一直是,恢复知觉的机会根本不存在,或者遥遥无期,那么最终呼吸机可能会被关掉。那些大脑严重受损或者长期痴呆者在某种程度上将被认为与靠生命支持系统活着的人几乎一样,没有正常人的行为能力。如果可能有绝对把握断定他们永远也不会康复——如极度严重的阿耳茨海默氏病患者——那么人们就会提出类似的有关他们依靠人工手段存活的伦理问题(肯尼迪和格拉布(Kennedy and Grubb), 1989,第1086~1116页)。

因此,身体健康而不仅是生存,是一个基本的人类需要。为了个人的利益,在提出其他任何需要之前应该努力满足这个需要。无论干什么,也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中,如果想要好好地过日子,人们必须做到的远远不仅限于生存。他们必须具备基本的身体健康。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一系列实际工作任务需要各种体力、脑力和情感能力,如果身体不健康,这些能力往往会受到妨碍。但是给健康和生病下定义并不容易,而且分歧巨大。

在身体健康的定义中,从生理损害角度所下的定义经常被称为“负面”定义(negative definition),因为这些定义在概念上把它和生物学的病,或更准确地说,没有病联系起来。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个人没有长期或严重地患一种或多种疾病,那么他们身体健康的需要就已经得到了满足(斯泰西(Stacey),1988,第169~172页;卡普兰(Caplan),1981,第1、5章)。对于我们的研究,这个观察角度显然是有用的。通常,严重的疾病剥夺了患者参与以及可能参与——以及可能别人期待他们参与的——特定的生活方式。

57 的确,正是由于这种参与受到了损害,我们首先会把造成损害的身体原因描述为异常的(富尔福德(Fulford),1989,第2、3部分)。因此,避免这些疾病将会成为大多数人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失去了这个意义上的身体健康会被认为是异常的——除非有某种原因,如饥荒或瘟疫,导致大部分其他人也失去了健康——所有文化都形成了各种复杂的社会机制,使其成员能够应付这种情况(帕森斯(Parsons),1958,第165~187页;参考摩根等(Morgan, et al.), 1985,第45~52页)。

身体健康的负面定义既高度具体,又在表面上通过生物医学模型(biomedical model)提供的技术理解可以得到普遍化(多亚尔和多亚尔,1984)。因为它的因果属性,还因为它的后果在法则上存在一定的规律性,这种诊断和治疗方法似乎提供了一个跨文化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比较、理解有时还可以提高不同社会环境中人们的身体健康。然而,相对主义者也许会反对这一点。他们认为生物学的异常和适当的治疗方法在不同的文化中有差异;如果不带有种族中心论或者甚至种族歧视的假设,关于谁对谁

错,到底谁说了算?他们喜欢强调的问题是,既然什么是真实的这个问题似乎是用以解释经验的医学理解体系的副产品,那么在不同治疗方法之间的合理选择是不可能的(赖特和特雷彻(Wright and Treacher),1982;阿姆斯特朗(Armstrong),1983;参考斯塔克(Stark),1982)。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解决这些疑问。假如有三个人,一个是25岁没有职业的芝加哥人,一个是里约热内卢的40岁的临时工,还有一个是内罗毕的12岁的孩子,他们都生活贫困,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无论他们文化差别多大,但是在以下三个方面,他们都是一样的。

首先,他们都感觉生病了。他们原本可以参与各自不同形式的生活,但是由于他们特定的症状和痛苦,别人认识到他们参与生活的能力在他们想要参与时将会受到严重损害。然而,这种认识将不仅仅是他们实际感觉的一个功能。同时,他们的身体状况也必须使他们在功能上没有能力持续参与实践。归根到底,一个人能够感觉不舒服而不一定会失去能力。只有当受到损害的参与同时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在主观感觉和身体实际状况上能力都受到了损害——我们才能最终而且合理地把普遍性归于对损害负责的疾病(参考布尔斯(Boorse),1975,第49~61页)。在这个例子里,这种疾病是肺结核。^①

① 在此必须增加两个条件。第一,一个人也许身体有病但没有感觉自己生病。然而,确定疾病仍将依赖于以往我们对这种疾病和其他人患病经历之间的关联的认识。第二,一个人可以身体患病但参与生活的能力不受损害。这将取决于她能否获得适当的社会环境、援助和支持网络。

其次,三个人都可能用各种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病,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各自得病的原因和症状。然而,鉴于我们在技术上对结核杆菌及其感染后果的了解,如果他们经过精确的化验,结果呈阳性,我们不清楚在实践中否认他们三个人都得了肺结核意味着什么。如同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有人否认氦是一种气体,否认氦受热会膨胀,否认氦受热膨胀是因为热对其分子结构产生的影响。

第三,现有的、最先进的技术还决定了最为有效的、生物和环境方式,用来预防和治疗,并且可以最为透彻地解释为什么这些方法可行。对于上述三个肺结核病例,预防措施是通过改善住房、饮食、卫生和疫苗接种条件最大限度地防止感染。治疗措施主要包括使用某些类型的抗生素。

当然,事情并不总是如此直截了当。对于像癌症之类的疾病,发病原因要模糊得多,而且尽管我们知道许多预防措施,但是治疗方法很少。关于治疗药物,最激进的评论认为,19世纪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例如肺结核、霍乱、伤寒——的减少主要得益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道理。流行病学的证据表明,对于20世纪的富裕病,例如癌症和心脏病,预防比治疗更为有效,这一点同样显而易见。然而,这些证据实际上依据的是生物医学方面的认识。因为所有相关疾病的生理学特征和诊断能力都是在过去的生物医学研究背景中产生的。^①

当然,建立身体疾病理论的方法可能而且确实各不相同。然

^① 赖泽(Reiser)(1981,第1~7章)。当然,治疗性药物也不是没有问题,而且毫无疑问,在侵害个人健康需要方面,一直受到广泛的滥用。在第10章里,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而,“传统”方法很难与建立在生物医学模型基础上的医学方法相⁵⁹匹敌,除非我们涉及的是较轻的病或者是肯定可以康复的病。如何定义它们不会带来太多的问题。我们还会碰到慢性病或者治疗方法并不是特别有效的病,“传统”的方法很难与基于生物医学模型的药物相抗衡。现在,全世界都接受这一点。即使在传统医学仍很受欢迎的地方,只要有可能,生物医学知识也会被用来治疗和预防严重疾病(莱恩·多亚尔,1987,第27~40页)。毫无疑问,在目前许多关于医学和欠发达问题(underdevelopment)的文献中,“两条腿走路”的中国模式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模式——传统医学和生物医学的治疗方法双管齐下,哪种方法看起来最有效、成本有效性最高就使用哪种方法(世界卫生组织(WHO),1983a;参考克兰曼(Kleinman),1984)。但如果是特别危及生命的疾病,尤其是那些由感染引起的疾病,几乎总是需要运用现有的生物医学技术。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用一种负面方式从跨文化的角度考虑身体健康问题。如果你希望依照自己的想法,过一种积极而成功的生活,那么最大限度地延长寿命和避免生物医学中的严重疾病的基本需要是你的客观利益所在。这一点适用于任何人,任何地方。^①

^① 相反,有时候也有人认为,身体健康状况不好实际上可以提高创造力,进而提高自主能力。例如,米勒(Miller,1976,第131页)和哈里斯(Harris,1987,第132页)都提到了哲学家布伦坦诺(Brentano)。布伦坦诺曾经表示失明对他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可以更为有效地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这种论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布伦坦诺必须拥有足够的健康才能获得概念上的工具,以他声称的那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应对丧失能力的现实。

自主是一种基本需要

虽然身体健康的负面定义清楚明白而且具有潜在用途,但是许多人认为这个定义有很多问题,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没有严重的生物疾病相比,丧失最低限度的人的行为和互动能力的前提所涉及的问题要多得多(萨蒙(Salmon),1984,第254~260页)。个人自主能力也必须得到维持和提高。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设想这样一个情景,一个行为人满足了她身体健康的基本需要,但是仍然没有多少发起行动的能力。“发起”在这里是一个关键词,因为人们认为对于一个发起行动的人来说,他的行为方式与机器存在根本的差别。对后者的理解是通过机械结构和法则论方面的规则性,但是人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他们身体组成部分之间带有确定性的相互关系。正如我们所见,个人在表达他们的自主意识时,参照了他们制定目标和策略的能力以及在他们参与的活动中实施这些目标和策略的意图。他们相信这些目标和策略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在实践上和道德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对在同样的意义上不能做出选择的机器却另当别论。当机器靠不住时,有些人会大发雷霆,我们也许会对他们表示同情,然而我们不会认为他们这样做有任何理性!

有三个关键的变量影响个人自主的水平:一个人对于自我、自己的文化以及在这个文化中作为一个人应该做些什么等问题的理解水平;他为自己作出抉择的心理能力;以及使他能够相应采取行动的客观机会(法登和比彻姆(Faden and Beauchamp),1986,第

241~256页)。下面让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理解

理解自我和文化的程度依赖于教师资源和质量。人们不是自己教自己如何采取行动——他们必须向别人学习。至于学习哪些认知技术,各种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但也不是完全不同。例如,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学习,以便能够用最起码的规范方式参与社会生活,无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什么样的文化规则。不停地说谎或者殴打同伴都绝不会是成功的社会交往的秘诀。同样,在所有的文化中,语言技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途径,行为者通过这种途径学会利用概念安排他们的世界上的一切,认真思考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该做些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意识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与其他人互动的副产品。只要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与语言相关,那么它显然具有社会性。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曾经指出,正如属于自己的语言,即从一开始就是由这个人创造出来的语言,不能存在,同样也不可能有一个纯粹的属于自己的私人(private person)(多亚尔和哈里斯,1986,第80~86页)。这种考虑同样适用于学习特定的原动(motor)技术。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的神话在于他已经知道怎么能够做到如此勤奋(而且具有种族偏见),因为早就有人教给他了。不像歌曲里面唱的那样:“需要别人的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任何人只要想成为一个人都需要别人。

某些学习和教育的形式比其他形式更有助于提高自主水平。⁶¹更多的是取决于教学的内容。有一些活动在所有的文化中都 very

见,如果人们希望能够成功参与并且理解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那么每个人都必须做好准备。布雷布鲁克正确地把这些社会角色划分为父母、户主、工人和公民(1987,第48页)。例如,想要成为一个技艺精湛的木匠、厨师或其他任何角色,你必须学会某些技能,而且还要学精通。在同专家谈判的时候,我们自主的力量也与我们的理解有关系。例如,在医患关系中,医学和健康知识丰富的患者能够而且确实对医生以及对自己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比缺乏这方面知识的人有更多的选择(戈罗维茨(Gorowitz),1982,第4章)。

这一点强调了考虑和做新事情的能力要与特定个人的实际要求相联系。如果学习的具体模式与这种要求相符,就或者有助于或者妨碍个人的自主。毕竟,一个人有可能学习任何东西。然而,一种良好而且相关的教育,无论由什么形式的教育机构提供,将会使学习者做好准备,参与到他们的文化中,使他们既能赢得同事们的尊敬又能增强自尊。正因为如此,在正式教育中,自主可能会受到损害,例如与社会的职业需要或学生情感需要不相关的课程设置(恩特威斯尔(Entwistle),1979,第1~2部分)。人们受教育的方式同样可以破坏自主能力。如果没有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没有增强他们的学习信心,他们潜在的选择范围将会人为地受到限制,同时受到限制的还有他们影响世界和他人的能力(格伦迪(Grundy),1987,第3章)。结果,他们的能力将会受到客观性的伤害。

精神健康

自主的第二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认知和情感能力——最终就是他们的精神健康。在我们考虑的所有自主的定义

当中,理性(rationality)是一个重要成分。但是它与精神健康相关的意义是什么呢?在这些意义上,失去自我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方⁶²法,也可以带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色彩——从鬼魂缠身到化学成分失调,应有尽有。人们认为身体上的疾病与身体的病理有关,所有精神病(mental illness)是否在同样的意义上也是如此,关于这个问题,由于缺乏具体的病原学根据,导致了一场空前的争论。西方有关精神病的概念是否可以适用于其他文化中的患者,有些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如克兰曼和古德(Kleinman and Good, 1985)与考克斯(Cox, 1986)著作中的撰稿人(参考梅齐克(Mezzicch)和贝尔甘萨(Berganza), 1984)。奥贝塞克尔(Obeyesekere, 1985, 第134页)也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佛教思想认为人生就是受苦受难,我们怎样能在一个信奉佛教的社会中表达出西方诊断学术语中‘抑郁症’的概念呢?”关于正统的精神病概念,赫斯特和伍利(1982, 第2部分)提出了一种说服力很强的相对主义批评观点。的确,有些人,如萨兹(Szasz, 1961),甚至质疑它是否存在,而且指责精神病学试图用一种伪科学来代替适当的相互对垒的道德、政治和宗教价值观领域。

这些批评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把注意力吸引到在诊断与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中的个人的精神病时必须关注的问题上。然而,这些论点没有排除不受文化差别干扰的情感认同和身体或认知方面的残障或造成这种残障的一些原因之间存在差异的可能性。因为精神病可以首先视为对个人自主能力的严重削弱:“精神病仅仅意味着一些不良的精神/行为偏离。这些偏离首先包括极度而且长时期地丧失了解和以理性和自主的方式对待自己以

及周围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能力。换言之,所谓疯病,就是极度而且长时期的、实际上的非理性和不负责任”(爱德华兹(Edwards), 1982,第70页;参考恩格尔哈特(Engelhardt),1982)。精神健康就是这个问题的正面——即“实际上的理性和负责任”。尽管界线与理性存在偏差,尽管对“极度”和“长时期”含义会存在边缘性的分歧,在所有的文化中,对许多在这些意义上对理性的偏离的认识是一致的。^①

因为所有行为,如果能算得上行为,必须包含起码的理由,所以对于一个有自主能力的个人所具备的最低限度的理性和责任,63 很难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一般来说,最低水平的自主必须在持续的时期内具备以下特征:

1)行为者有智力能力树立在某种方式的生活中常见的目标和信念;

2)行为者有足够的信心想要采取行动以参与某种型式的生活;

3)行为者实际上有时候通过不断树立目标和信念来这样做

① 布尔斯(Boorse)为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进化论的基础。提到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他认为某些形式的心理过程——例如知觉处理(perceptual processing)、记忆、智力、痛苦信号(pain signals)和语言——在不同人种之间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根据标准的进化理论而发展。因此,精神病指的是这些功能受到的非自然障碍——无论其起因有什么样的文化特征(布尔斯,1982)。富尔福德(Fulford)进一步认为,跨文化客观性来源于对受到损害的行为和互动的认识,它们不能被简单看做某种形式的身体功能丧失,无论行为者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体系。正是由于这种认识,导致我们把原因归于精神病(不是身体疾病),而不是简单地违犯任何特定的社会规范(富尔福德,1989,第8、9章)。

并且就此与其他人进行交流；

- 4) 行为者把自己的行为视为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完成的；
- 5) 行为者有能力理解他们的行为要取得成功所受到的经验制约；
- 6) 行为者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再次，和身体健康一样，最基本的自主应该从负面来理解——参照由于缺乏某种或多种这些特征而导致的严重、客观的能力丧失。^①

当个人缺乏上述特征，他们可以被认为要么丧失了情感能力、要么丧失了精神能力。如果撇开具体的症状，那些在这个意义上严重和永久患病的人已经失去或从未有过足以在有意图的社会互动中取得最低限度成功所必备的自主能力——也许根本就没有任何自主能力。诚然，在别人的帮助下，他们丧失能力的程度可能有所改善。就现在而言，我们的焦点在于严重的精神病。在这个领域中，具体的病原还处于争论之中，而且还存在着社会参与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但在这个领域中谈论恢复认知和情感能力确实有意义。^②

① 以上我们描述了最低限度的理性的条件。设计这些条件的目的是把那些有持续自主行为能力的人(如上所述)与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区分开来。在这个程度上，就行为者遵守行为规范和法律的程度，这些条件是中立的。换句话说，只要满足这些条件，最极端的行为异常者的行为也能反映较高的自主水平。关于理性的学术文献自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侧重研究精神心理(psyche)，另一部分关注决策模式。有关前者，请参看卡尔弗(Culver)和格特(Gert)(1982)，第2~6章。关于后者，参看霍沃思(Haworth, 1986)第2、6章。

② 回到我们先对疾病(disease)和病(illness)的区分，除非在身体上的病理得到确认，否则我们不用“精神疾病”(mental disease)这个概念。

在严重精神病的情况下,缺乏理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视觉和听觉幻觉、错觉或思维方式完全矛盾(克莱尔(Clare),第2~3章,1980)。例如,精神病性质的抑郁症患者几乎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识,没有能力参加日常活动。临床抑郁症伤害比较小,即使是这种形式的抑郁症患者,我们仍然能看出行为者和

64 行为之间的差距。具体来说,关于受害者在他们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多或少含有一种有限的宿命论感觉。这种感觉还经常伴随着一种对生活不可预见性的焦虑感,同时还有一种无助(塞利格曼(Seligman),1975)、失去控制(费尔斯(Phares),1976)、没有价值(贝克(Beck),1967)和挫败的感觉(吉尔伯特(Gilbert),1984,第4章)。简而言之,所有理论家描述了抑郁症患者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而且表现出很低水平的自主能力的不同方式。这种损失的原因或者个人对此做出解释的方式可能存在文化差异,但是这个事实并不反对在所有的文化中其症状导致相同形式的能力丧失的观点(福斯特和安德森(Foster and Anderson),1978,第5章;参考赫尔曼(Helman),1990,第10章)。^①

① 完全相对主义的方法对严重精神病造成的危险是它对这种丧失能力的客观性提出了质疑,而且有使拒绝对受害者提供适当关怀的做法合法化的危险。塞奇威克(Sedgwick)作出了强有力的论证:

相对主义理论在试图消除和削弱精神病概念时,便在精神健康行业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变得更加困难。相对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及其公众处于一种完全没有活动能力的状态……但是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和可悲的反精神病学的社会学姿态并不能被严肃地当做超越这场战斗的姿态……它处于战斗之中,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人希望关闭特护精神病病房,把精神病患者扔到大街上,不时还给他们打几针镇静剂,为的是向公众表示,他们仍然在进行某种医学疗法(1982,第41页;参考富尔福特,1989,第10章)。

否定这种噩梦般的情景——一个人无法参与到他们的文化中、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受到自己幻觉的折磨但又无能为力，只有依赖药物“勉强度日”——应该处于对个人自主的正面定义的实证研究的核心。这一点在雅霍达(Jahoda, 1958)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她的正面精神健康的成分包括：自我发展、有意识的自我接受和身份意识、生活目标的统一、对于压力和挫折的忍耐力以及“把握环境的能力”。沃尔(Warr, 1987, 第2章)最近在试图实证操作同样的概念时，区分了精神健康的五个成分：情感幸福(affective well-being)、能力(competence)、愿望(aspiration)以及完整的功能(functioning)和自主(autonomy)(我们与沃尔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把精神健康看做自主的一个成分)。当然，这并非暗示精神病患者完全缺乏自主能力。每个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无论他们在日常活动中表现得或感到多么无助。这个观点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在艺术方面，一些严重的精神病患者表现出极高的创造力；在法律方面，许多接受强制精神病治疗的患者并没有被视为没有能力在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做出自觉的选择(梅森和史密斯(Mason and Smith), 1987, 第18章)。

在论证上述论点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受到两种误解，因此需要在此提前予以纠正。第一，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是在赞美反社会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强调以损失互利互惠、相互依赖为代价的独立性。在牺牲他人利益的条件下追求个人私利的自65主很难构成一种普遍化的人类需要。实际上，好几项研究都表明，自尊与各种亲社会(pro-social)的态度、利他主义和无私慷慨形影相随：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能力最自信的人也正是那些最

关心他人需要的人(莱文(Lieven),1989)。此外,他们经常还是那些以实际行动提高他人状况的人,而且经常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会轻易放弃。例如,有一些年轻人从美国北部到南方去生活,长期亲身参与那里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舍弃舒适的生活和现成的工作机会,人们发现他们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科尔斯(Coles),1967)。按照一般的道理,似乎是挑战者自主性越强,就越有可能有效地挑战压迫性的社会秩序(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1978,第3章)。

第二,有人也许会认为,我们对于自主的分析虽然在口头上推崇弗洛伊德,但是并没有吸纳他和其他精神分析学家提出的人类认识上的革命。正是因为我们提倡的选择和决策模式在根本上仍然有一个前提,即只要身体、教育、情感和社会变数可以恢复正常,个人就有潜力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许多秉承精神分析传统的人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即使行为者被认为是自主的,因为他们在这些测度上有较高的分值——包括没有严重的精神紊乱和抑郁症——并且似乎表现出较高水平的自决能力,事实仍然是一个无意识做主的问题。它怎么会这样?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在精神分析学家之间存在巨大的争议,我们在此涉及这个争议不太合适。事实上,无论无意识的实际影响是什么,在我们以上界定的意义上,个人越自主,在追求人生目标方面就越自由。因为所有的精神分析试图达到的目标正是把这种自由受到的任意性精神约束降低到最低限度,所以我们的理论应该被当做精神分析目标的补充,而不是与之相矛盾。

能力必将增加主观幸福。在这一点上,许多精神分析的传统都很有说服力,而且我们已经清楚地区分了需要和偏好,强调了这一点。然而,冈特里普(Guntrip)进一步论述:“弗洛伊德说,我们最多只能帮助病人把他的精神痛苦换成普通的人类苦恼。我认为这个观点过于悲观,病人隐约感到他们有可能以一种更加真实而稳定的方式感受自我、体验生活”(冈特里普,1968,第279页;参考弗洛伊德,1974,第292~293页)。换言之,病人可以获得的治疗学方面的成功是提高他们参与或质疑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能力。这种参与也许并不幸福——实际情况无疑经常如此——但是这个事实丝毫没有否认它的解放潜力。的确,如果有任何东西能够把这种不幸福感降低到最低限度,那么它可能就是成功参与可以产生的自尊意识。^①

机会

第三个影响自主水平的变量是行为者有多少实施新的、重要行为的机会。所谓“重要”,我们的意思是这些活动应该属于布雷布鲁克的分类中的一类——父母、户主、工人或公民——具有社会重要性,或者行为者认为这些活动对于合理提高他们参与自己生活的能力很重要。这意味着当我们把自主能力的提高和选择能力的增强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指的不是任何原有的选择。一个人可以选择整天扔硬币,但是这样做过程恐怕算不上提高扔硬币者的自主能力。

^① 在这一点上非常感谢伯纳德·伯戈因(Bernard Burgoyne)。

如果一种品牌的洗衣粉实际上和其他品牌的洗衣粉没有什么不同,那么选择这种洗衣粉与其说扩大了选择者的自主范围倒不如说是缩小了他的自主范围(德沃金,1988,第5章)。但是如果我们作出重要的选择——知道我们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感到自豪和快乐——我们必须要有机会。对于那些得不到机会的人来说,他们的自由和自主人为地受到了限制,而且无法开发他们作为人所具备的某些能力(霍沃思,1986,第6章)。正是这一点超过其他的一切,使专制如此遭人痛恨。

67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受压迫者也能作出选择。对于决定社会角色的各种规则,他们没有发言权,然而他们的生活中却充满了世俗的选择,以解读这些规则。的确,鉴于这些严格的限制及其可能导致的极其艰难的处境,受压迫者在现有条件下艰难度日,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且还帮助别人(他们觉得自己对这些人负有责任)维护尊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经常体现出强大的创造力。如果受压迫者的自由是虚幻的——如果没有机会——那么鼓励帮助他们挣脱压迫的锁链就没有多少意义,奴隶制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尽管这个观点适用于所有极度而不应该贫困的群体。它还强调了在这些群体中个人的能动自由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所谓能动自由,指的是原则上的选择能力——即使在任何特定时候,这些群体的成员也许很少对自己受压迫的处境提出挑战。

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能动自由不应该与更高层次的、与政治自由相关的自主和机会混为一谈(多亚尔和哈里斯,1986,第5章)。我们把自主作为一个基本需要,因此,我们的分析更多关

注的是参与任何方式的生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无论它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色彩多么强烈。个人自主显然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存在着质疑和参与同意或改变一个文化规则的机会,那么行为者就有可能大幅度提高自己的自主能力,尽管政治上受压迫者无法得到一系列的选择权。在此之前,他们只能说是通过解释他们特定社会环境的现行规则进行选择。现在,在这些情况下,他们的这些行为在一种更深的意义上变成了经过选择的、属于他们自己的行为。原来的自主变成了“批判性自主”(Critical Autonomy)。

雷兹(Raz)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

重要自主(significant autonomy)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一个人可以或多或少地有自主能力。有重要自主能力的人能够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决定其进程。他们是一些有理性的当事人,能够在评估相关信息之后,在各种选择之间作出判断,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够选定个人计划、发展关系、为了目标承担义务,通过这些,他们的真诚、尊严和自尊得到具体体现。总之,拥有重要自主能力的个人是他们自己的道德世界的创造者之一(雷兹,1986,第154页)。

德沃金的说法更具技术性:

自主被认为是人的一种次要能力,用来批判地反映他们的首要偏好、欲望、希望等,它还是一种根据更高层次的偏好

和价值观接受或企图改变这些首要因素的能力。通过运用这种能力,人确定自己本性,赋予自己的生活意义和逻辑性,承担各自的应尽的责任(德沃金,1988,第20页)。

首要偏好和次要偏好的区分非常有用,因为它强调了基于思考过程的行为与不加鉴别的行为之间的差异。然而,如果把这种区别与在本质上确定自主的概念联系起来,就会掩盖两类人群之间同等重要的区别。有些人能够批判性地思考而且努力改变其社会环境中的规则,另外一些人则没有这种能力。受压迫者必须不时运用较高层次的批判性思维考虑德沃金的次要类型——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中——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如果认为他们有时候必须作出的痛苦选择与我们不假思索就可以做到的普通日常行为没有什么差别,那对他们来说是不公正的。同时,如果认为这些人有较高水平的自主能力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担负起他们这种人应尽的责任”,这种看法也是很愚蠢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更倾向于区别作为能动自由的自主和更高程度的批判性自主。前者与相对较高水平的批判性思考是一致的,后者则是民主参与任何程度的政治过程所必需的。要想真正获得批判性自主,个人必须有机会表达能动自由和政治自由(参考多亚尔,1990,第1~13页)。如果没有这两种类型的机会,他们又将在客观上丧失能力,即使他们的理解水平、认知和情感能力也许很高。对于现在而言,我们将继续专注前者,因为在此我们关心的是参与任何方式的生活所必须的前提条件,无论这种生活方式多么专制。在第7和第11章里,我们将探讨创造批判性自主

在实践、道德和政治上的含义。

比较需要满足中出现的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证明,生物意义上的人(humans)在成为文化意义上的人(persons)之前,必须满足某些条件。从逻辑上说,他们必须有能力和参与一种方式的文化生活。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有身体、智力和情感能力,持续地以某种受到尊重和强化的方式,与其他行为者互动。失去健康或自主能力必然导致这方面能力的丧失,而且没有能力创造或分享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无论这些东西的是什么。既然这些基本需要对于每个人都是相同的,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一条绕过种族中心论(ethnocentricity)的问题的途径。我们的研究正是以此开始的——即区分需要和想要的原则标准。这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任何社会所取得的社会进步。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仍然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基本”的含义是什么?确定需要满足的最低水平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即使立场最坚定的相对主义者估计也不会质疑某些需要的普遍性,如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水、氧气和卡路里。如果在童年时期没有受到某种教育和情感关怀,所有个人都会发现参与同伴们的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他们可能也不会反对。但是,比最低限度超出多少才算得上令人满意的基本需要满足水平?一旦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所有的共识立刻烟消云散。第二,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努力满足需要的方式存在深刻的差异。让我们把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物品、活动和关系确定为“满足物”(satisfiers)

(莱德勒(Lederer), 1980, 第 53 页; 参考卡姆内特斯基(Kamenetsky), 1981, 第 103 页)。因此, 既然满足需要总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中, 那么跨文化的、确定需要的标准不就成了是一件人工产品吗?

70 让我们首先探讨第二个问题。个人已经总结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满足需要的方法, 这既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件幸事。食物就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烹饪的原料常常是大同小异, 而全世界的烹饪习惯却是五花八门, 的确令人称奇。

能够在这些烹饪传统之间进行试验和选择——在许多大城市里, 如果你有钱的话——本身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特权。对于一系列其他基本需要的满足物, 如衣服、建筑物、工艺品, 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满足物同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经过了各种不同方式的发展。我们都需要最低数量的满足物, 如水和蛋白质。从表面上看, 这与某些文化传统是否比其他文化传统更优越、更先进这个问题没有关系。例如, 问中国菜和印度菜哪个好这种问题有什么意义呢? 毫无疑问, 某个中国人或印度人会有自己的偏好, 读者们恐怕也一样。然而, 正如我们看到的, 偏好是主观的, 而且存在文化差异。在这方面, 文化非常重要, 有些人为了不违犯文化禁忌, 特别是食物方面的禁忌, 不惜遭受严重剥夺(布雷布鲁克, 第 102~104 页)。

第二, 对于可以接受的需要满足的水平, 似乎也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在许多传统文化中, 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或受教育水平不如工业化国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以高度创造性的方式参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 他们确实经常在参与过程中表现出

很多的自主性,而且相信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的确,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了解得越多,它们的许多特征与我们自己的文化相比就显得越具魅力——例如,那些强调个人对集体义务的重要性而且严重关注环境问题的文化。总之,相对主义者也许会声称,因为个人健康和自主体现在各种文化环境中,在文化环境之外谈论这些问题,就是陷入了抽象的哲学泥淖,没有多少人类学方面的意义。一旦人们超越了参与社会生活最低限的前提,人的需要似乎就完全是相对性的。

例如,让我们考虑在不同文化之间比较自主的问题。有证据表明,个人成功是跨文化分析解释不了的。一位在传统文化中深受同行尊敬的工匠也许比一名自己和别人都认为是一个失败者的大学教授更加自主,尽管后者比前者的预期寿命更长、学问更大。进一步说,某种行为——如勇敢——在一个文化里可能代表高度自主,而在另一个文化里也许就显得粗鲁、愚蠢。有人可能认为,个人自主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不能用来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帮助我们以我们试图运用的方式来评价社会进步(莫斯(Mauss), 1985,第1~25页;参考拉方丹(La Fontaine),1985,第123~140页)。

表面上,这些论点非常有力。它似乎确实表明,一个文化强迫另一个文化接受人类需要的看法无异于概念和道德上的帝国主义。既要合理地主张我们理论的普遍性,同时又要承认在实践中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文化对于什么是令人满意的需要满足确实看法不同。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下面我们将利用一个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假设有一个小岛,岛上不存在物质匮乏或环境污染问题。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学习本土文化所重视的手工和认知技能。岛上有充足的职业选择机会,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所有居民只要遵守现行规范和法律就可以得到情感方面的关爱。所有其他的事情也都非常平等——例如,大众中间没有集中的贪欲和权力,没有流行的遗传疾病,也没有自然灾害——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如此富足的环境中,在需要的满足方面会存在任何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因此,在这种程度上,所有居民都应该具有相似的、较高水平的、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健康和自主,无论他们如何定义这两个概念。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如果他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成功地参与到他们的文化当中。让我们假设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繁荣富裕、所有成员高度参与的文化生活方式。

现在,假设岛上一半地方发生了一场瘟疫。其中一个症状是
72 可以让人丧失体能的严重病疾。显然,如果他们到小岛的另一半去,那里的人个个身体健康。新来的病人将没有能力像以往那样参与正常的生活,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被视为丧失了能力——无论我们如何定义疾病的概念。同样,假设这种瘟疫的一个后果是一定程度的健忘。患者忘记以前学会的许多智力和实践技能。很明显,无论他们如何解释失去记忆的原因,他们还是没有能力像以往那样以各种方式参与生活。最后,假设瘟疫的后果既不是丧失身体能力也不是健忘症,而是抑郁症以及丧失运用这些技能的能力的信心。无论如何理解这件事,后果还是如此,与那些没有受到瘟疫侵害的人相比,他们的参与能力将会受到损害。因此,不管当地人信奉何种宇宙观,通过这个假定,我们似乎可以构造出在一个文

化中可以对较高的和较低的健康和自主水平进行比较的情形。

类似的比较能不能用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呢？让我们进一步假设小岛周围还有一些岛屿，这些岛上同样非常繁荣，也有较高水平的社会参与——无论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点。在一个岛上被视为正常的行为可能是另一个岛上极力避免的，这种情况不一定会影响双方居民的健康和自主（我们界定的意义）。那么，通过假想，我们看到，许多来自完全不同文化的个人，在似乎完全相同的意义上，到达了远远高于最低水平的健康和自主水平——具有持续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能力，以高度创造性的方式参与他们的文化。原因在于可以得到特定的满足物而且这些满足物的特性与他们的文化差别无关（在第8章，我们将进一步总结这种差别）。总之，在高于最低限度的水平上，比较一个文化当中或几个文化之间基本需要满足的水平似乎没有什么困难。

同样的道理，如果一场导致痢疾、健忘或忧郁的流行病袭击了其他岛屿，（假设所有其他条件都是一样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岛屿受到的让人丧失能力的影响会有什么不同。我们立刻就可以确定哪些人健康和自主水平较高、哪些较低，同样也可以确定他们参与各自特定文化的、不同的能力。进一步来说，只要了解异族⁷³文化的各种规则，在一个岛屿上具有较高健康和自主水平的个人，在另一个岛上也将有更大的潜力进行较高水平的参与。的确，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如果他们的健康和自主水平更高，他们的参与不能比一些本地人更加成功。唯一相反的论点是，有人可能会争辩，由于在概念上受到本族文化的强行约束，成功地掌握一个异族文化的规则以参与其活动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在任何

细节上说明文化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则意味着什么都将是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人类学研究成果都不得被视为毫无意义的垃圾(多亚尔和哈里斯,1986,第6~7章)!但是这又必须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一个文化之中和几个文化之间比较个人的基本需要满足水平。当然,这些都不应该令人感到意外。实际上我们在各种流行病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中发现的正是这些类型的比较。

最后,如果这些比较是可能的,那么撇开文化差异谈论基本需要满足的最优水平而不是最低水平的意义在原则上就变得非常清楚了。身体健康的最佳水平,意味着根据人体基因潜力,尽可能长的预期寿命和尽可能少地因为疾病丧失能力。自主的最优水平对应于在前文里的能动性自主和批判性自主之分,可以分为两种形式。较低最优水平包括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参与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时受到的社会约束,同时还必须得到成功地追求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所必需的认知理解。较高的最优水平则进一步包括能够获得其他文化的知识,同时还可以获得关键技能和政治自由,以评价自己、努力改变现状(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的话)。

在本章,我们论证了健康和自主是人的基本需要。人们必需满足这些基本需要以避免从根本上损害个人参与其生活方式的严重伤害。如果上文中的思想实验没有任何逻辑方面的矛盾和事实方面的不恰当性,我们还证明了,有可能在原则上按照这种方法不仅在一个文化中而且在不同文化间比较基本需要满足的水平。在

74 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只是强调了每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所进行的同类比较的合理性。这些组织非常注重评估他们所代表的人所遭受

的严重伤害的程度。它们进行了许多这样的比较。

然而,这种把焦点放在普遍性上的做法也许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担心。当然我们很少提及特定人群不同的需要。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关注的是人类所有成员相同的需要,没有性别、种族、阶级、年龄和文化之分。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特定群体有特殊的需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妇女、受到种族压迫的群体和残疾人。这些群体成员的健康和自主除了受到我们已经概括出来的那些威胁以外,通常还面临一些额外的威胁。结果,他们需要一些额外的、特殊的满足物和程序来应付和矫正这些威胁。然而,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群体成员的基本需要和所有其他人有什么不同。

的确,只有在能够证明大多数代表特定形式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或压迫的“主义”与上述群体中个人的基本需要不一致时,才应该对其进行谴责。显然,出于这些原因,在任何关于需要的政治中,差别政治有一席之地。特定群体强调并且争取改善可以满足其成员基本需要的、现存的特殊满足物(洛弗尔(Lovell),1990,第3部分;参考罗博特姆(Rowbotham),1979)。他们最了解自己的需要,而且最致力于更好地满足这些需要的斗争。

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使这些差异具体化的危险。基本需要以及满足它们的必要条件(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对于所有被压迫群体都是一样的。正是通过这些概念,那些特殊形式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人的经历和伤害才能得到那些没有相同经历的人的理解和欣赏。在政治上,这一点有三个重要功能。第一,它阐明了被压迫群体之间共同的纽带——那些压迫他们的人对他们的健康和自主造成的无情的伤害。第二,这种共性表明,他们不同的经历实

际上非常相似,而且可以为更多的相互理解和同情打开大门。第三,这种情况又进而使得以同一个目标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成为可能。这个目标就是最好地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无论各个群体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异。^①

^① 最近女权主义关于差别政治的争论,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介绍,请参看洛弗尔,1990,第3部分;另参考索珀(Soper),1990。

第5章 满足基本需要的社会 前提条件

76

我们强调个人自主是不是偷偷夹带了一种否认社会在满足需要方面的作用和地位的、强烈的个人主义观点？在本章里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只能从其他人的积极行为中获得行为能力，而他们也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的，依此类推。任何忽视这个事实的能动性或自主的概念都将是空洞的抽象概念，与理解人们采取行动和作出选择的原因无关。这个论点探讨了一些社会前提条件，所有的集体如果希望长期生存，以确保一个可以使个性得到发展的环境，就必须满足这些社会前提条件。

个人自主的社会层面

在上一章，我们已经证明，必须具备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由，即能动自由和政治自由，个人自主才能是“批判性的”。在进一步探讨自主和自由之间的联系时，许多秉承自由主义传统的学者认为，两者都应该被视为不受约束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不是由行为者自己选择的。只要我们谈论的是有形的约束——通过使用暴力禁止自主选择——那么这一点就显得非常直截了当。

然而,“约束”有时被解释得更加宽泛,正如沃尔夫(Wolff)写道:“一个自主的人,只要他是自主的,就不以别人的意志为转移”(沃尔夫,1970,第14页)。这句话意味着真正自主的人完全自足,他们为自己选择自己希望的生活方式,只要这样做不干涉别人的选择。表面看来,这种自我决定的想法似乎合理可行。显然,如果对于他人来说除了自卫以外,什么也不用做,能动自由和政治自由都依赖于行为者能够为自己作出选择;而且尊重这些自由非常可行。

然而,自主的这种个人主义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我们把注意力仅限于德沃金的首要 and 次要偏好——两种偏好都不排斥创造性地生存于独裁主义的社会秩序中——这种个人主义的观点也分割了行为者与形成他们个人身份的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正如我们所见,个人通过了解他们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来发现自己是谁。只要这种行为学自他人而且为他人所强化,个人行为就具有社会性。

社会化的行为者必须遵守规则。这些规则是集体所拥有和加强的目标和信念的表达。有的显然是公共规则(例如,如何用一些货物交换其他货物),有的则在本质上似乎是私人规则(例如,沐浴、如厕习惯)。这些规则构成了我们对自我和他人意识的参数——即个人认为在私下和公共场合(正式地)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因此,成功行为所必需的自主并不是由遵守规则的必要性组成。恰恰相反,正是我们的社会环境所施加的规范性约束,使具体选择做X而不做Y真正成为可能(多亚尔和哈里斯,1986,第4章;参考雷兹,1986,第8、14章)。

对规则以及个人对规则的解释加以区分,这一点就变得显而易见。被人认为和自认为是棋手的人需要参照一套适当的规则。除非他们同意遵守这些规则,否则他们不能选择下棋。但是他们作为棋手的自主是有保障的,因为有许多不同的招术可供他们自己选择。他们对自己下棋水平的认识——或者甚至他们到底会不会下棋——取决于对手的棋艺。当然,在更加广泛的社会环 78 境中,理解个人为什么选择与具体规则有关的行为以及那些规则为什么如此制定显然比下棋要复杂得多。例如,个人和制度的力量总会对这些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还有一系列其他目标和策略——如果它们确实是有意识的——这些目标和策略比那些与下一步棋怎么走有关的目标要模糊得多(吉登斯(Giddens),1984,第14~25页;参考卢克斯(Lukes),1974,第11~25页)。然而,个人行为的可理解性仍然源自规则,因而也就是源自维持它们两者的社会集体的存在。

多亚尔和哈里斯在论述语言规则时强调了相同的联系:

因此,你采取的所有行为就像你所说的语言中的词汇。那些行为是在社会群体中实施的,语言是在社会群体中说的,它是这个社会群体的集体财产……所以,把你自己的行为看做是完全自足的——由你自己实施、为你自己服务——与任何其他他人没有关系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社会生活是个人的一个根本特点,不像一棵单个的树木碰巧生长在森林里。一棵树如果孤零零地生长仍然是一棵树;但是人性是社会赐予个人的礼物(多亚尔和哈里斯,1986,第80页)。

但是,这一点必须意味着,表达个人自主的机会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放任不管——不仅仅是消极的自由(negative freedom)。如果我们真的被他人所忽视,我们将再也不能学会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规则,因而也就无法获得在该生活方式中作出选择的能力。鲁滨逊·克鲁索独自一人在孤岛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的成功离不开他从前多年与其他人的社会接触,他在后来所运用的技能都是这些人教的!

换言之,想要自主,想要身体健康,我们还需要积极的自由(positive freedom)——我们已经描述过的物质、教育和情感方面的需要满足(伯林(Berlin),1969)。在普遍社会化的背景下,自主个人(而非奴隶)的行为所必需的认知和情感能力依赖于这种社会
79 化,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在身体上约束其他人的行为,为什么必须具备采取相应行为的情感能力。但是再一次,他们只有得到积极的帮助才能学会遵守包含在这种约束中的规则。进一步而言,希望以一种不受约束的方式行动仍然要求参与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其他人的积极行为有实质的意义。例如,一个人要想举办一个成功的讲座,仅仅要求听众不中断她的讲座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具备身体、智力和情感方面的能力认真思考她的观点。否则,举办讲座的人何必要白费口舌?

这些论点扩展了我们在前一章里把严重伤害和受损害的社会参与概念联系起来的理由。如果没有必要的需要满足以避免这种根本性的损害,个人将没有能力去探索他们的生活方式为了发挥身体、智力和情感表达的潜能而提供的边界。马歇尔(Marshall)、

托尼(Tawney)、蒂特马斯(Titmuss)和汤森(Townsend)在他们更新的公民权利理论中包括了这些论点(哈里斯,1987,第3~5章)。

保护个人的健康、学习以及情感的发育成熟本身就是一些社会过程。因此,它们必然涉及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互动。这些群体常常规模很小——如家庭、学校的班级、朋友和同事——其成员和其他群体的成员相互重叠。如果所有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方面,都遵守大体相同的规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有共同的文化。如果在一些但不是全部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一些成员有一套特殊的规则,只有他们和一些密切相关的人遵守这些规则——这些规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与主导文化相冲突,或许与之不冲突——那么他们就可以被视为属于同一个亚文化。^①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只关注前者,而且有两个重要的限制条件。一方面,我们同意阿彻(Archer)(1988,第19页)的观点,过多地强调文化的一体化可以导致“系统地忽视不同选择的存在或缺乏”以及“不情愿承认在全人类中存在任何区别,哪怕是很小的区别”。另一方面,尽管存在这些规范性的多样性,比较明显地,可以80找到具体的规则网络,从概念上组织起实际手段来,使规模较大的群体能够设法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而且将确定大多数成员视何种满足物为正常和可以接受的。即使“文化”不被视为一个决定个人活动细节的独立变量,它仍然是最有用的表达方式,可以用来表示这种规范性共识的存在,并且(如果它确实存在)将一个共识同

① 道格拉斯(1973)的文章充分说明了在文化的个性化方面规则(尤其是语言规则)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不重视以这些方式区别开来的各种文化之间实际而具体的联系。参看多亚尔和哈里斯(1983),第59~78页;参考哈里斯(1979),第2~4章。

另一个共识区别开来。

四个社会前提条件

像个人的情况一样,集体如果希望长期生存和繁荣,就必须满足一些必要的社会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关乎群体的规范性结构,即个人安排日常生活的规则。这些规则包含了如果他们希望继续相互支持,必须集体达到的目标。所有文化中都有四个这样的目标(参考威廉斯,1965,第2~3章;1979,第2章第3节)。第一,任何社会都必须生产足够的满足物以确保最低水平的生存和健康需要,同时还有其他工艺品和具有文化意义的服务。第二,社会必须保证一个适当的繁衍和儿童社会化的水平。第三,社会必须保证生产和繁衍所必需的技能 and 价值观能够在足够份额的人口之间传播。第四,必须建立某种权力制度以保证遵守规则。没有这些规则,这些技能就不能得到成功的实践。

即使行为者没有考虑他们行为的目的在于达到社会前提条件,个人行为也可以说明吉登斯所谓的人类行为结构的“二元性”(吉登斯(Giddens),1984,第24~28页,第6章;参考科恩(Cohen),1989,第1章)。如果没有个人的行为能力,就不可能有社会结构,如果没有社会结构,也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行为能力。吉登斯说:“我所谓‘结构的二元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本质上的循环特点:社会制度的结构性特征既是构成那些制度的行为方式的媒介,也是它的结果”(吉登斯,1982,第36~37页;参考阿彻,1988,第87~81 94页)。正是因为如此,个人的健康和自主必须总是在一个制度

环境中获得,社会制度的长期生存将依赖于此。出于类似的原因,布雷布鲁克也强调了社会作用的四个范畴。这些范畴几乎同我们的四个社会前提条件完全一致(布雷布鲁克,1987,第48~50页;多亚尔和高夫,1984,第18~21页)。现在,让我们逐一仔细研究。

生产

在所有的文化中,人们必须创造食物、住所和其他达到(所定义的)集体的“正常”健康水平所必需的满足物。这种物质生产的需要构成了每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如果社会成员希望养活自己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这些安排在各个文化之间在细节上会有所不同,尤其当它们存在于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游牧社会、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以不同的方式解决它们在物质方面的问题。然而,尽管存在着文化差异,这些社会在努力征服自然的时候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面临着他们都认同的障碍。

多亚尔和哈里斯认为,这些核心活动是一般社会生活中带有“本质性的”,对于异族文化和我们自己文化相似之处的理解能力中处于中心地位(多亚尔和哈里斯,1986,第7章;参考阿彻,1988,第5章)。例如,除非一个人类学家能够在另一个文化中多少确定一些与自己文化中的活动相同的活动,否则将无法翻译异族文化的语言,因此也就无法深入到异族关于规则和准则的集体意识中。他在学会异族语言之前通过加入这些活动,让人能够认出他来,这样他就能真正地进入。这样做将是非常必要的,既可以让异族人相信他也是人而且很友好,又可以建立稳固的翻译的桥头堡,以

把他们的语言和自己的语言安全地联系起来。

除非这些本质性的活动具备一种基本的可理解性,不依赖于在一个与特定文化相关联的话语模式中的意义,否则这两个目标都无法达到。这说明了生产活动各个方面与文化无关的实际上的
82 恒定性。一些形式的相对主义观点宣称,现实只不过是文化准则的反映罢了,这种恒定性结束了这些相对主义的论调。不仅如此,这些本质性活动的成功和失败背后所隐藏的原因还揭示出一种实际逻辑的模式,这种模式同样不受文化差异的影响。例如,假如你想建一个屋顶,如果支撑不当,它就会坍塌——无论你属于哪种文化,屋顶坍塌的原因都是一样的。进一步来说,如果一位人类学家试图种植庄稼或理解种植庄稼的技能,而没有理解水的实际重要性(无论异族人怎么称呼水),他就会显得非常愚蠢。

因此,本质性的活动包括所有文化中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社会组织形式。自马克思和涂尔干(Durkheim)以来,所有生产活动在本质上都是社会性的,这个结论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人在遗传方面不具有特定的生理或心理机制使他们能够靠自身生存——更不用说繁荣了。例如,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认为,成功的生产需要群体以劳动分工的形式相互作用:

每一个为世人所知的人类社会都存在劳动分工……即使在一个简单经济、资源丰富、蒙昧无知的社会里,也并非所有的工作在有的时候都同样有吸引力。当然,在更加复杂的经济体中,差别是非常惊人的。因此,在劳动分工方面,与在

权力制度方面一样,我们还是需要关注一种隐性的社会契约,这种契约需要经受永久的检验和重新谈判……用于调解一种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尽管冲突的强度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冲突发生在(1)工人个人和家庭对于食物、衣服、住房及舒适环境和生活乐趣等各种需求和要求之间;(2)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各种需要之间;(3)位于统治地位的个人或群体的各种需求和要求之间(巴林顿·穆尔,1979,第31~32页)。

简而言之,为了令人满意地、持续地满足基本需要,我们需要适合这个集体目标的社会生产关系。

然而,物质生产的范围比人们为了生产产品与自然相互作用⁸³的过程更加广泛。正如马克思认为,它还包括相关的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从播种到吃饭这一套完整的过程(马克思,1973,第88~100页)。一旦人们认识到所有形式的生产都具有社会性,因而要求某种形式的劳动分工,那么显然就需要一种适当的交换制度。如果人们不能生产他们自己和他们负责的人所需要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必须有某种其他方式以获得这些东西。

这需要一系列的规则,他们按照这些规则,用他们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交换他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无论这种交换制度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物物交换、互惠贸易或各种各样的市场——它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以具体方式把产品和服务分配给特定的群体或个人的分配制度。然而,分配制度也必须制定谈判协商个人权利的规则——即决定谁应该得到什么。这些还将涉及一些实际

观念和道德观念,前者有关特定个人或家庭对于物质生产的重要性,后者有关容忍何等程度的不平等是合理的。因此,交换和分配机制在不同的文化中大相径庭(萨林斯(Sahlins),1974,第5章)。然而,重要的是它们必须都具备一定的机制,无论其规范性的细节如何,这些机制都必须保证至少能够维持群体生存的生产水平。当然,大多数文化实际上都比这个水平高得多。

繁衍

各种生活方式如果想要长期存在,它们的生产方式还必须为成功的生物繁衍和社会化提供物质基础。生物繁衍和社会化指的是“从排卵开始到孩子不再依赖他人能够独立获得生活必需品并生存”的过程(奥布赖恩(O'Brien),1981,第16页)。这个过程包括两个独立的成分:生殖和婴儿抚养与社会化。从现在开始,本书中出现的所有“繁衍”(reproduction)这个词都特指这些活动,而非其他活动。

84 认为前者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可能似乎是很奇怪的。然而,正如艾森斯坦(Eisenstein)所认为,交配和繁衍总是发生在具体规则的背景中:

妇女参与的这些过程都不能被理解为与社会关系无关,她的行为包含着某种社会关系,而且这些社会关系反映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例如,生孩子这个行为只有反映了婚姻和家庭关系才可以被称为母亲的行为。否则,完全相同的行为可以被称为通奸行为,而孩子则是“非法”的或是一个“私生

子”。如果涉及不同的关系,“母亲”这个称呼可以有根本不同的含义——如“非婚母亲”。结果取决于这个行为包含着什么关系(艾森斯坦,1979,第47页)。

总之,无论生殖规则有什么具体的文化差异,比如在分娩和血缘关系方面,它们都必须使生育和产后母婴双方受到关怀等本质性的活动能够得到安全执行(穆尔,1988,第3章)。再一次,文化形式具有一个共核。

同样,文化的生存也将取决于最低限度地满足基本的孕期和产后的需要。对于不满足于生存的文化,更高水平的满足也是非常必要的。现在,许多人认为,人类早期对于生殖和社会成功之间密切关系的认识,有助于父权制和私有财产的发展。男人在体力上能够征服甚至强暴女人,违背她们的意志,特别是在她们由于生养孩子而增强了依赖性和脆弱性的时候。这两个事实,再加上她们与男性的亲密关系,使男人能够通过支配女人的身体来控制繁衍周期。当这个现象变得习以为常,为了社会利益把女人当作商品任意买卖也就很正常了,因此为私有财产制度的发展打下了心理和规范性的基础——这与恩格斯的观点相反,恩格斯从相反的方向看待这个问题(勒纳(Lerner),1986,第2章;参考梅拉索克斯(Meillassoux),1972,第93~105页)。

一些当代女权主义者曾经批评了这种推测性的人类学观点,她们认为这种观点在确定女人的社会重要性时过分强调她们在生物繁衍方面的作用。显然,除了这些生殖方面的需求以外,她们一直继续在生产的大多数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常常是主导的)作⁸⁵

用。把生产和繁衍过程割裂开来,仅仅根据繁衍过程确定妇女的作用低估或否认了她们的劳动在生产领域中的重要性。这个观点继而又支持了男性至上主义者的陈腐观点,即男人控制物质生产周期是自然而然的,而且隐藏了一个事实,如果没有女人,生产周期和生殖周期都会戛然而止(贾戈尔(Jaggar),1983,第6章)。然而,这种批评的有效性不能抹煞一个事实:与生殖有关的活动可以和那些与生产有关的活动区别开来,这是我们最先提出的论点中就谈到了的。传统的人类学理论受到了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妇女由于既要生儿育女又要承担其他的生产领域的任务,面临着双重负担。任何这样的批评同时也含蓄地承认区分两者的合理性。

在任何社会中,繁衍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养育孩子,并且对他们进行社会化,让他们正确理解和遵守一些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对于他们现在和将来的幸福至关重要。这些规则涉及许多活动,要么是本质性的活动,要么是具有文化特色的活动。前者对于所有文化都是相同的,而且用来针对基本需要的满足(例如,认识到某些活动有危险而且可能给人造成痛苦)。后者在不同的文化中各不相同,可能也可能没有用来针对基本需要的满足(例如,学习该文化的语言或学习该文化中一些更加奇异的习俗)。与生殖的生物层面一样,达到这两种类型的目标将取决于其具体的社会环境:

教孩子们什么以及怎么教都取决于大人的意愿。孩子们应该吃什么或者应该怎么上厕所?他们应该遵从哪些合法的权威?他们应该获取什么样的技能和爱好?这些都取决于现行的社会价值观,在当代社会里应该包括工人阶级家庭、少数

民族家庭子女的适当地位,当然还有妇女适当地位的价值观(贾戈尔,1983,第152页)。

从历史上看,尽管亲属关系的形式会有很大差别,婴儿早期社会化的社会环境总是某种形式的家庭结构。长期以来,证明和解释这些形式的社会特点和复杂性一直是人类学的中心话题(纳罗尔(Naroll),1983,第10章)。同时,许多女权主义学者把家庭的社会组织与父权压迫联系起来。然而,为了行文的目的,我们必须首先关注上文中阐述的、繁衍的生物和社会层面缺乏对称的问题。许多研究表明,亲生父母不一定在婴儿的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发挥有效的作用,这个观点进一步打消了任何使生母的作用具体化的企图(穆尔,1988,第21~30页)。然而,无论家庭结构多么不同,也无论在许多形式的家庭中妇女受到多大的压迫,文化的生存仍将依赖于这种早期社会化的成功。

文化传播

生产和繁衍的社会条件包括驾驭物质环境以便人们能够创造或消费特定种类的产品和服务。有关的社会群体成员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理解力,不了解以往达到这些实际目标的成功经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行为者不是天生就具有这种理解力,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他们也不一定预先就有接受该群体特定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倾向。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概念的复杂化,他们必须在正式和非正式教育的环境中,继续向别人学习这两方面的知识。这样做又基于业已存在的、决定相关生活方式的、居于

主导地位的文化观念的行为规范、法律、传统和礼节仪式——即区别一种生活方式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规则。

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以他们认为“相同”的方式对这些规则作出解释,通过对规则的例化(instantiation),使社会结构和文化得以繁衍再生。这种例化的过程是所有悠久文化的一个普遍特点,我们也称之为“文化传播”。为了让文化传播经久不息循环往复,必须建立一些符合并强化主导的规范性模式的交流模式。正如威廉⁸⁷斯认为:“从经验上看来,强调交流表明,人不局限于权力、财产和生产关系。在描述、学习、劝说和交流经验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而且带有根本性的”(威廉斯,1973,第18页)。这种交流的社会组织形式将需要有自己的规范性结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教育机构。然而,无论这些机构的细节如何,作为结果而发生的社会化必须使个人做好准备,在别人期望他们以及他们希望自己参与的劳动分工中,承担特定的生产和繁衍任务。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传播两种具体的认识。

第一种认识和技能有关。每个文化在前辈们如何学会应对他们最重要的生产和繁衍任务上,都集体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至少,这些知识包括了“技术”认识和“实践”认识。这两个术语是哈贝马斯提出来的,前者是关于成功地驾驭和预测自然过程,后者则关乎成功地与别人进行交流(哈贝马斯,1971,第301~317页;参考第7章)。两种类型的认识如果没有充分传达给足够数量的人,如果不适应新的要求,该文化及其个人基本需要满足的物质基础就会日趋恶化。

第二,每个社会都需要一些规则来衡量索取、交易和分配的合

法性,衡量的方式是把不同形式和数量的劳动与人们在劳动中获得的报酬联系起来(吉登斯,1984,第28~34页)。个人想要能够制定计划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就必须知道而且接受他们要用劳动换得产品和服务,而且他们的劳动还必须遵循某些规则。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持久的冲突,则意味着其分配制度的各个方面已经得到内化(internalized),与其特定的等级特征和其成员具体的需要满足水平无关。试想一下,在一些传统文化中,需要满足的水平极低,但是社会安定;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让许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确信,市场是一个组织生产、消费、交易和分配的自然而且公平的机制。你不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看到,如果不接受这些原则——特别是在贫困度和失业率较高的时候——⁸⁸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将会受到威胁(威廉斯,1979,第31~49页)。

权力

最后,显然仅有几套规则来构成一个我们所谓的文化是不能保证其长久存在和实施的。个人可以违反规则——而不是以不会威胁社会团结的方式来解释这些规则。这为有关个人创造了机会又带来了问题。一方面,它创造了社会变化的可能性——只要足够多的个人决定以相同的方式或导致相同后果的方式来违反规则,去遵守一套能够维持一个不同文化的新的规则。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鼓吹社会变化既无法解释也没有意义,即使对于大多数成员而言,他们面临的生活方式是不健康的、剥削的和专制的(古尔德纳(Gouldner),1971,第218~225页;参考吉登斯,1979,第1章)。另一方面,社会变化的前景造成了一些潜在的困难。因为我

们可以看到,个人维持并改善健康和自主的潜力完全是社会性的。它取决于集体接受一系列的规则,从制度上确定在生产上取得成功的劳动分工所必需的社会任务。无论革命性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长期利益,如果过多的人决定同时违反规则,那么每个人在短期的需要满足将会受到威胁。

因此,尽管文化规则可能被滥用并且最终招致集体反对,但是必须有某种政治权力——受到法令的支持——确保与需要满足相关的文化规则得到传授、学习和正确遵守。根据有关社会的规模、复杂性和差异水平,这种权力的性质将会大不一样。然而,无论这种权力多么集中或分散,如果社会要持续下去,它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产生有效性(吉登斯,1979,第108页;参考巴林顿·穆尔,1979,第15~31页)。的确,越从涂尔干的传统社会景象向“有机团结的”(organic solidarity)工业化国家靠拢,这一点就越发重要。

89 黑格尔第一个认识到成功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某种形式的集权制度(阿维内里(Avineri),1972,第7~9章;参考泰勒(Taylor),1975,第14~16章)。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个“国家”,通过它的规范性结构及其掌握的权力来确保支撑集体的整体生存和成功的规则得到传授和执行。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权力的物质表现形式总是某种形式的政府,即一个司法和执法机制体系。再一次,人们不必赞成任何特定社会的法律体系就可以认识到,如果它最根本的规则自始至终广泛遭到违反,那么这个社会及其成员要么会毁灭,要么会并入另一个人的基本需要更有可能得到满足的体系中。

总之,这四个社会前提条件——生产、繁衍、文化传播和政治

权力——涉及了一些结构性活动。这些活动是任何在最低程度上取得成功的社会生活模式都必须能够开展的。它们还涉及一些具体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必须经过计划安排而且维持较长的时间。在实践中,个人需要原则上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满足依赖于目标得到成功实现的程度。与此类似,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成功又将取决于其成员的健康和自主。当然,我们假定他们大致相同的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涉及的问题包括希望他们做什么、如何去、如果他们不做会怎么样。这些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才能保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需要得到满足,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有许多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体系曾经而且现在仍然能够协调不仅限于最低水平的此类满足。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哪些种类的规则可能提高最优水平的问题。

以这种方式强调个人需要满足和社会前提条件之间的相互依赖,应该清楚地表明,我们没有采纳功利主义学者和政客经常展示的那种抽象的个人主义观。至于哪些行为将会导致最大的幸福,人类福利的内容远远超过个人在这方面的考虑。然而,应该同样清楚的是,我们不接受各种形式的社会功能主义,它们预先假定个人行为者仅仅反映了其社会环境的结构特征。果真如⁹⁰此,则不可能解释社会变化,因为相关的个人将不会看到这种尝试的意义。

在此,我们主张,评价各种生活方式的唯一标准就是它们使基本的个人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的程度。但是,这必须意味着无论个人需要的满足多么依赖于社会环境,个人需要的概念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环境。否则,就相关的需要满足水平,任何对规范性

结构的评价都将是循环论证。现在,我们必须研究的正是这种评价方法的道德可行性。

第6章 人类解放与满足需要的权利 ⁹¹

至此,我们已经论述了,无论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健康和自主是所有人类的基本需要。我们还进一步说明了满足这两个需要的四个具体社会条件。但是,我们没有涉及人的需要是否应该得到满足这种道德问题。并非每个人都同意他们有义务帮助那些迫切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没有这种道德理论,我们只能向那些同意这些观点的人说教。这绝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工作。近年来,由于受到相对主义的攻击以及来自各种极端个人主义——“我现在”伦理观(the “me-now” ethic)——毁灭性的攻击,坚持满足基本需要的道德观念的人需要尽可能多的理性支持。但是他们的论点需要置于一个更加广泛的道德背景中,只有这样才能说服其他人。否则,怎么能指望人们把“存在”的需要变成“必须承担”的责任并有所作为?

对于这个问题,普兰特和莱塞(Plant and Lesser)勾画出一个大致的答案。这个答案提醒人们注意以下事实:

那些形成了道德观、需要实现某些目标或要求必须履行某些责任的人,无论这些道德观有多么不同,在逻辑上都致力于一个基本需要的概念。只有行为自主的人才可以追

求目的(无论多么不同)和履行责任(无论差异多大);因此,任何合乎逻辑的道德观都必须承认维护人的生命以及提高自主能力是两个最基本的义务(普兰特等,1980,第93页)。

92 这个重要观点需要进一步探讨。

特别是,他们的论点只适用于最低限度地满足基本需要的义务,还是可以扩大到更高的甚至最优水平的需要满足?普兰特等人(1980,第94页)认为,“相关的需要满足水平将成为一个规范性的争议,但是这一点不至于使整个概念无效”。然而,除非我们可以证明,个人有权利获得高于最低限度的需要满足,否则概念失效的结果似乎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义务满足高于最低水平的需要,那么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平等的满足水平——甚至包括异族人或敌人?如果这样,在一个资源匮乏、再分配能力有限的经济体制中,应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一个提供慈善施舍的道德义务,那么不应该从家庭开始吗?满足需要的道德及其程度是本章的主题。

义务、权利和道德互惠

作为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一具活的躯体或一个动物,只有意识、交流和树立目标和信念的能力是不够的,个人还必须承担责任。许多学者,如卢梭和涂尔干,都曾经十分生动地论证,社会生活的存在依赖于认识到对他人的义务——在某人和他人的互动

中,有些事情应该做,有些事情则不应该做。特定文化的成员能够接受对他人的责任,也能够认识到他人所承担的责任,如果没有这个假设,这些特定文化的规范性结构,无论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将无法让人理解。

不仅仅是社会生活需要道德责任,我们自己作为个人对社会生活参与的成功也同样需要道德责任。除非出于偶然我们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否则,社会成功将取决于我们理解自己道德责任的能力以及我们相应采取行动的意愿。的确,正是我们心中这种道德良心的存在支撑着个人存在的核心难题:在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到底应该做哪些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对于我们⁹³而言,道德责任所包含的义务与我们的自然环境同样真实。例如,某人根据一项具体的义务采取行动的说法有一些实证条件。根据这些条件,这种说法与对自然界的描述一样,是真实的(普拉茨(Platts),1979,第243页;参考阿林顿(Arrington),1984,第4章)。

义务的真实性显然包含权利的真实性——权利是一群个人为了履行自己和别人认为他们应该承担的义务需要享有的权利。然而,权利和义务之间的逻辑关系非常复杂。^①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论证,只有在一个业已存在的、明确规定了包含权利的条件

① 有义务做某事的个人,他们自己不一定有权利这么做(例如职业杀手)。进而言之,当个人有一种不属于特定某个人的义务的时候(例如,试图越狱或在战争中开小差),他们不具有权利。最后,即使义务确实属于某个人,这种义务如果带有任何具体的权利,就必须具有道德约束力——一种严格的,或者用米勒(Miller)的话说,“完美的”义务。我们也许有一种在道德上比较微弱的、慈善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并不包含享受慈善的权利(怀特,1984,第60~61页)。

德观体系中,义务才包含权利。怀特认为:“丈夫和妻子、孩子和父母、雇主和雇员、机构中不同职位的工作人员等等,他们之间各种各样的权利和义务不是来源于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而是来源于他们一起参与的共同制度”(怀特,1984,第70页)。因此,例如,如果这种“共同制度”规定,你有义务说出真相,我们就可以说他人有权利了解真相。这一点对你同样适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而且确实真正构成享有权利(entitlements)的权利(rights)带有某个个人或群体能够履行的相应义务。拒绝根据这种互惠关系采取行动的个体(如罪犯)可能会丧失权利而其他人则不会,原因也在于此。^① 再一次,正是个人认识和运用这种互惠关系的能力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我们将带着这个问题讨论满足两个层次的需要道德问题;第一个层次是满足最低需要的权利,第二个层次是满足最优水平的需要的权利。在每一个层次中,我们将区分两种人的权利和义务——来自同一文化的人和不考虑文化差异的所有的人。

^① 怀特(1984,第64~65页)认为,有权利而没有相应的义务是有可能的。然而,他举的所有例子都预先假定某种相关义务的存在,即使不是该权利表面上指定的义务——在比赛中第二投的权利、批评他人行为的权利或“通过双方公共的栅栏看邻居”的权利。说到这里,我们同意他的观点,把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关系确定为纯粹的逻辑关系容易让人误解。把严格的义务和相应权利的存在看做道德信仰和义务的严重性最重要的实证指标要好得多(伦特恩(Renteln),1990,第41~45页)。不久我们将要论证,即使以这些方式来看,我们仍然可以使如此受到文化束缚的义务和权利产生普遍性的不受文化束缚的义务和权利。有关权利、义务和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性文献的精彩介绍,请参看沃尔德伦(Waldron)(1984),第1~20页。

来自同一文化的人满足最低需要的权利

开始,让我们假设有一人 A,她相信自己对于群体 B 中的其他人有某种义务,而群体 B 也期待她采取相应的行为。还假设她意识到并且接受他们期待的合法性。群体可以是一个面对面的小团体,也可以是一个大型的无名集体。但是无论其规模⁹⁴大小,也无论其成员相互熟悉的程度,她和他们相信她应该履行她的义务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也相信她实际上有能力这么做。换言之,“应该”意味着“能够”。格维尔思(Gewirth)的观点如下:

最初的 X “应该”的说法还在逻辑上要求他承诺接受帮助其他人的积极责任。假设如果没有其他人提供的各种基本条件或服务(在此我称之为 p),X 就不可能做 z。那么,当 X 说“我应该做 z”,他也应该接受“其他人应该做 p”的承诺。因为“应该”包含了“能够”的意思,所以,如果其他人不做 p 是正确的,而要是没有 p,X 就不能做 z,那么 X 应该做 z 就是错误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认可某个目标,那么至少在表面上,或者在没有更好的反面考虑的情况下,他也必须认可达到这个目标的必要手段(格维尔思,1982,第 94 页;参考威尔,1983,第 37~47 页)。

因此,为了让义务的双方清楚地理解该义务的性质,义务的归属问题必须附带以下观念:承担义务者应该有权在适当的水平上

满足其相应行为所必需的需要。

假如 A 突然陷入贫困之中,但是 B 群体的成员仍然期待她履行先前规定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A 必须相信她有这种满足需要的权利。因为如果 A 最低水平的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她将根本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包括那些期待她履行的特定行为。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对于那些相信自己对 A 的行为有权利的人。他们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除非她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最低限度的满足,否则她将没有能力履行他们认为她应该履行的行为。因此,她的这种满足需要的权利,与她们对她承担的义务的重视程度以及对她履行承诺的期待是成比例的。反之亦然(参考 P. 琼斯,1990,第 44~46 页)。^①

当然,接受这种权利不能准确说明在特定环境中应该如何尊重这种权利。例如,B 群体中的成员也许同意 A 有满足最低水平需要的权利,但是不同意他们有相应的义务直接提供这种满足。

95 比如说,存在福利机构承担制度性义务来满足这些需要,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记住:如果 A 的权利有实质内容,某人或某个群体就必须承担向她提供帮助的义务。因此,B 群体的成员不能逃避满足 A 的最低需要的义务,至少是帮助满足她的需要——如果存在一个以此为目的的机构,如果能够证明不这样的话 A 的最

① 哈里斯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即使不要求任何人为 A 提供做 Y 的方法(例如借钱给 A)因而对此拥有相应的权利,A 也有做 Y 的义务(例如还债)(哈里斯,1987,第 137~138 页)。然而,他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如果我们真相信 A 有一个具体的义务(例如还债),如果他有能力就会履行,如果我们是他的义务能够履行的唯一途径,那么我们就相应有责任借钱给 A。

低需要将不会得到满足,而且 B 群体的成员认为 A 继续对他们具有义务。这种帮助的形式可以是直接支持,向 A 提供必需的物资和服务(或购买这些物资和服务的金钱),也可以是间接支持,向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福利机构提供资金(古丁(Goodin),1985,第151~153页)。

除了这种积极的支持,A 在道义上可以期待 B 群体成员的其他帮助就是“宽容(forbearance)”——即她的消极自由也应受到尊重,他们的行为方式不会直接阻止 A 履行义务。这和 A 试图妨碍 B 群体的成员履行对她自己的义务一样没有什么意义。然而请注意,这种强调宽容权利的观点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观点(如诺日克)是有区别的。正如我们所见,诺日克的权利概念在根本上是非社会性的,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据这个观点,我们有权利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只要不阻止任何其他他人做同样的事情。而我们的观点却是我们必须有权利做别人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条件是他们的这种期待是认真的。他们宽容的义务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是他们坚持特定的道德信念的结果。

因此,总的来说,只要 A 和 B 群体的成员共同维护上文概括的这种互惠的道德关系,那么他们必须被视为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性与他们占有的物质财富的相对数量无关,而是体现出一个前提,平等的需要满足水平导致平等的履行共同道德义务的能力——在社会中追求个人目标的过程中具有平等的尊严。如果不存在这种前提,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受到伤害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拥有的比别人少,而是他们所能够参与的生活方式比较少。他们⁹⁶

受到损害的能动性而不是他们的这种不平等待遇应该是我们在道德问题上关注的焦点(雷兹,1986,第227~240页;参考格维尔思,1978,第206~209页)。

至此,我们的讨论关注的是对于接受互惠道德义务约束的个人是否存在最低的需要满足。我们没有忘记,在这个过程中过分灌输概念上的一致性是有危险的,现在就让我们把这一点推广到共享某种文化的所有成员中去——共同的、规范的美好愿景。所谓道德规范就是一些规则体系,决定什么行为是正确的,什么行为是错误的。我们已经看到,道德规范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凝聚力,在个人之间达成一种共识,谁有什么权利,谁有什么责任。这种道德责任的关键特征就是我们愿意根据个人的行为是否按照规定的规则来确定他们的是非善恶。威金斯(Wiggins)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

所谓社会道德……不仅仅是任何陈旧抽象的原则。只有包含在(或能够包含在)一种共同的情感中、在历史形成的、由它永久维持的特定习俗和制度中,并且被认识到(或能够被认识到)的时候,它才能存在。只有通过参与其中,普通人作为实际的成员才能享有共同的关怀和共同的目标,这些关怀和目标可以有自己的生命,并被视为神圣的价值观,享有休谟有时提到的“道德美”。

换言之,美德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包括遵从那些规定了成为这样一种“社会道德”或文化的成员意味着什么的权利和义务,无论

一个人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①

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谴责和惩罚缺乏道德的人,或者表扬或奖励道德高尚的人,要求满足的前提条件是他们有这样做或那样做的选择——他们可能采取相反的行为。在一个文化中,责备任何人行不道德并且希望他们将来加以改进的前提必然就是尊重他们这么做所必需的满足最低水平的需要的权利。因此,如果我们相信某人与我们有相同的美好愿景,并且有能力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式做得更好,而不帮助他获得这样做所必要的至少是最低限度的财力物力,这种做法是很矛盾的。

“陌生人”在其他文化中最低需要满足的权利

97

但是,我们的道德义务意识是不是只适用于我们自己文化的成员?显然不是。过高估计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和向匮乏开战(War on Want)这样的组织的能力,认为它们能够解决第三世界

① 在此意义上定义美德的概念是根据古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道德理论。“根据古希腊的所有观点,做一个好人至少与做一个好公民密切相关”(麦金太尔(MacIntyre),1985,第135页)。然而,很久以后的道德理论不再如此强调在普遍接受的生活中成功的社会参与——从其后奥古斯丁学派(Augustinian)的“不幸福意识”到追求个人偏好的各种形式的自我主义——个人责任对于集体的道德重要性一直隐含在人们信奉的教条中。在这种程度上,作为权利的社会体现,坚持对社会成员的规则约束是是否则凌乱不堪的美好愿景贯穿起来的线索。例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对于现时现地的社会组织作出的提示不是偶然的。我们还能看到即使是经典自由主义也隐含地假设了由对法律和参与竞争市场所主导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中,古希腊的勇气道德显然很重要。麦金太尔对相对论的玩赏使他忽视了这种概念联系为不同道德传统提供些许共同标准的可能性,否则他的理论就能成为历史研究和哲学思辨中的壮举。这一方面的进一步探讨,参见伯恩斯坦(Bernstein, 1986),第4章。

极端贫困的问题,彻底根除导致贫困的政治经济条件,这种看法虽然很愚蠢,但是它们确实代表了一种十分强烈的意识,受害者有接受援助的权利而未受害者有给予的义务。这些感觉反映了人们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把上文描述的论点运用于所有地方的所有人。而且这样做很有道理。因为道德义务没有国界——只要那些声称信仰美德的人确实言行一致。

让我们举一个很有争议的例子,如果我们认为个人不应该因为信仰或撰写和出版关于这些信仰的作品而被杀害,那么我们把这种立场确定为我们认可的道德美的一个方面。正是这个原则的绝对地位导致我们谴责任何违反者,无论他们是我们自己文化的成员还是其他持有对立的道德观念的文化的成员。但是对另一个文化的那些人说:“我认为你不应该这么做”又是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他们可以而且他们有权获得最低需要的满足,满足的程度应该不超过我们有能力提供的水平。因此,在另一个社会里看到一位处于饥饿状态的母亲竭尽全力但十分徒劳地喂养她的婴儿时,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结论:她应该有更好的能力完成我们认为她对婴儿应尽的责任。鉴于我们这样把责任归于她,我们就有义务努力以某种方式帮助她。“应该采取行动”满足人们的最低需要,即使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这种通常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举着一面噩梦似的镜子,那些生活在比较舒适国家中的人们可以通过镜子看到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应该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但是又发现他们自己也被剥夺了这么做的能力。如果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形象来形容,在他们的眼里,“这片荒原”和他们自己是没有受到保护

的荒原上“可怜、赤裸的、两条腿儿的动物”(一格纳提耶夫(Ignatieff), 1984, 第38~44页)。^①

我们许多人都觉得,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享有得到帮助的权利,并且相应地给予其他人相同的权利。即使那些不愿意这么做的人通常也觉得有必要得到某种正当理由以拒绝普遍的最低需要得到满足的权利。种族主义学说声称,某些现代智人中的成员不是完全的人类。除此之外,不给陌生人提供最低限度帮助的最平常的理由是,这样做将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损害他们照顾自己的能力。例如,哈丁(Hardin)认为:

如果穷国得不到外界的食物援助,那么农作物歉收和饥荒将会定期制约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但是如果它们需要的时候总能从世界粮库里得到粮食,它们的人口可以毫无节制地增长,它们对粮食的“需要”也会因此相应增加。从短期看来,世界粮库可能会减少这种需要,但是从长期看来,这样做实际上毫无限度地增加了穷国对粮食的需要(哈丁,1977,第17页)。

① 这个观点的道德力量并不依赖于我们接受我们赋予满足需要权利的那些陌生人的道德目标。我们赋予这些条件的价值观随着我们赋予自己美好愿景上的价值观的变化而成比例地发生变化,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必须希望所有其他人都将追求这种价值观而且因此能够这么做。这种观点与古丁的观点相反。古丁认为“仅仅表明某件事情以道德观为先决条件并不能用来说明它一定在道德上符合人们的愿望”(古丁,1989,第49页)。因为如果人们相信任何具体的事情在道德上符合他们的愿望——相对于道德观本身——那么基本需要满足的道德愿望必须符合我们以上概述的理由。

但是,只要把注意力放在最低基本需要上,这些观点就会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可以推测,他们假定应该对存在迫切需要的人做点什么,然而又否认他们有权利得到他们这么做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健康和自主(奥尼尔,1986,第4章)。

因此,我们并非暗示任何人都必须同意,所有的人都享有最低需要满足的权利。他们也不必把全力保证其他人满足最低需要作为自己的义务。给人们造成痛苦是,而且一直是,一种个人和集体的人类非理性的特征。所谓“非理性”,我们当然不是指没有“手段上的优势”。如果把道德规范撇在一旁,极度残酷剥削其他人总是在短期对某些人有利。然而,这种极度利己主义的行为受到了广泛的反对。面对一个有迫切需要的人,如果你能够有所作为提供帮助但是却什么也没有做,那是一种不道德的错误行为,这几乎是一种举世公认的观念。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普遍对种族大屠杀感到深恶痛绝。同样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对各种形式的功利主义感到忧虑不安,这些功利主义把救助给予多数群体,希望给少数群体造成严重的困难。的确,恰恰是为了说明这些问题,休谟在他意义更加深奥的利己主义版本中呼吁一种普遍的道德“同情”。最近在道德理论中自然主义复兴,其特点之一同样就是诉诸于普遍主义(诺曼,1983,第5、11章)。

换言之,关于最低限度的需要满足,某种道德共识已经存在
99 了一段时间。它强调了一种不公平性,即一些人没有能力参与其文化或发展其个性。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这种共识还说明了为什么正义和公平这些辞藻长期受到欢迎,即使在压迫性的政

权当中。迫切需要和享有权之间的联系很强,理性和感情都支持这种联系。

同一文化中的成员最优化满足需要的权利

至此,我们已经证明,所有的人都享有最低限度满足其基本需要的权利。然而,对于任何高于避免绝对的痛苦或能够“勉强混得下去”的需要,我们尚未提供一个合理的论证。现在就让我们将论证扩展到更高的需要满足水平,达到并且包括“最优化”水平。

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履行某人应尽的义务通常所涉及的行为远远高于最低水平的需要满足所保障的最低限度的行为。总会有一些目标个人非常重视,而且他们相信他们有一种义务竭尽全力实现这些目标。通常,他们把这些目标视为他们生活行为的中心内容,是否能够成功实现这些目标将会决定他们是否自认为以及被别人认为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这种个人目标是文化观念所决定的——某人履行道德义务的对象所期望的履行义务的类型和水平。因此,力图达到道德完美是忠于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象征,因而也是为了追求某种特定的美好愿景。忠于该生活方式的程度最终将由其他抱有相同价值观的人来评判。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我們对自己的期待值低于自己的最佳状态,或者认为较低的状态也能为那些我们为之承担义务的人所接受,就会对我们和他们潜心追求的、决定我们行为的共同美德表示怀疑。这样将意味着人们

并不相信美德有那么美。^①

然而,如果我们同意,那些致力于追求相同美好愿景的人有竭尽全力的义务——要按照这样的道德观行善事——那么这就使我们追求进一步的信念:有关的人有权获得他们为了使自己的最大努力在现实中成为可能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我们指望别人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但是同时又认为他们不应该享有这么做所必需的条件——即与他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最低满足相对的最大限度的满足,这种想法是不合逻辑的。当然,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我们自己。这个结论唯一不能支持的是,让我们相信在一切平等的前提下,低于最大限度的努力与追求美德是相容的。

但是再一次,在这个背景中,“美德”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真正重视自己的道德信仰,那么我们就只能同等程度地重视我们文化中其他成员对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其道德行为能力的事情所享有的权利。与最低需要满足的情况相同,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从负面看,不限制他人作出最大的努力;从正面看,尽我们所能给他们提供与我们自己追求美德所要求的需要满足相同水平的满足。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自己文化中所有其他成员,如果重视其

① 再一次,这些观点源自古希腊道德理论,由麦金太尔总结概括:

这些社会共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古希腊城邦必不可少的要素,它们在城邦联合和制定规则方面的成功之处在于所有那些各种活动形式特定的美德,在这些活动中,荷马之后的希腊逐渐认识到美德与人为因素无关的客观性的标准:战争与战斗、体育运动与体操表演、各种形式的诗歌、修辞、建筑、雕塑、农业和各种各样的技术以及城邦自身的组织与维护。因此,一个公民的好坏关键在于他作为骑士、作为战士、作为戏剧诗人的好坏,一位工匠的好坏关键在于他制作笛子或马笼头技术的好坏(麦金太尔,1988,第107页)。

道德观,也必须对我们承担相同的义务(格沃斯(Gewirth),1978,第240~248页)。

当然,上文中“最好”和“最优”的内涵在不同的文化中各不相同,取决于他们特定的道德规范和各自拥有的满足需要的资源。因此,当我们用“最优”这个术语时,我们显然不认为,那些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人对于所有可能增强他们追求美德能力的事情都有权利。因为这些满足物的范围可能是无穷无尽的,文化中没有任何个人或群体能够承担相应的提供满足物的义务,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义务,就不可能有可以确认的权利。我们的观点是,特定文化的成员已经有合理清楚的概念,知道在实践中作出最大的努力意味着什么。这些还将与各种范例联系起来,这些范例涉及普通人如果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能够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同时兼顾通常与发挥能力有关的健康、教育和情感自信水平方面的理论。因此,为了保持一致性,忠于一种美好愿景必须与该文化中现有的、对于个人需要什么才能作出最大限度努力的、最好的理解联系起来。一致性原则还决定,每一个被寄希望作出最大努力——并且被鼓励努力这么做——的人,能够得到公平份额的现有资源,使其努力有可能成为现实。

但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公平”?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说明,在¹⁰¹相同的道德体系中所有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最优化需要满足的权利,并且享有同等的要求得到实现该目标所必须的资源权利。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在证明需要的普遍性时提到的那个富足之岛,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岛上什么也不缺,正如休谟所言,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因不公正而嫉妒”(休谟,1963,第184页)。但是假

如岛上的许多商品和服务突然间没有了——由于发生了一场自然灾害——那么需要的满足将不得不相应地减少。在其他所有条件不变情况下,这将会对每一个人产生相同的基本影响,在什么也不缺的时候,他们的需要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例如,根据不同的匮乏程度和类型,死亡率和发病率将会相应上升,受教育和得到情感支持的机会将会相应减少。然而,即使在这些情况下,个人平等地最大限度满足需要的权利仍然同样强烈,其重要性超过了满足偏好的权利。在平等地实现这种可行的需要满足之后,至于剩余的产品应该如何分配,我们的讨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任何指导性原则。

正是这种既基于道德权利又基于实用功效的论点,在背后推动提倡平等获得高水平的卫生和其他福利服务的社会政策。尤其在竞争性经济和文化中,劝说弱势群体竭尽全力自力更生,但不同时给他们提供自力更生所要求的需要满足,是非常不合理的。

遗憾的是,我们在当今世界中并不能比在人类历史上更多地看到这种有限的平等主义。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存在着利益冲突,那些拥有权力和特权的群体通常极力维护他们自己满足需要和想要的最优化水平,根本不顾给其他人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而他们却声称与其他人有相同的价值观。我们已经考虑过一些当权者极力使自身优势合法化的方法。然而,正如黑格尔在分析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极度统治其他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个人发展所作的贡献在受统治的过程中贬值,那么结果造成的矛盾的代价终将要我们来偿还(黑格尔,1977,第104~111

102 页)。广义上说,这种代价可以有两种形式:第一,追求短期利益可

以威胁制度“积累”。例如,英国在劳动者的教育方面缺乏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该国当前经济上的颓势(芬尼古德(Finegold)和索斯凯斯(Soskice),1988)。第二,不公平的统治威胁到制度“合法性”——那些受统治者也提出了一些可以让人相信的断言,他们接受自己受统治以及那些统治者的合法性。但是,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断言,如果他们的身体健康和自主受到损害,这些断言都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这两种潜在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解释西方福利制度的发展(高夫,1979,第3~4章)。

因此,忠于一种与其他人共享的美德概念——甚至包括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假定的美德——包含了承诺给他们追求美德的权利,这种权利与我们留给自己的权利同等严肃。严重剥夺他们的权利也许可以在此时此地导致主观快乐,但是既不符合道德美德,也不符合任何合乎逻辑的社会正义理论。毫无疑问,许多当权者忽视这种忠告,继续大肆敛财,希望他们永远不用支付长期的代价。作为个人,他们也许有这种运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你可以把一匹马牵到理智的水边,但是你不能强迫它喝水,这句话千真万确(格沃斯,1978,第190~198页)!

异族人满足最优化需要的权利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最优化需要满足的集体义务应该取决于某种美好愿景以及与此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体系的集体义务。但是,对于那些不具有相同的道德观念体系因而不具有相同的美好愿景的人来说,他们之间的社会正义情况如何呢?

衡量道德义务是根据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重视其类型特

征——它对每一个人都适用，而不仅是对那些已经公开与我们达成协议的人。如果我们的美德是绝对的美德，那么我们必须相信所有个人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作出相应的行为——无论他们自己

103 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念。例如，如果某人相信女性割礼是对所有妇女的侮辱，或者隔离老年人令人发指，那么这些做法必须受到道义上的谴责——无论参与者使用什么借口。然而，如果我们相信别人应该按照我们的标准尽最大努力行善，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意他们享有努力这么做的权利。然而，要想使这种方案不成为一种空洞抽象的道德观念，他们应该有权利满足某些条件，在身体、情感和知识方面使这种选择成为可能：即最优化需要满足的权利。的确，从一种道德观念转向另一种道德观念，在知识和情感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应该要求我们的道德对手尽可能地处于良好的状态。

因此，一致性原则要求我们必须支持陌生人的最优化需要满足的权利，即使我们对他们的道德信仰的了解与我们对自己的真理和美好愿景优越性的忠实态度相比，显得一无所知。凌辱弱者的胜利是道德上的失败。就像奴隶一样，即使他们说他们同意，你从来也不能确信他们是不是真的同意。无论他们的同意在短期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个人满足，这种满足绝不会长久。如果在公认的残暴行为面前，对美德的关注压制了最大限度追求美德的前提条件——无论目前的信仰是什么，对所有可能具有美德者提供最优化的需要满足——那么所导致的冷漠的遵从只不过是一种概念上和情感上的奴性。任何道德规范要求其遵从者作出的并不是负责任的道德选择。

至此,我们已经说明,只要个人重视任何美好愿景,他们就有一种义务,尊重所有其他人努力追求相同美好愿景的权利。共同的人类需要观点包含了所有的人、即使是陌生人最优化需要满足的权利。在本章的附录中,我们讨论了敌人享有的权利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并且通过分析那些在他们的国家境内或境外严重侵害其他人的需要满足的政权及其代理人,证明了这种权利的合理性。然而,支持这种观点的标准要求把需要满足扩展到所有民族。

特殊义务与需要满足的最优化

104

关于权利就说到这里,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呢?在实践中,最大限度满足需要的权利不仅包括宽容的行为,而且还包括获得物品和服务的积极行为,而这些物品和服务是在物质和心理方面实现这些决定所必须的。简而言之,我们全都有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帮助所有的人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

如果这个观点可以接受,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赋予了一项繁重的责任。在整个世界上,紧迫的需要程度惊人。每个个人都有许多已经熟知的人和他们觉得为之肩负着一一种强烈而明确的责任的人(例如朋友和家人),他们自然要全力忙于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和想要,我们如何指望他们履行特定的义务?是否存在能够采取行动保障满足最低需要的权利的机构?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不清楚,那么全世界每一个人怎么能够都有最大限度满足需要的权利?正如奥尼尔认为,“关于权利的推论,对于那些需要他们的行动来保护对权利的尊重的人来说,常常只是带有一种模糊的信息。

广泛接受抽象的权利学说与广泛地不尊重权利并存”(奥尼尔, 1986, 第 117 页)。这种情况可以避免吗?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从一个假设开始。假设有一天在海滩上,平静的气氛突然被打破,人们看到一个小孩被急流卷入大海,正在拼命挣扎。谁有责任救他——为了尊重小孩正在拼命争取的生存需要?如果有一个救生员,人们的第一反应无疑是,他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去抢救落水儿童。他已经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项义务,因为在他的就业合同中明确规定了这种责任,而且因此保障了他自己的某些权利(如固定收入)。但是假设他无动于衷,谁应该采取行动抢救这个小孩?

例如,让每个人都高声叫喊:“孩子的父母也对他有一种特殊的义务,只有知道他父母不救他,我们才去救他”。这样做合理吗?肯定不合理。孩子有得到帮助的权利,不是因为他和任何人有契约关系,而是因为他的“紧急需要”(古丁,1985,第 111 页)。任何能够挺身而出满足孩子生存需要的人都有一种这么做的道德责任——更确切地说,每个严肃对待自己美好愿景的人。^①

但是,这种责任应该如何分配?显然不应该按比例分配。例如,当时有 200 个人在游泳,每个人承担 $1/200$ 的责任。如果每个

① 我们不能说由于那些本来可以提供帮助的人没有提供帮助导致孩子的死亡。在此,因果关系问题非常复杂,因为如果我们说没有履行责任导致任何具体的事件发生,似乎由此可以推断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他们导致的。例如,是不是因为没有带斧子进英国皇家植物园,那里所有树木生长都是你导致的?这么说,当他们侵犯了其他人的基本需要满足,我们仍然能够很好地理解我们干预因果过程的能力以及我们这么做的道德责任。在我们关于海滩上的例子中,如果孩子淹死了,每一个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的人以及那些有“合理的机会”提供帮助的人都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

人都能够满足当时的需要——在这个例子中是阻止孩子被淹死——那么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对此负完全的责任。唯一可以减轻责任的情况是，他们如果采取行动就会威胁自身的基本需要满足（例如，他们自己也不会游泳），或者他们很诚实地认为，他们会影响其他采取合适行动的人成功地抢救孩子。除此之外，关于旁观者的拖延是否合理的任何决定都将取决于他们是否等待时间过长以至于孩子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这一点可能很难决定，这个事实是为了考虑不冒任何风险，而不是为了躲避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古丁的观点，他很适宜地指出：“这种责任的界限非常简单，受害者需要的界限与责任者有效行为能力的界限相比——不多，但是当然也不少”（古丁，1985，第135页）。

因此，所有那些在海滩上的人都应该对淹死的孩子负责。然而，如果我们的理论合乎道理，它必须也能适用于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尽管这些人的不幸我们没有直接看到，也不能直接满足他们的需要。对于那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人或者那些我们能够直接帮助的陌生人，我们有各种特殊义务，与这些特殊义务相比，我们对于陌生人的实际义务是什么？如果需要满足从家庭开始，那么对于那些我们家庭之外、与我们没有直接联系的人，我们的义务有多少？让我们分别从国内和国际的范围考虑陌生人的问题。

如果人们同意不仅是当事人，而且还有机构——各式各样的社会机构——都能采取行动保证需要的满足，只要它们拥有足够的权力和物质支持，这个问题就开始迎刃而解。对于那些与他们

没有任何联系的人的需要满足,个人自身显然没有能力阻止其恶化或促进其提高。如果一个集体包括一些的确有联系的个人,而且拥有专业知识和资源,它对此进行合理干预,情况就不一样了。

- 106 个人对陌生人需要满足所须履行的道德义务是通过他们对这些机构的支持——或者如果他们是该集体的成员,通过他们支持或反对的政策得到实现的(格沃斯,1978,第312~319页)。因此,如果重新回到我们的例子中,许多自己不去海滩游玩的当地居民应该而必须认识到他们为了保护那些去海滩游玩的人应尽的责任。因此,他们可以集体承担救生员的费用——救生员承担的满足需要的特殊义务建立在他接受培训和掌握特殊技能的基础之上。

但是为什么停留在那儿,把人们的注意力仅限于附近的一个海滩上?所有公共海滩上的所有的游泳者都有相同的需要,因而都有受到保护的权力。为此目的而征收的税款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严格义务,这正是其道德合理性之所在。否则,个人人格的道德不理智或混乱将会导致“搭便车”的困境——享受救生员提供的符合全体利益的利益,而为救生员提供必要资源却对谁都不利。该论点同样适用于为所有因各种意外事故受到伤害者提供救护的机构提供资源,如当地的急救中心、医院等。它也是各种公共提供的预防措施背后的根本原因,如游泳培训课程和游泳池等。换言之,个人有一种严格的义务,通过支持相关的制度性机构,确保他们参与陌生人的集体性需要满足(普兰特等,1980,第93~96页;格沃斯,1982,第59~66页)。

这些义务触及福利制度所有基于权利的正义性的核心。因为在各种不同的国家背景中,许多福利制度机构都已经证明它们在

缓解需要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我们在第13章中将要说明),我们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切实可行性已经得到了初步证明。因为事实上,比最低水平高得多的需要满足已经达到,因此是可以达到的。同样,无论在过去有什么样伤害需要满足的记录,福利国家机构并非一定导致需要满足的减少,尤其在自主的基本需要方面。在实践上,同样在理论上,对于那些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尽最大努力追求我们的美好愿景的人,我们必须永远希望他们能够达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这个水平在实践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应该如何让它起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也许会有争论,但是不会减少集体帮助 107 其他人达到高水平的需要满足的道德义务,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满足是可以达到的。同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格外谨慎,不要设立那些在实际上通过为个人选择设置人为和官僚障碍的有损于自主的福利机构。

然而,对于其他民族国家中的陌生人的需要,我们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不能证明我们承担的责任局限于当地的合理性,那么任何进一步限制义务都将是任意性的。这必须意味着我们有一种义务,帮助任何地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即使在对他们拥有正式管辖权的特定国家机构无所作为的时候(辛格,1979,第23页)。这个观点最终还是把我们带到了第三世界。那些需要帮助者被剥夺的范围如此之广,他们满足需要的权利如此之大,如何能够对生活在数千英里之外发达国家的个人解释这种道德责任,让他们感到有实际意义呢?第一世界的个人,作为个人不能直接有效地满足第三世界的需要(费士金(Fishkin),1982,第75页)。的确,如果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某些善举,那么甚至可能

会因为降低了制度性干预的重要性而产生潜在的危害。^①

因此,正如每个人都有一种在自己的国界之内支持集体福利提供的严格义务,我们还有相同的国际义务。我们有义务帮助建立和维护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地减轻痛苦的机构(古丁,1985,第163~167页)。与国家福利制度一样,这些机构也可以通过某种税制融资——“国际需要税”。至于这种税制的细节以及收入用于救济和投资之间的分配,将是一个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就目前而言,重要的是,提倡建立这样的税制是基于我们对于需要与权利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并且是在当今国际现实中具有实际意义的努力。许多援助机构业已存在,它们急需能够有这样的税制提供额外资金。具体地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估算,第三世界每年因各种疾病死亡的儿童中,有14,000,000儿童可以通过廉价的疫苗预防或运用非常便宜的治疗方法幸存下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7,第5页)。救助这些儿童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已经很健全。如果第一世界的公民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手上沾满了这些孩子们的鲜血。

然而,有人仍然可能会提出反对,认为我们强调的国际需要权利仅仅关注了最低需要满足问题。即使我们在这方面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还要强调这些需要者最优化需要满足的道德重要性?

① 这些观点都不是为了否认穷国居民自己的义务,他们的义务与那些生活在富国的公民完全一致。即使最贫穷的不发达国家也存在社会不公平,表明少数派群体漠视他们对于多数派群体的义务(桑德布鲁克(Sandbrook),1985,第5章)。虽然它们也许没有满足其成员需要的全部的义务,但是似乎有理由认为有一种义务为这种目标而努力。对于这种权利剥夺,这些国家有最密切的联系而且非常了解,因此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加以干预并努力改善。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一旦国家不再被看做划分道德责任的独立范围,人们就会同意,我们尊重自己国家的公民通过集体福利机构最大限度满足需要的权利。由此可以断定,对于其他国家的需要者,我们也具有同等的责任。需要满足机构首先关注的必须是最低要求,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些机构运作时所受到的实践方面和政治上的制约,而不是说明我们尽快消除这些制约的责任。现有福利机构在道德上最杰出的地方体现出来的恰恰就是这个从关心最低需要满足到关心更高需要满足的进程。我们的论点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种严格的义务,在最贫穷国家的需要者中间,为了这个相同的进程而努力。如果同意我们有一种义务支持创建和维护在全世界范围内满足需要的机构,而且在原则上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道德和政治目标,那么为什么不多多益善呢?

相对主义与人类解放的前景

因此,正是健康和自主的人最能发挥创造性而且能够导致文化高度繁荣,有可能为所有的人所利用。许多学者,如华尔泽(Walzer)、启恩(Keane)、拉克劳(Laclau)和莫夫(Mouffe),一贯雄辩地强调的正是这种可能性。遗憾的是,对于他们有关人类需要的相对主义结论以及他们暗示的人类需要最优满足的权利,我们不能做出同样的评价。严肃看待这种权利要求我们接受两个事实:基本需要客观存在,有一些最优化满足需要的方法在客观上优于其他方法。正如我们所见,近年来欧洲思想理论中许多后现代主义传统具有相对主义的特征,这种传统否认了两者的可能性,因

此使自己除了维护这种或那种文化现状之外对什么都无能为力(卡利尼克斯(Callinicos),1990)。正如文森特(Vincent)所言:“文化相对主义除了在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中的进步意义之外,在实践上只是向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提出的‘习俗专制主义’投降”(文森特,1986,第55页;参看安德森(Anderson),1983,第45~55页)。

例如,假如第三世界的人民遭受某种由于经济欠发达而招致的疾病,这种疾病如果运用西方的医疗技术可以治愈或预防,那么说他们不需要利用这样的知识意味着什么?同样,忽视妇女作为人的潜能,认为她们不需要并且没有权利从限制她们接受教育和社会交往范围的父权控制下解放自己,这又意味着什么?在什么意义上她们能够不需要?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相对主义者的选择——人们不能“需要”他们不想要的东西。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人们经常混淆他们的想要和需要,有时可能因此导致灾难性的后果。^①

在学习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需要方面,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帮助——如何独立和共同地追求人类解放的目标。在这方面,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好的理解是一种在实践中最有效果的理解,与其文化渊源无关。在这方面,有

^① 梅尔罗斯(Melrose)提出了以下例子,说明如何运用这种相对主义观点证明需要满足中滥用的正当性:葛兰素(Galxo)将钙骨化醇糖浆作为一种大众滋补品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推广,我们曾对此提出质疑,葛兰素的确对此作出了答复。当时,葛兰素不仅没有在英国这么做,而且《英国国家药品集》中也称该用法未经证实。葛兰素的高级医疗顾问在答复中强调,不同的国家有非常“不同的医疗概念”(1982,第80页)。

的理解毫无争议地优于其他理解(多亚尔和哈里斯,1986,第148~155页)。相对主义错误地将某些群体的意识和实践与其他群体隔离开来,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业已建立起来的许多概念和实践的桥梁。在这个时期里,人类反复拒绝在选择上为文化的概念界限所限制——为我们大家都带来了进步性的后果。

选择的最优化与基本需要满足使其成为可能的人类解放之间¹¹⁰的理论联系由来已久。它是马克思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黑格尔哲学背景中最根本的成分(泰勒,1975,第546~564页)。两种理论方法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它们关于这些自由能够得到最好的自我表达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的概念:是通过市场由个人表达,还是在更加集中的计划和/或社群社会中通过集体表达。我们可以论证,两者中任何一个都是可行的。黑格尔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说似乎仍然最富有成效:关于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就越了解自己。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拒绝或否认人们普遍接受的毋庸置疑的真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社会和自然界中什么是偶然的(例如,奴隶制和有关致命疾病的超自然主义解释)和什么是必然的(例如,识字能力必须能够进入不同的文化传统,或者保持身体健康必须饮用未经污染的水)。黑格尔也同意这种学习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他认为它有自己特点鲜明的历史发展模式,在它们摧毁那些人为地约束人类创造力的文化结构的同时,超越了人类创造力的界限(普兰特,1971,第6~7章;诺曼,1976,第5、6章)。

马克思在一些作品中,推断出了类似的观点——再一次把焦点集中于阻止人性充分发挥潜能的非自然约束。两者之间关键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存在一个政治行动纲领,可以用来消除这些约

束。他声称,人民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像黑格尔认为的那样,只能在历史长河里随波逐流,尽管可以理解历史,但是无能为力。对于马克思和所有那些相信人类状况可以通过谨慎运用现有最好的知识得到改善的人而言,米纳娃的夜枭(the owl of Minerva)在黎明和黄昏起飞,尽管也许在白昼耗尽之后更加安全!伴随着这个信念而来的是一个巨大的责任。因为如果人类确实拥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任务就是不懈努力,促成那些作为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的改变——在最优化而且可以持续的水平上,满足尽可能多
111 的人的身体健康和自主方面的需要。相对主义的悲剧在于,他们声称关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辩论缺乏逻辑,结果其支持者——无论他们的意图何在——转而支持那些希望阻止这种改变的人。

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在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方面的确取得了进步——客观上,有一些方法和选择在满足需要方面优于其他方法和选择——接受这个观点并非屈从于文化帝国主义,也不是声称在所有方面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应该效仿西方。这样做只是坚持认为,那些被剥夺了选择能力的人与没有被剥夺选择能力的人相比处于不利地位,无论在什么文化中,出于何种偶然的、可以改变的原因,都是如此。这样做也是为了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西方的科学、理性和政治传统促进这种选择,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导致更高的个人健康和自主水平,而其他文化则不行,那么这些科学、理性和政治传统可以而且应该被视为更加人道、更加进步(尼科尔(Nickel),1987,第71~79页)。

当然,对于其他满足基本需要的传统,我们也可以这么推论。例如,很清楚,印度和中国的保健和治疗方法,在理解个人的意识

状态如何影响一系列的生理过程方面,为西方医学提供了很多的借鉴。然而,情况不同的是,对特定疾病的最佳治疗方法或者实现特定目标必须的最好教育,仅仅是一个文化偏好的问题(多亚尔,1987,第35~38页)。这些对于所有关于本质性的活动的理解模式同样适用,所有的文化如果想要生存和繁荣,这些本质性的活动必须成功进行。

我们已经论证,人类需要存在的信念与严密的符合道德的美好愿景的信念结合在一起,强烈支持所有人的需要都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的道德准则。这种观点包含个人相应的责任——在适当的地方有所作为,减轻其他人遭受的痛苦,支持在这些方面行之有效的国家和国际机构。接受这些责任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重要选择的最优化,在各种文化的生活方式中以及在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之间,实现人类的解放。

附录：敌人需要满足的权利

112

第6章中的论点是不是在“爱你的敌人”这个原则上走得太远？对于和我们正在交战的敌人,支持他们的最优需要满足的权利当然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当真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权利,那么是不是可以断定不可能有所谓的正义战争或起义,因为它们都蓄意剥夺人的生命？让我们通过下面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假设有两个群体,它们分别是A和B,生活在两个毗邻的国家里。A奉行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其成员和所有其他群体(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文化差异)的需要。相反,B由

少数人统治,只关心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或想要,而大多数人受到残酷的剥削,没有人关心他们的需要。根据异族人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的道德权利,请考虑以下三种情况:B进攻A;B的大多数人起义反抗压迫者;A进攻B。

假设B的统治者赞同对A宣战,因为他们把战争视为抢夺领土和劳动力或者平息A向B的人民提供不同思想观念的唯一途径。再假设A通过鼓励B的大多数人民起义反对B,因为A认为B的统治者侵犯了自己的权利。可是A反对战争,因为战争是通过武力而不是理性规劝强行推行他们的价值观。然后,B进攻A,打死打伤了A的许多成员。在这些情况下,A的军队确有正当的理由回击B的军队,消灭足够数量的B国军队,使其丧失进攻的能力。如果这样做意味着杀死他们,那么也只好如此。因为是B侵犯了A的权利,道理与一个杀死或者伤害他人的个人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完全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自卫都是正当的,因为个人或群体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保护他们将来满足需要的潜力,才能保护他们为了追求美好而弘扬美德的能力。如果自卫者同时还尊重袭击者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的权利,那么自卫就无法奏效,因此袭击者丧失了这些权利,他丧失的权利与他构成的威胁的严重性成比例(沃尔泽(Walzer),1977,第4章)。这个论点同样可以用

113 以证明某些形式的监禁的合理性,而且再一次强调了权利和义务的相互性。

我们能不能根据类似的理由证明B的人民有权利以武装革命的方式反抗他们的统治者?正义战争的理论可以适用于反抗暴政或政治压迫的民众起义,洛克(Locke)等人坚持这种观点(杰拉

斯(Geras),1989,第185~211页)。对于这种权利,我们的理论关注的是严重的社会非正义这个具体的概念。政府成员及其代理人由于明确无误而且极其严重地侵害他们自己人民基本需要满足的权利,他们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这种权利,其道理与B军队的成员在进攻A之后的情况一样。这个权利可以根据结果来证明,如果“痛苦平衡”(balance of suffering)的计算结果显示,起义造成的痛苦大于维持现状的痛苦,那就算了。否则,如果所有其他维护基本需要满足权利的渠道都被某些人堵死,而这些人还积极参与了侵害这种权利的过程,那么起义就是正义的。然而,起义的正义性不仅仅是因为B的统治者不公平,与之相关的还有起义者必须致力于实现普遍地、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的目标以及制定宪法政策,以保证实现目标的可行性——如果起义成功的话。最重要的是,两者都将保证,胜利以后会保护失败者的权利。

最后,如果A进攻B,旨在推翻B的现行政权,并且代之以一个确实尊重普遍地、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的政权,那么A的行为有正义性吗?在此,可能与直觉相反,通常答案肯定是“没有”,因为动词是“进攻”。如果真正的目标是赢得道德上的共识而不是物质财富,那么试图通过造成伤害——而不是为了维护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而作出的牺牲——把这种共识强加给一种生活方式几乎总是会破坏生产力。无论人们在道德上觉得多么正当,这种进攻通常无法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它所产生的共识将会值得怀疑。世界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相互冲突的美好愿景,在这样的背景中,在正常情况下,那些持有不同道德观的人们相互尊重彼此的国家/文化界线是非常重要的(沃尔泽,1977,第6章;参考罗尔斯

114 (Rawls), 1972, 第 378~379 页)。如果不严格接受和执行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就会很容易吸引世界上的 B 把他们特定的苦难蔓延到其他地方, 或者 A 出于好意而剥夺当地人民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最了解当地人民生活状况的是他们自己, 因此用外部干涉的方法来解决这些有目共睹的不公正问题仍然可能犯极大的错误。

正因为这个原因, 以上论点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是合理的: 如果 B 群体内部解放的力量试图通过使用武力推翻 B 政府, 他们请求 A 予以帮助。如果根据上述分析武装起义是正义的, 那么在原则上, 它理应得到外部资源。至于在实践上是否向他们提供资源, 这要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那些接受帮助的人将会致力于满足普遍而基本需要的目标和战略。然而, 外部资源不同于武装干涉。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对本国人民极端残暴, 人民完全丧失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反抗能力, 无论他们得到多少外部援助。尽管上述论点支持国家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 外部干涉是正当的——越南入侵柬埔寨可能是这样一个例子(阿克斯(Arkes), 1986, 第 232~242 页; 波格(Pogge), 1989, 第 242~245 页)。在这种情况下, 面临如此的无助, 因为国家的界线而不加干涉是错误的, 这样做无异于看到一个有类似需要的、无助的个人受到袭击而无动于衷。因此, 这个论点绝对不是宣扬暴力, 它既强调了那些遭受直接攻击者自卫的权利, 又恳求真正的宽容。

关于战争的正义性(jus ad bellum)就说到这儿。战争中的正义性(jus in bello)又该如何呢? 以上论点都没有表示, 那些进行正义战争或起义的人们决定战争方式的权力是有限度的, 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支配这种决定权的规则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

型：一类是关于可以直接对哪种人实施暴力，另一类是关于攻击方式。前者区分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尽管区分两者会非常困难，但是只有战斗人员才是蓄意打击的目标。因此，在我们前面的例子中，一旦 B 群体的士兵被解除武装，那么他们又重新得到了所有最大限度满足需要的权利，他们曾经由于进攻 A 群体而失去这些权利——只要这样做不会妨碍 A 群体的军队继续有效防卫。A 群体的成员希望规劝他们的战俘接受自己文化的道德优点，加入他们反抗 B 群体的事业，所以他们应该在现有条件下尽量维护战俘的健康和自主。杰拉斯把这些规则运用到国内革命的背景中，他的结论是，只有直接压迫者才应该受到打击，即该政权的领袖、士兵、警察、安全特工、狱吏、打手等；一般指那些为自身的利益发动战争的人，那些与强制实施并执行压迫人民的法律相关的人（杰拉斯，1989，第 198 页）。对其他的广大人民实施暴力是绝不能宽恕的。

至于适当的战争方式，最合适的莫过于“最低限度的武力”原则。战斗的形式应该能够制止敌方战斗人员的行动，但是也不应该采取任何导致无谓痛苦的方式（格沃斯，1978，第 215 页）。因此，在 B 群体成员被解除战斗力或者在审讯中交待了他们知道的所有有利于 A 群体防卫的情报以后，A 群体不应该再使用武器和其他的方法对他们造成永久伤害。这样做将会削弱他们尽最大努力走上 A 群体的美德之路的能力，而且还会让他们确信 A 群体在道德上并不比 B 群体高尚。在对待战俘的问题上以及使用武器方面的选择是道义的要求，与 B 群体的行为无关，只要在这方面道德不妨碍有效自卫。化学武器和核武器以及折磨摧残人的方式

之所以令人恐怖,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可以致人于死地或永久残废,而且因为它们甚至剥夺了受害者(假设他们还活着)选择遵从对他们造成打击的人的生活方式的机会。因为目标是毁灭或完全支配受害者,所以他们的自主权和人性并不重要,遭到了抛弃(内格尔(Nagel),1971~1972,第140~141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样对待自己的同类都是最严重的道德错误。^①

① 该附录写于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之前,关于这场战争,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此无法赘述。然而,我们有必要指出,根据我们概括出来的理由,如果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那么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经得住出于类似理由的谴责——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地极不道德地干涉别国内政。人们只能希望这场战争的胜利以及围绕这个问题的道德观点使这种情况在将来更难发生。

第7章 理论上的最优化需要满足

116

即使我们假定一个社会中存在普遍的共识,即应该把需要满足的优化置于优先地位,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走出相对主义的地界。至于什么策略能够最好地达到这个目标和/或该目标能否与其他目标和信念相互协调,恐怕很难达成一致。人类历史创造了众多的生产、繁衍、交流和政府的模式,即使最终目标一致,对于什么是适当的社会政策安排常常各说不一。一方面,我们必须根据广泛的当代理论和实践认识所提供的可供选择的空間,判断最优化的内涵。米纳娃的夜枭在努力往前飞的时候必须不断回头看,至少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是正确的!然而,另一方面,关于这种选择在实际中的内涵——具体应该做些什么以达到其中所蕴涵的目标,也许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分歧。这种情况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于特定技术的有效性也许存在争议。为了让个人保持最佳健康状态需要营养,但是哪些种类的食物是最好的?对于特定的技术,想要达到最佳水平的能力,必须满足专业教育的需要,但是最成功的教学方法是什么?在科学和技术上是正确还是不正确,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一些基于科学的技术确实无可争议地非常实用,有利于基本的需要满足,而且比其他技

- 117 术更为有效。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肯定能做到这一点——例如某些基因工程技术——对于它们能否产生解放性的效果有待于进一步辩论(约克森(Yoxen),1983,第5章)。因此评估的问题从对技术实际功效的评估转变为对如何设计该项技术,使用范围,应该由谁来控制等等。这种认识不是对技术功效而是对人类和社会造成的影响的认识,没有它——技术的使用价值要么没有实现,要么没有得到正确的使用。^①

第二,关于什么是合适的优化需要满足的社会政策,也存在着大量的争议。例如,预防性与治疗性健康政策的不同作用、教育的内容与过程、普遍性或选择性社会保障、再分配收入和财富的方法、土地改革以及无数的其它问题。再一次,我们可以大致把社会政策分为两类,无可争议的确实有效的社会政策和尚且存在相对分歧的社会政策。例如,英国所有具备一定能力的儿童都要学习读写的政策属于前者。应该使用什么程度的法律强制措施来调节环境就属于后者。当然,即使需要满足最优化的策略存在很大的争议,那些涉足其中的人肯定相信,这种争议是值得的,人人超越偏好差异的层次来讨论方案是否正确是有意义的。然而把精力集中在这一点上不能解决这些争议,也不能证明能够产生合理的解决办法。

第三,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即使对关于需要满足最优化

① 一些人反对这种科学技术的作用/滥用模式,声称两者都可以深深地根植于剥削性社会关系中并在其中得以进化,因此它们绝对不可能适合于真正的解放性目的;RSJ Collectives,(1981)第38~44页。进化的车轮或许与颇值得怀疑的社会关系背道而驰——父权制、奴隶制。谁知道……或者谁在乎呢?

到底意味着什么存在着共识,在资源限制的背景下,还会存在各种不同的困境(内维特(Nevitt),1977)。当人们确实实需要的东西供应不足的时候,一个老生常谈的政治问题就会重新出现——什么人得益?或谁得到什么?因此,虽然人们可以相信某些技术和文化行为会使每一个人都受益,但是其他技术和文化行为只能和特定群体相关(例如,婴儿教育技术或专为老年人建造的特殊的住房设施)。我们怎样解决哪个群体应该得到什么的争议?当我们在微观层次上研究资源分配并且认识到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时,同样的争议就转移到了个人。一些最突出的例子显然出现在医务界,人们必须就挽救生命的治疗方法进行分配(贝尔和门德斯(Bell and Mendus),1988,第2~5章;参看丹尼尔斯(Daniels),1985,第1~2章)。同样,在宏观层次上,应该把什么类型的需要满足从立法上给予置于优先地位——是应该改善环境、提供更好的理疗卫生服务,还是应该提高教育服务水平——对此也可能存在着许多分歧。利益冲突将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游说来表达。这些游说的群体中包括在道德、政治和职业方面有各自的优先考虑的个人。

遇到这种争议时,需要满足最优化的目标在道德和实践中就存在非常严重的不确定性。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清楚什么是正确答案,或者甚至所谓正确答案意味着什么(多亚尔(Doyal),1990,第1~16页)。这种不确定性更进一层就是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了实现我们提出的论点中涉及的需要满足最优化,应该(should)做什么?根据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现实,能够(can)做到什么?通常情况下,“应该(ought)”暗示着“能够”。然而,此处的“能

够”是而且将永远是值得争议的。例如，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是，已经享有特权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以民主的方式把满足需要置于满足偏好之前。在多大程度上，以穷人的权利的名义强迫有特权的人降低自己的自主权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反对种族侵扰的立法），也许存在普遍的共识。在其他情况下（带有歧视的就业配额制），也许并不存在这样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本书还没有以任何方式提到应该如何解决这些特殊的争议和问题。在本章中，我们将试图通过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个解决方法。

第一个问题涉及交流。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才能保证通过辩论得到采用的政策最有可能产生解决我们谈到的需要满足问题的最合理而且最有效的方法？通常，我们并不指望确定性，而是要知道问题的答案是通过最为开放、最具批判性的交流而形成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作出的决定可能是一种妥协，这种妥协旨在服
119 务于尽可能多的竞争者。除非我们能够发现能够最大限度优化关于需要满足的争议的合理性的程序——在充满分歧的背景下能够证明某些形式的共识在客观上是可接受的——否则我们将再一次面临相对主义的疑惑。

第二，如果接受我们所强调的个人自主和平等，那么我们就要接受某种形式的能够开展政策辩论的政治民主。那么，这个民主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呢？如果我们转向强大的中央集权民主政体，将冒有损害个人自主的风险。许多必须作出的决策具有道德不确定性，而这些决策如果由独裁国家官僚机构通过机械的方式执行，自由就会受到威胁。如果把以上两点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清楚

地理解布雷布鲁克(Braybrooke)的观点,他认为“严格意义上对需要满足的最终优先性”在实践中必须让位于他提出的所谓“相对于角色的谨慎优先”(role relative precautionary priority)。在此,至于何种满足物最适合他们的需要,如果存在分歧和/或资源限制,哪种满足物应该得到优先考虑,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群体都应该享有话语权(布雷布鲁克,1987,第6章)。否则,民主的多数派可能不愿意参与。相反,如果我们转向相反的方向,即完全的权力分散的民主制度,似乎就会威胁到需要满足最优化所要求的效率和长期计划。

显然,我们需要这两条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结合。如果优先权原则与角色的联系过多,过于谨慎地保护自身利益,那么需要就有可能沦为偏好。随之而来的就会是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困难。总之,除非我们可以找到可以普遍化的答案来解决以上问题,否则任何改善(更不用说最优化)需要满足的计划都会令人怀疑。人类解放就会成为一个充满吸引力但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在我们看来,哈贝马斯与罗尔斯(Rawls)的著作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最大的希望。他们的著作影响深远又颇具争议,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中引进了客观和普遍的人类需要的概念,我们自己的理论也受其影响。哈贝马斯的个人权利概念的基础是其所谓的“可以一般化的利益”(generalisable interests),而罗尔斯则称之为“首要产品”(primary goods)。此外,他们都希望他们对美好愿景的看法带有一定的政治实用性,哈贝马斯强调政治辩论的理性,而罗尔斯则强调政治构成的合宪性(constitu-

tionality)。在本章中,我们将简要介绍和评价他们的一些观点,120 目的在于说明这些观点对于当今从道德和政治方面研究需要满足的重要性。

哈贝马斯与理性交流

哈贝马斯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敏锐地意识到社会主义理论中理性和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全新的、不受启蒙运动中污浊的资产阶级目标所污染的社会秩序(罗德里克(Roderick),1986,第41~50页)。然而,如果不参照这些目标,社会主义理想的合理性就无法得到证实。结果,哈贝马斯认为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改革而不是系统性变革。这种改革会受到优化“可一般化的利益”的目标的指引。在原则上,这些利益是由以下问题的答案所决定的:

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中的成员的意愿是杂乱散漫的,而且他们充分了解在这个社会中需要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功能性的强制义务,如果他们能够而且愿意决定社会交往的组织形式,他们会怎样集体地解释他们的需要并遵循这样的解释?(哈贝马斯,1976,第113页)

因此,理性问题变成了建立原则的问题,依照这些原则可以决定满足这些利益最有效的政策。

哈贝马斯认为,有两种传统理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两者在

本质上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种传统来源于韦伯(Weber),它的特点是提倡资本主义的组织和管理结构。理性在此仅仅被转换为以最大限度发挥集体效率的方式来操纵人的能力,但是这种方式任意地限制了人的自由并扭曲了他们的创造潜力。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种转换退化为武断地强迫接受掌权者的价值观。因为在 121 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人的价值观,又因为将理性等同于手段意味着“价值观在原则上没有讨论的余地”,所以“绝不可能通过在公共场合开展的开明的讨论来构建一个集体价值观体系”(哈贝马斯,1974,第271页)。然而,恰恰是这种讨论使人们能够超越他们所受到的、由社会环境设置的、任意性的对自由的约束。他们虽然出生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但是从未对此表示认同。

另一方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理性等同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假定他们是历史上进步力量的代表。然而作为一个集体,工人阶级在实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长远目标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潜力很小,他们最多只是对资本主义最为极端的暴行进行过各种有效的反抗。当然,以他们的名义所做的一切通常本身就证明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失败,因为这种做法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除非这种被剥夺基本社会权利的阶层与其它社会阶层中的抗议力量团结起来,否则他们所引发的任何冲突都无法真正推翻一个社会制度——他们只能挑起与正式民主制度不相容的剧烈反应”(哈贝马斯,1970b,第109~110页)。

哈贝马斯为了探索一个有效的、能够服务于每个人的利益的民主理性模式,抛弃了以上两个传统,转而关注语言和交流本身的

规范性结构。他构想出一个“理想的言论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交流不会被意识形态的特征所曲解,一般化的利益可以有效地和理性地在集体层面上得到概念化和追求。他的论点并不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确实能够找到这种纯朴的对话和辩论所必需的条件,而是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些条件可以存在,那么质询和辩论本身的基础就会发生动摇:

122 无论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如何被扭曲,理想的言论环境的设计必须包含在潜在的言论结构中,因为所有的言论,即使是有意的欺骗性言论,目的都是为了真理……只要我们掌握了构建理想言论环境的手段,我们就能够构思真理、自由和正义等概念(哈贝马斯,1970a,第372页)。

理想的言论环境的规范性结构暗含在真诚交流的努力中。一旦明确公开,就会包括一些实用性规则,这些规则可以规定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可以以最富有成效、最理性、最民主的方式进行辩论。

对于我们来说,三条规则特别重要,决定了有关最优化需要满足的辩论应该如何进行。第一,所有参与者对于他们试图解决的任何问题所导致的技术性问题,应该尽可能地充分知情、透彻理解。哈贝马斯认为,所有的人对能够干预世界或社会,导致可以预见的、有价值的结果都有一种无可争辩的“认知兴趣”。这种手段控制“受控于基于实证知识的技术规则。在所有的情况下,它们包

含了对于可观察到的事件,无论是物理事件还是社会事件,有条件的预见。这些预见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不正确的”(哈贝马斯,1970b,第91~92页)。现在,在自然科学和技术中,这种知识非常丰富,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中则相对较少。如果解决最优化需要满足问题的方法要求这种“技术性”了解,解决问题的人就必须能够充分掌握与手头的任务相关的、现有的、法则论和事实方面的知识。

第二,如果关于这些知识的辩论威胁到需要满足的最优化,其理性的解决办法将需要特殊的方法和交流方面的技巧。一方面,经过实证评估得到接受的原则——方法论,例如对试验进行控制——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交流技巧,即哈贝马斯提出的“阐释性理解”,对于有效运用这些方法以及对结果的讨论非常必要。它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在各种文化传统中个人和群体的、有可能导致行为的自我了解,以及不同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的可能性”(哈贝马斯,1971,第176页)。只要参与任何社会活动,我们就必须具备这种“实际的”了解,哈贝马斯进一步描述了一系列实用规则——一种阐释性方法——在成功的交流中必须坚持这些规¹²³则。这些规则包括全面地、以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说实话的重要性,必须建立信任,至少有达成共识的可能(罗德里克(Roderick),1986,第73~105页)。

第三,旨在增进技术和实际了解——需要满足最优化的可能性——的交流必须尽可能的民主。鉴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范围广泛,复杂多样,具备相关知识的人必须能够参与讨论,探讨如何能够实现需要满足的最优化。如果辩论由既得利益者,包括那些

在方向、内容和程度上设置毫无根据的约束的“专家”所掌控,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民主辩论。麦卡锡(McCarthy)给哈贝马斯作了如下总结:“如果由于一方的角色或地位使他发表言论的权利受到质疑,例如他的角色或者地位让他没有权利说话,或者他的行为违反了公认的准则或传统,那么能够达成一致的交流基础就会崩溃”(1978,第289页)。因此,在关于需要满足最优化的社会政策中辩论的规范性结构与获得正确的技术信息和专业方法论知识的能力同样重要。

只要这种辩论的参与者遵守以上规则,哈贝马斯认为,解决最优化问题的最理性的办法就是那些达成最广泛共识的办法。^①的确,他把真理本身等同于这样一种共识:“我们认为,只有满足了以下条件,才能算是发现了真理:每一个负责任的主体只要在不受限制、不受约束的交流中详尽地检查这个观点,并都能够表示同意(引自麦卡锡,1978,第419~420页)。然而,一些评论家认为,这种理性辩论的观点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观点,没有任何希望实现,因为所有已知的言论环境都受制于权力和资源方面的限制(卢克斯

① 根据阿罗(Arrow)不可能定理,这种理性和民主妥协的可能性很小(阿罗,1963)。然而,一旦焦点从偏好转向需要,他的定理所提出的问题就会开始消失。第一,森(Sen)(1984,第421~422页)认为,他的结论依赖于非常严格的信息限制,包括否认关于社会国家的非主观性信息。一旦承认共同人类需要的存在,这些限制就会开始消失。第二,米勒(Miller)(1989,第299页,文档号:3)认为,一种“民主的对话形式”使参与者能够选择合适的正式方法化解分歧,因此可以避免总体偏好相互冲突的方法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再一次,只有当商讨的焦点超越了对比权衡这些偏好的时候,情况才会如此。因此,显然,人类需要的客观理论加上上文中认可的交流模式可以有助于克服阿罗定理为理性和民主和解所设置的障碍。另参见佩蒂特(Pettit,1980,第145~147页)。

(Lukes), 1982, 第 134~148 页; 参考基特(Keat), 1981, 第 180~190 页)。

哈贝马斯的反应是, 他的设想显然是反事实的, 并且构成了一个政治目标, 而不是实际存在的情况。我们对此表示赞同。然而, 这样理想化的规范性结构隐含在一些常见的辩论的方法和内容之中。这些辩论目前确实发生在他称之为日常的私人 and 公共交流的“现实世界”中。隐含在平常话语中的这些或多或少分散的……没¹²⁴有问题的背景假定得到“理性化”, 并在通过与他的想法相符的批判性交流中展现出来。只有通过这种方法, 人们才能合理思考扎根于文化传统中的特定信仰与解决需要满足的技术和实际问题的方法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 1981, 第 70 页; 参考怀特(White), 1988, 第 92~103 页)。

把观点和论点公开, 接受集体评估, 以发现事实方面的错误和逻辑上的矛盾, 专业人士之间制度化辩论的严密性不过如此。典型的例子包括医学方面组织恰当的会诊和临床审计。扩大人类理解范围的其他努力的成功取决于探询者“交流能力”的提高——同化的话语规则以及导向“真实、自由和正义”的社会互动(哈贝马斯, 1970a, 第 372 页)。这包括具备概念上和方法上的能力, 能够发现谁是谁, 除此之外, 还包括一个信念, 即某些观点比其他观点更为合理。因此, 由理性来主宰政治过程的潜力与哈贝马斯和卢梭(Rousseau)共同信奉的道德观相关。他们相信普通人的本质是善良的, 他们有能力和谐地在一起生活、工作、创造和交流, 有能力运用切合实际的理性和平地化解争议, 有能力最优化地满足自己的需要。

然而,尽管哈贝马斯态度乐观,但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他对于人类解放的构想与现行的社会现实之间实现和解困难重重。他认为,充满戏剧性的日常行为和互动的的生活世界已经被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在组织和手段方面的理性所“殖民化”——失去了人性,并被分门别类(罗德里克,1986,第134~135页)。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任务就是剥去各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这些信仰让人们迷信那些个人和群体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导致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日常生活的支离破碎是自然的,而且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等同于社会进步。对于个人而言,哈贝马斯把这种斗争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疗法联系起来。对于群体,马克思和马克

125 思主义经济和政治分析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以上两种观点的批判性特征至关重要:“在自我反省中,以知识为目的的知识与自主权和责任中的利益相一致。因为进行反省本身就是一种解放运动”(哈贝马斯,1971,第197~198页)。最近在俄罗斯和东欧发生的事件体现了这种反省的成果以及人们所关注的重要焦点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程度。

更具体地说,专业人员系统化的专业知识必须面对理性化的生活世界——基于经验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普通公民从这种自我反省中总结出来的。否则,既得利益的权力就会无限膨胀——他们的生活世界经验将会得到具体化,并且增强他们的偏见。在福利国家尤为如此,其规则和法律常常脱离公民的经验。根据怀特的观点(1988,第113页),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法制化是:

客观地重新定义客体所生活的世界……它要求一个连

续不断的过程,“强制性地”使日常生活状况抽象化。这不仅是认知的需要,把日常情况囊括在法律范围之内,而且是一个实际需要,使行政控制可以得到执行。因此,法制化有一种使生活世界**具体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旦与重新定义的生活门类中的社会工作者和其他行政人员不断提高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就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扩大依赖的领域。这个领域包括了我們定义的……家庭关系、教育、老龄以及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福利的方式(怀特,1988,第113页)。

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遇到了一个他一直没有满意解决的问题。许多人受到了误导,盲目信任专业人士,使自己的意识受到扭曲——医学行业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这种情况非常严重,我们不清楚他们怎样才能够树立信心,加强理解与能力,从而能够采取不同的行动。哈贝马斯寻找能够引起变化并导致进 126 步的工具。他在那些他认为是抵御了工具理性腐蚀的群体中寻找。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妇女运动。妇女运动许多著名目标中的一个就是攻击男权对公共话语的殖民化(哈贝马斯,1981)。但是这些进步群体缺乏政治权力,加之那些控制现有制度性交流渠道的既得利益群体不断产生影响,最优化需要满足的可行的政治纲领会是什么样子呢?

至于如何克服这个困难,无论哈贝马斯的建议多么模糊,他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至少是影响了我们的论点。要想使基本需要满足最优化经过民主协商仍然有意义——使人类解放开始成为一个切合实际的主题——个人必须具备足够的权利、健康和自主,

一起努力达到目标。^①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些社会制度,规定这些权利和需要满足能够得到保障,并且确实能够得到保障。从这个角度看来,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暴露出各自的问题。这个事实仅仅强调了重新考虑国家和信奉这些目标的个人之间的宪法关系的重要性。在竞争性资本主义制度中,基本需要满足的不平等性意味着一些公民与其他公民相比,享有一种不应得的优势,无论多么强调公民自由。相反,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中,公民享有一种正式的基本需要满足的权利,但是缺乏公民自由,而且中央计划经济在交付产品方面面临着重重困难。当然,两种政治传统的优点的某种结合应该是可能的。但是它可能是什么样子呢?

罗尔斯、正义与最优化的需要满足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结合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关于正义的

① 怀特否认哈贝马斯理性和民主话语理论与我们所定义的最优化需要满足之间的联系。他集中精力探讨所谓的“生物需要”,放弃了谈论改善话语的努力,这种话语的改善可以在各种文化中导致普遍提高满足水平。这么做回避了不同文化之间定义需要的概念以及设置需要的优先权方面的重要分歧(怀特,1988,第69~73页)。我们已经评估了这种观点所遇到的困难。毫无疑问,如果权力强大的剥削群体的成员更加沿着哈贝马斯描述的路线进行交流,那么他们就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而且更为行之有效。然而,为了保持一致,在他谈论解放以及谈论解放能够为每个人带来更多的选择的时候,他必须运用一种共同利益和需要的理论。他并不是一直这么做——在这一点上怀特是正确的——仅仅是让他和其他一些更好的伙伴为伍,包括马克思。最近哈贝马斯自己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对性进行的一些攻击可以用来强调这个观点(哈贝马斯,1988)。

理论。这种理论必须提供一个看起来切实可行而且符合逻辑的美好愿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必须作出物质牺牲的人对此深信不疑。在《正义理论》(1972)一书中,罗尔斯试图构建一个这样的美好愿景,一时间反响强烈,评论如潮。过后,几位颇具同感的评论家对此进行了精心修改。¹²⁷

他首先攻击相对主义的正义性,特别是功利主义和直觉论(intuitionism)的概念。前者最终把正义等同于总体幸福。结果,由于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探讨过的原因,无法严肃对待人权。后者认为道德是客观的,但是道德唯一正确的源泉是人的直觉,而人的直觉的迷雾是由既得利益集团驱散的。如果这个人是圣雄甘地,这个观点似乎很合理,但如果是波尔布特,那么就会令人担忧。罗尔斯则认为,评价正义必须基于理性和普遍性,并且试图证明一系列宪法原则的真实性,这些原则即包括积极权利又包括消极权利(罗尔斯,1972,第22~40页)。在这么做的同时,他采用了一种与哈贝马斯相似的理性理论。

罗尔斯秉承了17、18世纪社会契约理论的传统。他首先设计出一系列个人之间的谈判,谈判的内容涉及“首要产品”的提供,而这些“首要产品”包括“权利与自由、机会与权力、收入与财富”(罗尔斯,1972,第92~93页)。这些都是制定生活计划以及成功实施这些计划所必需的自由、产品和服务。罗尔斯一方面假设,在这个“初始状态”上所有的参与者对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理解基本相同。例如,他们都拥有完全相同的哈贝马斯定义的技术和实际技能,包括对于经济制度和心理动机的评价。然而在另一方面,所有的参与者都被罩上“无知的面纱”,他们对于自己所处的特定环境

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们是谁、如何谋生、拥有多少财富,家庭背景等等(罗尔斯,1972,第19页;参考莱斯诺夫(Lessnoff),1986,第7章)。

他们知道的是他们必须明确一些宪法原则,这些原则在大家同意接受之后,将会在他们必须生活的社会中决定他们的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作为作出该决定的群体中的一员,谁也不知道在作出集体决定之后他们的处境将会怎样——他们将会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有多少社会地位和特权。因此,和哈贝马斯一样,罗尔斯热衷于消除既得利益集团对理性考量构成的威胁——从谈判过程中剔除“那些让人们争吵不休而且受其偏见引导的那些偶然性的知识”(罗尔斯,1972,第19页)。如果正在做出的决定与在一个国家中限制个人行为的规则同样重要,那么这一点尤为正确。

在这些情况下,罗尔斯认为,与主观自利对立的理性决定一个制度将会最大限度地增强个人制定并且追求生活计划的能力,无论当时参与者发现自己身在何处。这种处境就如同让一个小孩平分蛋糕,事先不知道哪一块将属于她自己。罗尔斯声称,在这些情况下,理性参与者如果最终把财产赋予最不富裕的群体,他们就会关心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初始状态上协商的宪法原则,通过保证特权最少的群体的利益的最大化,包含了一种“最大的最小值”(maximin)规则。两条这样的原则似乎随之而来。第一条原则有关“根本权利和自由”,第二条原则涉及“经济和社会利益”(罗尔斯,1972,第63页)。

对于那些处于初始状态的人来说,他们首先同意的是,应该保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以保证一个民主的政治组织模式。大致说

来,这些权利包括:

政治自由(选举权、参政权)和言论、结社自由;良知自由和思想自由;个人自由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按照法律规定不会任意遭到逮捕、拘禁的自由。第一条原则要求所有这些自由都是平等的,因为一个正义社会的公民都拥有相同的基本权利(罗尔斯,1972,第61页)。

只有通过保护这些自由,那些在初始状态上协商的人才能够保证:如果今后他们发现自己没有了权力和资源,他们自己的自由和尊严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践踏,无论当初这些人因为什么原因拥有强大的权力和丰富的资源。换句话说,公认的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将会受到公开的谴责。同时,哈贝马斯提出的民主制度的其他交流优势将得以维持。

第二条原则可以一分为二:第一条有关社会不平等性,第二条 129 有关平等机会。至于前者,罗尔斯认为,决策的最大的最小值模型(Maximin Model)导致了他的“差别原则”——社会不平等性只有在有利于最不富裕的群体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合理的容忍。假如有10个人生产了10件产品,10个人平均分配。现在假设其中5个人为了得到更高的收入,同意接受强度更大的工作,并且多生产了5件产品。这样10个人一共生产了15件产品。只要他们因此而得到奖励的额外产品不多于4件,就会或多或少留一些产品给其他5个人。尽管在新的分配方式中收入的不平等性增大,由于前5个人的劳动所增加的产量提高了其他5个人潜在的消费水平。

罗尔斯的观点认为,最不富裕者实际上的确尽可能多地得到了新增的剩余产品。倘若没有其他使他们受益更大的分配方式,倘若我们把嫉妒心从那些处在初始状态上的人的心中剔除出去,他认为第二种状况比前者更加公正(罗尔斯,1972,第538~539页)。

按照这样的推理,罗尔斯没有拒绝平等主义的观点。例如托尼(Tawney)认为过度不平等将会导致个人尊严、信心和自主水平下降,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例如,他认为如果没有自尊,“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可做的事情;或者如果某些事情对于我们有价值,而我们缺乏为之努力的意愿,所有的欲望和活动都变得空洞乏味,徒劳无益,我们也变得冷漠无情,玩世不恭。因此,处于初始状态的群体希望社会能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伤害自尊”(罗尔斯,1972,第440页)。换言之,关键的道德问题不仅是不平等性所导致的严重伤害,它还涉及如何把这种伤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同时最大限度地提供现有的产品和服务以避免其他类型的严重伤害。因此,从道义上为不平等性辩解的理由只能是,人们可以证明不平等性可以为最不富裕群体的利益服务——通过经济刺激导致产量增加。

130 理性的宪法谈判者还将进一步制约社会不平等性的合法化。罗尔斯认为,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为不平等辩护,那么每个人无论在社会阶层中目前处于什么位置,都必须有平等的机会竞争最理想的位置。这一点很重要,既有功效方面的原因,也有道德方面的原因。如果没有平等的机会,最能胜任职位的人就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些职位——这将不利于最不富裕群体的利益,因为结果将可能使他们受到伤害(罗尔斯,1972,第303页)。在道德方面,如果最不富裕的人没有机会通过努力得到更多,这将很不公平,即便他

们自己决定维持现状,也应该有选择的机会。如果没有这种选择,他们将不但“无法得到职位所提供的某些报酬,如财富和特权”,而且还“被剥夺了实现自我的经历,这种自我实现来自于技术娴熟而且全心投入地履行社会责任……是美好人生的一种主要形式”(罗尔斯,1972,第84页)。

最大限度获得首要产品的程度将取决于坚持上述宪法原则的程度。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其中包含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因素。根据第一条原则,由于基本自由得到了保障,民主辩论将会保证人们对自然和社会世界的认识得到提高,集体和个人的选择范围随之扩大。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认识到不断积累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价值,西方民主国家即是如此。例如,个人言论自由的权利、集会自由的权利、不会未经合法审判遭到监禁的权利、不会受到公民权利机关残酷迫害的权利——这些是所有美国权利法案中涉及的重要内容——否认这些权利就是否认他们作为人得以繁荣发展的能力,无论他们处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中。

差别原则的第一个成分承认市场的生产潜力,但又主张存在一个临界点,如果超过这一点,这些经济方面的原因就不能证明不平等水平的合理性。社会主义者对差别原则的道德批评集中在它所设置的限制上。差别原则为合理化设置了限制,坚持把最不富裕的群体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首要产品的权利与合理化挂钩。如果我们不得不用这些方法消除收入的差别,那么即使最平等的工
131
业化社会中的不平等的程度也大大超过了限度。进一步而言,纠正不平等所积累的盈余将会增加进一步再分配的总量。

平等机会原则还关注到类似的宪法和再分配方面的问题。一

方面,这条原则需要有一些“完全彻底的程序上的正义”的程序,禁止机会受到任意性和歧视性的限制(例如等级或种族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它还要求每一位儿童都将获得足够的首要产品,保证那些“接受捐赠和受到激发”的人能够作出大致相同的人生计划的选择(罗尔斯,1972,第83~90、301页)。换句话说,平等机会原则提供了一个指南,用以评估差别原则所产生的盈余是否得到了合理的再分配。在实践当中,这种分配需要广泛而且激进的测度,涉及方方面面,从健康、教育和其他福利资源提供的增加到财产继承权方面严格的限制。这些测度不仅成本昂贵,而且还受到业已占据权力和特权地位的测度的挑战。

如果没有首要产品理论,那么罗尔斯试图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关因素结合起来的努力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位于初始状态的谈判者争辩的目的肯定是为了优化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然而,这些产品和服务是所有的个人制定和实施自己具体的人生计划的前提条件,如果不具备一些这方面的知识,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同样,如果不理解这些前提条件,一旦我们拒绝承认平等机会等同于严格的后果平等或形式上的机会平等,那么我们就不能明白在实践中实现机会平等意味着什么(德沃金,1981,第2部分)。然而,除了首要产品的重要性以外,罗尔斯很少谈及首要产品发挥他赋予它们的解释性作用的具体方法。他选择了一种“苗条的”美德理论,因为他希望它在不同的美好愿景之间尽可能保持中立,并且应该允许这些不同的美好愿景在他推崇的

132 那种符合宪法的民主制度中相互竞争(罗尔斯,1972,第395~399页)。然而,这对于他的那些位于初始状态的参与者们所造成的无

知的程度如此严重,以至于许多批评家认为这些参与者还不如拿自己的未来作赌注,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加入富裕者的行列(普兰特等,1980,第126~131页)。

修正罗尔斯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罗尔斯必须证明为什么根据他的考虑,最不富裕的群体也有个人发展的能力。要想证明这一点,关于需要的理论必不可少。我们出于大致相同的目的已经对这种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当社会的骰子最终被掷出去,无论他们置身于何处,他们的最佳利益都将得到维护,要想证明这一点,那些处于初始状态的人在定义“最佳利益”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健康和自主的最优化,因为最优化的健康和自主是公平竞争或与那些更加幸运的人合作所必需的。即使是那些不冀求更多利益的人,也仍然希望在他们选择的物质条件范围之内充分享受生活。总之,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应该加以延伸,能够说明只有在不平等使最不富裕的人能够得到优化基本需要满足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时,不平等才是对不富裕的人有益的,而且是可以容忍的。

需要满足的最优化也是基本权利和自由取得实际成就的一个必要条件。根据第一条原则,这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是圣神不可侵犯的。在这一点上,罗尔斯有些含糊不清。一方面,他清楚地表明,他认识到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有些人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消极自由的权利和自由的价值将被减少到最低限度。例如,他认为“对于每个人来说,自由的价值都不

尽相同。有些人权力大财富多,因此达到目标的方法比较多”(罗尔斯,1972,第204~205页)。另一方面,他也认为第一条原则应该排在第二条原则的前面。的确,他在后来写的一篇论文中声称,
 133 社会和经济提供方面的问题根本不应该成为宪法谈判的主题(罗尔斯,1982,第52页)。

遗憾的是,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正如波格所说的那样,在拥有正式的自由但极度贫困的状况下,贫困者

由于贫困而在许多方面显然并不自由。现有的基本规则不能为他们提供合法途径,获得更多的必需品……如果社会首要产品的价值是为了反映人类需要概念的合理性,那么它就不能否认基本的社会和经济需要在人的生活中所起到的根本作用。但是坚持基本(公民和政治)权利和自由的突出作用恰恰否定了这一点(波格,1989,第133页)。

后来他又认为

第一条原则要求制度性的计划应该,如果可行的话,保证每一位参与者都将获得足够的社会产品,以满足一个参与相关社会制度的正常人的基本社会和经济需要。当正常的人有差异的时候,这个最低标准(对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的定义是(在正常的范围内)能够满足更大的需要。我把基本社会和经济需要称作并且定义为:某个社会制度中标准的基本社会经济需要(波格,1989,第143页)。

在创立他的“通论”的过程中,罗尔斯把自己两条主要原则在严重稀缺的条件下置于相同的优先水平,从而避开了对他的批评。在此,“所有的社会首要产品……都将平均分配,除非不公平分配任何或全部这类产品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最弱勢的群体”(罗尔斯,1989,第143页)。至此,我们的分析表明,在更为富裕的经济环境中,他的“特殊理论”中的排序原则面临着困难。一旦经济成就的一般性指标被分解,存留下来的局部贫困效应将会打消把消极自由置于比积极自由更为重要地位的念头。

因此,如果我们从这些方面考虑,则不是两条正义原则,而是一条由三个要素组成的原则。第一个要素是我们在第6章中论证的基本需要满足的权利,包括保护影响优化自主权的公民自由。第二个要素在道德上证明,为了这种满足的优化,需要采取任何不平等的方式。此外,请记住经过修正的第一条原则将会消除不平¹³⁴等机会的物质原因,因此第三原则成为完全程序性的,规定了造成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法律制约。罗尔斯的这种观点我们非常赞同,也为我们后面的章节带来了启示。

总而言之,罗尔斯构建了一部社会契约,我们不应该认为它代表了一个实际的、在制定公正的新宪法的人之间有可能发生的谈判,而应该把它看做一种类似于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论环境,因为在许多当今的政治辩论中(例如关于福利制度的辩论),其观点和看法都非常含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可以在原则上保证经济和政治过程中的有效参与,把这两者合并在一起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
对基本需要最优化的满足。这就必然需要一个有相应的司法和分配能力的国家。我们在第6章中推导出来的优化需要满足的道德

权利必须转化为由公共权力保障的宪法权利,道理就在这里。简而言之,事实证明古典自由主义倡导的个人自由与某种受到社会主义启发的福利国家制度是相容的,如果严肃对待的话,还依赖于这种制度。

当然,我们可以就福利提供的具体内容,以及在特定的国家和地方环境中可行的实际水平,进行广泛的谈判和辩论。哈贝马斯和罗尔斯没有试图根据以往的经验确定具体的水平,他们两人相互支持,共同坚守某些基本规则,只要结果是理性而正义的。这种做法强化了两者道德观的可行性,并且为个人差异和偏好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优先发展经济而忽视了健康保健的提高,或者当地人可能更注重环境而忽视了发展高等教育。同样,政府组织和政治进程的其他方面也会存在多样性(波格,1989,第156~158页)。

在一部罗尔斯主义的宪法中,最不富裕者实现需要满足最优化的实证条件通常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每一种选择在原则上都是可行的。然而,在谈判中不能放弃的是最弱势群体不可剥夺的135 权利,以便通过这种方式将其需要满足的权利置于优先地位,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能认为我们所定义的基本需要概念是无关的(迈耶斯(Meyers),1985,第2章)。在前一章里,我们力图说明这个观点如何合乎逻辑地遵循追求美德的理念。尽管罗尔斯的通论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一个类似的但是较为含蓄的需要理论,但是在阅读时我们可以认为它具有大体相同的目的(波格,1989,第39~43页;参考库卡萨斯和佩蒂特(Kukathas and Pettitt),1990,第69~73页)。

对罗尔斯的评论

在如此强调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同时,我们并不否认他的观点也存在一些问题。的确,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批评文献,而且政治领域中左右两派都对他提出了重要的批评意见。

左派批判家,如米勒(Miller)和麦克弗森(Macpherson)认为,罗尔斯的许多具体观点,及其结论中隐含的社会形式,与现有的各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关系过于密切,因此避开了一系列有关稀缺、生产和再分配的问题。在社会方面,他预先假定存在一个阶级社会,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方面,他至多只是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某种变体——宣扬竞争和激励机制的好处。这一点忽视了人力成本以及团体和管理权力的集中,而这些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远远胜于与供求规律的关系。在这样的权力范围内,指望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者允许自己的财富和特权受到任何实际的侵害简直是痴心妄想(麦克弗森,1973,第89~90页;参考米勒,1975,第215~230页)。

这些观点所存在的问题是,它们同样也存在很多问题。它们不过是最大限度地贬低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所取得的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它们至多是造成了一种没有依据的说法,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稀缺和侵犯个人自由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古特曼(Guttmann),1980,第145~156页;参考布坎南(Buchanan),1982,第28~132页,第145~149页)。目前,这些批

136

题的贡献目前在第二世界遭到广泛质疑。类似地,对于民主的解放的潜力与国家对经济和政治制度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容的程度,也存在着争议。关于这些观点,1989年和1990年发生的事件是二次大战以来在国际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最惊心动魄的发展变化。如果连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者们都愿意——勉勉强强地——探索他们自己的信仰与类似于罗尔斯的那些思想之间的相容性,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期待第一世界中罗尔斯的批评家们作出同样的反应!

罗尔斯认为人们有权得到那些获取平等机会所必需的首要产品。有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反对他的这个一般性的观点。罗尔斯关于权利的论述遭到众多非议,被认为是墨守成规、强制性的、个人主义的。在执行过程中不仅需要官僚/法律程序,而这些程序可以恣意践踏个人需要的多面性,还需要只有国家才能强制实施的制裁措施——这种体制据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强制性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则是多余的。由于权利构成了当今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阶级分明的、社会的基本规则,人们认为权利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换言之,在人们看来,宪法权利要么无效,要么多余(坎贝尔(Campbell),1983,第2章)。这些批评也都存在缺陷。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实施并非总是意味着制裁,还包括教育、咨询服务和其他防止滥用的政策。此外,政治权力和成文的规则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特征。对于美好生活的不同构想总是丰富多彩的,需要调解或仲裁。要想达到这个目的而又不致于不公正地侵犯个人自主,就必须在某种意义上系统地认识到个人权利的存在。

然而,除了已经提到的问题以外,罗尔斯的工作还存在进一步

的问题。像哈贝马斯一样,他对政治战略问题没有提出什么见解: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环境中,群体如何能够努力贯彻执行他的原则并且有望取得成功。然而很显然,即使没有这些答案,罗尔¹³⁷斯的观点也能帮助我们澄清以需要为主导的社会的目标。它们在任何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认真地对待个人权利——一种由健康、受过教育的个人共同奋斗,既照顾自己又相互关照,使她们作为一个人的创造潜力得到最佳发挥的理想。

右派批评家攻击罗尔斯的角度不同。他们的攻击有两个主要部分,我们在第1章中都介绍过。第一,诺日克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虽然强调尊重个人自主,但是因为它必须与积极权利理论相联系,因而受到威胁。诺日克的观点是最新的而且最具连贯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人有权享有的产品和服务并不一定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而是必须由别人来买单。因为权利有严格的要求,慈善机构被排除在外,所以唯一别的可能性就是某种形式的税收。但是如果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被征税者就无法拒绝纳税,诺日克认为他们的消极权利受到了不公正的侵犯(诺日克,1974,第174页)。由于国家在实施类似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和机会均等原则时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类似的侵权行为,原本可以被称做正义的理论结果却适得其反。

第二种批评与第一种有关系,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尊重积极权利而非消极权利的代价上。这种观点认为,尊重个人言论自由、隐私、财产安全等权利毕竟没有任何成本。个人只不过需要过自己的日子而不受任何干扰。然而,积极权利——尤其是罗尔斯构想的那种积极权利——不能以同样的方式与严格的义务联系

起来。因为在这里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提供而不是容忍,资源限制也许使其不可能实现。如果在稀缺的环境中,义务不可能得到履行,或者没有任何清晰的思路指导我们在相互争夺的要求之间作出决定,那么由此可以断定,权利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克兰斯顿(Cranston), 1973, 第 66~67 页)。因此,谈论某人拥有某种权利,如健康保健或教育,但是国家却无力担负,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再一次,罗尔斯倡导的那种再分配政策唯一连贯的基础就是慈善事业而不是宪法改革。

- 138 这两种批评都有缺陷。诺日克的论点基于一种洛克式(Lockean)的所有权观,在根本上侧重个人——你,而且只有你,有权决定如何处置你的劳动成果。然而,一旦认识到生产是一个社会过程,融合了许多人的劳动,那么任何与所有权有关的权利都不能只关注个人(麦克弗森,1962,第 5 章;参考奥尼尔,1981,第 319~321 页)。因此,如果直接或间接对生产负责的那些人的政治代表为了再分配的目的同意征税,那么诺日克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此外,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都要消耗资源,因此在这方面两者无法区别。如果保护财产安全的问题受到重视,仅仅希望其他人履行容忍的义务是不够的。例如,还需要某种形式的警察和司法制度(普兰特(Plant), 1986, 第 36~38 页)。更重要的是,全体公民必须具有强烈的道德互惠意识。然而,这种互惠只是自由论者标榜自由的陈词滥调,而不是实际享受自由的物质手段,那么被剥夺者闭口不谈容忍也就不足为奇。

虽然上文中反对罗尔斯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们也同意,罗尔斯的观点存在着几个不足之处和漏洞,需要加以

修正。首先,他对民主理论和公民参与缺乏应有的重视。罗尔斯式的宪法似乎能够导致良性的官僚社会,但是政治参与较少。毫无疑问,韦伯的支持者们会用这种方法解释罗尔斯的理论,并且在他的著作里找不到多少相反的结论。在定义和实施基于需要的政策方面,我们强调最大限度参与的必要性。因此,罗尔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古特曼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批评观点,列举了四种有关在政治过程中优化和平均参与机会的经典论点:保护个人自己及其群体免遭他人的专政(民主的传统的正当理由),直接受到决策影响的人通过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更好的政策(哈贝马斯最主要的辩词),鼓励自我发展,提高政治判断能力(J. S. 米勒以及后来许多费边社成员强调的重点),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尊严(汤尼(Taw- 139 ney)和 T. H. 马歇尔的首要关注点)。她综合以上观点,为罗尔斯添加了一条新的宪法原则:在与他的分配正义原则一致的前提下,最大范围地扩散政治权力(古特曼,1980,178~181页,197~203页)。我们对此表示赞同。

这种参与原则必须从属于他的再分配目标,因为实现后者是前者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古特曼认为,在一个不公正、不平等的环境中企图扩大参与机会——例如美国在60年代后期,社会对学校的控制不断加强——实际上可能在许多方面拉大不平等的差距。因此,除非机会均等原则通过与平等的需要满足原则相结合这个说法被赋予实质的内容,否则自由民主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古特曼,1980,第191~197页;参考古特曼,1982)。如果不把类似于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有资格交流的目标蕴含在生产、

繁衍、教育的方式中,并使权力的运用计划公开,监管透明,那么扩大参与机会也是无法实现的。否则,我们将会缺乏优化这种满足以及优化民主制度本身所必需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古特曼的分析还支持许多相关的措施,如工业民主、从中央到地方决策的权力分散、官僚和专业组织有义务向公众负责。

罗尔斯的著作所忽视的第二个问题也值得关注:对于某些特殊群体而言,罗尔斯定义的正义特别难以实现。一方面,在人们看来,鉴于他的理论的普遍性和他设定的那些可以用来判定每个人所受待遇的标准的方式,这种忽视可能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对于某些群体而言,执行机会均等原则比较困难,在所有的文化中确实存在一个亟需解决的结构方面的问题。例如,父权对于男女之间不平等问题所造成的显性和隐性影响尤为如此。对于一般的不平等问题,佩特曼(1988,第43页)认为罗尔斯:

140

仅仅是想当然地认为,他能够一时并且同时假定参与者灵魂脱壳,消除所有实质性特征,并且假设存在性别差异,发生性交,生出孩子,组成家庭。在原始契约中,罗尔斯的参与者既是一个仅有理智的实体又是“家庭的主人”,或代表妻子的男人……罗尔斯的初始状态是一个严密抽象的逻辑,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如果说罗尔斯在构建其初始状态时偷偷带入了父权主义的假设,那么佩特曼的论点很有道理。如果在初始状态上只有男人——男人自以为是“一家之主”——那么他们达成的社会契约将

很难认可妇女作为个人和社会现实而不是一个理想化的抽象概念所必需的特殊的首要产品。然而,这个缺陷并不能说明我们应该拒绝罗尔斯一般性的方法和结论,只要对谈判者的特征进行修改,把佩特曼的观点包括进来就可以了。

假设谈判者在宪法问题上达成一致之前也不知道自己的性别,鉴于罗尔斯默想试验的理想特点,他的模型包含了许多反事实的假设,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这是特别针对繁殖后代,那么我们阅读罗尔斯有关女性特殊需要的普通理论之后就会发现有一系列的权利,其中包括自由、安全避孕和流产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两项权利,就不能说妇女拥有与男人同等程度的规划和实施人生机会的自由。恰恰是因为这些原因,罗尔斯认为它们应该作为需要的满足物,是所有妇女都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

然而,一旦我们涉及社会繁殖领域,就会提出更多难以解决的原则问题。一方面,幼小的儿童在身体、心理和道德等各方面的发育都不成熟(至于他们多大年龄就不再是儿童了,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暂且撇开不谈),所以他们有权得到保护,使他们能够成长为健康、自主的成年人,以免遭到人为的伤害。另一方面,妈妈(或者任何其他最重要的抚育者)的特殊需要表明,我们应该 141 鼓励她们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试验各种不同的抚养孩子的方法。这一点与向儿童提供保护是一致的。在此,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需要做的是修改法律和规范性的限制,使关爱儿童的方式制度化,从而刺激选择……而不是让孩子们面临不必要的伤害的威胁。在功效和道德方面,在特定的情况下,正确的行为过程也许未必那么

清楚。即使假设关怀者和儿童双方在普通权利的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情况仍将如此。

正如哈贝马斯提出的那样,此类表面上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紧张关系,任何旨在化解的这些紧张关系的理性而有效的尝试都必须既包含专家的系统化的知识和普通人源于经验的知识,我们所探讨的正是后者的基本需要和日常生活世界。在相关的问题上,在通过协商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孩子们、关怀者和专家的声音都必须倾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我们在上文中探讨的需要满足最优化的交流和宪法条件,正义既要求组织严密、专业理论知识丰富的集权,又要求在计划和执政程序方面与我们的基本道德义务相一致的彻底的民主。如果不能涵盖基本的人类需要和权利的普遍特征,则需要一种尊重妥协的制定社会政策的双重战略。因此,任何成功的优化需要满足的交流和政治战略都必须包括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成分。没有参与的正义是空洞的,缺乏正义的参与是盲目的。这句话是对康德最好的解释。

国际主义、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

在第6章的末尾,我们论证了一种观点:优化需要满足是一项普遍性的人权,接受这个观点将会导致一种极端的国际主义。人们并不情愿把资源分配给异地他乡的陌生人,这一点在心理上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他们怀有一种美好愿景并且希望以此作为行动的准绳,那么他们再在道德上就别无选择,只能认同这种

142 做法。当然,一旦我们为了一种基于权利的“福利制度”而接受了

这个事实,用米尔达尔(Myrdal)的话说,我们就在道德上被迫“超越福利制度”,同样必须尊重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需要满足的权利(米尔达尔,1960)。

在夸夸其谈的时候,罗尔斯自己的理论忽视了全球正义的问题,或许是因为制定一套假定的契约用以决定一部适用于整个世界的宪法的想法过于不着边际,令人望而生畏(罗尔斯,1971,第171~182页)。然而,运用罗尔斯的无知的面纱之类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导致了米尔达尔的结论。如果我们假设那些处在初始状态的人们不知道他们将在哪个国家生活,那么似乎很显然他们将同等程度地关心这种所有个人都享有的、国际化的优化需要满足的权利(波格,1989,第6章)。在实际讨论应该如何实现这种优化的过程中,焦点往往在于从北方国家流出,能够使南方国家最需要的人得益的转移和资本。

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的的辩论既复杂又激烈。为了进一步实现国际的优化需要满足的目标,我们主张在发达国家里征收一项国际需要税。但是,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已经表明它们不愿致力于重要的再分配,应该由哪个机构管理呢?管理世界范围内的再分配的理想机构是一个民主的世界性的政府,这个政府应该实施我们为民族国家所设计的罗尔斯式的宪法原则。这就要求创立一些国际性的福利机构,进行直接提供或者协调现有的国家福利机构。固然,如果我们考虑到全世界的国家或国际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再加上诸如联合国这类与之对抗的国际组织的无能,建立这种机构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这个目标虽然令人生畏,但是并没有排除其道德合理性(波格,1989,

第 259~261 页;参考古丁,1985,第 154~169 页)。它仅仅强调了这项任务的迫切性及其涉及的许多不同层次的政治活动。

同时,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继续在第三世界中蓬勃开展,而且
143 取得了一些胜利,包括我们在上文中认可的那种宪法改革。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新的原因就是拖欠第一世界银行的巨额债务——第三世界的不同地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必须加强政治经济合作以对抗发达世界的力量。随着这种联盟的出现,更加公平的从北到南的财富再分配将会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坎马克等(Cammack et al.),1988,第 7 章)。实现该目标应该与建立或改善以前的那种国际机构的工作相结合。

然而,再分配只是优化需要满足的道德议程的一部分。如果第三世界构建更加平等的社会、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忽视了环境问题,那么最终将会弄巧成拙,自寻失败。例如,如果环境遭受严重污染,实际收入的增长未必能够提高个人的健康状况和自主。的确,发达世界的一个教训就是如果更多的财富招致更大的危险——例如食品污染——结果适得其反。

此外,从长远来看,环境污染可以导致经济发展受到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是因为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受到破坏,也可能是因为危害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造成的影响。消除这种威胁再一次需要一个适当的国际政治权威机构进行合法的管制(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第 12 章)。罗尔斯的谈判者如果在有关宪法的协议达成以后,再一次不知道自己被安排到哪个国家,如果无知的面纱没有遮盖住她最大限度保护自身利益所必需的环境因素,那么她将会同意以上的观点。

当然,这种权威机构的管制活动必须结合国际产品与服务的再分配,使欠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否则将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需要满足最优化的普遍性原则以及根据罗尔斯的理论作出的推论都要求,业已通过掠夺自然环境在经济上获利¹⁴⁴的国家有一种道德义务,保证现在也受到相同诱惑的贫困国家分享这些利益。假如世界各地的每个人优化需要满足的权利都受到尊重,那么欠发达国家就有可能更好地抵制那些在短期内可能提高需要满足但却是对环境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鉴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有机性特征,对环境不负责任的长期后果在每个人看来都是不得人心的,无论他们碰巧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泰勒,1986,第6章)。任何人都无法逃避。

最后,在优化人类需要满足的过程中,即使我们注意到了生态空间的问题,还必须面临一个与时间有关的道德责任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对子孙后代有没有责任?如果有的话,是哪些责任?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侵占了属于子孙后代的宝贵的环境资源,就可以不断提高现有的需要满足水平。有一点非常清楚。单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此承担的责任十分模糊。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家族血脉延绵不断,文化传统世代相传,但是我们不一定因此克制在此时此地提高需要满足水平的愿望(帕菲特(Parfit),1984,第480~486页)。同样,基于权利的论点似乎也不能给代际再分配提供多少支持:尚未出生的人,无法承担相应的义务(即使在原则上),我们也不清楚应该如何赋予他们权利(帕特里奇(Partridge),1981,第243~264页)。

话虽这么说,但是否认当代人单纯出于短期考虑有责任保存

并且保护环境,在道德上让人感到有些于心不安。以下三个理由,如果结合在一起,足以证明将来的人有权利享受至少与我们现在相同水平的需要满足。

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直接干预能够保护我们的子孙后代免受伤害,如果我们对他们负有特殊的义务,那么我们至少必须对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后代负有保护环境的责任。我们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妨碍他们追求最优化的需要满足。然而,如果接受了这
145 个观点,那么似乎不可能在实证上把上下两代人的环境需要割裂开来。环境的完整性是不能用时间来分割的。

第二,罗尔斯的论点也表明,对环境不负责任非常不公平(罗尔斯,1972,第44节)。让未来的人派代表来到当今世界,和我们就环境保护问题进行谈判,也许只是一个天方夜谭,我们也不可能去未来世界(古丁,1985,第172~173页)。我们可以想象一张无知的面纱,它让当代人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是否重新复活,但是确实知道自己的需要和环境的关系将来会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谈判的结果绝对不会是对生态环境不负责任。再一次,这个论点成功与否取决于人类需要的存在——或者是以这些名称表达的首要产品——这种需要是不随时间的变化而转移的,是谈判者所熟识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把现在和未来的利益连接到一起(范伯格(Feinberg),1980,第181页)。

但是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崇尚某种只能适用于现代人的当代的美好愿景没有多少意义。如果我们相信某种生命形式美好无比,如果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威胁到这种生命形式的长期生存,那么就正好相当于终结了我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一点不

多一点也不少。这些生命形式,如同人一样,有一种固有的叙述结构(narrative structure)或终极目的。然而和人不同的是,关于信仰美好事物的叙述向未来无限延伸。如果我们相信一种生命形式是美好的,那么它就应该继续下去。如果有人现在支持自己所钟爱的生命形式的道德观和成就,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在乎它将来会怎样,这种观点有什么意义?这种反应首先只能说明对这种生命形式的道德价值缺乏责任。因为这肯定意味着有关人员不想让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做他们现在相信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事情。破坏当今美好事物的生态可能性就是不断破坏未来美好事物的生态可能性——无论我们认为美好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的开始,我们按照避免严重伤害的前提条件区分了需要和想要。如果所有的人能够为了自己的客观利益而采取行动,这些条件可以视为他们应该共同拥有的目标。在这部分的结尾,我们列举出优化需要满足的权利所受到的环境制约。因此,人的需要就是在不危害子孙后代的前提下,在当前条件下,所有的人都应该达到的健康和自主水平。从长远来看——如果还有长远的未来的话——我们不仅要意识到生物圈的脆弱性,还要有某种可行的、使需要满足得到优化的责任,重视权利意味着同样重视环境。 146

我们曾经论证,要想成功实现优化的需要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不可少。首先,参与者必须准确理解他们试图改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第二,这些环境中必须确实存在导致变化的客观机会。但是还有一个条件,我们在此只能点到为止。在挫折和可能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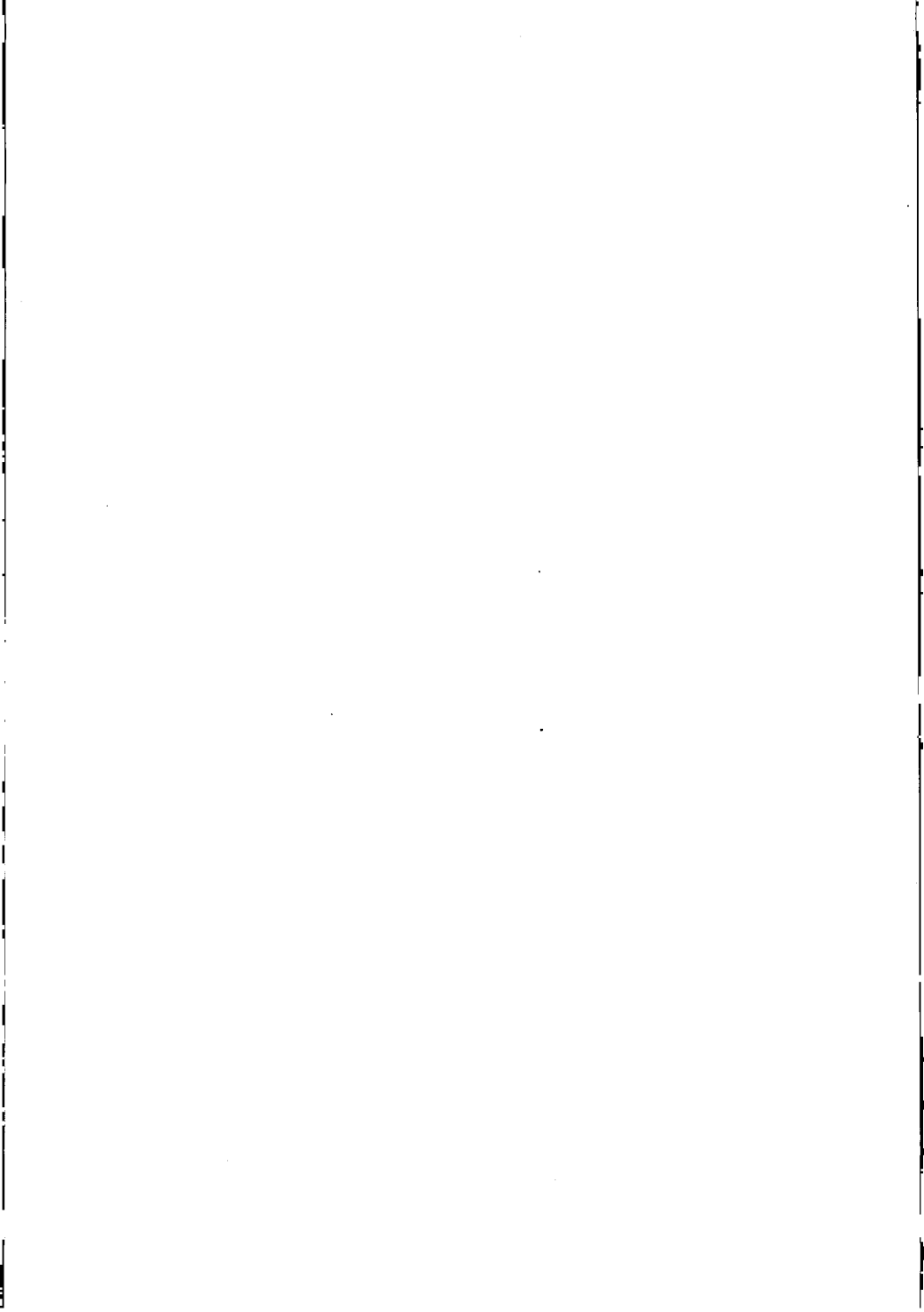
面前,参与者需要具备古希腊人的美德——理性、勇气、真诚和牺牲精神。麦金太尔(MacIntyre)最近一直在致力于复兴这些美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人也许认为,成功的政治斗争还需要古典的基督教美德,特别是仁慈地对待那些与我们的观念不同的人,满怀信念与希望,坚信参与有助于更为公正地分配物质、智力和情感资源,即使在短期内不能成功。

如果在所有这些方面不追求个人美德,那么每一个人的需要满足得到最优化的梦想将永远只是一个梦想而已。没有什么历史的“长河”,也没有什么社会决定的过程来自动地为我们带来我们所需要的变化。产生变革的社会环境无论多么成熟,个人都必须

147 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职业和政治生命中、在高尚美德的指导下不懈努力,才能最终导致变化。此外,我们越成功就越需要加强集体的潜能,采取进一步行动,努力达到相同的目标。确实,正如我们所见,通常,成功地挑战了地位稳固的权威人士,往往正是那些健康和自主水平相对较高的人。因此,如果我们严肃对待美德,就知道美德与一个更加自由解放的未来密不可分——我们在保护现有的需要满足水平的同时,应尽一切可能的方式努力提高需要满足水平。

第三部分

实践中的人的需要



第 8 章 需要满足的测度

151

在第 2 章里我们论证了基本需要是客观普遍存在的,但是我们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不断深化。我们还认识到,满足这些需要依靠许许多多特定的满足物,而这些满足物确实在不同的文化中各不相同。在此,我们必须再一次讨论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个二元性带来的诸多问题。我们能够用普遍而且可以测度的方式说明身体健康和自主的含义吗?需要满足的最优化在实践中包含什么内容?我们能够设计出直接评估满足水平的测度标准吗?这些就是本章里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新颖。“社会指标”、“基本需要方法”和“人类发展”概念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它们都已经研究了以上所有的问题。因此,我们对实践中人的需要的分析就从这些文献开始。

社会指标和其他人类福利的直接测度

目前,各种用以评估“需要满足”的实证指标在全世界普遍使用。尽管这些指标渊源久远,在 19 世纪 60 年代,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原因,人们对测度“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福利的直接的、非货币方法产生了新的兴趣。

在理论方面,这个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用国民收入来测度总产值表示不满,更不用说用它来衡量福利了。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经济体中货币结算部门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净附加
152 价值的总和。未经调整的 GDP 把农民和其他直接消费的产品排除在外(这部分在欠发达经济体中可以达到总产值的 40%)。此外,广大妇女在家庭中没有报酬的活动和服务也未列入其中(这部分在较发达经济体中可以达到 40%)。然而,作为一个衡量福利的指标,人均 GDP 仍然是很不完善的。它没有考虑满足需要的物品和奢侈品之间的支出构成,没有考虑群体之间和家庭中福利的分配,没有考虑生产和消费对福利造成的影响(除非福利是根据 GDP 所衡量的那些东西来定义的),没有考虑生产对环境和生物圈产生的副作用,因而也没有考虑未来生产和福利的可持续性(迈尔斯(Miles),1985,第 2 章)。

这些不完善之处众所周知——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以此进行批评显然不合时宜,因为 GDP 从一开始就不是用来衡量总生产或福利的。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这些不足之处导致人们探索衡量福利的其他测度指标(迈尔斯,1985,第 2 章)。首先,德鲁诺斯基(Drewnowski)和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有关人员提出了“生活水平”的概念——直接衡量各种生活领域中需要满足的测度。后来,其他社会科学家,主要是北欧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将这个概念加以理论化。冯·赖特(Von Wright)(1963)总结出在这种环境中客观福利和主观幸福之间的区别。后来,阿拉特(Allardt)(1973)进一步拓宽了这种方法,从单纯的物质生活水平推广到包括生活中通常属于私人和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他通过这种

方法,区分了客观福利的三个基本层面——拥有(having)、喜爱(loving)和成为(being)——同时保留了与主观福利的区别(另参看加尔通(Galtung),1982)。

这些理论发展反映并且促进了实践的发展。在第一世界中,各国政府开始从凯恩斯经济管理模式转向社会计划方面更加广泛的责任,这种转变进而要求构建新的统计来建造模型并实行控制。社会报告制度在美国得到发展,并且通过英国政府刊物《社会趋势》广为传播。197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确定了一系列“大多数成员国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并且随后针对这些问题¹⁵³确定并且建立了监控发展的社会指标(OECD,1976)。

19世纪60和70年代,在第三世界,一些地区可观的发展速度未能阻止相对甚至绝对贫困水平的不断恶化,这个经历直接导致了“基本需要方法”。“经济增长”是通过GDP的变化来衡量的,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和“福利”的指标受到了批评。通过聚焦就业和收入分配,描述后者的各种努力最终导致直接关注“基本需要”(威斯纳(Wisner),1988,第1章)。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正式通过了《基本需要发展战略的原则和行动计划宣言》,1978年,世界银行开始了基本需要方面的工作。这些动议和其他动议启动了收集和比较基本需要满足指标的计划,最典型的就优先满足少数基本需要,如营养、初等教育、健康、供水、卫生和住房。^①基本需要方法被认为有许多优点,对于第三世界而言,它既是一个目

① 在卷帙浩繁的此类文献中,请参看斯特里顿(1981,第18章);斯特里顿等(1981)第1章;迈尔斯(1985)第2章;希尔霍斯特(Hillhorst)和克拉特(Klatter)(1985);利森(Leeson)和尼克森(Nixon)(1988)第2章。

标又是一套政策重点(斯特里特(Streeten),1981,第18~19章;斯图尔德(Steward),1985,第1章)。这个目标可以适用于所有关心的问题,而且可以被人们广泛接受,因此对于国际援助机构也颇具吸引力。最重要的是,它有坚实的道德基础:有些人认为,“把基本需要置于首位”更接近于发展的根本目标。事实可以表明,少量的金钱可以缓解大面积的痛苦。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作为一种优先政策,这种做法可以把分散的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完整合理的计划,同时还能够支持针对特殊弱势群体的具体计划。

然而,尽管取得了理论发展和政治优势,社会指标和人类发展方面的进展似乎陷入了泥淖。在政治上,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社会指标运动在80年代逐渐衰弱,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中。结果导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第三世界“结构调整”政策,该政策很少顾及基本需要、人类发展或生活质量(科尼亚等,1987)。到19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增长速度减缓,绝对贫困扩大。同时,基本需要战略还受到第三世界批评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帝国
154 主义对于他们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回应。相反,他们强调欠发达国家最为迫切的需要是在经济上减少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威斯纳,1988,第1章;迈尔斯,1985,第169章)。

毋庸置疑,国际经济所面临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南北双方在社会指标和“人类发展”运动中所面临的危机。此外,一些基本需要战略不切实际,还有一些战略“对于社会一政治现实表现出惊人的天真”(利森和尼克森,1988,第34页,参考第2章)。但是此前很久,相对主义的浪潮(如第1章中所分析)就冲垮了这些战略的概念基础。他们认为,基本需要方法对人性(特别是西方文

化观念)和社会变化作出了一些人为假设,是一种单一、线性的发展模式。相反,一种评价生活质量的人类学方法得到了提倡(里斯特(Rist),1980)。在宏观层面上,这要求更加强调把社会 and 参与作为理解特定社会群体需要的途径。在许多方面,在某些人手里(例如约翰森(Johansson),1976),这代表了一种积极的贡献,有助于增进本书倡导的人类需要的跨文化理解。然而,在其他方面,它又降低了所有普遍人类需要概念的可信度。

社会指标/人类发展运动的衰落首先归咎于缺乏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参考森,1987,第25页)。以上提到的早期理论创新无一例外地存在一个巨大的缺点。没有任何人证明其理论的普遍性,也没有任何人在同一枚硬币的反面解决了相对主义提出的更加深刻的哲学问题。不是普遍方法的概念遭到否定:“需要是社会结构构建的,因此没有客观内容”(里斯特,1980,第241页),就是承认普遍需要的理论可能性,这一点更为常见,但是由于对概念和证据存在文化和政治偏见,具体评估普遍需要被视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①

因此,加尔通(1980,第72页)虽然承认基本人类需要的存在,但是认为这些需要受到了西方观念、类别和清单的“腐蚀”和“污染”。我们只有通过创造另一套非西方的需要清单,才能接近普遍性的核心。一份普遍性的清单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即使他通过比照各种相互矛盾的清单有可能更加接近这个目标。卡尔—希尔 155

① 韦格尔(Weigel)(1986)不在这些批评之列,但是他的个案似乎基于社会生物学论点,虽然很有趣,但是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其原因就是第3章总结的原因。

(Carr-Hill)一脉相承,首先承认“一般来说,测度和统计工作不是政治上、社会上和理论上的自主活动”,继而提出一个真正令人恐惧的问题,技术解决方法可以代替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有两个可能的结果:人们要么根本不设立任何指数(因为这些指标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要么设立最适合自己的政治偏好的指标”(卡尔—希尔,1984,第176、180页)。他采用了第二种方法,但是无法否认不同价值体系的支持者提出的任何其他指标体系。又回到了相对主义。然而,抽象地攻击相对主义、在理论上证明基本需要的存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指出他们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应用社会研究实践中的具体内容。

满足物与“中间需要”

虽然个人的健康和自主的基本需要具有普遍性,但是满足这些需要所必需的许多产品和服务却存在着文化差异。例如,所有的民族都需要食品和住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满足任何特殊的营养和庇护需要的烹饪方法和住所的形式五花八门、千姿百态。我们把所有能够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物体、活动和关系系统称为“满足物”。基本需要永远具有普遍性,而其满足物通常是相对的。森在分析贫困问题时曾经提出过类似的看法:“贫困在能力范围内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但是在商品或特征范围内看则通常以相对的形式出现”(1984,第335页)。基本需要和社会指标文献的一些撰稿人也提出过相同的观点(如莱德勒,1980)。所有人普遍具有的基本需要或能力,而且满足它们的方式以及满足它们所需要的满足

物种类繁多,数量极大。这两者在理论上非常相符。但是在实践中衡量需要满足则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

森(1984、1985、1987)在一系列论文中形成了一个关于福利的概念和测度,有助于完成这项任务。首先,他把商品和商品的一系列特点或有用的特性区分开来(兰卡斯特(Lancaster), 1966)。例如,一顿饭的特性可以是填饱肚子、建立社会联系或提供家庭生活的中心。相反,许多不同的商品通常具有一个或多个相同的特点,例如所有(或大多数)食物都具有填饱肚子的特点。其次,他认为这些特点必须与人的“功能”区别开来。功能指的是一个特定的人利用她或他所支配的商品特点所能达到或成就的结果。人们可以选择的一系列功能,即他们对功能做出“选择的自由”,称为“能力”。功能和能力又进一步区别于那个人的最终心理状态,如幸福或愿望的满足。森因而构建了一套分析消费和福利的方法,内容比正统经济学更加丰富,具体方法如下:

商品 → 特点 → 能力/功能 → 心理状态

我们打算在我们的理论中结合森提出的框架。他的模型表明,有两个针对财富(商品)或针对用途(主观终极状态)的选择可以用来测度福利:“能力/功能”和“特点”。让我们逐个加以分析。

第一,我们提出的健康和自主的基本需要显然与功能密切相关。但是,尽管森自己有效地运用了他的框架,但是由于他没有列出一份系统的功能和能力的清单,可能会受到批评。我们认为,我们的理论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实际运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

运用跨文化测度直接衡量我们基本的个人需要满足的程度。在第9章中,我们将要说明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然而,某些概念和实证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常常让我们在普遍性和操作性之间面临着痛苦的选择。我们如何能够在既不接受相对主义观点,也不会一般在意义上开展工作而使我们就社会政策具体问题的理论变得无关痛痒的基础上,绘制出基本需要满足或“客观福利”的蓝图呢?

- 157 第二,正如森所说,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必须用一种基于满足物及其特点的方法来补充第一种方法。“满足物的特点”是所有特点的一个子集,在一个或多个文化背景中有助于我们基本需要的满足。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细分,以确定普遍性满足物的特点:满足物适用于所有不同文化的那些特点。因此,普遍性满足物的特点就是那些在所有文化中能够促进身体健康和人的自主的产品、服务、活动和关系的特性。例如,一个特定人群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构成了(大多数)食物的一个特点,并且具有跨文化的相关性。同样,“遮风避雨”和隔离携带病菌的媒介是所有住所的共同特点(尽管其程度大不相同)。普遍性满足物的特点在普遍性基本满足物和社会相关的满足物之间搭建了一座关键的桥梁。

鉴于我们在第3章中提出的关于人类需要的论点的使用特征,普遍性满足物的特点可以被视为一些目标。具体的满足物可以作为追求这些目标的手段。出于这个原因,也是为了便于把握词语,让我们把普遍性满足物的特点称之为中间需要。如果这个推理是正确的,这种需要可以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一系列衍生的或次要目标,如果想要达到首要的

健康和自主目标,首先必须实现这些次要目标。布雷布鲁克(1987,第2.2章)曾经指出,列出这种清单是一种惯例,不同的研究提出了众多不同的关于需要的清单。然而,许多国际组织(如OECD)、国家政府和个人都提出过不同的清单。^①有些项目出现在所有的清单上,如食物;有些则没有,如“娱乐”或“产品和服务的支配权”。这种清单存在的问题是它们特定的性质。相比之下,我们的理论规定了哪些中间需要对基本需要的满足是最重要的,原因何在以及为什么它们在所有文化中都是相同的。这些中间需要可以列举如下:

营养食品和洁净的水
具有保护功能的住房
无害的工作环境
无害的自然环境
适当的保健
童年期的安全
重要的初级关系
人身安全
经济安全
适当的教育
安全的生育控制和分娩

158

① 布雷布鲁克(1987)第2.2章。有关这些分类的对比,请参看迈尔斯(1985)第6章;巴斯特(1985);约翰森(1976)。

入选这份清单的唯一原则就是该满足物的特点是否普遍而且积极地有助于身体健康和自主。如果符合这个条件,就可以定为一个中间需要。对于提高基本需要满足,如果不是普遍需要的,就不能作为一个中间需要,无论该商品/活动/关系的影响范围如何广泛。例如,“性关系”没有列入清单中,因为有些人与其他人没有任何性关系也能享受健康自主的生活。同样,一个项目如果在某个社会背景中有害于健康和自主(如英国的高层住宅),但是如果它在别的社会环境中并没有这种危害,也不能列入清单(参看道格拉斯,1983,第171~172页)。

我们关于普遍性满足物特点的定义有一个例外。人种之间的重大生物差异可能会引起对特殊的满足物特点的要求。到目前为止,这类差异最大的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别差异。在第10章中,我们将要证明这种情况需要一种更高级的普遍性满足物特点,满足这种需要对于半数人的健康和自主至关重要。妇女如果想要在各自的社会中享有与男人同等的参与机会,就需要保障生育控制和分娩的安全。

至于什么是普遍必需的,证据来自于两个主要科学领域。首先是现有的、最好的技术知识,这些知识可以说明身体健康或自主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是比较人类学知识,这种知识有关当今世界上许许多多不同文化和亚文化、国家和政治制度的行为规范(布雷布鲁克,1987,第2.3、2.4章;参考马尔曼和马库斯,1980)。因此,在合理决定中间需要的构成问题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可以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是贬低我们在第7章中讨论的哈贝马斯的“实

用”认识的贡献。

和所有的分类一样,这份中间需要的清单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任意性。其中的元素只是“语言包装”或“标签”,用以区分不同的特点集合。此外,采用的词语标签含义模糊——它们没有“包括或完全代表所确定的需要”(贾奇,1980,第280页)。增加特点或“需要类别”的数目可以减少模糊性。然而清单越长,理解人类需要全貌的问题越大。后果是,真正的需要类别却变得无足轻重。无论采用什么分类方法,我们的理论要求选择的唯一条件是满足物特点的普遍性。

因此,我们建议测度根据(1)基本需要和(2)中间需要来确定的需要满足。需要满足还有第三种解释,但在本书中占的比重比较小。它要求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衡量具体满足物的消费。在特定地点和时间决定哪种满足物是必需的,要求使用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最近的贫困研究和“社会审计”(social audits)率先尝试了这个方法。^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必须得到来源于经验的知识的补充,后者丰富多彩,来源于接受调查者的实际生活。这些问题有些将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提出来,第9章和第10章运用了部分贫困研究的成果。在其他方面,我们的分析坚定不移地坚持中间需要,如果想要满足身体健康和自主的基本需要,这些中间需要就必须得到满足。

^① 汤森的著作(1979)提供了在英国的例证。关于贫困研究,请另参看麦克和兰斯利(1985),关于许多方法论问题的综述,请参看《社会政策期刊》特刊16,2(1987)。关于“社会审计”,参看《政策研究》(1990)。

基本需要满足的标准

下面一个问题是关于比较需要满足测度的标准和计算需要满足的不足之处。关于基本需要,在第二部分里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既不赞成绝对的最低标准也不赞成与文化相关的标准。

- 160 不能选择前者仅仅是出于生物数据方面的考虑,因为对于绝对最低标准是什么可能会发生改变——通常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后者将会否定我们的整个项目,因为它意味着回到因文化而异而且无法比较的衡量标准。在此,我们提出了第三种标准——最优化标准。

在第4章里,我们在两个层次上确定了最优的基本需要满足水平。在第一个层次上,健康和自主的标准是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文化中选择他们会参与的活动,具备这样做所必需的认知、情感和社会能力,并且有资格享有获取这些能力的途径。在第二个层次上,最优的健康和自主的标准是,个人能够形成必要的目标和信念以质疑其生活方式、参与旨在实现这个目标的政治过程、和/或完全加入另一种文化。我们把这个标准称作批判性最优。在这两个层次上,优化都不意味着“最大化”。

在实践中,参与一种文化与质疑和改善该文化所要求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是一样的。但是在认知理解和社会参与机会方面以上两种优化标准发生了分歧。批判性最优涵盖的内容更广,包含了获取其他文化的高级知识、行使能动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机会。按照第6章中的观点,所有人都有权享有的正是批判性最优水平上

的需要满足。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健康和自主的批判性最优水平的标准。在实践中,这个标准要么意味着当今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能达到的最优需要满足水平,要么意味着目前在物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比这个标准更高的标准。两个标准都提出了复杂的问题,涉及可普及性、关于需要的全球政治以及经济的可持续性。此时,我们将避开这些问题。让我们采用第一个意思,根据总体基本需要满足水平最高的社会集团所达到的最新标准来确定批判性最优。在一个国家之中或多个国家之间,各种社会分类方法可以用来界定最富裕群体——社会阶层、收入层次、种族群体、性别。因此,如何将优化理论运用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手头的任务。在本书的大多数地方,我们采用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最有意义的社会集团——民族国家。¹⁶¹

因此,我们对最优需要满足理论的应用,将要在实证方面联系身体健康和批判性自主水平最高的国家的实际表现。在此,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使用不同国家在各个方面不同的“最好的做法”(如日本的预期寿命、瑞典的经济安全等等),还是使用一个总体表现最优的国家。后者有一个优势,这种需要满足水平有目共睹,切实可行,而且可以不去考虑不同需要之间以及不同群体的需要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交易(纳罗尔(Naroll), 1983, 第64页)。也就是说,不仅“应该”(ought)有“能够”(can)的意思,“是”(is)也有“能够”的意思(威廉斯,出自森,1987,第96页)。第12章中的数据表明,当今表现最优的国家是瑞典。

当然,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样一种最优的标准目前

还很不现实。尽管从长远来看,这种最优标准是唯一合乎逻辑和道德的、可以用来评判需要满足的标准,但是这并没有排除用较低标准作为中期战略目标的可能性。对于较不发达的国家,首先确定在任何(正统方面定义的)经济发展阶段取得最佳成就的国家,然后根据它们来制定较低的标准。在第 12 章和第 13 章中,我们同意哥斯达黎加可以作为第三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中的榜样,1977 年以前,如果没有目前的内战,斯里兰卡曾经是世界最贫困国家中的明星。

中间需要满足的标准

鉴于以上论述,下一个步骤就是决定导致最优基本需要满足水平的中间需要满足水平——每一个普遍性满足物的特点。这项工作提出的问题是,中间需要的“投入”与身体健康和自主的“产出”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我们将在第 10 章中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此可以大胆做出一个更加笼统的推论。在一项关于环境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的研究中,沃尔(Warr)设计了一个“维生素模
162 式”,我们认为这个模式可以用于完成这项任务。沃尔指出,一定数量(而不是过量)的维生素对于身体健康非常重要:“如果摄取量偏低,缺乏维生素会导致生理性损害和身体不健康,但是达到了规定的水平之后,多余的维生素没有任何好处。他认为主要环境特征对于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也是同样的道理”(沃尔,1987,第 9~10 页;戈尔茨坦,1985)。

这个道理适用于身体健康,也适用于自主的其他成分。换言

之,如果想要实现人的健康和自主的优化,就需要特定水平的中间需要的满足。但是一旦超过这个水平,任何额外的投入将不会进一步提高基本需要满足。例如,在低收入国家里,医生与病人的比率和某些生存指标成正比,但是在高收入国家里则不然。这意味着医疗提供的数量对于人体的存活所产生的效果在某种中级水平上就达到了渐近线。再看一个例子,一个住所一旦安全、温暖,不拥挤,有清洁的水和令人满意的卫生条件,任何进一步的改善——如增加空间,添置舒适的设备,豪华的装饰等等——都不能提高居住者与居住相关的需要满足。这些改善也许可以很好地满足主观愿望,提高想要的满足,但是它们与评价基于需要的福利无关。

然而,沃尔进一步指出,有些维生素也会产生副作用:数量过大肯定会造成伤害。为了便于记忆,他把这些称之为 AD 成分,这个名称取自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又恰好能代表“增加反而减少”(additional decrements)的意思。这一点对于有些中间需要也同样适用。例如,有些保健食品如果食用过量可以危害健康,甚至威胁生命。对于这些种类的满足物,存在一个食物消费的平台,平台两端,无论太少还是太多都有害。童年时期和成年时期的安全以及其他某些中间需要满足物可能也是如此,太多了反倒有害。这两种关系如图 8.1 所示。因此,构建一个需要满足的指标体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定实现最优水平的基本需要满足所必需的最低水平的中间需要满足。这个数量是根据个人的身体健康和自主而衡量的。根据罗尔斯的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个水平称为最低投入水平的最优(*minimum optimorum*)。显然,这个目标将寻求满足 163 物的最小化和寻求结果的最优化结合在一起,但是与其他强调基

本需要的重要性的方法不同,它让前者附属于后者。例如,如果根据现有的最科学的知识,进一步改善教育方面的供给能够提高人民的身体健康或批判性自主,那么由此可以断定,目前他们在教育方面的需要没有得到最优的满足,他们应该被视为处于客观被剥夺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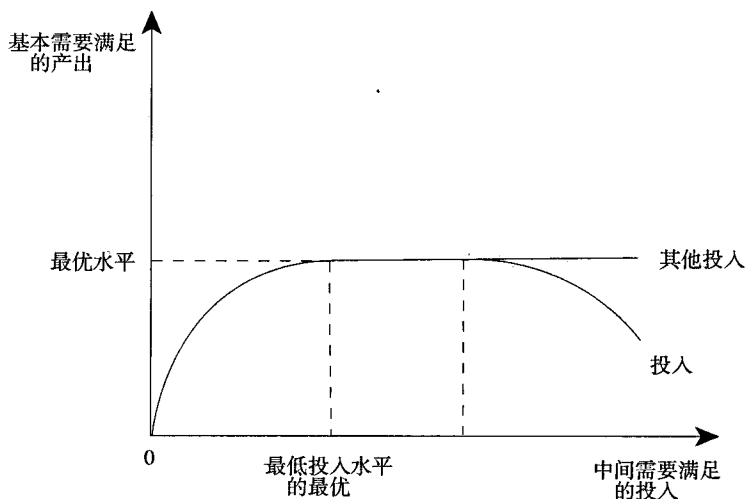


图 8.1 中间和基本需要满足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沃尔(1987)图 1.1,第 10 页。

164 在确定的价值范围之内,各种普遍性满足物或中间需要可以相互替代,或相互补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对这个程序设置一个限制条件。作为替代性的一个例子,环境变暖或劳动减轻将会减少人的食物需要(卡特勒,1984,第 1121 页,及以下各页)。基本需要之间的互补性非常强:例如,妇女的文化教养有利于健康、营养和降低人口出生率(伯基和乌尔哈克(Burki and Ul Haq),

1981,第171页,及以下各页;斯图尔特,1985,第5章)。所有这些关系及其之间的关联需要更多的研究。存在补充品或替代品的地方,如果不了解投入B、C等的消费水平就无法确定投入A的最低消费水平(马尔曼和马库斯,1980)。然而,除此以外,所有中间需要都必须达到最低限度的最优满足水平。如果它们属于AD型,这种水平还应该低于出现“增加反而减少”的水平。

另一个限制条件涉及可普及性受到的生态约束,我们在第7章中曾经讨论过这一点。可以设想,对于有些中间需要而言(特别是健康和教育服务),在图8.1中继续供给已不再能够提高基本需要的点太偏右,以至于依靠现有资源无法普遍达到最低投入水平的最优点。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种限制性最优,确定在相关人群中可以普及的基本需要满足的最高水平。在第6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强的道德理由,在定义普遍性时应该把全世界所有的人视为唯一的相关群体。这个观点包含了一种“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实用概念,我们将在第11章中探讨这个问题。然而,在此时此地做出实际战略选择的时候,对于相关人群而言,一个普遍性程度较低的概念又可能成为唯一可行的概念。为了所有切实可行的目的,这将意味着一些民族国家的人口,这些民族国家能代表特定类型的社会—经济限制,与所有个人需要满足的水平相比,都做得很好。

设计需要满足的社会指标所遇到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做得很好”的确切含义又是什么?我们

仍然需要有效而可靠的“社会指标”来评价在满足身体健康和自主的基本需要和以上确定的中间需要方面成功的程度。然而，由于
165 所有这些指标都是替代性的测度——代表了那些严格说来无法测量的基本概念（卡利，1982，第2页；迈尔斯，1985，第16～18页）——作为满足任何需要的指数的任何测度，其适用性永远存在合理争议的余地。让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有关文献中确定的这些遗留问题。

有效性

人均卡路里消耗量作为一个“充足合理的营养”的指标，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要求的一部分，究竟有多大的有效性？“居住密度大于每个房间两人的人口比例”这个测度抓住了“拥挤”的实质吗？我们时刻面临一种危险，就是重视那些碰巧容易测量的东西。与此相关的危险是用“投入”取代“产出”或“结果”。有一个例子可以同时说明这两种危险，即用“学习的时间”来测度“学习”。当然，这种追求完美的忠告有一种危险，可能使所有描绘人类状况的努力都陷于瘫痪。在实践中，不可能直接测量时，必须使用某种“转换”，把理想的标准和可行的测度手段连接起来（卡尔—希尔，1984，第183页；斯特里顿，1981，第21章）。尽管我们必须学习目前最好的做法，我们的理论也的确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它确定了一系列明确的最终结果——个人健康和自主——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中间“投入”。该理论以这种方式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上的基本原则，指导我们接受某些常用的社会指标（如预期寿命），拒绝其他指标（如“闲暇”），并且发现重要的空白点（如“处于危险之

中的儿童”或“社会隔离”等指标)。

分解与分配

所有编纂社会指标的人都必须面临在什么程度上如何分解数据的问题。我们可以区分三个宽泛的选择,并且将要使用其中两个。^① 第一是详细描述个人之间的差异,例如通过运用低于某种基准的比例(如低于每天 2000 卡路里)。我们的理论关注的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差异,特别是最贫困者的绝对标准。结果,它支持的是这种指标,而不是群体平均状况的指标,如预期寿命。利用 166 第一种方法区分,不同的个人可以在不同的需要领域里低于各种基准点。第二种方法是分解需要满足的测度,区别分值稳定(较高或较低)的群体,如男人和女人或各种社会阶层的成员。第 12 章将推出区别男人和女人的需要满足指标。

福利的综合指标

与人均国民收入不同,社会指标方法造就了丰富多彩而杂乱无章的需要领域,通常衡量每个需要领域的指标都不止一个。这种状况导致人们寻求一种综合指标,用一个数字就可以反映福利状况。在此,我们介绍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权衡几个指标,最终形成一个指标。生活物质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PQLI)就是其中之一,该指数

^① 卡尔—希尔(1986),第 305~306 页。第三种选择是分解适合于我们正在讨论的需要满足领域的群体。例如,性别在计划总体工作量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在规划自然环境时却不是。

在发展研究的文献中大量使用(莫里斯,1979)。PQLI 指数是表示婴儿死亡率、1 岁时的预期寿命和基本文化程度三个指数的一种简单的未加权平均数。在这些领域中的需要满足,从最低标准到最优标准都可以衡量出来,其最优标准与我们所确定的方法大致相同。因此,婴儿死亡率的范围一端是 1950 年以来表现最差的国家的水平,另一端是参考瑞典(全世界表现最好的国家)目前的成就得出的最理想的水平。同样,衡量预期寿命的数值范围可以确定为,从 1950 年以来预期寿命最低的国家的水平,到可能的最高平均预期寿命(77 岁,比瑞典当时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两岁)。我们假设到了这个年龄后,将来无法预见的发展不能继续延长人的正常寿命。同样再加上文化程度的百分比就构成了 PQLI 指数。

遗憾的是,该测度在概念和方法论方面都应该受到批评(斯特里顿(Streeton),1981,第 387~390 页)。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暗示,某一中间需要领域不能与另一个领域进行交换(除非有明确的
167 补充性和替代性的证据)。无论多少童年时期的安全感都不能补偿今天的住房短缺;更好的营养同样也无法抵消环境污染的危害。相反,每个领域都应该单独评估,根据最低标准或最低投入的最优标准计算。此外,PQLI 指数支持健康和自主最低限度的概念——可以用它来描绘我们做得多么糟糕,但是不能用来衡量更加广泛的人类进步。它还回避了交流和组织的过程,没有这些过程,最优化需要满足水平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

最近发表的联合国计划署报告(1990)按照类似的思路创建了一套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HDI 指数结合预期寿命、文化程度和达到体面生

活标准的收入(后者“令人满意”的水平采用的是9个西方国家官方“贫困线”的平均数)。与其他指数相比,其先进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套更加清晰的人类发展的理论公式,以此作为人的能力构成,人民利用他们所取得的能力来参与各种不同的活动。这一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森的研究,和我们自己的理论也非常相似。然而,HDI指数仍然容易受到在此概述的所有现有综合指数的批评。^① 这些批评为更为复杂、多方面的指数提供了更加充足的理由,如埃斯蒂斯(1984)的社会进步指数。这个指数总共包括11个次指数,使用了44个社会指标,覆盖了社会进步的6个方面。在此,由于缺乏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衡量的重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威胁压垮整座大厦。

另一种解决汇总问题的方法(斯特里顿,1981,第390~394页)是使用平均预期寿命或某种其他测度作为唯一的人类发展指标。最近的研究表明,该测度与人均医生数量、卡路里供应量以及特别重要的文化程度存在很高的相关度(斯图尔特,1985,第4章)。我们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预期寿命在关于人类需要问题的任何考虑中如此重要。然而,我们的解释是通过把这种对于生存问题的关注推广到更加广泛的最优身体健康和个人自主问题。除
168
非我们找到一个有效的指标来整体衡量这种综合现象,否则综合利用一个以上的指标将会继续存在。在此之前,分解社会指标是必要的。尽管我们不应该阻止人们寻求衡量人类幸福的总结性测度,但是一个单一指标的想法(如人均GNP)也许将仍然成为许多

① 参看德赛、森和博尔特维尼克(1990)有趣的著作。

人孜孜以求的圣杯。

谁决定？人的需要的定量与定性研究

最后是研究需要问题所面临的一个永久性的难题。什么是需要？如何衡量需要？如果同意主观偏好和职业/官僚指令都可能是决定这些问题的因素，那么该由谁来决定适当的社会指标？如何决定(布拉德肖,1972)？在过去的20年中出现的、业已取得共识的答案就是“参与”(斯特里顿,1984,第974~975页)。接受评估的是全体人民的需要，他们有效而有识的参与至关重要，而且已经在乡村一级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然而，仅仅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强调参与并不是一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除了别的问题以外，它可以通过享有特权者操纵信息过程的能力使他们处于更加优越的地位，而且还可以为了局部而牺牲共同利益。

我们的方法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一些线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理论在本质上具有“反复性”：我们可以证明普遍和客观需要的存在，但是知识的不断积累又不断地修改和提高我们对于中间需要以及如何最好地满足这些需要的认识。这种新知识反过来又反馈到评价社会政策的指标当中，并且修改这些指标。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和基于经验的知识不断增长，导致适当的中间需要指标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改善。这一点为决定不同文化中特殊满足物的过程提供了更加充足的理由(例如含有特定营养成分的特殊种类的食物)。

现在，让我们注意，我们的理论支持使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布赖曼,1988,特别是第6章)。除了一些最小的群体以外，评

价需要满足必须涉及定量社会指标：总结各种人群的状态的数字统计。这些数据还有其他一些好处，特别是它们使人们能够计算出各种群体在需要满足方面的差异程度及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速度。尽管如此，这并不排除定性研究的作用。定性研究可以帮助169

以帮助我们理解行为的意义，设计和改善基本需要满足指标。在实践中满足人的需要意味着什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都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但是在任何时候，人们在描述这方面的进步时，首先借助的是定量数据。

我们从身体健康和人类自主的基本需要出发，界定了“普遍性满足物特点”——那些在所有文化中共同的需要满足物的特点——并且运用它们来决定各种“中间需要”的类型。满足每个特点的目标标准是保障个人健康和自主达到最优所必需的最低要求，相应地被确定为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目前所达到的最高标准。我们也提倡在特殊环境中使用最优标准和最低投入的最优产出标准的限制性版本。为了描述基本需要和中间需要，我们理想化地要求社会指标必须是有效的、分布性的、定量的和汇总的，而且可以随时加以修改。这些指标可以在不同群体之间加以分解。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编写各个国家、文化群体和其他集体的需要满足的概况。

尽管以上论述的都是关于个人需要，这些方法同样可以应用于我们的社会前提。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确定——并且衡量——那些使人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合理而民主地确定并且最优地实现其基本需要的社会前提，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11章中加以探讨。

同时,下一页上的图 8.2 总结了我们理论的基本结构。这幅图虽然不能证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但是确实能表明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它划分的理论层次,区别了普遍目标、基本需要、中间需要、特殊满足物和社会前提。第二,它表明了该理论在参与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人类解放之间的界线。图 8.2 总结了前文的分析,可以作为在第三部分中理论运用的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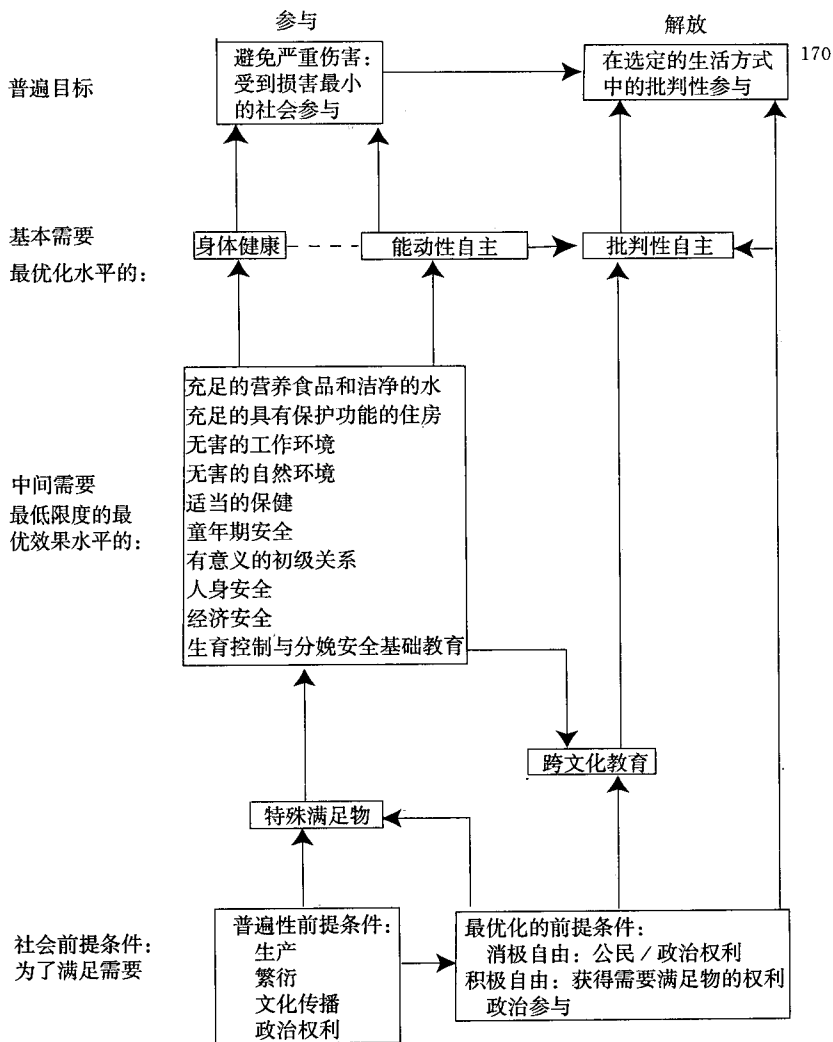


图 8.2 理论提纲

第9章 身体健康与自主

如何从实证方面评价基本需要的满足？读者们会想起在第4章的理论中设立的最终目标以及身体健康和自主的基本需要的划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避免从根本上持续损害社会参与的严重伤害。这些需要则被视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普遍性条件。在此，我们的意图是使身体健康和自主具有可操作性，并且提出两者的跨文化指标。^①

图9.1详尽展示了图8.2中第一行的内容，标明了我们研究¹⁷²方法的重要步骤。第一，我们考虑的是生存和丧失能力的测度。丧失能力的概念是从事人类正常行为的受到限制的能力。在这个概念中，限制是生理或情感损害的结果。第二，我们求助于跨文化的、运用生物医学模式的身体疾病测度。剩下的三个部分将我们在第4章中区分的个人自主的三个成分进行具体操作：精神病、认知剥夺和受到限制的参与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的机会。我们希望在作出结论的时候能够说明如何从实证方面描述身体健康和自主的基本需要。

^① 第9章和第10章中的一些观点和文字源自莱恩·多亚尔(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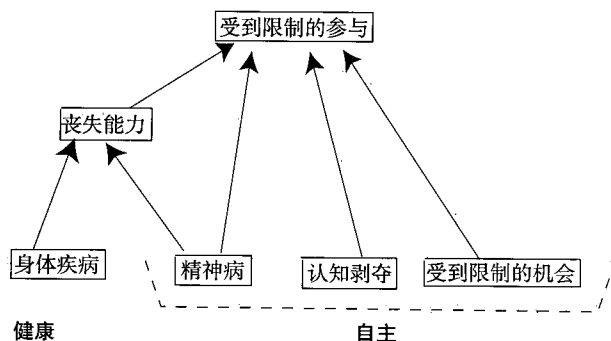


图 9.1 参与、健康和自主的关系图

从图 9.1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定义和具体操作实施健康和自主的方法是前文中曾经论证的负面方法。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一条著名的定义中，将健康的正面定义确定为“在身体、精神和社会方面完全幸福的状态”。然而，这条定义虽然得到频繁引用，但常常被人忽视。道理很简单：人们不清楚如何衡量这种正面的健康概念（卡普兰（Caplan），1981，第 1、5 部分）。我们的方法是用从负面定义和衡量身体健康：死亡、丧失能力和疾病的最小化。同样，自主也是从负面定义和衡量：精神病、认知剥夺和受到限制的机会的最小化。然而，我们认为负负得正：两者一起构成了一个全面的、具有操作性的概念，反映了 WHO 试图确定的那种客观幸福状态。

生存与残疾

我们已经看到，生存可以说是身体健康需要的底线。除非个

人是活着的,否则他们连生病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做任何别的事情。如果我们姑且不提长期昏迷这个有意思的话题,生存在实证方面的含义根本不存在多少争议。如果你有能力实施任何有意图的行为,那么你就是个活人。我们曾经论证过,个人有权利得到与他们身体能力相应的生存手段。当然,如果他们停止了生存,也就无从谈起他们受到任何形式的剥夺。死人不能被剥夺任何东西,因为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情,或者不能参与任何活动。正是这个事实使死亡成为个人最大的悲剧(内格尔(Nagel),1979,第1章)。

173 然而,如果人们的生存机会人为地受到可以改变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的限制,那么他们也是受到了剥夺。

与这种剥夺最相关的指标将是死亡率和预期寿命。预期寿命表示根据当时的死亡率,在特定人群中某个特定年龄的人将要存活的年数。例如英国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5岁;几内亚人为42岁(世界银行,1988,表1)。婴儿死亡率(每1000名婴儿当中1岁以前死亡的婴儿数)和5岁以下的死亡率(每1000名儿童当中5岁以前死亡的儿童数)是广泛衡量健康和社会条件的重要指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1987)使用后者,而不是人均GDP,作为比较各国社会进步的关键指标。我们已经看到,希克斯和斯特里顿(Hicks and Streeten, 1979)认为预期寿命也许是全面衡量基本需要满足的最好的测度。

基于死亡率的总量统计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它们没有反映出不同个体和不同群体之间生命机会的分布。一种解决方法是计算出各个国家里不同阶层和其他群体的比率。例如在今天的英国,用这种方法研究的结果显示,非技术工人的子女1岁以前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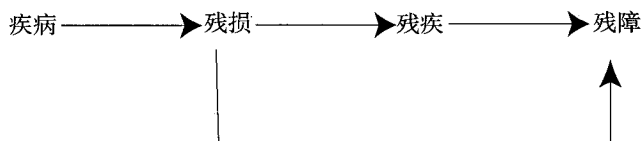
折的可能性是专业人员子女的两倍(怀特黑德(Whitehead), 1988,第229页)。另一个方法是利用各种计算死亡年龄离差的测度来计算个体生命机会的变化范围(勒格兰德(LeGrand), 1987;西尔伯(Silber),1983)。然而,所有这些计算方法都会遇到概念和统计方面的问题(卡尔一希尔,1987,第516页)。这项研究继续寻找一种有效而敏感的差别性生存机会指数,但是诸如预期寿命这样广为人知、广泛运用的指标当然不会因此而失去有效性。

然而,正如斯特里顿(1981,第363页)所指出的那样:“人生可以是痛苦、野蛮和漫长的”。身体的存活并不完全等同于健康,使用死亡率来衡量疾病—健康状况有许多问题。导致死亡的原因可能与导致疾病的生理状况和病菌不相同。结果,死亡原因方面的数据通常没有严格的可比性。最重要的是,死亡率仅仅提供了致命疾病方面的信息而遗漏了其他疾病的发病率。例如在当今的英国,在死亡率数据中癌症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而关节炎却根本没有提到,尽管关节炎是一种更为流行的使人丧失能力的疾病。因此,我们还另需一些衡量身体健康状况不佳 174 的直接测度。

因为我们强调个人充分参与生活方式的能力,衡量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衡量功能性和结构性能力的丧失,而不诉诸医学疾病范畴。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残损、残疾和残障分类》(1980)区分了这三个概念,与我们在第4章中对于类似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残损”意为“任何心理、生理或人体结构或功能的丧失或不正常”,表现为与个人的生物医学状态的某种标准相背

离(世界卫生组织,1980,第 29 页)。这些状态体现为器官层次上的混乱,可以根据受到影响的人体系统来进行分类,如智力、内脏、骨骼等。第二,“残疾”是“残损”的后果,指的是“以正常人的方式或在正常的范围内行为的能力受到限制或缺乏”。在此,关注的焦点在于适用于所有人的混合行为或综合行为,如任务、技术和行为举止。它体现了“功能性限制[残损]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种现实”(世界卫生组织,1980,第 28 页;富尔福德(Fulford),1989,第 3 部分)。第三,“残疾”限制或阻止了某人正常(取决于年龄、性别和社会和文化因素)履行职责。“残障”指的是这种“残疾”的任何社会结果(世界卫生组织,1980,第 29 页)。“残障”只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应用。

以上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残疾处于生物概念的残损和社会环境概念的残障之间。它如果可以以一种跨文化的方式得到具体研究,就可以为衡量基本需要的满足提供有益的帮助。

英国最近的一项研究标志着评估残疾方面的进步,在原则上
 175 可以应用于任何地方。这项研究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进行了修改,划分了 10 个可能出现残疾的主要领域:移动、四肢伸展、灵活性、视、听、个人照顾,克制、交际(被别人理解和理解别人)、行为举

止、智能(记忆、思维过程清晰)(英国人口普查和调查办公室(OPCS),1988a,第10页)。通过调查,从调查对象或其看护人那里逐项收集有关他们残疾的性质以及导致残疾的疾病方面的信息。运用适合于我们的理论的方法,它可以评估出残疾在这10个领域中的严重性,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全面衡量残疾的指数。然后组成一个评审团,对严重性进行裁决,评审团的成员来自专业人士、研究人员、残疾者、看护人和志愿者组织。显然,这种方法试图吸收并且协调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和基于经验的知识。

例如,有一个人患有脊椎和腿部的关节炎、心脏病,而且因为中风影响了身体的一侧,他被鉴定为6级残疾(残疾一共分为10级,从最轻微的1级到最严重的10级)。他的移动能力受到损害,需要支撑才能保持平衡,不能弯腰从地板上捡东西。他的灵活性同样受到了损害,比如他拎水壶冲水都非常吃力。但是在所有的文化中这也许并不能使一个人残障,因为在许多文化中男人通常并不干某些家务活。毫无疑问,作为一个衡量残疾的测度,这种方法适用于世界各地所有的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些方面的残疾将会削弱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效力,因为这些活动要求具备那些因残疾而减少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该项调查的结果是,英国有14.2%的成年人存在某种程度的残疾;其中6.2%为严重残疾(5~7级),2.2%为非常严重残疾(8~10级)(OPCS,1988a,表3.2)。除了缺乏资源和/或缺乏政治意愿以外,没有任何理由能够阻止这项研究在所有国家展开,使人们能够计算出残疾的相

对流行程度。^①

设计适用于儿童的残损和残疾的指标受到了人们的特别关注。这项工作要求有一种关于儿童在生理、认知和身体结构等方面“正常”发展的范围的理论。OPCS 在英国的另一项研究¹⁷⁶ (1988b)发现,英国 3.2%的儿童存在某种形式的残疾,其中 0.8%为非常严重的残疾,这个结果是根据评价成年人的方法类推出来的。这种研究也可以应用于任何和所有文化,即使不是如此,有一些替代性的关于儿童残损和残疾的指标也能够粗略地比较全世界的儿童健康状况。它们包括新生儿体重偏低、身高和体重增长缓慢、超重/超高率、小头畸形、肌肉运动协调能力差以及各种感官残损。关于这些状况,有一些零散的对比资料可供查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7,第 3 部分)。

疼痛被排除在 OPCS 研究之外,因为疼痛是一种残损,而不是一种残疾。然而剧烈或慢性疼痛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他们疾病的重要部分,减轻这种疼痛能够提高(无论以多么微不足道的方式)他们的行为能力和与其他人互动的能力。在此,再一次出现了令人

① 有些残疾者组织反对这些定义和分类,认为它们使残疾的性质具体化、个性化和医学化(奥利弗(Oliver),1990,第 1 章)。首先,“正常”这个概念是世界卫生组织定义残疾的核心,它忽视了亚文化、性别、种族和其他因素对所谓正常行为的影响。其次,他们认为社会环境是理所当然,因而忽视了自然和社会特征对残疾造成的影响。第三,顺着这一点,他们单纯根据生物病理学来解释残疾。第二种和第三种批评观点作为一种对于许多以往研究和实践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它们未必包含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中。相反,残障是一个社会概念,它为确定和纠正政策和实践限制残疾者社会参与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不用说,如果不积极动员残疾者和其他群体,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很有可能不会发生)。然而,第一种批评观点仅仅反映了相对主义有关任何共同人类需要概念的观点,出于前文已经提出的理由而被我们否定。

尴尬的概念和实践问题,因为众所周知,不同文化以及各种文化中不同的个人对于疼痛的理解是不相同的。不过,一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在任何文化中疼痛就是疼痛。持续的疼痛,如果是现有技术可以预防的,就如同可以预防的死亡或残疾一样,对于所有的人都构成了严重的伤害。^①

身 体 疾 病

这种残疾的测量方法对于描绘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流行程度非常有价值。但是解释和理解这些发现,需要关于身体健康和精神病的理论。至于身体健康,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证明生物医学模式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分类和解释框架。

这个框架包含了一个关于身体健康的负面定义,“广泛”而详细地说明了多种疾病,而不是一个健康状态不佳本身的“精深”定义(巴斯菲尔德(Busfield),1986,第35页)。恰恰是因为其技术功效,生物医学模式当前主宰了《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CD),这个概念系统是国际通用的确定人类疾病模式的系统。因此,所有提供国家或国际死亡率和发病率信息的统计数据都采用了生物医学模¹⁷⁷式的疾病分类标准(例如 OPCS,1986;WHO,1988)。实际上,许多人正是利用这些数据来试图解释该模式在关于预防和治疗

① 有些人(参看威廉姆斯(Williams),1985)试图把“痛苦”(概念比疼痛更加广泛)和残疾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全面衡量“生活质量”的测度。如果全面操作受到损害的参与能力,那么这个测度会非常诱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说当前所做出的努力已经解决了痛苦经历的文化差异问题。

论中的失败。

因此,在原则上,残疾在医学方面的原因如表 9.1 所示。在当今的英国,最严重的残疾是由肌肉骨骼疾病、眼睛和耳朵方面的疾病引起的,另外还有神经系统的疾病,尤其是中风。在贫困国家中,导致残疾的主要病因可能不同,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所有的国家都适用。

表 9.1 导致残疾的疾病频率(英国)

	%
传染	1
肿瘤	2
内分泌和代谢	2
血液	1
精神	13
神经系统	13
眼睛	22
耳朵	38
循环	20
呼吸	13
消化	6
生殖—泌尿	3
皮肤	1
肌肉—骨骼	45
先天性	0
其他/不明	6

注:

1. 对 10 000 名生活在私人住宅的成年人的调查(也就是不包括那些生活在公共设施中的人,如养老院和医院)。

2. 百分数的和超过 100,因为有些人患有多种疾病。

3. 诊断术语基于 ICD 对疾病的分类,根据调查对象对疾病的描述。

资料来源:OPCS(1988a)表 4.3。

确定身体疾病流行程度的理想方法是对相关人群随机抽样进行医学诊断/检查,以查明疾病的存在状况,调查过程中,既不受调查对象主观定义的影响而又利用他们独特的经验知识。这种医学调查很少见,尽管在一些西方国家越来越常见(布拉克斯特(Blaxter),1986;卡特赖特(Cartwright),1983)。在没有这种理想方法的情况下,必须求助于另外两个数据资源。第一,使用正式医疗服务的行政记录。这种记录可以包括入院和出院记录,以及病人在社区与初级健康服务提供者接触的记录。第二,发病率数据资源,包括不太严格的实地调查、小规模流行病学研究和家庭普查中个人报告健康状况的问卷。

以上这些各有不足之处。前者受到提供水平、对服务的获得产生影响的货币或非货币因素以及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者易于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面临着其他困扰主观健康评估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把主观评估这种决定性的衡量不健康的方法排除在外,但是这样并不意味着在结合其他指标时自我感觉毫不相干。在英国,人们核对了医生的记录和其他临床诊断结论,结果发现外行的自述与之非常吻合(怀特黑德(Whitehead),1988,第224页)。

尽管我们认为生物医学模式提供了一种用以比较疾病流行程度的跨文化衡量标准,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估算不同类型疾病的病例数量仍然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

图9.2再现了这样一项宏伟的工程。这项工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热带疾病研究和培训的特殊项目》针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种疾病的流行状况,估算了各种具体原因所导致的死亡率。尽管该图中的两个部分没有严格的可比性,但它显示

了腹泻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在生存和疾病问题上的重要性,而且表明了死亡率和发病率数据所提供的疾病模式差异。身体残疾的一般类型与这些疾病的严重表现形影相随,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自主与精神病

我们已经看到,成功的社会参与的必要条件不仅仅是身体没病。首先,表 9.1 清楚地显示了精神病(包括老年性痴呆、抑郁症和恐怖症)是当今英国导致残疾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在第 4 章中曾经主张,关于理性的缺失,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没有文化差异的精神病概念。然而,进一步运用这个概念还要求我们回到第 4 章提出的一些问题上去(巴斯菲尔德,1986,第 2 章)。

大多数精神病的病原不明或者存在争议,这个事实意味着诊断精神病通常是根据综合症状和病人的个人和社会背景的详细情况,而不是根据身体检查。因此,诊断结果的一致性比身体疾病更容易引起争议。另外,尽管我们以前在这个问题上颇为乐观,但是有迹象表明,精神病的体验和症状在不同文化中存在差异,即使所有文化的医疗行业使用完全相同的精神病模式。例如,许多研究发现抑郁症的症状在不同文化中存在差异。西方“自我中心”文化中常见的抑郁症的某些症状,如负罪感和自杀的念头,在非西方“社会中心”文化中很少见,甚至根本不存在。与此同时,他们则表现出频发的某些身体上的症状(马萨拉(Marsalla),1985,第 303 页;贝瑟(Beiser),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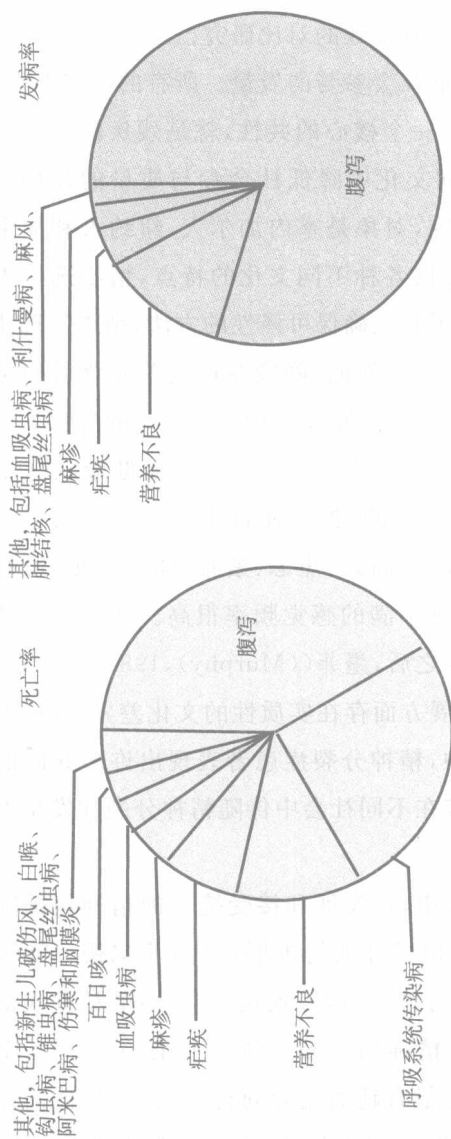


图 9.2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 (1977~1978) 主要传染疾病和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比例图

注:

* 发病率没有包括呼吸系统疾病, 因为不存在可靠的估算数据。

** 本图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热带疾病研究和培训特殊项目》所提供的估算数据, 并且根据已经出版的对定义明确的人群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进行了证实和修改 (沃尔什和沃伦, 1979, 表 1)。

资料来源: 开放大学 (1985), 图 3.3, 第 19 页。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认真细致的对比研究已经表明,在所有的文化中,严重的精神病降低社会参与的质量。所有的研究都发现,在多样的症状背后隐藏着一个核心的共性,就是残疾的症状。正是它揭示了精神病在不同文化中降低社会参与质量的作用。例如,曾经有一项抑郁症研究,对象是塞内加尔人、纽约人和加拿大的东南亚难民。研究者根据各种不同文化的特点,精心选择表达抑郁的词汇,同时还使用了其他确保可译性的方法,结果发现研究对象在症状上存在重大差异。然而,隐藏在这些差异背后的是许多共同的体验,包括绝望、优柔寡断和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身体上的症状包括心悸、头昏眼花、呼吸困难以及长期健康状况不佳

181 (贝瑟,1985)。世界卫生组织的《抑郁症合作研究项目》(1983b)发现,在五个国家中,悲哀、不高兴、焦虑、紧张、体力不足、没有兴趣、难以集中精力以及各种不满的感觉频率很高。在总结了精神分裂症的各种跨文化研究之后,墨菲((Murphy),1982,第4章)断言,尽管在症状和病情发展方面存在实质性的文化差异,在所有我们已经掌握资料的社会中,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我们可以有效地比较在不同社会中伴随精神分裂症发生的残疾的发生率。

的确,在过去的40年中,在发展和接受统一的精神病国际分类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巴斯菲尔德,1986,第22页)。最为主要的两个方案是《国际疾病分类》中的精神病部分和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II)。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很有趣的差异尚待解决,但是他们在精神病跨文化诊断的可操作性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贝瑟,

1985,第289~290页)。运用这些诊断的分类,我们可以比较各国和各群体自主受到损害的情况。

话虽如此,但是在实践中,利用行政数据和调查数据描绘精神病的跨文化流行程度还是要比描述身体疾病难得多。^①未来的指标需要各种资源来弥补这些缺陷(沃尔(Warr),1987,第3章)。但是这只是说在现有的可以普遍推广的测量基础之上,这些缺陷原则上可以弥补。

学习与认知技术

现在让我们看看个人自主的第二个要素——学习和认知技术。在本书第4章中,我们已经证明,个人理解自身以及理解自己的文化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于特定文化的知识和规则的认识,以及他们对此作出合乎逻辑的推论的能力。所有文化都有许多共同的基本技术,包括语言和基本的社会交往技巧——那些参与我们在第5章中介绍的“本质性活动”所必须的技术。皮亚格特(Piaget)的研究成果虽然遭到了不少批评,但是也确实给我们提¹⁸²供了证据,说明普遍存在某些认知发展阶段,至少在两岁以前,婴儿通常必须经过这些阶段。皮亚格特则一直强调在这个阶段中生物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皮亚格特,1952;达森(Dasen),1977)。

① 几乎所有常用的跨文化指标都有缺陷并且/或者不可靠,无论它们是精神病医院的数据、医务人员的诊断记录,还是假设的替代指标,如自杀率。墨菲(1982)介绍了一项精心的精神病比较发病率的调查,请参看。但是这项调查的结论是即使在现有的数据基础上也可以得出一些可靠的结论。

个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让世界变得井然有序,掌握语言(关于这一点,后面会谈到的更多内容),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认知技术。

然而,除了这些共同的要素以外,不同文化所要求的能力相去甚远。我们再一次又面临着许多操作的困难。显然,思考新事物应付新事物的能力必须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对于特定个人的实际要求。在仅仅能够维持生存的经济中,操作计算机的能力对于人的基本自主能力没有意义,而农业技术在后工业化社会中同样无关紧要。只有个人的学习方式与这些特定要求相符,才会要么有助于他的自主,要么妨碍他的自主;才会有是否使他残疾的问题。

那么首先,衡量学习必须有文化差异,但又是“客观的”。换言之,在所有的文化中,公认的核心能力,是那些使其成员能够理解和解释该文化规则的能力——具有成功参与该文化的潜能,既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又能增强自尊。例如,英国年轻人当中缺乏现有就业岗位所必备的语言、数学和科学等技术的比例在原则上可以计算出来,而且可以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较(普雷斯和瓦格纳(Prais and Wagner),1985;芬戈尔德和索斯凯斯(Finegold and Soskice),1988)。在工业化世界中,正式教育所达到的水平——根据教育发展的国际标准分类(ISCED)的数据——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个有效的可比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197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1986,第2章)。但其他社会环境不适用这种指标,需要不同的指标。

然而,在这些对比差异的背后,隐藏着所有或大部分社会都共

有的某些技术。让我们回到语言问题上。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有一个共识,自我认知和智力提高的潜力与运用语言的流利程度息息相关。世界并不是事先用概念包装好,然后自己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秩序和认识必须通过语言媒介强加于人。由于这个原因,某人语言的丰富程度受到了他所处的世界的广度和多样性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到这个世界,还影响到他们在这个世界里能不能成功地做事(多亚尔和哈里斯(Doyal and Harris),1986,第4~6章;弗赖尔(Freire),1985,第2章)。自主的认知范围的扩大是与语言水平相关的。^①

在运用书面语言而不仅仅是口头语言的社会中,这个过程的关键因素就是读写能力——比如说,阅读官方文字和写信提意见的能力(库姆斯(Coombs),1985,第52~57页;卡尔—希尔,1986,第300页)。因此,在文字社会中,阻碍人们识字不仅人为地通过抑制人们的意志力和想象力限制了他们的自主能力,而且割断了他们与本族文化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历史、文学、技术)之间的联系,还把他们排除在当今政治社会生活之外。低估文盲者的自主能力当然是一个愚蠢的行为。这些人或许在文化多样性和技艺方面具有超凡的创造性,而且在家庭和同伴当中有很高的威望。读写能力可以拓宽意识,提

① 霍夫曼(Hoffman)雄辩地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

剥夺语言能力足以招致暴力,因为它几乎相当于剥夺一个人的自我。失明的愤怒,无助的愤怒是一种无言的愤怒——把人吞噬在黑暗之中。如果一个人终身不能说话,生活在无法表达自我的状态中,那么这个状态本身肯定使人狂怒,使人心灰意冷……如果所有疗法都是语言疗法,通过交谈的方式进行,那么也许所有的精神病都是一种语言疾病(霍夫曼,1989,第124页)。

高智力水平,在原则上能够加强他们的自主能力,这个观点并不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正因为如此,许多文盲者努力学习掌握这种技术,通常还是在非常坚苦的条件下。对于当今绝大多数的文化,读写能力指标都是自主能力的跨文化指数的关键因素。最新的统计表明,有将近 9 亿成年人被剥夺了这种最基本的能力,其中大多数是妇女(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UNDP,1990,第 27 页)。

世界经济的国际化也要求具备许多其他共同的技术,如基本的数学、物理和生物知识。尽管它们不能被看做是不受文化影响的人类知识的特点,但是它们在现代世界的必要性决定了它们应当被用作教育指标来衡量人们在这些领域中的能力。尽管存在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参看斯皮里特(Spearitt),1990),教育研究者们

184 正在研究这些技术的跨文化测度。例如,根据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在 13 岁的孩子当中,能够计算完全相同的中等程度的数学问题的比例,韩国为 40%,英国为 18%,美国为 9%(IAEP,1988,第 17 页;参考 IAEEA,1988)。换言之,全球经济的扩张正在均化某些智力技能的需求,使自主的这个要素的差距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小。然而,这些技术是新近强加给各种文化的,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都有许多有助于提高个人自主的特殊技术,而且种类繁多,彼此之间千差万别。一套理想的指标应该不仅能捕捉到共性,也能捕捉到差异。

在所有这些方法中,自主的认知要素都包括了参与具有文化重要性的活动所必需的智力和体力技术。纳罗尔(Naroll,1983,第 136 页)认为,它要求一种积极的态度,尊重自己而且尊重别人:

要想获得而且保持尊重,一个人必须技术娴熟、尽职尽责地履行本文化所赋予自己的社会职责。知道这些职责并且能够很好地履行这些职责的人——那些了解并且充分履行社会责任的人——中国人称之为有“仁”,意第绪语中称之为“高洁之士”(mensch),真正的人。一个高洁之士,一个有“仁”之人深受家人、朋友和邻居的尊敬,也因此得到了自尊。

被剥夺了这种自尊所必需的认知能力,就是丧失了最根本的能力,受到了严重伤害,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住在哪里。

社会职责与参与机会

因此,个人的身份——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别人如何看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有规律的、反复行为的反应。我们已经说明,人的自主性也包括参与某种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的机会。剥夺一个人成功的社会参与潜力就是剥夺他的人性。某人也许在身体和精神上非常健康,而且具备了与文化相关的知识,但是由于没有机会而无法实现这些能力。从定义上说,囚犯的自主受到了限制,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多么健康,多么具有创造性。履行社会职责是人的自主的普遍特征,尽管关于如何确定、分配职责不同文化的期待值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第5章中,我们明确了四个社会前提条件,与之相关的职责对于所有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群体都是相同的,从而对于所有文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既然人人都有与这四个社会过程相关的职责,那么成功参

与其中的机会正是我们跨文化研究自主的这个方面的重要因素。

自主受到的威胁可以来自两个方面：职责剥夺和职责压力（马萨拉等，1985，第 312 页）。前者指的是把人排除在任何有社会意义的活动以外，特别是排除在所有四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职责以外。后者指的是由于不同职责之间无法控制的冲突，成功履行其中任何职责的机会都受到了威胁。下面让我们通过两个个案研究，失业和妇女的“双重负担”，来说明社会参与受到的威胁。

在所有社会中，最重要的活动形式也许就是**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人们把自己的一部分转化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或维护的服务，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帮助别人生产或维护。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既可以是体力劳动，也可以是脑力劳动，而且有两种形式：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有偿劳动在大多数社会中对于个人自主特别重要，因为劳动所得的收入使劳动者直接得到其他的中间需要。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1961，第 80 页），有偿就业是我们和现实之间最重要的纽带。此外，巴林顿（Barrington）曾经强有力地证明，主动参与本社会的全面劳动分工是评价自我价值的重要因素。

参与与社会生产相关的活动的机会十分重要，由失业导致的精神健康问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 世纪 80 年代，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精神健康问题的严重性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最新的一项跨行业调查表

¹⁸⁶ 明，西方发达国家自 1960 年以来，失业和心理健康问题恶化之间

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项调查采用了13个不同的心理测试指标,包括感情、压力、消极自尊、焦虑、抑郁情绪、心理痛苦、神经错乱和自杀(沃尔,1987,第11章;参考史密斯(Smith),1987)。

研究提供的证据还清楚地说明了强制性失业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贾霍达(Jahoda,1982,第59页)总结了有偿就业的种种好处:除了收入以外,还有“强制接受的时间安排、社会经历范围扩大到家庭生活以外的感情因素较为淡漠的领域、参与集体目标或工作、与地位和身份相符的任务、有规律的活动”。虽然有些工作会对感情和认知能力产生消极影响(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讨论这个问题),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成果表明,被排除在这种形式的社会参与以外对于各种自我认知危害极大。

建立参与就业的机会或障碍的跨文化指标非常困难。失业或经济参与率方面的比较数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在那些正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国家(戈弗雷(Godfrey),1986,第1章)。尽管国际劳工组织(ILO)定期发布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他们忽略了广泛参与的非正式劳动力市场,还有维持生计的农业。同样,我们缺乏可靠的指标反映与再生产活动相关的状况以及不同群体选择不选择这种社会职责的自由。然而,考虑到我们确实拥有的信息,和我们对于这些不足之处的认识,建立这些指标还是有可能的。

成功参与受到的第二种威胁是职责压力——两种或者更多社会职责的要求之间无法控制的冲突,妨碍其中任何一种职责的成功参与。这个威胁最重要的实例无疑就是妇女面临的双重负担,

她们既要承担生产劳动,还要承担与生殖相关的劳动。在第5章中,我们指出生殖劳动是成功的基本需要满足所必需的普遍性的社会前提条件,在大多数社会中,儿童的呵护和社会化不言而喻是一项崇高的社会责任。然而在实践当中,这项责任在功能上的必要性和道德价值常常与其无偿劳动的地位以及与更被人们看重的有偿劳动发生冲突。在整个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中,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妇女承担着双重责任和负担,既承担着无偿的家庭劳动,又参与有偿就业。越来越多的关于家庭劳动的研究表明,生殖和生产劳动所导致的紧张状态是诱发西方妇女高度焦虑、抑郁以及超负荷工作的因素,而且还因此进一步损害了她们成功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沃尔,1987,第230~231页)。

对于许多人而言,参与另外两个社会前提条件——文化传播、构建和执行社会规则——构成了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这同样需要以一种跨文化的有效方式加以描述。也许反映这种参与机会唯一最好的指标就是,他们在满足了个人和家庭需要(睡觉、吃饭、个人卫生、家务劳动)以及契约活动(工作或学习)之后,拥有的“自由时间”的数量。时间量反映出这种参与潜力的巨大差异,尤其是取决于性别、家庭规模和职业(OECD,1986,第4章;西格和奥尔森(Seager and Olson),1986, #13)。全世界许多弱势群体都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选择,要么没有工作,要么超长时间地工作,两者都制约了这些更加广泛的参与形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间量的研究清晰直观地表明了妇女由于双重负担在更加广泛的社会参

与方面所面临的种种障碍。

批判性自主

提到个人对于其生活方式中文化和政治规则的直接或间接控制权问题时,我们面临着诸多更加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不同群体追求其生活目标所需要的自由、自主以及积极和消极自由。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任何社会群体进行有效参与的普遍性条件。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何实施那些更进一步的参与过程,使人们能够适应并且挑战特定的规则,无论他们是出生于这些规则之中,还是出于任何原因置身其中。批判性自主包含了对比文化规则的能力,反省本族文化规则的能力,与其他人一起合力改变规则的能力,以及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努力都宣告失败投奔另一种文化的能力。现在,让我们仅以教育条件为例来研究批判性自主。其他方面留待第11章中讨论。

188

身体健康不仅仅意味着生存,同样的道理,个人自主的认知因素不仅仅是各种文化独特的技术,甚至也不仅仅是读写能力和其他与基本活动相关的技术。它必须包括教授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并且提供一个可以公开讨论和辩论这些问题的论坛。但是怎么才能操作和衡量批判性自主的教育因素这种开放性的问题呢?我们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是获取其他文化的规则和知识的机会。标准的国际性语言知识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当今世界上大约有4 000种不同的语言,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只使用以下五种语言中的一种:英语、汉语、印地语、西班牙语和俄语(克

里斯特尔(Crystal),1987,第286~289页)。第二是利用这种教育的动机和认识,这种教育指的是设置合适的课程,使人们能够探索其他文化,弄清楚其中的含义。认为任何文化中的人们都不需要了解其他文化的文学经典或当今的科技词汇的观点,完全是陷入了破坏性巨大的教条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淖。但这样仍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传统文化中许多没有受过教育的家庭成员作出巨大个人牺牲,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这种解放认知潜能的机会。对于教育实践来说,实现这种潜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讨论这个问题。

总之,学习在增强自主方面发挥着双重作用。首先,它提供(或更准确地说,可能提供)语言和实用技术,以及使个人能够成功参与本族文化的适当的知识。其次,它可以开始把个人从本族文化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并且为他们提供了根据对比地球上其他文明的知识来评价自己所属的文化的概念资源。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才能被认为是选择了支配自己的环境,即使他们可能仍然没有机会离开这个环境。因此,高层次的学习可以摆脱受到单一文化传统蒙蔽的自主,追求批判性、解放性的自主,满足马斯洛提出的自我实现的“最高”需要。

189 这种自主解放的前景与许多文化习惯的压抑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表明它与我们称之为内在和批判性的自主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

成功参与可能要求个人接受无法接受的事实:履行破坏批判性自主的职责,即使这些职责在特定文化中有助于参与。例如,在非洲和中东的某些群体中,女性的割礼和其他一些有害于女性身

体和精神健康的习俗。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当今的电视节目消耗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内容荒诞无稽,对自我解放和提高批判性自主构成了巨大的障碍。鲍德里拉德(Baudrillard)认为,电视文化反映的不再是所指(signified),而是符号(sign)。传媒和大众相互模仿,形成了一个“超现实”的怪圈,脱离了意义的任何终极目标(鲍德里拉德,1983,第98~99页)。莱斯(Leiss)认为,在这些情况下:“过去的需要分类消失了,分崩离析的状况导致人们不断重组新的模式……满足感和幸福感越来越模糊不清,令人困惑不解”(莱斯,1976,第88~89页)。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来驳斥以上观点:通过废除文化特征的某些旧的形式,大众传媒推动了更具普遍性的特征的出现,这些特征具有交流性和合理性,我们在第7章中曾经讨论过哈贝马斯的这种设想。然而,这些论点必须权衡意义和语言的贬值给个人带来的危险(拉希和厄里(Lash and Urry),1987,第288~292页及第296~300页)。为了避免种族中心主义的教条,灵敏的批判性自主的测度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而要考虑到这些因素,这种测度就要找到所有文化中认知和情感参与的潜在模式,和阻碍个人参与的人为限制。

我们已经阐述过,个人拥有身体健康和自主方面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可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可操作化。表9.2综合了我们提出的关于身体健康和自主的跨文化指标的建议。除了预期寿命以外,所有这些都是负数。也就是说,它们衡量的都是健康和自主的实证成分短缺的程度。当然,有几个指标即使是富裕国家也没有, 190

表 9.2 我们建议的基本需要满足指标

基本需要成分	建议指标
身体健康	
生存机会	α 各年龄段的预期寿命(包括分解测度和分布测度) α 按年龄段划分的死亡率,特别是婴儿和 5 岁以内儿童死亡率
身体非健康状况	β 残疾者的比例(按照严重程度) β 儿童患有发展性残损的比例(按照严重程度) β 身体感到严重疼痛者的比例 β 各种疾病类型的发病率
自主	
神经错乱	β 严重精神病、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病患者的比例
认知剥夺	χ 缺乏相关文化知识 α 文盲 β 缺乏获得数学、科学知识和其他普遍性基本技术的机会 β 没有世界性语言技能
经济活动机会	β 失业和其他衡量排除在重要社会职责以外的测度 β 完成生产和生殖活动之后,缺乏“自由时间”

注:

α 有理由信赖的普遍性或接近普遍性数据。

β 仅为少数几个国家的数据,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有明显的可操作化观念。

χ 更具猜测性的建议。

更不用说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衡量自主的指标。然而,如果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关于这些指标的研究都应该遵循的大致方向。

第 10 章 中间需要

在第 8 章中,我们介绍了“普遍性满足物特点”的概念:即根据现有的最权威的认识,在所有文化中,“输入”对个人健康和自主的“输出”产生积极作用。我们确定了十一个这样的特点,并称之为“中间需要”。在本章中,我们将逐一详细这些特点,同时做好以下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做的那样,利用科学的证据证明选取这些特点的合理性,这些证据把特定普遍性满足物特点与身体健康或自主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通常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营养虽然是一个“身体健康满足物”,但是如果严重缺乏,也会影响认知和情感的发展。第二,我们将要为每一个中间需要确定跨文化指标,或者在没有指标或没有令人满意的指标的情况下,提出一些建议性的替代指标。

为了避免生病,人们必须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能够获得各种产品和服务,数量充足,质量有保障。换句话说,每个个人维持身体健康的必要条件就是各种协调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输入。每一个相关的中间需要都有一个物质基础,可以在生物医学认识领域得以确定。我们把这些中级需要归纳为以下五种类型:

1. 满意的营养食物和洁净的水

2. 满意的具有保护功能的住房
3. 无害的工作环境
4. 无害的自然环境
5. 适当的保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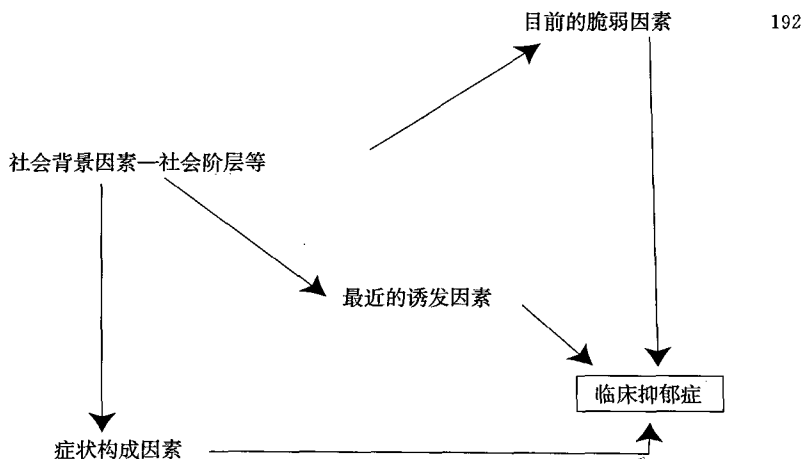


图 10.1 抑郁症的社会因素

资料来源：布朗和哈里斯(1978a)第 48 页。

我们能不能用类似的方法区分中间自主需要？关于自主的情感因素，我们将从布朗和哈里斯(1978a)关于女性抑郁症的社会根源的重要研究入手。他们运用十分复杂的系统方法，证明抑郁症及其导致的丧失自主能力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对于逆境的反映”。在区分这种逆境的各种社会成分的时候，他们采用了图 10.1 所示的模式。最近的诱发因素是抑郁症发作的充分条件，如离婚、孩子离开家庭或者某种其他特殊的被视为长期性的个人困难。目前自

身的弱势因素是抑郁症严重恶化的必要条件,如失业、失去一个亲密而且可以信赖的亲友或者早年丧母。还有其他“社会背景因素”使某些群体预先具有抑郁症的倾向,从而使他们对诱发因素和自身的弱势因素更加敏感。例如,工人阶级女性比中产阶级女性患
 193 抑郁症的比例高得多。最后,症状构成因素影响到抑郁症的严重性。它们包括失去重要亲友、在什么年龄失去这些亲友以及以往抑郁症发作的次数和程度。

在不同的文化里,该模式中各种变量的精确度存在差异,例如特定家庭成员在情感方面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但并不足以让人质疑其在不同文化中的普遍适用性。^①

当然,我们明白布朗和哈里斯的研究仅限于女性。然而,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寻求男人和女人共同的需要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模式中吸取四个有损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情感受到剥夺的童年、重要亲友的缺乏或丧失、不安全感和经济剥夺。这些反过来又暗示我们,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四种有助于提高情感自主的中间需要:

6. 童年期的安全

7. 重要的初级关系

8. 人身安全

9. 经济安全

① 吉尔伯特(1984,第176~183页)对布朗和哈里斯作了有益的总结。他们受到的两个批评是:坦南特和贝宾顿(1978)、戴维斯和罗奇(1980)。布朗和哈里斯对前者作出了答复(1978b)。

我们必须在这个名单上再加上“适当的教育”，作为一个提高自主的认知成分的条件。至于决定能否扮演有价值的社会角色（自主的第三个方面）的社会因素，我们暂且不谈，留待下一章讨论。

最后，人类中间存在某些生物性差异，所有具有那些共同特征的人有着一些特殊的中间需要。尽管在过去的数千年中巨大的社会分化使性别差异更加明显，但性别差异仍然是男女之间最重要的差异。对于我们的理论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女性的生育能力使她们（只有她们）有了另一种类型的中间需要：安全节育和安全生育的需要。

现在让我们逐一考虑这些中间需要。

食 物 和 水

194

为了维持人体的各项功能，必须摄取一定的能量，最低限度的能量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础代谢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计算，人体的“临界”能量需要是基础代谢率的 120%。这个水平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年龄、性别、平均体重、环境温度、体力活动水平和其他因素（如怀孕和哺乳）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一位体重 65 公斤、年龄在 20 到 39 岁之间的男子，他的临界能量需要大约是每天 1 800 卡路里；而对于一位体重 55 公斤的女子，她的临界能量需要为每天 1 500 卡。然而，这只是维持人体功能的绝对最低数量。根据粮农组织的估算，一个“适度活动”的人的能量“需要”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男人为每天 3 000 卡，女人为每天 2 200

卡。关于维持身体健康、避免因营养不足致病所需要的卡路里,这些是最权威的数字(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1973;卡特勒,1984,第1121页及以后)。当然,为了保证身体发育和健康,我们还需要特定数量的其他营养成分,如蛋白质、维生素和碘。

如果某人的摄入一直低于这个水平,那么长期的营养不足就会损害身体健康,降低人体对其他各种疾病的免疫力,导致虚弱无力,需要剥夺的状况不断恶化,并且对此越来越无能为力。卡路里不足与营养不良、婴儿出生体重不足及两岁儿童消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此外,缺乏某些营养成分与某些特定的疾病有关系:例如,缺乏维生素A与最终导致失明的眼球干燥症有关;碘缺乏与智力迟钝、听力和语言缺陷、痉挛及许多其他障碍有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7,第121页)。即使在发达国家,营养不良也是一个问题,大多数人虽然食物充足,但是他们消费的食物以很多不同的方式违背了自身的健康需要(克拉特巴克和兰,1982)。

应用最为广泛的营养满足度指标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的每日人均卡路里供应量占需要量的百分比。这个指标显示,在第三世界的某些国家需要普遍得不到满足。例如,粮农组织第四次世界食物调查(1977)发现,印度17%的人口低于上文中定义的绝对最低标准的“临界”能量摄入量(卡特勒,1984,第1129页)。如果
195 我们根据低于平均卡路里需要量的人数来看,营养剥夺的范围就更加广泛了。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平均每日卡路里供应量仅为需要量的91%(世界银行,1985,表24)。然而这些数字还非常不准确:他们只是计算了食物供应量,估算了饲养牲畜和食物加工和流通过程中消耗,没有考虑

到烹饪过程中的消耗,也没有考虑一个国家各阶层和其他群体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分配不均的问题。此外,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卡路里需要量的估算数字本身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了许多批评。例如,森(1984,第 351 页)在一份有益的调查报告中提出,把这些数据和身体特征(如体重)联系起来的做法,存在着循环论证的危险,可能导致低估女性相对营养不良的问题。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明智的做法是利用更加直接的、衡量食物不均等的实际后果的指标来支持食物摄入指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对身体消瘦和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所占比例的估计,是以体重/身高之比异常偏低为指标的。结果表明在许多最贫困的国家中 5 岁以下儿童患严重营养不良的比例超过十分之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7,表 2)。^① 如果要反映其他营养成分摄入不足问题以及富裕国家的营养不良状况,我们还需要更为敏感的指标。

充沛的安全用水是一个补充性的需要。干旱总是和现代的一些饥荒相伴发生,它带来的极度干渴和脱水比饥饿破坏性更大,能更快地致人于死地。然而,即使在水量充足的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水未必安全,未必人人能够得到。许多传染病就是由水携带的,而且由于缺乏干净的水而得以传播。例如,据估计,1975 年腹泻类疾病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在 500 万到

① 一些跨国统计数据研究发现,一旦在回归中加入人均收入,卡路里满足度和生存机会测度(例如婴儿死亡率)之间的关联就会比较微弱(坎普尔,1984,第 52~62 页)。然而,这可能反映了上文指出的衡量问题以及该营养不足测度未能反映的营养不良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显然,营养和健康的关系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牵涉到一些其他因素,如身材和(可能还有)遗传选择以及一些我们提到的其他中间需要。

1 800万之间。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世界上80%的疾病都归咎于受到污染的水。这些疾病尤其伤害儿童,是造成较高的儿童死亡率的罪魁祸首。这不仅是受影响的人大量染病,而且还突出了千百万女性的困境,她们必须日复一日地为家里取水。她们
196 就这样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通常是疾病缠身,虚弱乏力,而这些疾病正是感染自她们所取的水(阿加瓦尔,1981,第29~32页)。

在谈论对水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水的纯度固然重要,但是首要的还是水的数量。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研究提出,每人每天21升水是一个必要的目标,如果考虑到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平均每人每天需要112升(斯图尔特,1985,第124页)。世界卫生组织以相关的方式估算了能够得到足够的、安全的饮用水的人数(参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7,表3)。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更加敏感的指标,反映全世界的供水中的铅、汞、硝酸盐和其他污染物的含量。

住 房

下一个中间需要是满意的住房,如果想要避免生病,这个需要就必须得到满足。从表面上看,这里满意的含义比食物更具文化相对性。人们可以认为,鉴于“住处”的巨大的社会差异——不用说其气候条件方面的差异——任何寻求满意度的共同标准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有些人认为,贫民窟的概念渗透着“北方的”价值观(德拉卡基斯—史密斯,1979);其他人则认为,西方标准控制了满足第三世界住房需要的非常不合适的政策(特纳,1972)。

联合国(1977,第 3 页)曾经宣称,住房标准应该根据各国自身的气候、经济、技术和社会环境。所有对以上这些观点所反映出来的担心是有根据的。然而他们是否也否定了人们对住房的某些普遍性需要的认可呢?我们认为,有三个与住房相关的满足物特征,如果得不到满足,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不利于身体和精神健康。

首先,住处必须提供适当的保护,使人避免遭受日晒雨淋,蚊虫叮咬,避开自然灾害和携带疾病的媒介的侵扰。住所应该能够经受得住风吹雨打,能够提供满意的卫生设施,在寒冷的季节里还能够御寒保暖。住房不足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无家可归。世界各地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睡在人行道上,睡在桥洞里,或者睡在别的露天场所,他们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利益,在健康和自主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次,我们在上文中讨论了供水问题,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卫生设施差或者根本没有卫生设施,导致了供水受到细菌污染。在不发达地区,血吸虫病是一种最消耗人精力的寄生虫疾病,这种病就是由感染者的尿液引起的,尿液污染了水源,然后未感染者用被污染的水洗漱,或者在水中游泳。全世界有两亿以上的人深受其害。疾病还可以通过人的粪便直接传播。携带病菌的粪便如果未经处理,就会给苍蝇提供一个繁殖的温床,苍蝇可以携带病菌,把这些致命的病菌直接带到食物上,或者带到人的眼睛里,使人患上沙眼。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患有这种眼疾,它通常可以导致部分或完全失明(开放大学,1985,第 3、4 章)。

第三,过度拥挤的住处也会损害居住者的健康。过度拥挤会造成过多的社交需要、缺乏私人空间,危害身体和心理健康,使人

身心疲惫。当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过度拥挤与贫困、种族歧视和其他独立影响健康的因素有关。然而,即使把这些其他影响考虑在内,狭窄的住房本身的影响仍然非常强烈。来自不同社会的大量证据表明,过度拥挤容易导致多种疾病,其中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儿童身体和认知能力发育缓慢、成年人的精神压力和抑郁症——所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身体疾病,损害自主(缪里,1983,第1章;道格拉斯,1983,第171~173页)。^①

根据《布伦特兰报告》(1987,第250页),由于以下这些原因,第三世界的许多住房都不够完善:

198 低收入住房一般都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没有完善的或者根本没有基础设施和服务——包括自来水、下水道或其他卫生处理人体排泄物的方式。第二,人们生活在拥挤狭窄的环境中,容易流行各种传染病,尤其是在营养不良,人体免疫力降低的时候。第三,穷人通常只能把房子建造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上:容易被洪水淹没的平地、满地灰尘的荒地、容易发生滑坡的山体,或者临近工业污染的地方(哈迪曼和米奇利,1982,第8章;琼斯,1990,第4章)。

例如,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市郊,许多人生活在简陋的棚屋里,

① 还有一个因素:住房也许安全、温暖而且宽敞,但是非常不方便,居住者不能利用或消费其他人类需要的满足物(例如去当地的市场)。这一点说明了第8章中讨论的各种中间需要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由于其后果应该在其他地方显现,我们就不单独提出监控住房条件这个方面的指标。

高高的脚柱支撑着简陋的小屋，屋子之间以湿滑的木板相连，下面便是城市污水形成的沼泽，一步稍有不慎就可能夺取一个孩子的性命（《经济学家》，1983 年 4 月 30 日）。这种条件显然没有满足我们的普遍性满足物特征，然而量化住房需要的社会指标寥寥无几。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数字表明，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居民（85% 在农村地区，1980 年）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7，第 114 页）。联合国收集的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统计并不十分可靠，而且已经过时，这个数据是有关过度拥挤的唯一具有可比性的全球信息来源（联合国，1987，表 4.5；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UNDP，1990，表 17）。其他合适的跨文化住房需要指标几乎不存在。

富裕国家的情况则不同。尽管在工业化国家里有些住房仍然比较低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无论是空间还是舒适便利的程度，从总体趋势上看，住房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瑞典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甚至宣称：“由于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基本的便利设施（自来水、下水道、抽水马桶和中央供热系统），我们已经不再可能利用这些指标来衡量住房标准的分布和变化”（艾里克森和阿伯格，1987，第 5 页）。然而在英国，不同于许多其他气候条件更加恶劣的发达国家的是，由于供热和保温条件不尽如人意，婴儿和老年人的冬季死亡率远远高于夏季（道格拉斯，1983，第 170 页）。再一次强调，这个例子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传统的西方住房形式必然比其他形式的住房优越，也不否认各国住房需要的官方的国家定义有时也可能出现可怕的错误，把人们从他们自己感到满意的住房里驱赶出去，让他们搬进实际上可能损害他们的健康和自主水平的住房去。最重要的是，这些错误无论发生在什么

样的特定环境中,都能够参照相同的标准加以识别。

无害的工作环境

除了家以外,对个人健康和自主影响最直接的环境因素就是他们的工作场所了。工作条件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严重伤害。第一,工作时间过长可以从体力和脑力上削弱人的精力。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这一直威胁着劳动市场中处于最弱勢的群体,无论是19世纪英国工厂里的童工还是20世纪第三世界血汗工厂里的童工,无论是美国南方的奴隶还是斯里兰卡领地里的劳工,无论是有偿工作的男人还是无偿劳动的女人。在原则上,我们可以像前一章里讨论的那样,利用时间预算研究来描述那些超长时间工作的人。

第二,有害的工作环境可以造成职业伤害和职业病,威胁身体健康。职业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那些与某些类型的生产加工和/或材料相关的疾病。例如, β -萘胺的使用提高了印染行业膀胱癌的发病率(多亚尔和爱泼斯坦,1983,第32页)。在农业领域,尤其是那些缺乏有效政府监管的第三世界国家,有毒杀虫剂的使用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威胁(布尔,1982;埃克霍姆,1982,第6章)。另外还有一些更常见的疾病,如支气管炎,与特定职业的相关性较弱,很难轻易把两者联系起来。然而,如果我们按照职业分类来关注特定病因导致的死亡分布情况,工作对于发病的贡献程度就似乎显而易见了(开放大学,1985,第10章)。第二种描述有害工作条件的方法是直接评估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

音、接触危险物质和空气污染。遗憾的是,大多数这方面的信息,除了某些西方国家以外,我们都没有(OECD,1985,表 16.1)。英国的数据表明,这些危害对那些最不富裕的群体威胁最大,这个结论很可能具有普遍性。

第三,某些形式的工作可以损害工人的自主。无技术含量的、过度重复的、机械般的工作几乎完全不能刺激工人的能力,也无法培养积极的自我意识。沃尔对各种研究发现作了广泛的总结,他 200 认为控制、技术运用和多样性的机会共同并单独影响身心健康。特别是缺乏对工作内容的控制,容易诱发抑郁和焦虑,降低自尊。正如我们在第 9 章中明确的那样,工作要求太高或者太低都可以破坏身心健康(沃尔,1987,第 5、7 章)。毫无疑问,当今世界上许多人在他们被迫从事的工作中,自主不是受到了激励而是受到了损害,但是目前我们没有掌握准确的人数。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工作在总体上导致工作自主的减少。关于这个论点,尽管有许多关于技术剥夺方面的理论,证据却比较模糊。但的确有来自瑞典的一些证据表明,在过去的 20 年中尽管精神压力也不断增加,工作自主在总体上还是得到了提高(阿伯格,1987;参考库利,1980,第 2 章)。

无害的自然环境

更加广泛的自然环境本身既可以增进健康,也可以损害健康。即使人们对水、营养、卫生设施、住房和职业都感到非常满意,危险的环境仍然可以导致伤害,甚至死亡。我们已经看到,原本富足健

康的人在在工作中接触致癌污染物质后可能患上癌症。这些污染物质还可以在更大范围里破坏环境,造成现代工业灾难,例如最近在切尔诺贝尔和印度的波帕尔发生的那种灾难。

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的情况同样如此。在此,工业排放的废物是罪魁祸首之一。这些废物即使没有直接排放到河里而是存留在陆地上,也会导致严重问题,因为它们能够渗入周围的地下水,且只有在发生了突发性疾病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它的存在。同样,空气污染也危害极大,特别是在人口密集、工业和/或汽车集中的地区。尽管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空气污染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某些呼吸系统疾病和仍然存在的硫磺集中排放之间的相关性仍然引人关注(斯特恩等,1984,第 110~112 页)。

- 201 这些环境问题在欠发达世界的某些地区更为严重。巴西的库巴坦被一些环保组织称之为“死亡之谷”。1980 年,因为严重的大气污染诱导有机体突变,15 000 名当地居民不得不迁移到别的地方。关于极度的水污染,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河。波哥大河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大量的有机和无机工业废弃物——特别是大量的砷、铜和汞——从河流上游排放到河里,而生活在下游两岸村庄中的人们饮用河水的水。很多证据证明,这些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剥削密不可分(埃克霍姆,1982,第 6 章)。显然,评估环境问题的标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例如,由于相同的生物学原因,滴滴涕(DDT)对于伊斯兰教的毛拉和基督教的主教同样有害。

现在,联合国(1987)和经合组织(1987)这样的国际组织所绘

制的有关自然环境质量图表比十年前所做的要令人满意得多。空气污染指标,包括一氧化碳、氧化氮、氧化硫的排放量,是反映总体环境恶化的重要指标(参看第 11 章)。对于我们的工作而言,更好的指标是危险污染物质的实际集中度,例如在有人居住的地方烟尘和氧化氮集中度。^①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水质量的监控,我们还可以得到有关污水处理厂覆盖面的数据。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导致环境恶化,影响身体健康和自主:例如,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交通噪音是一个越来越大的威胁。最后,健康调查可以直接监控接触危险物质(如铅)的程度。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利用这些知识规定了多种污染物质的最低安全标准,这使得我们可以找出那些暴露在超标污染中的人们,勾勒出污染分布的情况。

保 健

认识到上述中间需要并且采取实际行动,将有助于减少许多危险,避免全世界的人们维持身体健康的基本需要遭到危害。然而,为了维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医疗保健——预防性、治疗性和缓 202 解性医疗保健——总是一种必要的额外输入。尽管人们公认在过去的—个世纪中,第一世界死亡率的不断下降,主要归功于环境的改善而非治疗性药物的使用(麦基翁,1976),但我们已经论证了,只要医疗手段能够改善人们的长期健康状况,它就是道德的。这

① 关于海洋和空气污染问题,把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统计单位局限性特别大。例如,在许多西方国家,每年一半以上的硫化物污染是由别的国家排放的(联合国,1987,表 1.16)。

样,剩下的问题就是,论证获得技术最先进的高效医疗服务是一种中间需要。但我们必须再深入探讨一下不同的康复系统的本质,特别是“西方”医学的本质,否则就无法设计享有“有效”保健的指标。

西方治疗医学当然不是没有问题,而且无疑是被广泛滥用了,危害了个人的健康需要。尽管耗费了巨大的资源,生物医学研究在有效治疗发达社会的致命疾病(癌症、心脏病和高血压)方面几乎毫无进展。此外,现代医学会导致许多危险。医生的治疗可以直接导致许多问题——过量使用有害健康和/或使人上瘾的药物。另外还有许多间接的危险,包括用医学方法解决非医学因素导致的健康问题(有时也叫做健康问题的医学化),使用生物医学模式掩盖经济和政治原因导致的疾病。医学研究越保守就越把自己禁锢在概念之中,只会死死抱住特定的病原学治疗方法。例如,把肺结核的病因仅仅确定为一种特定的感染,而忽视了原本可以避免的环境状况。这种做法将会导致把健康资源用于昂贵的诊断和治疗技术,而不是成本效率更高的预防措施。最后,医学完全听命于技术导致了医患关系产生严重问题。五花八门的医学仪器完全由医生操纵,病人对于这些仪器感到神秘陌生。医生的大多数诊断信息来自机器而不是来自与病人的交流,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培养交际技巧,而有效疗法和健康教育与宣传恰恰需要这种交际技巧。

203 最终结果就是个人健康问题的管理对医生的依赖性更强,医生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更加巩固,他们更加反对进行必要的医疗改革(多亚尔,1984)。

然而,这些问题无论多么突出,都还不至于全盘否定建立在疾

病的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之上的医学行业。首先,治疗医学通常确实能治愈疾病!过度强调疾病的病原固然掩盖了其环境、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不能排除病原学的治疗功效。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有目共睹,包括诊断方法和相关技术、外科手术、消毒、麻醉、抗生素、接种疫苗以及各种处理确诊疾病的策略——荷尔蒙和化学替代疗法以及临终关怀缓解痛苦的方法等。因此,即使本应该更多地重视疾病的预防,在任何医疗保健制度中治疗和有效的处理方法仍然是最重要的。奇怪的是,虽然有人批评西方医学存在种族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是近年来治疗医学成就最显著的地方却是受传染性疾病困扰的第三世界(莱恩·多亚尔,1988,第35~38页)。例如,抗生素可以治愈许多致命的细菌感染,许多防疫计划都使用了免疫学或其他源于生物医学知识的疗法。

有人认为生物医学模式贬低了预防的作用,有人认为生物医学模式长期被用以滋养那些有助于营造不健康环境的社会关系,还有人认为生物医学模式历来缺乏成本效率或者偏爱城市。所有这些观点表明,我们需要一项正本清源的行动计划,而不是寻求一种全新的医学模式。显然,当前全球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初级保健,在疾病的早期介入治疗,并且教育指导工人和其他人员掌握预防医学的原则和习惯(世界卫生组织,1978,1987;开放大学,1985,第9章)。考虑到高科技医学昂贵的费用,以及欠发达国家捉襟见肘的健康预算,短期内没有别的选择。

因此,理想的衡量这种中间需要的社会指标将会反映人们能否享受适当的保健。在实践中,现有数据最全面的、最可靠的指标 204

是各种医疗输入的“供应”。尽管目前这些指标还不是十分理想，但是在世界各国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提供初级保健的确能够降低死亡率并减少相关疾病(斯图尔特,1985,第7章;坎普尔,1984,第3章)。有没有各种医疗输入的供应,包括医生、护士和医务辅助人员,确实不一样,这使得人们有可能得到费用低廉的治疗和预防性的医疗服务。有关医疗输入供应的平等性,一项粗略但数据来源比较全面的指标就是每个医生或护士服务的人口数量。1965年以来,这项指标在全世界都有所提高,但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大——1980年英国每位医生服务的人口数为650人,而埃塞俄比亚为69390人(世界银行,1988)。

然而,对于许多穷人来说,如果由于地理或费用方面的原因而无法享受健康服务,即使有这方面的服务也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保健利用率的直接指标非常重要——尤其是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和肺结核等疾病的免疫人数。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对于“能享有健康服务”的人数的估计虽然并非十分可靠,但还是很有用的。可奇怪的是,能否享有健康服务于对健康服务的需要似乎是成反比的: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很高的国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享受不到健康服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7,第3、4部分)。对医疗资源的使用也会因不同国家医疗体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所有的国家里,大多数人都只能享有略高于基本水平的医疗服务,因为他们都是在与他人分担医疗系统的成本。我们还需要衡量公共医疗系统效率的指标(经合组织,1985,表1;琼斯,1990,第6章)。

童年安全

童年时期的安全感是形成有自主意识的成年个性的中心要素,这个观点是所有心理学流派的核心特征。不仅如此,尽管不同文化在如何爱孩子、教育孩子和培养孩子能力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我们还没有听说有哪个传统观念体系不支持这种观点(科宾,1981,第 1 章;麦克弗森,1987,第 3、8 章)。如果我们同意一个人的特征具有延续性,那么这种“童年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个人自主的一个构成要素,而不是一种输入。然而,由于童年发 205 展的长度和中心地位,我们有理由把童年安全单独确定为一种中间需要,这个需要的满足将会影响成年后自主意识的水平。

塞利格曼(1975,第 137 页)将幼年期周遭令人敬畏的重要因素对我们产生的巨大影响总结如下:

人类的婴儿比其他物种的幼仔更加无助。在出生之后的 10 年或 20 年中,有些孩子感到周围的环境在自己的主宰之中,有一些孩子则深深地感到无助……一个孩子如果不断地感到无助,很少有环境在自己的主宰之中的感觉,那么如果置身于一个新的环境,他会觉得自己非常无助,可以利用的线索极少。另一个经历相反的孩子,即使利用完全相同的线索,可能认为一切都在自己的主宰之中。无助和主宰经历的早晚、次数的多少以及强烈程度决定了这种动机特征的强弱。

这段话是一位行为学的代表人物所写,他把行为解释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控制或无助。然而,孩子受到某些大人的支持和鼓励,逐渐与他们的行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孩子自主意识的增强应该主要归功于这些人,这一点很少有人会提出异议。弗洛伊德主义的传统也印证了这种观点,但对于所涉及的精神力学问题还提出了一种不同的且意义更加深远的解释。

哪些因素可以影响儿童自主意识的成长?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提出了儿童心理—社会需要的四个方面,我们相信可以适用于所有不同文化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世界卫生组织,1982;凯尔默—普林格尔,1980)。首先是爱与安全需要。孩子出生以后,这方面的需要最初是通过与父母和养父母之间稳定、持续、可靠、强烈的情感关系来满足的。它并不排除一些消极的感情,只要不是过度 and/或任意的体罚或贬低人格。年幼的孩子需要持续而可靠的态度和行为,否则其个性特征和价值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此,熟悉的地方和习惯的生活规律似乎也可能是重要的促进因素。

206 第二,儿童需要新鲜的经历以培养其认知、情感和社会发展能力。玩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儿童通过玩耍开始早期的探索和学习。因此,所有的儿童都需要时间和机会去玩儿。第三,儿童需要在一个公正、清晰的规则框架内得到表扬、认可和积极的反馈。第四,我们需要逐渐把责任感灌输给孩子,起初是简单的个人日常生活方面的事情,然后是更为复杂的对别人承担的责任。关于儿童的普遍性需要以及如何满足儿童的需要,我们知道得很多。例如,有关攻击性的研究发现,父母独断专行的家庭,孩子往往最具攻击性,而父母宽容大度的家庭,孩子也并非攻击性最弱。攻击

性最弱的孩子似乎来自一些既有明确的行为规矩又有温暖而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的家庭(利文,1989)。

怎样才算是好父母,这个问题自然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看法,因而虐待儿童和忽视儿童的定义也随之不同。鉴于这种情况,比较不同社会对待儿童的态度特别危险(钱纳和帕顿,1990)。对待孩子,什么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关于这个问题,所有文化确实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规则。我们必须从这个事实出发。在此基础上,科宾(1981)忽略掉那些在任何社会都会被定义为虐待的行为,只研究虐待儿童在不同社会的“异质性”。她认为,如果存在以下因素,这种行为会更加盛行——儿童的文化价值较低;儿童群体之间相互歧视,私生儿童、孤儿和女孩儿受歧视;对于儿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能力存在不合理的认识;在直系家庭以外,缺乏更广的、关爱孩子的亲属和社区网络。其他一些跨文化研究表明,虽然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使用体罚的现象,但是在更加复杂的社会中频繁使用体罚的现象更加普遍(莱文森,1989,第2、4、6章)。

在全世界范围内,儿童自主和健康发展的许多基本前提条件都严重缺乏,然而,反映这方面不足的社会指标十分不尽如人意。根据第8章中采用的“维生素模式”,我们不打算用某种“最优化的”童年作为准绳,即使我们可以定义一个这样的概念。虽然我们 207 无法理解为什么,但我们知道,儿童常常能够忍受相当程度的忽视、不安全和不幸,而他们的自主意识却完好无损。我们寻找的是确保每位儿童的自主意识有机会得到最优化的成长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安全、激励、认可和责任。在实践中,我们几乎无法得到任何这些方面的信息,所以必须依靠最粗略的替代指标。

完全脱离家庭关系的“流浪儿”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现象,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粗略的资料。据估计,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大约1~2亿儿童生活在街头,仅仅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就有4~5千万。大约三分之一的儿童独立生活,努力自己养活自己,只是偶尔回一趟家;大约7%的流浪儿是被家庭抛弃的,得不到父母提供的任何心理—社会资源。在大多数情况下,唯一的国家干预形式既严厉又具有惩罚性——在他们最终触犯法律的时候(麦克弗森,1987,第204页;参考奥尔斯布鲁克和斯威夫特,1989)。在里约热内卢,他们甚至得和由雇佣枪手组成的杀人团伙相斗,这些人杀害流浪街头的儿童就如同消灭一群害虫(《卫报》,1990年4月21日)。发达国家的儿童也遭受了各种形式的虐待和忽视,这方面的证据虽然有限但是越来越多。例如,根据一项最新的估算,英国可能遭受过性虐待的儿童多达10%(本托文和维扎德,1988;劳伦斯,1988)。我们一直缺乏重要的客观福利的数据,这种状况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反映了家庭生活的许多方面依然蒙着隐私的面纱。

重要的初级关系

另一个中间需要是一系列重要的初级关系——这是一个由身边重要的人组成的网络,个人从与他们的互动中得到心理上的强化刺激。他们在教育和情感方面提供安全的环境。以上提到的布朗和哈里斯的研究指出,失去配偶或挚友,或者与重要亲友相隔绝,会使人更容易抑郁,精神崩溃,或使病情加重。在此,区别初级

支持群体与亲密和值得信赖的关系非常有益。纳罗尔(1983)收集了大量研究结果,这些结果广泛来自于各种社会和文化,用以支持一种更加全面的“精神网”理论。所谓精神网,指的是那些作为规范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初级关系群体。他认为,遭到削弱的精神网与精神疾病、自杀、犯罪、虐待儿童、打老婆和许多其他个人自主受到抑制的指标都有关联(纳罗尔,1983,第二部分)。

发达的工业社会可能比第三世界有更多的人由于缺乏强大的初级支持群体而受到伤害。例如,英国的几次调查表明,大约五分之一的老年人遭受严重的孤立(廷克,1981,第 163 页)。另一方面,瑞典的一项普查运用了不同的指标,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 1968~1981 年之间孤独问题的严重性有所上升,只有 2% 的人受到影响(阿克塞尔森,1987)。尽管社会联系的数量与主观孤独感(有害于积极的自我意识)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后者深受社会联系质量的影响,无论是缺少亲密的朋友还是失去了一个终身的伙伴。此外,对于那些没有人依赖的人或者觉得自己极度依赖他人的人,孤独的问题尤为严重(廷克,1981,第 11 章)。生活在公寓里的人有一种奇特的经历,一方面缺乏隐私,另一方面又感到特别孤独。例如,曼彻斯特的一项关于生活在家中的老年人的研究发现,许多老年人整天看电视,口头交流极其有限(埃文斯等,1981,第 6 章)。这种孤独可以伤害个人的自我意识,导致他们的能力越来越弱,自主意识越来越淡,这是毋庸置疑的。不同文化容忍或者甚至鼓励这种孤独行为的程度大相径庭,即使在西方社会内部也是如此。例如,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就比较罕见,而不像英国或美国那样(芬奇,1989)。

一个亲密和值得信赖的关系可能是一个普遍性的满足物,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即使个人生活在一个基本在各方面都能给人以支持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问题的
209 困扰。这些需要并非总是非常强烈,但是偶尔也会十分突出。通常,这些问题就像“困惑”(库恩的术语)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根据现有的概念和实践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我们的概念和实践技术来源于本族文化的框架和亚文化(库恩,1962,第4章;参考多亚尔和哈里斯,1986,第1章)。库恩认为,这些困惑只有在经过多次努力仍然无法解决的时候才会成为一个威胁。因此,人们为了维护自主,仅有一个能提供基本支持的社会背景是不够的。原因有二:

第一,为了保证他们的自我意识不受到不切实际的伤害,也保证他们为将来纠正自己的行为做好准备,对于不断出现的失败必须进行调整和详细的探讨。这常常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体贴入微的情感与智力支持,这种支持只能来自于非常了解此人的人。第二,因为在公共生活中个人的行为必须顾及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所以任何详细探索自我的努力通常都难免受到限制,例如探索自我的欲望、信仰、抱负、责任、弱点和力量。个人发展的独特环境在这里变得特别重要。人的潜能的深度、复杂性和范围几乎是无限的,因此潜能的开发和培养是一项必需的社会活动。其结果是,只有那些高度致力于这项任务的人才会为此付出时间和精力,也只有他们才有希望得到回报,享受别人的帮助。确定个人自我发展的私人空间正是这种支持性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当这种关系消失时(无论这些关系曾经多么困难甚或令人不愉快)人们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失落感(布朗和哈

里斯,1978a,第 173~179 页;弗雷登,1982,第 6 章)。这一点还可以解释一个几乎全人类都拥有的愿望,心爱的人去世的时候,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工人和农民,都希望为死者举行一场“合适的”葬礼,尽管通常还需要一定的费用(斯特里顿,1984,第 973~974 页)。

衡量初级支持群体的社会指标目前正在构建之中,尽管最容易得到的指标——有关独自生活者的数据——是效果最差的。与伙伴、亲戚和朋友间交流的量性信息更有价值;但是过多的社会结合可能会伤害自主,特别是批判性自主。因此,最好的指标是那些衡量初级网络质量的指标(特别是某人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其他人)以及衡量人们对网络的选择权方面的指标。目前,只有少数几个高收入国家有这些指标(阿克塞尔森,1987;芬奇,1989)。

经 济 安 全

要想维护和扩大个人自主,下一个必须满足的中间需要就是安全。如果个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如果那些满足其他基本需要所必需的主要财产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就可能发生严重的伤害。例如,对于无助的研究表明,高水平的自主与对于环境的质量、持久性和一致性的控制感是紧密相关的(塞利格曼,1975)。也就是说,如果不确定自己想要实施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结果,自我表达和创造力就会受到挫伤。在个人自主的维护和发展这个问题上,我们说过的一切都预先假设行为人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他们可以计划并努力创造一个特定的未来——至少为他们自己。第二,通过一系列规则、报酬和人际关系,他们假设在不远的将来这个网

络大致保持不变,他们能够做到这些。无论不安全感发生在哪一个情况下,其结果都是创伤——严重丧失对外界的控制能力和自我意识,最终可以导致精神疾病甚或死亡。到目前为止,要摧毁某人的自主能力,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无端、任意地惩罚和羞辱他们,并剥夺他们任何申诉的权利。在所有我们已知的文化中,有一些为数不多的事情使人产生愤怒和不公正的感觉,这些任意性的压迫行为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点丝毫不让人感到意外(巴林顿·莫尔,1978,第2章;参考贝特尔海姆,1986)。让我们把经济安全 and 人身安全区别开来,逐一加以研究。

经济不安全的问题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突如其来的庄稼绝收、变幻莫测的气候、牲畜的暴死给大多数人带来深重的灾难,过去如此,现在仍在继续。18世纪以来,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工业制度又为经济不安全问题增添了新的威胁:无产阶级丧失了获得
211 生产资料的权利,极度依赖于被雇佣的劳动来保障生活,并因此面临着失业的巨大威胁。在战后的岁月里,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了充分就业政策、收入维持计划和国家提供社会服务的制度,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的缓解了一些现代工业社会的不安全问题(埃斯平—安德森,1990,第2章)。但是经济不安全问题又出现了新的形式,尤其是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中都存在着潜在的永久性的过剩人口,这些人享受的权利很少,最多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让我们把经济不安全定义为生活水平令人无法接受地下降的客观风险。在这里,“无法接受”指的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生活的能力受到威胁。与此相关的一个指标是埃斯平—安德森(1990,第2章)构建的“去商品化”概念,用以衡量集体收入维持体

制(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有的)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人们的收入不受年老、疾病、残疾和失业等偶发事件的影响。另一项指标是一种基于参与的、衡量汤森定义的“贫困”的指标。“生活条件(即饮食、生活设施、标准和服务)使人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参与到各种关系当中,遵循那些社会成员所理应遵循的、习惯的行为规范。如果他们根本没有或者没有足够的生活条件,就可以被视为受到了剥夺”。那么贫困就可以被定义为缺乏获得这些生活条件的资源(通常是货币资源)(汤森,1987,第130、140页;参考1979,第1、6章)。显然,摆脱贫困构成了一种普遍性满足物特征,是人们能够参与其社会、挑战其价值(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的话)的一个必要条件。^①

① 消费某些商品使人们有可能实现这种参与,有两种主要方法可以定义和评价这些商品。第一种方法是“预算研究”方法,让各方面的专家确定基本商品、活动及其必要的最低标准;第二种方法是“共识”方法或者也可以称为“多数主义的”方法,把这项任务交给从相关人群中选取的代表。显然,两种方法各有优点,但是如果单独使用则都不尽如人意。我们的理论遵照第8章和下文第14章中形成的思路,指出了一种解决这种两难问题的方法。沃克(1987)也认为,在这些问题上,明智的共识只能来自专家和公众之间的对话,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系统整理的知识和基于经验的知识之间的对话(这是为了简化几个问题。有关这些定义和衡量贫困问题的最新讨论,请参看汤森(1987);维特一威尔逊(1987);皮亚乔德(1987);布拉德肖等(1987);沃克(1987))。

什么是最低限度的活动和惯例模式,使人们能够实现这些活动和惯例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经济资源是多少,如果能够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相对贫困定义为低于该标准的资源数量。达成明智的共识的过程可以在原则上克服许多有关贫困线的不同意见,这些不同的意见一直困扰着以往的分析。如果在实践中不能达到这种共识,那么就有可能设置许多不同的贫困线,当各种标准被放在一起考虑,无论在不完全的排序比较上建立了什么样的共识,都算是有了一个比较不同人群的标准,尽管这种比较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参看森(1979);阿特金森(1989)第1~2章)。

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衡量这种贫困的指标还尚待开发。一个粗略的指标就是用一个社会中公认的平均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贫困线。但我们必须强调,这并非一个理想的办法,而且也不意味着承认存在一种粗略的、“相对的”贫困定义(赫德斯特罗姆和林根,1987)。一旦找到一个可以操作的标准,就可以清点出低于贫困线的人数。^① 目前我们可以得到几个西方国家的此类指标。这些指标表明,这些国家在经济不安全的程度上差别非常明显。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常使用一种更基本的经济不安全指标——低于“绝对”贫困标准的人数。所谓绝对贫困线,指的是如果收入低于这个标准就不足以购买最小限度的食物和最基本的必需品。根据世界银行的粗略计算,1977~1984年间,在有据可查的那些低收入国家中,几乎一半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里(如厄瓜多尔和马来西亚),低于贫困线的比例也很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7,表6)。当然,这些指标对衡量与健康 and 自主的最佳表现相联系的经济安全来说还是很不够的。我们在第11章中将会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人 身 安 全

人身不安全——一个人受到暴力攻击的威胁——可以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犯罪活动也可以来自国家有组织的暴力。但无论是两种

① 由于种种原因,点人头数的测度受到了批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测度不关心人们的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程度。为了改正这个过度简单化的问题,这些“贫困赤字”可以被计算、总计和表达为总收入的一部分。

情况中的哪一种,建立一个衡量人身不安全的共同标准都是障碍重重。如果想对这些障碍避而不谈,在“什么构成人身安全”这个问题上,道德观不同的人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

关于个人犯罪,在以具有跨文化可比性的方法定义犯罪和评价犯罪活动的道德问题方面,存在着许多众所周知的问题。不仅如此,如果个人的抗议行为是为了反对一个他们拒绝接受的道德规范和/或为了满足基本需要,而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满足需要的方式,那么“犯罪”行为可能是一种自主意识最强烈的表达方式。当然,如旁观者拒绝接受同样的道德规范,那么人们就倾向于把这些行为视为进步的、值得称赞的行为(斯坦基维茨,1980,第2章;史密斯,1983,第5章)。

但要沿着这个倾向去论证却不考虑某些形式的犯罪可能对他人的²¹³人身安全(也许包括旁观者)任意造成的威胁,想要结论站得住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一般来说,将犯罪等同于造反而予以肯定,是基于个人需要应当得到满足的理由。这个个人需要与本书描述的概念十分相似。如果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去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那这不仅适用于以自己的需要受到侵害为理由而主张将犯罪合法化的人,也必须适用于那些犯罪行为的受害人。恐怖主义和针对平民的犯罪行为有时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但是实际上却和人道主义格格不入,道理就在这里(约翰逊,1982,第8章;参考杰拉斯,1989)。

即使人们接受这个观点以及类似的观点,认为犯罪是可以用共同标准衡量的,但要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话,从官方数字中得到人身不安全的指标仍然存在着许多方法论和实证方面的问题(博

顿利和皮斯,1986,第1、2章)。在这些困难面前似乎有两条道路。第一,我们可以利用官方统计的杀人案件,把它作为一个替代指标,用以衡量其他公民对我们人身安全构成的威胁。杀人案在世界各国具有广泛的可比性,比其他类型的犯罪受法律和惯例的差异的影响较小,在所有社会中都有合理准确的报道(华莱士,1986)。第二,这些数据需要受害者研究进行补充。受害者研究是最近十年在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发展起来的,尽管并非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这些研究可以在人身不安全问题的几个方面(无论是由公民造成的还是由国家机器造成的),为我们提供比官方数字更为客观、更具有可比性的信息(博顿利和皮斯,1986,第22~32页)。

事实上,个人的暴力行为与国家暴力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然而,如果国家的行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那么讨论国家涉嫌犯罪就会引发许多哲学问题。把公正等同于法律条文中的规定,有利之处在于有能力解释为什么法律曾经有过那么大的改动,为什么在不同文化之间法律的差异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法律“实证主义”的不利之处在于其相对性,因而没有能力解释任何与基本需要的满足相联系的自然的公正概念(坎贝尔,1983,第2、4章)。如果214 没有这个概念,就连“一个不公正的国家”这个概念都会变得自相矛盾,导致荒谬的伦理后果。由于这个原因,还有其他我们无法在此探讨的种种原因,我们姑且假设不公正国家的暴力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概念。

不公正的国家暴力的指标尽管通常无法获得,但还是可以设想出来的。许多人都经历过短暂的或持久的国家暴力,无论是在

地方武装冲突中,还是以死刑、严刑拷打和监禁的方式。大赦国际提供的材料证明,政府机构超越国家权限,避开司法程序无故杀人的案件每年多达数千起。

至于有多少人由于受到严刑拷打和监禁身体和精神健康遭受严重损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反映这种状况的指标很容易就可以设想出来(大赦国际,1983,1984)。另一个数据来源是联合国有关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战争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和健康,这个数据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战争的正义性,但是在有效的人身不安全指标当中,衡量此类国家暴力的指标必须占有一席之地。

教 育

从个人自主的情感成分转向认知成分,我们必须讨论教育对于人生幸福的作用。在第 9 章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学习、语言和识字能力在扩大自主能力方面的关键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4)把学习定义为“可保持的,且不是身体发育或遗传(本能)范式的发展所带来的在行为、信息、知识、理解、态度、技术或能力方面的任何改变”。现在,我们需要讨论教育对这个过程可以做出的贡献。教育是在正式机构中进行的、主要针对年幼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教学体制。然而,在一个跨文化的环境中评价教育,我们再一次面临着概念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的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以人为中心的学习”受到青睐(在巴西和其他一些国家则是“教育为了解放”),正统国家教育日益失去人们的信任。弗赖尔等人认为,这种

教育鼓励一种“自发的”大众教育，完全注重于大众文化和常识。然而，这种策略越来越面临着哲学方面的矛盾和实践方面的问题。与我们的理论更相关、更合拍的是格拉姆茨的分析。他既强调了“教育者—载体”的独特知识，又强调了人们日常生活知识的有效成分。^① 这种分析倾向于将指导与倾听和利用从社会经验中发展起来的的知识的能力相结合。我们将证明，教育越接近于我们在第7章中描述的那种交流方式，对个人自主的贡献就越大。

如果接受这个观点，那么就意味着获得适当正式教育的机会是提高个人自主的普遍性先决条件。在此，“适当”指的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前者包括一套在所有文化中大同小异的核心课程，如基础数学、基本社会技巧、物理和生物过程、世界和地方历史以及与将来就业相关的职业技能。在理想状况下，这种类型的学习使学生做好准备，主动全面地参与所有的实践/选择，而他们的幸福的延续和改善正是基于这些实践/选择。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虽然存在着文化差异，但是自60年代早期以来，在上述这种类型的学习方面的基础研究一直是全球教育发展的核心。因此，理想地说，我们需要反映所有上述关键科目教育成就的指标，这些指标必须没有文化偏见，而且具有国际可比性。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有识字能力方面的可比性数据，而且甚至连这个数据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在第9章中我们也曾经提到，有必要对这些必修科目取得的教育成就进行进一步的对比研究。

^① 格拉姆茨(1971)，尤其是1.1节和1.2节。关于格拉姆茨的教育观点的重要性及其当代相关性，请参看恩特威斯尔(1979)第一部分。另参看爱尔兰(1985)。

如要学习指标反映学习成果,教育指标就应该能够测量带来教育成果的可获得的教育投入。然而,由于缺乏衡量熟练程度的直接指标,我们必须依赖各国人口正式教育经历的数据(库姆斯,1985,第2~3章;琼斯,1990,第7章)。这可以用很多方法来测量,比如完成学业的所用的时间、所取得的学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 216 教育资格、所到达的教育水平(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在教育体制中不同层次的学习年数、完成学习的年龄、对成人教育的参与等。北方国家的这些信息相当充足,南方国家的也在不断增加。教学效果方面的研究则是另一个问题,反映教学质量的指标几乎不存在。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指标,仅凭从数量上衡量教育投入的数据是无法反映正式教育对提高自主能力所作出的贡献。任何通过对可获得教育和相关学生的生活质量的衡量所做出的推论都必须由它来验证。

如果我们从能动性自主再进一步,来讨论批判性自主,那么这种水平的教育权利还是不够的。在本族文化的现行规则和其他文化的规则之间进行评判和选择需要更加广泛的跨文化知识。一个人无论如何精通本族文化的知识,如果他不了解其他社会制度,不懂得比较方法的规则,就无法对本族文化进行仔细彻底的研究。专制并非仅仅是依靠暴力实现的。公民所接受的(或缺乏的)中、高等教育禁锢了他们的意识和想象力,让他们保持沉默被动,成为专制存在的基础。因此,无论涉及哪个文化或国家,引导人们避免专制的课程必须包含不同文化传统方面的教育,并且提供一个对此进行公开讨论和辩论的平台。

最好的高等教育努力追求的正是这种开明的能力。继续教育

和高等教育尽管还存在着许多缺陷,但是在当代世界中开辟了一条拓宽意识的重要通道,无数有识之士随时准备为此做出巨大的牺牲。联合国收集的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数据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是作为衡量批判性自主的替代指标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然而,理想地看,我们需要的教育指标必须能够直接反映人们运用科学方法获取关于其他文化传统的知识的权利——第9章中讨论过的那种能够享受批判地学习的权利。

安全的节育和生育

女性生育的能力给她们的身体健康和自主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威胁。相当一部分女性的疾病源于女性生殖系统、与生育相关的危险以及养育孩子所承担的基本责任。尤其在第三世界,疾病通常更加猖獗,贫困和上述因素结合起来导致所谓的“母爱消耗综合征”,母亲和孩子更加容易染上传染性疾病。从对自主的影响来看,生育既可以是有利的,也可以是具有破坏性的。具体结果将主要取决于怀孕是女方自愿选择的还是被迫的。自主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个人对自身和环境的控制感。即使在最好的环境中,怀孕很显然仍可能威胁到人的自主,但是如果选择是否做母亲的权利也被剥夺,那这种威胁就会倍增(佩奇斯基,1984,第9~10章;参考奥布赖恩,1981)。

根据1966年《联合国人口宣言》,“有机会决定孩子的数量和和生孩子的间隔是一项基本人权”(联合国,1975,第8页)。这份报告还认为,这项人权的实施需要教育体系,需要直接提供避孕、流产和绝

育方面的医疗服务以及治疗不育症和生育力低下的措施。然而,计划生育的目的还应该是丰富女性的生活,提高她们的自主。国家、任何社会团体或者伴侣都不应该剥夺女性控制自己生育的权利。在无法实行节育的地方,一个与异性相爱的女性时刻面临着怀孕的危险,即使她根本不希望怀孕。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事情的结果肯定是不得不非法流产,这不仅让她们感到更加焦虑,进一步丧失控制权,而且对健康甚至生命构成严重威胁(莱斯利·多亚尔,1985,第4~7页)。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前苏联,避孕受到了很多限制,流产非常普遍,造成了威胁女性幸福的客观后果。

即使在避孕合法而且有条件的地方,生产给女性的健康和自主带来的威胁依然存在。计划生育措施可以促使女性采取各种形式的避孕方法,如注射醋酸安宫黄体素,这些避孕措施她们自己无法控制,但是计划生育工作者能够控制。如果女性选择了男人反对的避孕方式,他们可能会不合作,或者拒绝承担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责任。这样就会促使女性选择对自己的健康更为不利的避孕方式,如服用避孕药或者使用宫内节育器。避孕药容易导致循环系统疾病,还可能诱发乳腺癌和宫颈癌。宫内节育器同样可能导致盆腔感染。总之,为了寻求一种男人认为可以接受的避孕技术,以性解放的名义,女性一直被当做试验品(波拉克,1985)。性别歧视和父权制能够隐藏在技术进步的思想的外衣下,这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根据联合国的指导方针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提供了一个衡量法定权利的指数。为了评估各国女性实际控制自己的生育期的程度,我们还需要有关采取避孕措施方面的数据。例如,根据世

界银行(1988,表 28)的统计数据,育龄已婚女性或者她们的丈夫采取任何方式的避孕措施的比例存在明显差异,在有些非洲国家几乎为零,而在英国则高达 83%。

在本章的结尾,让我们利用表 10.1 把所有普遍性满足物的特征以及在本章中提出的反映每一个特征的社会指标汇集到一起。为了使这些指标具有可比性,所有的指标都是从负面来定义的,也就是说,它们衡量的是欠缺的满足或没有得到满足的中间需要。这些指标大部分都直接反映了某种满足物特征所欠缺的程度,但是有一些指标衡量的是与之相关的身体健康和自主方面的欠缺。例如,婴儿患营养缺乏病的指标提供了一个衡量营养缺乏的间接的替代指标。在此,我们采用了在第 9 章中列出的那些反映基本需要满足指标,但把它们放在特定情境中来丰富我们对于中间需要满足的评估。

表 10.1 体现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需要满足模式,全面“审计”特定国家、群体或文化提供给个人的自由机会都应该依照这个
219 模式。当然,我们提出的许多指标并不新鲜。然而,有一些指标很有新意,在世界上有关社会指标的文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例如,衡量儿童需要的指标非常少见。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在一般社会指标名单上非常显眼的名字在表 10.1 中不见了。我们认为,这种现象说明,普遍性人类需要的理论可以选择现有的需要满足指标,也可以提出新的指标。我们希望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关于人类需要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现有的有关需要满足的证据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尽管有时只是一种微弱的优势。

表 10.1 我们建议的中间需要满足指标

普遍性满足物特征	社会指标
1. 食物和水	
适当的营养摄入	α 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卡路里消耗量 β 低于要求的其他营养物质消耗量 α % 缺乏足够的安全用水 α % 患营养不良/营养缺乏疾病* α % 出生体重偏低的婴儿* β % 超重/肥胖*
2. 住房	
令人满意的住房	β % 无家可归者 β % 居住在经受不住正常天气变化的房屋里
满意的基本服务	α % 缺乏安全的卫生设备
足够的人均空间	β % 高于规定的室均居住人数
3. 工作	
无害化的工作环境	β 特定危害的发生率 χ 危害情感/认知自主的工作任务的出现频率 α 工伤事故造成的死亡/受伤* α 与工作相关的疾病造成的死亡/疾病*
4. 自然环境	
无害化的环境	β % 污染物集中度 > 规定水平: 空气、水、土壤、辐射、噪音
5. 保健	

适当保健的提供

α 单位人口医生/护士/医院病床数量 $<$ 规定水平

适当保健的获得

α % 不能获得社区健康服务

α % 对于规定疾病没有充分免疫

6. 童年需要

童年安全

χ % 儿童遭到遗弃、虐待和忽视

儿童发展

χ % 缺乏激励、积极的反馈、责任

7. 支持群体

重要的他人的存在

χ % 无亲密、值得信赖的关系

首要支持群体

β % 无/很少有社会联系

χ % 需要帮助的时候无人可求

8. 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

α % 绝对贫困

χ % 相对贫困(参与标准)

β % 对特定的偶发事件没有受到必要的保护

9. 人身安全

安全的国民

α 凶杀案率

β 犯罪受害者的比率

安全的国家

β 国家暴力受害者

α 战争受害者

10. 教育

获取文化技能

α 缺乏初等/中等教育

α 正式学习的年头 $<$ 规定水平

获取跨文化知识

β 缺乏规定的职业资格

α 缺乏高等教育

11. 节育与生育

节育安全

α 缺少安全避孕和流产的条件

生育安全

α 产妇死亡率*

注:

α 合理而可靠的普遍性或近乎普遍性数据。

β 只有少数国家有的数据,但是被清晰地可操作化成了可测量的指标。

χ 推测性较强的建议。

* 与特定普遍性满足物特征相关的健康或自主指标。

第 11 章 最优化需要满足的 社会前提条件

在第 6 章和第 7 章中,我们提出了每个人都有一种最优化需要满足的道德权利。现在,我们需要考虑这种道德权利如何转化为具体的积极权利——如何能够确定并赋予需要满足的权利,在现实世界的政治进程和制度中如何能够接近我们理性思考的程序前提。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评价不同的社会离一个理想的公正社会到底有多远。此外,我们在前文中介绍了需要满足受到的全球性和生态环境的限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这些限制范围之内加以讨论。显而易见,这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牵涉到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生态可行性方面的问题,我们无法在应有的深度上解决这些问题。在此,我们试图要做的就是根据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可能达到的标准,设计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指标。然后,可以用这些标准来比较各国实现最优化需要满足的程序和物质前提,并且为它们的改进和人类的进步指明方向。

再论人权的普遍性

社会主义理论家常常批评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他们关心个

人的自由但是同时对于生活中物质必需品的重要性保持沉默。的确,社会主义者们有时把满足需要的优先权置于自由权利之上:布雷赫特曾经写道,“食物第一,道德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方集团和第三世界国家极力主张没有社会—经济权利的公民——²²³政治权利是一种空洞虚伪的权利,并且为争取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对于社会—经济权利的关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文森特,1986,第 4、5 章)。也有人主张西方的权利概念没有看见一种互惠共享的安排,这种安排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大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保障社会中的弱势成员分享需要满足的主要方式。例如,许多没有成文法律的文化为老年人提供的关怀比那些使用正式权利理论的文化要好得多。^①

要明确指出的是,这些批评意见直接反映了我们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第 9 章和第 10 章所关心的正是如何去操作那些“人们要求的权利”,而以往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当代新右派却常常忽视了这些权利。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做法是描绘需要满足带来的结果,而不考虑不同社会中存在的不同法律形式。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中的“77 国集团”)对西方的权利概念提出了另一种批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概念没有看到民族国家在自主方面受到的限制(文森特,1986,第 5 章)。西方的做法假定国家是保护人权的关键行为体,忽视了

^① 文森特(1986)第一部分以及辛格拉尼里(1988)中的一些撰稿人公开宣扬了这些问题。有关这种观点的最新言论,请参看伦特恩(1990)第 2~3 章。然而,她反对描写性相对主义包含了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并且继续努力从跨文化实证研究中吸收某些普遍性的道德原则。

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这种不平等的状况确实存在,是强国的政治/军事统治以及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机构和大公司的统治的产物。换言之,我们可以设想到以下情景:一个民主国家希望提高其公民的福利,但是却无能为力,因为这个国家本身受制于强大的敌国或盟国,或者受制于其经济依赖性。这种有关人权问题的“南方学说”强调了殖民主义强国给予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的义务,更重要的是,给予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国际经济新秩序或某种其他形式的国际关系发展经济的权利(文森特,1986,第5章;加尔通,1980,第89页及以下部分)。关于“依赖性”的文献有时还主张摆脱国家的依赖性是一种基本需要(西尔斯,1982;威斯纳,1988,第1章)。

这种批评观点提出了一些关于世界秩序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问题。在世界秩序中,所有人的权利都要受到严肃对待,但是
224 我们把这些问题的留待本书最后部分讨论。这里我们意在说明如何能够设计需要满足的权利并将其付诸实践。提高人类福利的全球性及政治经济障碍,和推动我们前进的恰当战略都是内容广泛的问题,需要单独对待。但如果解读恰当,应该说国际上权利理论的争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标准,评价不同社会在提供改善需要满足的物质和程序条件方面的表现。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国家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或者更差,原因尚无定论,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其他民族国家的行为所造成的。

但是,接受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对于西方人权概念的内容提出的批评,并不等于我们认可否定人权概念。在我们看来,那些把人权仅仅看做一个意识形态的空洞说辞、抹煞社会经济结构中依

然实际存在的平等和不公正的观点不仅有害无益,而且是危险的。程序化的权利本身就是更好地保护根本的人类需要的重要方式。两者都处于所有解放斗争的核心,而且在需要满足受到伤害、程序化权利又遭到剥夺的第三世界环境中矛盾甚至更加尖锐,它们之间又一次存在着一种相互关系。正如鲍尔斯和金提斯指出的那样(1986,第 169~170 页):

因此,权利理论的争鸣对于资产阶级、贵族、新教徒或无产阶级都是一样的。它一直是各种激烈的跨阶级社会斗争的目标,其进步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受统治和压迫群体的贡献。此外,权利理论的证明还充当了结盟的依据和表达群体需求的框架,而不是反映某种社会哲学或政治意识形态。

总之,如果政治原则和实践因为侵犯了一项或多项自由权利而妨碍了基本需要的最优化满足,那么它们就成为人类解放的障碍,必须受到谴责。无论是对于伊朗妇女的权利还是南非或芝加哥南部黑人的权利都是如此。对于每个人都是这个道理。

225

消极自由的程序性前提条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我们的理论证明了评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合理性。首先,它们是批判性自主的必要前提条件。其次,

由于我们认为其他人应该能够理解并且身体力行我们所倡导的美好愿景,所以我们对他们承担了一种义务,而公民和政治权利在实证方面支持了这种义务。如果这些权利被滥用,导致我们和他们在个人的独立性方面受到独裁的限制,那他们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不会期望我们做到这一点。最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使人们能够进行理性的公开辩论,改进如何实现需要满足的最优化方面的决策。

这些观点包括了罗斯的第一正义原则中提出的那套权利和自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波格,1989,第147页):

“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及保证其公平的价值标准。

保护良知自由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保护个人自由和身心健全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受到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评估这些权利得到尊重的程度意味着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每个社会的法典范畴以及它们在实践上的有效保护。

在那些最尊重这些权利的国家里积累了一个巨大的制度性安排的网络。与广度和有效性之间的差异相对应,两个因素通常被用来解释比较性差异。第一,如果政府希望长期坚持这些权利,这些权利就必须具有某种法律基础。这通常要求在国家宪法中明文规定,尽管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保证避免侵犯(普理查德,1988,第143页及以下部分)。第二个因素有关政府提

226 供给权利遭受侵犯的个人的纠正机制。在此,重点在于司法独立

和适当的程序,如未表明理由和遵循合理的法律程序,国家不能剥夺个人的权利。一项研究发现,在世界各国,司法独立与尊重公民权利之间都存在着积极的联系(普理查德,1988,第 151 页)。然而,适当的程序规则和法律原则所体现出的一致性还会独立影响一个国家的司法质量,因此要求单独加以评估(辛格拉尼里和赖特,1988)。如果说一个国家尊重公民权利,那么它就应该在合法的制度上和实际的过程中为了这个目的而努力,而且这些努力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实际操作这些基本权利的正确的起点当然是《联合国人权宣言》。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这个或多或少在全球具有代表性的机构首次尝试在一系列普遍性的公民和政治权利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后来又源源不断地出现许多其他宣言和公约,包括《欧洲人权公约》(1963)、《儿童权利宣言》(1959)、《残疾人权利宣言》(1975)、《废除各种形式歧视妇女的宣言》(1979)等。这些宣言和公约许多都已经编入了《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ICCPR)和《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ICESCR),两者均于 1976 年生效。

在广义上,这些文件所保障的权利涵盖了罗斯的第一正义原则(未修订)中的所有内容,还加上几项获得社会和经济资源和待遇的权利,使人民能够按照“公平的价值标准”享受这些自由。狭义上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

保证平等的自由权利,如思想自由和社会交往的权利。

保护公民不受国家的侵害,如严刑拷打、不经过审判无限期拘

禁以及强迫信奉宗教。

作为保障这些权利的方式的法律权利,如适当的程序的权利以及证明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的权利。

227 个人权利,如与异族人和同性恋者发生关系的权利,只要本人愿意。

政治参与的权利,包括组织行业工会的权利,和平政治斗争的权利以及通过无记名投票和全民投票的方式参加多党选举的权利。

妇女、异教徒和其他少数民族享有平等的所有上述权利。

在全世界范围内,联合国倡导的这些权利在何等程度上得以执行或者遭到践踏,联合国本身并不定期发布最新的调查结果。尽管如此,有一些独立的研究项目尝试承担这项任务(加斯蒂尔,1984;辛格拉尼里,1988)。其中,内容最全面的是由休曼那(1986)提供的。他采用了40项不同的权利,其中大部分是公民权利,包括妇女和少数民族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他利用各种不同的资料来源,衡量了120个国家实施这些权利的实际情况。他对每一项权利的观测结果都按照程度来划分,一个极端是绝对尊重,另一个极端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侵犯模式”。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指数,给某些权利加上更大的权数,理由是侵犯这些权利意味着直接威胁和伤害个人——这是一个确切的标志,表明作为我们提出的中间需要的个人安全受到了严重损害。这些侵权的方式是:农奴制、奴隶制、强迫劳动或雇佣童工;未经司法审判剥夺他人生命或让人“失踪”;国家机关施用酷刑或高压统治;强制性工作许

可或征召劳动力；国家执行的死刑；法庭判决的体罚；未受指控而遭到无限期拘禁（休曼那，1986，第 2~4 页）。我们提出了一些在当今世界实现最优化需要满足的程序化前提，休曼那的指数捕捉到这些前提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将在第 12 章中运用这个指数来勾画比较性、程序化的需要满足。

政治参与

仅凭公民权利并不足以表明政治参与的程度，也不足以表明公民对一般决策过程和关于具体政策内容的辩论结果所产生的影响。重要的还有个人思考、倡导和参加改变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规范和权力结构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环境促进个人自主的发展，那么这个环境自身必定不排斥改变和改善。我们已经看到，要产生最具进步意义的变化，即使政策决策处于最佳状态，公开辩论至关重要，让尽可能多的相关专家的意见可以对手边的问题产生影响。民主再一次成为最优化人类需要满足不可替代的前提条件。 228

但是如果要把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参与指标，那么它在实践中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这个术语必须要被剖析解读，才能为政治参与的可操作化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民主并不以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状态存在，而是像一个连续函数一样，各种政治制度可以按照民主的不同程度划分等级。政治制度有许多不同的方面可以用特定的指标来衡量（波格，1989，§ 13；莱恩和埃尔森，1987，第 6、7 章）。其中三个方面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基本政治结构的“民主性”，公民参与的机会以及国家对这种参与的反应。以下让

我们逐一考虑。

公民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政治制度作出的决定。包括小规模参与性论坛在内,公民投票仍是最流行的直接参与形式。然而在实践中,全民投票并不是频繁使用,而且作为一种保护程序公正的机制还存在一些其他的缺陷(莱恩和埃尔森,1987,第211页)。因此,我们在此主要关注代议制民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代议制民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代议制度中,政治参与最普通的初级指标就是,政治党派在何等程度上被允许存在并在自由公平的选举制度中竞争权力。在实践中,这种情况必须具备以下特征:第一,相关公民群体应该尽可能具有普遍性,被剥夺公民权的唯一主要群体就是未满法定年龄的孩子。因此,妇女和男人一样普遍享有投票权的范围成为程序进步的关键指标。第二,无论是在宪法中还是在实践中都必须容忍相互竞争的政党的存在。一些国家虽然容忍几个政党的存在,但是不允许它们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对政府构成任何实际威胁。

衡量这些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的指标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拥有正式的投票权; 229 只有某些中东国家的妇女和南非的有色人种的投票权还受到限制(西格和奥尔森,1986,表29)。很多使用不同定义的渠道也用来衡量真实的政党选择的指标(库瑞恩(Kurian),1984,表43;韦森(Wesson),1987)。根据休曼那(1986,第15页)收集的数据,在1984年,某种形式的多党民主制度统治的人口为19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一党制、一个人或类似形式的制度统治的人口为24亿(占总人口的51%),直接或有效的军事管制的人口为4亿4千

万(占总人口的 9%)。此后,东欧的情况得到明显改善。然而,这些数字仍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许多国家距离政治参与最起码的前提条件多么遥远。

但是,至于个人和群体对于制定和执行约束所有人类集体的社会规则有多少实际影响,这类的正式指标所反映的信息很少。这里所说的社会规则是那些与我们的社会先决条件相关的规则。因此,我们必须分析在一个政治实体中公民实际参与的程度。选举中的投票水平为衡量正式政治过程中的参与提供了一个可靠而直接的标尺。除了那些强制投票的国家以外,我们有充分的理论方面的理由认为,选举投票率的变化反映了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觉得他们的福利受到自己的政治行为的影响(科皮,1983,第 53~55 页)。

除此以外,其他形式的公民参与也可以被区分为“自主参与”和“动员参与”两种形式。自主参与指标包括说话、写作和参与抗议示威活动。某些国家,如瑞典就有这方面的证据(肖尔金(Szulkin),1987)。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公民自动组成压力集团和社会运动的程度及其广泛性和有效性方面的证据。的确,如果没有这种自主活动,任何民主宪法都只是一个空壳。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国家机构对于公民压力的反应。现代代议制民主有着不同的形式,他们接近程序争议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波格,1989,第 153~156 页)。这些不同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1)选举制度,从英国的简单多数选举制到许多欧洲国家真正的比例代表制;(2)政府构成模式——最典型的是最小获胜政党联盟,230 尽管其他形式也可以看到;(3)政权组织形式,无论是总统制、内阁

制还是委员会制(莱恩和埃尔森,1987,第7章)。公民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集中性或分散性程度。在此,联邦和州郡分离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具有民主责任而且拥有实权的下层政府的存在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应运而生的各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究竟孰优孰劣,没有一个简单的评价方法。但是莱恩和埃尔森(1987,表7.9)设计了一种根据欧洲各国赋予群众影响的程度比较各国政体的方法。他们的结论是,即使在那些议会民主制国家中公民影响依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通过所有这些方法,不同的政治实体给予其公民影响政策的机会大相径庭。公民权范围越广、选举参与水平越高,国家越能容忍不同政治党派的存在,政府机构对于公共舆论的响应程度越高,受到公民的有效民主影响的经济社会生活领域越广,广泛参与各种自主运动的公民越多——持续不断的解决争议的过程也就越合理。尽管这些程序无法单独保证为了实现需要满足最优化所追求的战略,但是,如果与本章中讨论的其他社会前提条件结合在一起,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最有把握的成功机会。无论人们及其政治实体具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特征,结果都是这样。

积极自由的物质前提条件

然而,正如我们在全书中所阐述的,最优化需要满足的权利绝不仅限于公民权和政治参与机会。它还要求最优化地满足那些我们已经明确的基本需要和中间需要的权利。由于法定权利和实际权利之间可能存在的更大的差距,事实证明,监控这些权利更加困

难。由于这些权利涉及实质性的争取资源方面的要求,这意味着 231
被贫穷困扰的国家的政府即使有最民主的宪法和最美好的愿望,
也无法保证在实践中尊重这些权利。相反,另一个国家也许在满
足这些需要上面做得很好,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需要作为权利
的地位。我们在第 10 章中讨论并且支持了需要满足的直接测度。
在此,让我们详细分析一下支撑实际社会权利的物质前提条件,对
第 10 章的内容进行一些补充。

在实践中满足人类需要必须有一个生产和繁衍的系统,供应和分
配人们必需的需要满足物。实现这项权利可操作化要求我们进入经
济和社会过程领域。回顾第 5 章中介绍的社会前提条件,我们必须把
注意力从文化传播和政治权利转移到那些物质生产和社会繁衍方面
上来。后者是所有社会的共同特征,具有满足需要的潜力。

一种物质生产模型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一种社会制度想要永远繁衍下去,其成员
就必须通过劳动的方式利用他们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资源,运用所
有的生产方式,创造出他们作为个人生存所必需的各种产品和服务。
其中一部分将为生物和社会繁衍过程提供输入。在几乎所有的
社会中,从童年时代的结束开始(甚至更早)一直到死,除了睡觉
的时间以外,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繁重任务占据了人们绝大多数的
时间。然而,我们扩大生产的能力是没有止境的,正是在这一点
上,人类有别于所有其他物种。因此,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劳动既
是一种奴役状态,又是他们创造力的表现(马克思,1961,第 7 章)。
这里我们会关注所有社会共同的物质生产因素,把生产的具体方

式或制度留待第 12 章和第 13 章考虑。为此,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模型,它包含所有人类经济活动共同特征及其影响需要满足水平的方式。在构建不受文化因素影响而且具有操作性的模型方面,最为重要的尝试出自研究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学派。我们的模型借鉴了这方面的工作,尤其是斯图尔特的研究工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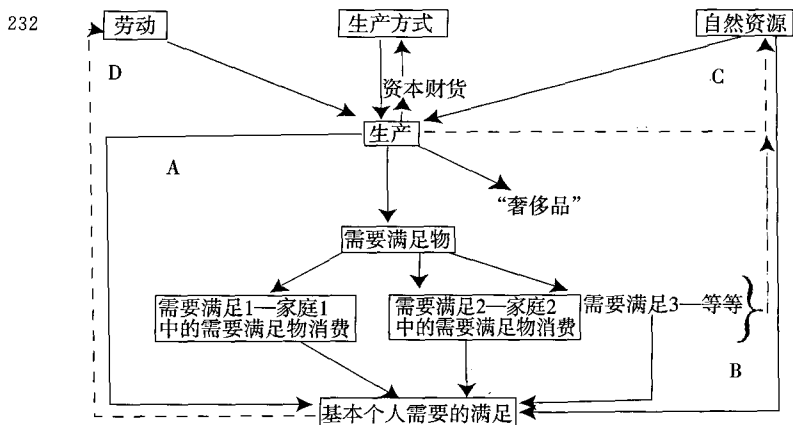


图 11.1 一种物质生产模型

- A. 生产过程对于基本需要满足产生的直接影响
- B. 自然环境对于基本需要满足的直接影响
- C. 生产和消费过程对于自然资源库的影响
- D. 基本需要满足对于劳动能力的影响

^① 斯图尔特(1985)第2章;参考科尔和迈尔斯(1984)第5章。这个模式中作了许多简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模式故意选择了制度方面的中立性。我们从中借鉴了经济制度的总体类型(例如,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和生产的制度性领域(例如,市场、公共行业或家庭生产)。

图 11.1 展示了一个抽象的生产模型,根据这个模型,位于顶部的资源被转化为底部的需要满足。

在发生这种变化的过程中,所有的经济体必须保证生产、分配和需要转换这三个过程发生在某种有效的水平上。

所有的生产始于资源:体力和脑力劳动;自然资源(包括地球环境的全部特征);人力创造的生产资料。然后,这些资源被划拨给生产单位,在生产单位中,人类劳动、知识和组织把原材料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输出。在这一点上,该模型脱离了传统的经济理论,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输出:需要满足物、“奢侈品”和资本产品。资本产品是不能用于当前消费的产品,而是作为生产未来产品的生产资料。除此以外,剩下的可以分为两类。需要满足物是那些在任何特定经济结构中满足最基本的个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奢侈品指的是所有其他产品和服务,包括基本需要满足物以外的消费品以及诸如武器系统之类的产品,这些产品不能进入其他产品的生产领域。要想设计出一种比国内生产总值(广泛地包括所有以上三种输出)更加敏感的需要满足测度,区分满足物和奢侈品至关重要。

在第二个阶段中,消费品和服务必须在消费单位之间进行分配。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来说,消费发生在多名成员组成的家庭中,尽管不同文化的家庭构成肯定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从我们的理论角度来看,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部的需要满足物分配对于需要的满足具有关键意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需要满足物都是可以拆分的、单个家庭独自消费的物品。有些满足物,如消费疟疾的医疗队,纯粹是公共产品,既无法排斥,也不

能拆分,邻近的居民虽然不可避免地得从中受益,且一个人享用并不妨碍其他人也可以享用。有些是可以分别享用的满足物,而且具有严重的外部效应,如预防接种医疗队,往往会产生额外间接性的好处(斯图尔特,1985,第21页)。在这些情况下,相关的消费单位不是家庭,而是地域性的群体,比如一个村庄,或者一个社会群体,比如某个公司福利计划的受益者。实施分配的机构各不相同,但是分配作为资源转化为需要满足的一个阶段,其中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在第三个阶段中,需要满足物被消费、加工和转化为个人需要满足。我们将这个把输入加工处理为需要满足的过程称作需要转化过程。对于许多人来说,该过程的一部分发生在“家庭”中而且包括:(1)在每个家庭成员之间分配需要满足物;(2)把这些输入转变成基本需要满足的“输出”——转变成个人健康和自主。²³⁴ 第一个步骤提醒我们注意到家庭内部分配和消费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影响这种状况的因素,尤其是性别差异。第二个步骤让我们关注这些输入转化为需要满足的功效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因素,例如家庭的社会结构,家庭可以得到的耐用消费品存量,与满足需要相关的实践知识和社区提供的集体产品和服务。同样,学校、健康中心和所有其他满足需要的集体场所的有效性也值得评价。

另外,还有两个因素也与需要转化过程有关。一方面,如图11.1中的路径A所示,工作或劳动过程与健康 and 自主可能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内在联系。因为我们在第10章中已经讨论过工作环境监控问题,所以在此不复赘述。另一方面,人们的需要满足还受

到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的影响(尽管工业化已经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区别)。自然环境的一个经济功能就是直接为满足人类需要服务(雅各布斯,1989)。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为人们提供了舒适宜人的生活环境,如新鲜的空气、纯净的水源和美丽宜人的风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生产方式可以降低或污染自然环境的质量,减少以往那些“免费”产品的数量。图 11.1 中的路径 B 表明了环境对于需要满足的这种直接影响。因为我们在第 10 章中也已经讨论了环境质量指标,而且在下文中还将提及,所以在此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已经探讨了资源转化为需要满足的过程,现在还有第四个阶段需要考虑。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必须保证生产性资源得到补充,使未来的生产周期能够保持最少大致相同的输出水平,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为物质再生产。可持续生产要求劳动、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库全都有能力在未来生产中维持至少相同水平的输出。资本产品的补充要求一定比例的输出用于投资。生产和消费²³⁵过程对于生物圈和自然资源库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也必须考虑在内。《布伦特兰报告》^①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满足当前的需要,同时不危害子孙后代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能力”(1987,第 43 页)。“C”箭头说明了这种反馈效应。最后,如箭头 D 所示,人类劳动能力的恢复说明了基本需要满足对于促进生产的重要影响:满足需要不仅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而且通过增强劳动力的能力在

^① 1987 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我们共同的未来”。

经济方面也是十分有益的(斯特里顿,1981,第348~353页;斯特里顿等,1981,第4章)。如果把资本看做更新的资源,那么一门真正建立在需要基础上的新兴的经济学必须指出人和生态方面的消耗。

因此,无论个人生活在什么性质的经济制度中,决定他们需要满足水平的物质因素是:

生产出来的需要满足物的总量、构成和质量。

这些满足物在消费单位之间(家庭)的分配模式。

这些满足物被转化为个人需要满足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内部的满足物分配)以及劳动和环境对于需要满足的直接影响。

资本财货、自然资源库和人力资源的损耗/积累率。

在这一点上,读者也许觉得我们兜了一大圈来说明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们希望,一旦与传统的国民收入计算方法相比较,任何怀疑态度都会消散。因为,传统的方法甚至连上文分析的第一个阶段都不如,没有将需要满足物与其他产品区分开来,也没有注意到另外三个阶段。此外,这个模式适用于所有形式的经济,无论是前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236 该模式在原则上提供了一种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中评价经济表现的方法,没有循环论证的危险,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依赖于内部偏好,将它作为量杆,因此深受循环论证的危害(斯蒂德曼,1989,

第 11 章)。显然,以传统方式衡量的经济增长也许不能提高需要的满足。一个经济体总产量的提高也许是以不能满足需要的奢侈品的形式实现的,或者满足物不能分配给那些需要的人。无知或者其他限制可能会阻碍剩余的满足物转化为更高层次的需要满足,过度的劳动或掠夺环境可能会抵消消费满足水平的提高,或者当前的增长是以牺牲未来资源和未来需要满足为代价换来的。因此,传统计算 GDP 的方法不能作为衡量需要满足水平的替代指标。

制度表现的指标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能够比较并且开始解释不同经济和社会制度满足需要的能力,确定哪种制度“较好”哪种制度“较差”,就必须用某种新的方法取代 GNP。在此,我们罗列了各种评价一个国家或其他单位在实践中尊重“社会经济权利”的能力和潜力的指标。再一次,我们只能总结该领域中需要的理论能够借鉴的某些新颖的思想。

1. 生产 在生产这个第一个阶段中,我们需要对一段时间之内需要满足物的输出进行总体的测量。为此,我们需要某种令人满意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区分满足物和“奢侈品”。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确定需要满足物,例如在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体中的大米。然而,情况通常并非如此简单。在大多数现代经济体中,有各种各样的食品可供人们选择,任何一种食品(比如大米)本身并不是基本需要满足物,因为还有许多其他途径可以摄取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大米只有在以大米为主食

的、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体中才是一种基本需要满足物,但是在现代英国或新加坡就不是。此外,超市货架上的一袋大米通常包含了一系列消费者可能无法不买的特征(例如大米、包装、也
237 许还有一个促销用的免费礼物),并非所有的这些特征都能够充当需要满足物。

最为理想的是,我们需要某种方法估算出一个经济体生产出来的具体满足物的总价值。例如,科尔和迈尔斯(1984,第135~139页)利用类似的区分基本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的方法,设计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根据必需的程度把产品和服务分为不同的等级。^①运用相关方法,我们就可以开发出更为敏感的测度,以衡量生产制度的合理性。无论实践中存在多大困难,这个“处方”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影响健康和自主总体水平,进而影响社会参与机会的是需要满足物的总产量,而不是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总量。单凭这一点并不能衡量在生产领域里孰优孰劣,因为正如森所指出的那样(1984,第12章,第294页),首要

① 通过比较特定群体和最富裕社会中最富裕群体在一个产品的某一项目方面的消费,任何产品都可以被分解为基本或非基本因素。通过运用指数曲线分析农产品消费,科尔和迈尔斯估计在低收入国家里大多数贫困人口78%的农产品消费都可以被确定为基本必需,相比而言,对于最发达经济体中的高收入群体,这个比例只有13.5%。在此基础上,经过大幅度简化,他们可以计算出不同经济体的需要满足物产生和消费总量,这意味着全球生产的奢侈品价值要超过基本必需品。以下是他们估算出来的1975年的数值(科尔和迈尔斯,1984,第135~139页):

基本必需品	3.4 万亿美元
奢侈品	5.3 万亿美元
资本产品	2.1 万亿美元
总产量	10.8 万亿美元

产品或基本必需品转化为“首要动力”或需要满足水平的转化率存在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① 但是对于单纯的功利主义的计算方法,这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这个阶段中,如果没有引入分配问题,我们的结论可能是,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优先发展需要满足物生产的经济体,与另一个总产量相同但是“奢侈品”生产比重更大的经济体相比,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全体成员成功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

2. 分配 在该模型的第二个阶段中,必须引入有关分配问题的考虑。在第 7 章中,罗尔斯的原则经过修改,成为一条关于社会经济安排的基本原则。如要得到最优化的基本需要满足,每个人的中间需要都必须得到起码的满足——第 8 章中介绍的“最低投入水平的最优”。在每一个领域中,每个人都应该有资格得到诸如营养、住房、支持群体或教育等,使他们能够尽可能有效地参与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合理分配原则是一条严格平等的原则,尽管在真实的世界里显然还只是一个理想。^② 即使实现了这

① 如果考虑基本食品以外的许多产品和服务,问题将会成倍增加。

例如,在某些社会中(而不是在其他社会中),一辆轿车或一部电话可以成为一个满足物,因为它是成功社会参与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任何社会中想出一筐这样的满足物并且达成共识,这让我们又回到了那些在上一章中讨论过的贫困研究面临的方法论问题上。

② 参考波格(1989) § 13.1。在此,让我们把森明确的另一个问题放在一边。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环境中将会要求不同数量的普遍性满足物特点,以达到最优化水平的健康和自主。例如,工作积极的工人比消极怠工的工人需要更多的食物,生活在气候条件恶劣环境中的人需要更好的住房等等。满足物转化为需要满足的转化率不同,因此需要满足方面的平等未必要求得到满足物方面的平等(森,1984,第 280~282 页)。

个理想,贫困问题仍然可能存在,但只是相对贫困,而不是绝对贫困。究竟哪些分配模型能够真正使人们以最优方式得到这些满足物,这个问题还有待探讨。

238 在此,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目的:把生产和分配的衡量方式结合在一起,创造一个“罗尔斯式的”最贫困者的实际收入的测度。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这种水平上跨国家和其他群体的比较将会表明他们的物质前提距离某种可行的理想多么接近或遥远。让我们考虑考虑如何能够创立一种这样的测度。

首先,究竟哪个群体的处境最为艰难——是罗尔斯定义的最贫困者吗?在第10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许多需要满足的直接测度,在每一种情况下,“最贫困者”或“最弱势群体”都可以根据具体的方式加以确定:吃得最差的、住得最差的、最不安全的以及在我们所有其他中间需要方面条件最差的。然而,正如罗尔斯的批评家们所指出的那样,这(以及类似的程序)通常意味着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不同的人将会成为最贫困者。如果没有一个单独的衡量福利的测度,我们就无法把这些不同的领域结合到一起,确定总体上的“最贫困者”。波格认为,最好的而且实用性最强的方法就是在收入分配的最底层确定一定百分比的群体。当然,选择的百分数具有任意性。比较不同群体中的最贫困家庭具有一种很强的道德意义,但是这种计算方法会缺乏可靠性和任何更为广泛的有效性。收入最低的20%的人是一个重要群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准点,可以用来比较各个社会在分配问题上的公正性(波格,1989,§17.5)。

其次,如何解释实际收入呢?最为理想的是,我们需要一些方

法来衡量不同群体所消费的需要满足物的价值。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合理假定最贫困群体的大部分支出都将用于满足物(什么是满足物,在每个特定的经济体中都有基于其自身文化的定义)。^①在比较各个经济体的时候,满足物的相对价格各不相同,而且在欠发达国家里许多维持生计的产品根本没有市场价格。这些问题使得利用官方汇率比较世界各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变得非常复杂。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人们越来越多地运用“购买力平价”来估算汇率。按照一个标准国家(通常是美国)盛行的价格,对某个国家一系列标准商品进行重新定价,合理估算出第三世界国家中非贸易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人均国民收入可以按照这些新的汇率进行比较,²³⁹给我们一个更加真实的(如果还是不够精确的话)实际人均收入(世界银行,1987,第 268~271 页)。一旦得到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20%最贫困者的(或者任何其他百分比的)实际人均收入。1980 年,根据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最贫困者的实际收入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一些非洲国家不足 100 美元,而瑞典则高达 4 400 美元。

最后,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些粗略的测度,以衡量最贫困者的实际收入,评判这些测度的最佳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不是我们在第 10 章中讨论的那种最低标准。我们关心的问题在于,在我们

① 有关评估收入分配的方法的全面概述,请参看阿特金森(1983)第 3 章;关于衡量贫困的测度,请参看(1989),第 2 章。有关收入分配的比较数据方面的讨论,请参看卡夸尼 Kakwani(1980)。世界银行(1988)表 26 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总结了所有可以得到的数据,尽管由于通过《卢森堡收入研究》某些西方国家的信息更为丰富(奥希金斯等,1985)。

所知范围内,多高的最贫困者实际收入水平与最优化需要满足所要求的水平相容。只有决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证明,哪些具体的国家行为应该加以改进,尤其是在一个国民收入存在如此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为此,我们必须从世界上表现最好的国家入手。根据表 12.2 和表 13.1 中的数据看来,这个国家就是瑞典。瑞典和其他主要的欧洲福利国家的经验表明,倾向于相对贫困者的收入再分配可以与经济规律结合起来,提供高水平的需要满足。因此,如果高收入国家提供给本国最贫困公民的实际收入远远低于瑞典的水平,那么就是专横地剥夺了他们可行的需要满足水平。

然而,对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如此高水平的需要满足为道德评价强加了不切实际的标准。对于处在较低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我们可以参照那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相对于较低的收入档次实际收入最高的国家,构建一种有限的罗尔斯式的测度。在下一章中表 12.2 中使用的数据显示,这些国家包括斯里兰卡(在低收入国家当中)和南斯拉夫(在中等收入国家当中,如果我们排除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比一些 OECD 成员国还要高)。当然,赞同这种有限的测度并不是否定最优化的目标,也不是认可当今世界造成贫富如此悬殊的格局。的确,瑞典最贫困者的实际收入将继续作为一种在国际
240 上衡量公正性的方法,除非人们能够证明它是无法推广普及的。人们很有可能接受这个观点,但是同时也认识到,对于不同类型的不发达国家,我们必须为最优化做出一个可行的解释。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点,世界卫生组织为总体收入水平较低、中等和较高的

欠发达国家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健康目标。

3. 需要转化 有关第三阶段的研究——影响消费转化为需要满足的机制——非常薄弱。在原则上,这种研究包括将任何家庭或家庭群体的满足物消费水平与基本和中间需要满足的指标进行比较。需要满足与消费的比率越高,需要转化过程的“效率”也就越高。尽管这个比率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一条光明大道,但这里我们无法尝试将操作这个比率。

这仍然没有解决家庭内部的满足物分配和需要满足等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有充足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证据,证明家庭内部存在着系统的不平等现象。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在营养、健康和读写能力方面,女性比男性遭到更多的剥夺。在需要满足的许多因素上,女儿比儿子受到的剥夺更加严重(森,1984,第 15、16 章)。在第一世界国家中,成年人在诸如收入、教育和就业等方面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诺里斯,1987,第 4 章)。女性在家里承担了大部分的无偿劳动,通常还负责满足包括孩子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然而,与男人相比,她们所享有的家庭资源的份额更小(埃尔森,1991;帕尔,1980,1989)。

这些不平等现象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还会破坏需要转化的全过程。妇女的教育和健康也是决定满足物转化为家庭成员的健康和自主的有效性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例如,不同的文化和家庭对于水和食品污染的认识不一样,这种不同的认识对于人口健康具有相当的影响(斯图尔特,1985,第 78、121~124 页;琼斯,1990,第 119 页)。导向妇女的投资比导向男人的投资具有更高的回报率,更加有助于提高儿童福利。因此,我们需要衡量性别偏见

- 241 和家庭内部分配的指标,以衡量需要满足的物质框架的最佳潜力(当然,他们还是“机会公正的平等性”和积极自由的测度)。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听说过有任何有效、可靠的指标可以胜任这项任务,尽管人口的性别比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替代指标(森,1990)。

4. 物质再生产 最后,我们需要描绘一下物质再生产的过程——经济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将经济可持续性的一般性概念可操作化要求我们明确自然环境的“经济功能”,并且提出衡量每种功能的指标。这些功能可以被分为三种,我们在此将讨论其中的两种。它们结合在一起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总体“环境消费”的测度(雅各布斯,1989,第3页)。第一是提供资源——能源、原材料和直接消费产品。这些资源有的是不可再生的(如矿产资源)、有的是可以再生的(如水资源)、有的是连续性的(如太阳能)。在这个阶段中,不必提出适当的资源消耗率,我们提出的指标就能够衡量不同社会和群体各种资源的利用率。不可再生资源利用的一个关键而合理可靠的衡量标准就是人均能源消耗,尽管理想地看,它应该扣除从连续性或可再生能源中得到的能量,如太阳能和水力发电。

自然环境的第二个经济功能是通过降解、吸收、分散和储存等方式消化废物。如果前三种消化的方法不足以处理废物总量,污染就会更加严重。一旦特定的废物达到某种水平,就会引发环境的第三种经济功能,即生命支持系统的延续(如气候)出现问题。随着这些威胁的严重性变得越来越明显,产生废物的直接指标也变得越来越平常。它们包括对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排放到空气中

的各种气体和微粒的衡量。世界资源研究所做出了一项壮举,创立了一个温室气体排放指数。我们在第 12 章中使用了这个指数。除此以外,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评价物质再生产受到的威胁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是全球性的,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加以讨论。

经济可持续性与子孙后代的权利

242

当然,我们以上所说的所有内容都必须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需要。尤其是物质再生产的社会前提,使我们警觉到当代人最优化需要满足所面临的全球性和时际制约。如何在实践中监控这些道德问题,我们在本章中无法回避,必须加以简要讨论。这要求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经济可持续性”的含义,尽管我们还无法正面回应由此而引发的许多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问题。虽然为我们无法预见的发展道路构建测量体系尚且存在着一些逻辑上的问题,但我们可以评估可持续发展在实证方面和结构上的障碍,进而评估未来社会人们最优化需要满足在这两个方面的障碍。

对于可持续性,我们可以在实践中确定一系列可能的解释(雅各布斯,1989,1990)。如果一个经济体当前的环境消耗(如上文所定义的)没有降低其子孙后代享受同等水平的环境消耗的机会,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经济体是可持续的。这种解释包含了绝对的代际平等。如果我们关心的某种资源没有不断增加,那么就意味着现金折扣率等于零——在未来的岁月里价值与现在相同。相比而言,关于经济可持续性的一种最保守的解释也许仅仅是,那

种经济消费水平,根据我们目前的预测,有可能避免某种形式的生态灾难。然而,在实践中,对于许多环境功能而言,这两个门槛或许已经等同了。“维持现有水平的环境消耗,如热带雨林,实际上将不能避免灾难:这些环境消耗水平正在导致灾难。也就是说,最低限度的门槛可能要求比最高限度的门槛更低的消耗率,在这种情况下,两个门槛实际上已经合二为一。”(雅各布斯,1989,第5页)

在这些情况下,为理想的环境消耗确定合理的标准也许已经不是太困难了。例如,服从总体“存量”超过生态系统可持续的临界水平的原则,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如渔业)不应该超过其再生率。对于不可再生资源,如矿物燃料,总输出不应该超过存量总“输入”,无论是通过经济利用已探明的储量,发现新的储量,循环利用,还是使用替代资源。关于废物处理,同样在现有绝对污染水平不会威胁生命支持系统的前提下,应该维持在低于增加总体污染的水平上。如果有朝一日这些标准在国际上达成共识(如同目前正在达成共识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那么各个经济体的表现

243 就可以通过这些标准来评价。

但是对于某些事情,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一说了。西方人均能源消耗量大约为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国家的80倍。世界上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消耗了全球四分之三的初级能源。如果人均能源消耗平均达到目前工业化国家的标准,那么到2025年,全球82亿人口每年将需要约550亿千瓦的能源——目前为100亿千瓦,如果人均消耗量保持不变,到2025年将为140亿千瓦(《布兰特伦报告》,1987,第169~170页)。这说明了一个事实,第一世界和第

二世界目前的能源消耗模式也许不具有可持续性,当然也就不能推广普及。毫无疑问,第一世界所利用的过多的能源和资源大部分支持了想要的满足,而不是基本需要的满足。

一旦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需要满足问题,另一个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了。未来人口的规模并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当代人有能力控制在某种范围之内的一个变数。经济可持续性的问题与未来人口规模问题密不可分。《布兰特伦报告》(1987,第 55 页)中提到:“发展的可持续性与人口发展的动态密切相关”。鉴于在一定时期内全球生产总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权衡未来人口规模和需要满足水平之间的关系。根据联合国对全球人口增长的预测,1985 年世界人口为 48 亿,2000 年达到 61 亿,2025 年将达到 82 亿。90% 的人口增长将出现在第三世界。此外,人口出生率降至人口替代水平的日期对于未来世界人口稳定的水平非常重要。如果 2010²⁴⁴ 年(仅仅 20 年后)能够达到这一点,那么全球人口将会在 2060 年稳定在 77 亿。然而,如果 2065 年才达到这一点,那么全球人口将会几乎增加一倍,到 2100 年达到 140 亿。

这种人口预测还必须考虑农业和其他食物来源的支持人口的能力。北方国家在较为合理的膳食结构方面取得的进步对此非常敏感。用粮食喂养的牛羊和家禽,生产每公斤食用肉需要消耗 3~9 公斤粮食(《布兰特伦报告》,1980,第 101 页)。然而,这还不包括所有其他的中间需要。有些中间需要,如住房、健康和教育,即使满足最基本的水平也是相对昂贵的。更不用说满足需要到最优化的程度。

表 11.1 我们建议的实现最优化的社会前提的指标

社会前提	社会指标的例子
尊重公民/政治权利	α 尊重联合国提出的权利的指数
政治参与	α 代议制民主指数 β 投票率 χ 政体中公民影响的指数
需要满足权利的物质基础:	
满足物生产	χ 人均“基本必需品”生产的价值
满足物的分配	β 一定百分比的最贫困群体的实际收入(相对于在各个发展阶段表现最佳的国家的比例)
需要转化	χ 需要满足与基本必需品的消费之比 α 人口性别比
物质再生产	α 人均不可再生能源消耗 β 人均温室气体排放 α 总生育率

注:

α 合理而可靠的普遍性或准普遍性数据。

β 只有少数国家有的数据,但是在这些国家有着清楚的可操作化概念。

χ 推测性较强的建议。

为了当代人,以及我们无法回避的未来人口的最优化需要满足,人口增长似乎应该降至某种水平,至少降至不至于损害当前的健康和自主水平。这种情况也许会作为提高需要满足的副产品而出现(康芒纳,1980);尤其是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从长远看来,有

245 可能降低人口出生率(科克伦,1977;H. 琼斯,1990,第164页)。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感到自鸣得意,因为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地方

非常年轻的人口比例很大,已经“积蓄”了很高的潜在增长率。因此,速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求我们具体的生育控制政策的中心任务放在提供最广泛的安全避孕措施。在第 10 章中我们已经证明,这种政策如果得到合理实施,还将有助于提高妇女的自主。倘若我们能够避免独裁主义的人口控制方法,在这个问题上,当代和子孙后代的总体利益似乎是一致的。监控人口增长的指标应该包括倾向于主动的和倾向于选择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以评价结果为目的的人口出生率测量方法。当然,上述观点并不是说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是全球经济可持续性的主要威胁。相反,更为突出的威胁倒是第一世界的过度消费及其破坏生物圈的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

我们已经确定了实现最优化需要满足的程序前提和物质前提,并且提出了衡量各种前提的制度指标。表 11.1 列举了所有这些内容。无论是哪一种文化,这些指标都为一种社会制度满足其成员需要的能力提供或建议了相关的证据。在第 12 章中,我们将利用这些指标来衡量不同国家群体在何等程度上有效地保证这些社会前提,制定合理政策以提高人的需要满足。当然,这种国际性的需要满足审查不能解释它自己的结果。这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的、关于需要满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就是我们在第 13 章中要简要描绘的。上述讨论还想当然地把民族国家当作衡量和比较需²⁴⁶要满足的基本单位。要再次重申,我们的解释并不暗示这种倾向。各个国家的能力以及它们在操作过程中受到的限制差异巨大——大小权力集团之间、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不发达国家之间,等等。某个社会表现糟糕的责任可能并不在该社会的范围之内。但是,

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在本阶段都不予考虑。首要任务在于掌握目前的情况,这项任务需要以国家为基础的指标,这些指标必须适用于所有社会,无论其信仰存在多大的差异。

第 12 章 描绘人类福利的蓝图： 三个世界中的需要满足

现代化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祸害人类，这是一个一直都没有定论的问题。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出现以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骇人听闻，19 世纪人们对社会进步的信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理性进步道路的理念又重新被人们拾起，福利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不断实践着以提高人类福利为社会目标的承诺。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悲观主义又占据了上风。国际主义者指出，第三世界处境悲惨，仍然受到新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剥削；环境保护和绿色和平运动也发出了不可持续性和生态危机的严重警告。这些“理性悲观主义”观点本身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观点的挑战和破坏。后者认为，发展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详细描绘了。

描绘客观福利的蓝图^①

我们相信,一套关于普遍性人类需要的具有连贯性理论会有助于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后现代主义批判所有关于发展的理念。我们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并不是要用安逸的观点取而代之,认为人类的未来必然会变得更好。我们的观点包含了对客观人类福利的理性审查:对现代世界的需要满足现状进行严肃审慎的评估,包括过去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的可能性。

248 人类福利水平是在提高还是在降低?不同国家和群体在需要满足上的不平等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我们的理论认为,只要能得到数据,就可以对这些问题给出实证的答案。我们打算在本章中提纲挈领地将它们勾画出来。但答案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基本需要和中间需要的准确结构本身就是对需要满足的解构性评估。从逻辑上看,很有可能现代化提高了某些领域的需要满足水平,但同时又降低了另外一些领域的需要满足水平。当然,同样,某些民族和群体的客观福利蒸蒸日上的同时,另外一些民族和群体的客观福利可能日薄西山。

至此,我们已经提出了衡量基本需要、中间需要及其物质和

① 本章写于联合国1990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之前,由于时间所迫,没有加入该报告中的一些最新数据。然而,我们在制作表12.4中利用了该报告。该报告和我们这个项目之间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森对两者的影响。一个国际性组织,充分运用科学合理的人类发展理论,提供一份人类发展的社会审计表,这份报告是首次尝试,因此也是一个规划人类需要的里程碑。我们在第8章中简要探讨了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森使用的方法之间的相似和不同之处。

程序前提的指标。在这里我们将把这些指标结合起来，构建出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群体的客观福利的社会轮廓。有些指标是群体的平均值，但许多其他指标将侧重受剥夺最严重的群体在需要满足方面的欠缺。为了说明这些指标对于特定群体的需要的适用性，我们还将展示一些男性和女性福利的比较数据。

这项工作称不上是我们的独创。第 8 章简要回顾了社会指标运动，在此，我们将大量借鉴这方面的知识。由于我们依赖于现有的数据，以下内容在实证方面没有什么新颖之处。然而，我们相信，我们的理论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有所建树。第一，通过提供一个清晰的普遍性需要的概念，并且从这个概念中演化出一个更为严格的分类，区分中间需要及其最优化满足的社会前提，我们的理论有助于整理现有的社会指标。第二，我们的理论制定了标准，从现有的、杂乱无章的社会统计中，鉴别出哪些统计能够提供有效的测度，以衡量客观人类福利，哪些统计则不能。第三，需要满足的一些重要成分目前尚未得到描述，我们的理论还有助于确定现有数据的空缺，并且提出新的指标弥补这些空缺。

在上一个半世纪中，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产力水平取得了巨大的提高，据估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全球货币化总产量价值高达 13 万亿美元。以世界总人口计算，大约每人 2 500 美元，相当于目前南斯拉夫或葡萄牙的平均收入。但是，鉴于当今世界资源分配很不公平，任何需要满足的全球平均数值都会造成误导。²⁴⁹ 低收入国家的消费仅占总产量的 5%，尽管它们有全世界 49% 的

人口,而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只有 16%的人口,但是却消费了 65% 的总产量。

因此,在比较国家之间不同水平的需要满足时,我们将遵循传统的南北划分的做法,“北方”为经济先进、发达或工业化世界,“南方”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工业化世界里,我们把资本主义国家划定为“西方”,把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划定为“东方”。由于我们使用的数据截止至 80 年代中期,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忽略苏维埃集团国家在过去两年中经历的政治经济变革,将它们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类型单独对待。我们还将采用常用的三个世界的划分,即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来描述这三个国家群体。在第三世界中,我们又把这些国家分为“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被视为独立的类型单独处理。在此,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不同国家和政治制度之间真实的差异,以及在最合理的、实现需要满足最优化的社会和经济政策问题上,我们能够从这些差异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基本需要与中间需要

关于这些国家群体的个体需要满足,表 12.1 列举了一些总结性的指标。该表使用了第 9~11 章中讨论的那些指标以及所有在这些方面可以得到的数据。然而,接下来的论述还采用了其他材料,对表 12.1 所反映的在某些时间点上的状况进行了补充,并且

316 人的需要理论

8. 识字率,1985(%) 69 43 46 73 (c. 100) (c. 100) 70

中级需要

水/营养

9. 安全饮用水,1983(%) — 54 33 59 (c. 100) (c. 100) —

10. 卡路里,1982 111 96 92 110 132 130 111

住房

11. 拥挤,70年代(%) — — — (61) 13 2 —

健康服务

12. 人口/医生,1981 1.7 3.7 11.6 5.1 0.34 0.55 3.8

13. 资源占有,1980
~1983(%) — — 49 (57) (c. 100) (c. 100) —

安全

14. 战争死亡人数,
1945~1985(%) 0.2 0.1 1.0 0.4 0.0 0.0 0.3

15. 凶杀案受害
人数,1987 — — — (8.3) 1.9 3.8 (4.6)

16. 贫困,1977~
1984(%) — 48 (55) (33) — — —

教育

17. 成年人:中等
教育(%) 16 14 (9) 10 42 30 16

18. 成年人:中等以
上教育(%) 1.0 2.5 (1.4) 4.8 (8.9) 11.7 3.7

19. 学生:中等
教育(%) 39 35 23 47 92 93 51

20. 学生:中等以上
教育(%) — — 3 14 20 39 19

生殖

21. 避孕, 1985(%)	77	35	21	50	—66—	50
22. 孕产妇死亡率, 1980~1987	44	340	510	130	—10—	250

251

注:

“低”收入、“中等”收入和“工业市场”经济体的定义来自世界银行(1988,第 217 页)。然而,我们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数据进行了重新计算,目的是为了包括以下 8 个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中东的 4 个高收入石油输出国被排除在这些国家群体之外,尽管在计算全球平均数时它们被计算在内。虽然把“发展”等同于人均收入存在许多问题(瑟尔沃尔,1983,第 1 章),但是世界统计数据组织方法使我们很难根据某个其他变量来组织和展示数据。除非特别注明,各群体中所有国家都根据人口进行了加权处理。当我们只有一个群体中半数以下国家的数据时,表中的数字是用括号括起的。

由于比较各国的人均收入存在着一些众所周知的问题,因此,该表提供了两种独立的测度。第二行是根据当前汇率计算出来的平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单位为美元,第三行则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也是美元,很遗憾,该表只提供了 1980 年的数值),更为精确地反映了各国实际收入的差距(世界银行,1987,268~271)。遗憾的是,我们还无法得到所有国家的该项数据。

—=无法得到。

定义与资料来源:

(按行数排序)

1. 总人口, 1986, 百万(世界银行, 1988)表 1。
2. 根据 1984~1986 年间美元平均汇率计算出来的 1986 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世界银行, 1988)表 1。
3. 根据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198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世界银行, 1987), Box A. 2。
4. 出生预期寿命, 以年为单位, 1986(世界银行, 1988)表 1。
5. 1 岁以内婴儿死亡率, 单位为每 1 000 名安全降生的婴儿, 1985(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987)表 1。
6.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单位为每 1 000 名安全降生的婴儿,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987)表 1。
7. 体重低于 2 500 克的新生儿百分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987)表 2。
8. 15 岁以上具有读写能力者的百分比, 1985(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987)表 1。
9. 能享有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定义标准的饮用水的人数(%), 1983(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987)表 3。
10. 人均每天卡路里供应量占正常需要量的百分比, 1983(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987)表 2。

11. 两人以上同住一室的房屋百分比,20 世纪 70 年代各年度(联合国,1987),表 4.5。
12. 平均每个医生服务的人口(单位以千人计),1981(世界银行,1988)表 29。
- 252 13. 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健康服务标准的人口百分比,1980~1983,(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7)表 3。
14. 1945~1985 年间战争中死亡人数占 1986 年总人口的百分比(联合国,1987),表 3。
15. 每 100 000 人当中凶杀案受害者人数(世界卫生组织,1989)表 10。
16. 收入不足以购买营养达到最低满意度的食品以及非食物必需品(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标准)的人口百分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7)表 6。
17. 1970~1982 年间所有受过中等教育的成年人的比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表 1.4。
18. 1970~1982 年间所有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成年人的比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表 1.4。
19. 中等学校各年龄段学生总数占中等学校适龄(一般为 12~17 岁)人口(1985 年左右)的百分比(世界银行,1988)表 30。
20. 所有中等以上教育机构(学院或大学)录取学生人数除以 20~24 岁之间的总人口(1985 年左右)(世界银行,1988)表 30。详见原文第 303 页。
21. 育龄已婚女性或其丈夫采取任何一种避孕措施(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方法)的百分比(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表 20。
22. 每年与怀孕相关的女性死亡人数/100 000 名安全降生的婴儿(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表 11。

婴儿死亡率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也是生存机会的敏感指标。婴儿死亡率的改善尤为显著,自 1950 年以来,许多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了一半以上。然而,在这项指标上,相对差距之大几乎不亚于以前,因为第一世界国家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例如在巴西的东北部地区,婴儿死亡率实际上呈上升趋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7,第 16 页)。印度和其他一些低收入国家的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比西方国家高出许多数量级。在以上两个指标上,中国的表现相对于其收入水平异常优秀。在工业化世界内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

预期寿命方面与发达西方国家之间几乎不相上下。但是它们在其他指标上继续落后于西方国家,而苏联的生存机会在 70 年代经历了绝对的倒退(戴维斯,1988)。

相比而言,获取残疾和疾病流行的直接的、具有可比性的指标要困难得多。有关具体的疾病,除了死亡率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有关患病者发病情况的数据。有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整理的化验或临床报告,估算了 80 年代早期疟疾和霍乱的发病率,结果显示了这两种疾病仍然是致使人们丧失能力的罪魁祸首(世界资源学院,1987,表 16.4)。表 12.1 中第 7 行所示的婴儿出生体重不足是一个评价(儿童)健康的直接指标。我们在这方面掌握了广泛的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在这个指标上的国家间差异要小于在死亡率指标上的差异,但模式是大体类似的,只不过中国的成就光芒四射,印度则相对黯淡无光。但对于大多数其他严重疾病,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没有具有可比性的数据,也没有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衡量方法,可以用来比较这些疾病致残的情况。缺少有效而可靠的国际发病率统计数据的情况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这实在应当引起相当的重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靠原因具体而明确的死亡率。由于第 9 章中列举的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死亡率统计不能用作直接的发病率指标。但这些统计数据确实给生者提供了一些关于这些疾病的特点和严重性的信息,尽管只是间接的信息。如果某一群中的一个特定样本患上某种疾病死亡,那么该人群中其他人很可能也难免染病。正因为如此,死亡率统计被运用于流行病学研究,分析死亡和发病的原因,对研究和制定有效的预防计划也

是至关重要的。表 12.2 总结了最新的全球数据,说明了南方和北方各自常见的、危害最严重的传染和慢性疾病。

表 12.2 世界主要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世界卫生组织,单位:千人)

	发展中国家	%	发达国家	%
传染与寄生虫疾病*	16 020	40	810	8
肿瘤	2 200	5	2 050	19
循环系统与某些退行性病变 [‡]	7 620	19	5710	54
围产期状况	3 080	8	170	2
受伤与中毒	1 980	5	690	6
其他与未知疾病	9 240	23	1 240	12

* 包括腹泻类疾病、流行性感、肺炎、肺气肿和哮喘。

[‡] 包括糖尿病、胃部及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肝病及肝硬化、肾炎、肾病综合症及肾下垂。

资料来源: H. 琼斯(1990)表 5.3,第 110 页。

当我们转而探讨衡量个人自主的直接指标时,就会发现这方面具有可比性的证据也非常匮乏。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对九个国家 and 地区的精神病患者进行过研究,这九个国家分别是丹麦、印度、英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台湾地区、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

- 254 研究结果(1973)发现,各国对于精神分裂症的具体诊断基本一致,而且大约 5 000 万人——相对于全世界人口的 1%——患有这种类型的精神病。许多人被收容在精神病院里,忍受着拥挤、肮脏的环境,遭受野蛮的虐待和忽视,条件之恶劣,令人震惊(科恩,1988,第 1 章)。萨托里乌斯(Sartorius)估计,患有抑郁性精神错乱的人超过一个亿,大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2%(1974,引自马萨拉等,1985,第 299 页)。很有可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变化,特别是市场关系的延伸和社会关系的销蚀,第三世界某些群体的精神健康水平不断恶化。尽管这些研究以及其他类

似的研究并不能绝对保证避免引入僵化的诊断模式,但是大量的证据显示精神错乱涉及范围广泛,并且严重干扰了患者社会参与的成功实现(马萨拉等,1985;贝瑟,1985)。

关于自主的认知因素,唯一普遍而可靠的证据就是读写能力(第 8 行)。这个指标记录了自 1950 年以来一种稳定而缓慢的提高态势。当时在全世界 15 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 55% 的人具有读写能力;目前在人口增加了一倍的情况下,识字率提高到了 70%。然而,在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提高的速度明显减缓,仍然有为数众多的人被剥夺了这种提高自主的最基本的需要。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里(中国显然是一个例外),情况尤为如此。在几个伊斯兰国家里,许多女性仍然不能读书写字。另一方面,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普及读写能力方面成效显著,加入了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行列。当然,仅凭读写能力一项,还不足有效衡量认知剥夺。但遗憾的是,对其他应有的社会技能的缺乏和对其他社会文化的接触的不足,我们的认知仍然很有限。

可以用来衡量自主的其他因素并且具有跨文化可比性的指标非常稀少。关于社会参与机会,最普遍的数据是正式部门的就业统计数据,但即使这些数据也并不可靠。等级制度、种族、性别和其他特征给有效参与设置的障碍只能通过解构数据来显示;我们只是在以下的表 12.4 中尝试对性别差异进行了数据结构分析。

现在让我们看看第 10 章中确定的一些中级需要,我们从获得洁净的饮用水开始(第 9 行)。尽管第一世界也不能绝对保证供水安全——仍然存在着铅、硝酸盐和其他污染物质的威胁——但是第三世界里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的程度要大得多。除了中国以外,

第三世界 86% 的城市居民和 44% 的农村居民可以得到安全的供水, 这些数字表明, 1970 年以来, 供水状况得到了改善, 因为在 1970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 65% 和 1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987, 第 114 页)。最贫困的国家, 主要是一些非洲国家, 状况还是最差的。

营养不良方面的记录既反映了一个全球性的进步, 又反映了威胁到生命的地区性短缺。全球性的进步非常重要, 不容低估: 除了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之外, 全世界所有地区的卡路里、蛋白质和脂肪的平均人均日供应量在 1961~1984 年间不断增加, 亚洲出现了实质性的增加。在这段时期里, 全球人口, 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人口巨幅增长, 同时, 食物供应量也在不断增加。然而, 这些笼统的平均数掩盖了一些实际的短缺, 一些重要的条件必须加以说明。

第一, 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现状非常糟糕, 而且还在不断恶化。²⁵⁶ 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外, 平均人均卡路里和蛋白质摄入量下降。1982 年, 前者的平均数量仅达到需要量的 92%。在 21 个低收入国家中, 1985 年的人均每日卡路里供应量低于 20 年前 1965 年的水平。第二, 各国内部的食物分配与需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在巴西这个中高收入国家和主要食品出口国, 50% 以上的儿童营养不足(科姆布拉(Coimbra), 1984, 第 321~328 页)。在婴儿死亡率较高的国家里, 几乎有五分之二的 5 岁以下儿童患有次中度或严重营养不良, 孟加拉国患有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多达 21% (严重营养不良被定义为体重不足该年龄段标准体重的 60%)。在第三世界国家里(有些国家例外, 特别是中国), 五分之

一以上的年龄在 12~23 个月的婴儿还表现出消瘦的迹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7)。即使在第一世界一些最富裕的国家里,例如美国,营养不足和营养不良也反复出现。总之,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充足的食物养活所有的人,甚至许多国家的食物过剩,但是营养不足和营养不良依然是一个严酷的现实。

住房条件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城市中不断恶化,而在第一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却在继续改善。表 12.1 中的第 11 行提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但并不可靠的)居住标准,显示了居住密度超过两人一个房间的家庭的百分比(同样居住密度的人数的比例要高于这个数字)。从表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国家的拥挤状况极为严重,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少数低收入国家的状况更加严重。在东方国家这一组中,大密度居住的人口仍然数量巨大,但是在西方国家里,这样的人口已经很少了。令人满意的卫生条件这个指标在第三世界的城市居民那里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从 1970 年的 34% 上升到 1985 年的 62%。但是乡村居民受剥夺的状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仍然有 85% 的居民缺乏令人满意的卫生设施。在第 10 章中我们讨论过,许多低收入住房缺乏干净的饮用水,而且位于不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理环境中。把这些因素和上述数据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断定,第三世界的住房需要满足的程度比第一世界要低得多,东方国家则处于两者中间的某个位置。当然,西方国家也有许多无家可归者,许多人居住条件拥挤不堪或者卫生条件不佳,而第三世界中有些人住房条件十分优越。即使如此,这些数据仍然 257 表明,住房需要满足的匮乏反映出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天壤之别。

大体反映出**健康服务**享有权的是第 12 行中一个相当粗糙但是可以普遍得到的指标:每位医生服务的人数。1965 年以来,在世界所有地区,这个比例都在不断提高,但是各国之间仍然差异惊人。这项指标与人均 GDP 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但是中国和印度(仅仅在这一方面)的供应量再一次超过了根据其经济资源所推算出来的供应水平,第二世界国家同样如此。世界卫生组织估算的“享有健康服务权”的人口比例表明,在 80 年代早期(第 13 行),除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人以外,低收入国家大约一半的人口根本享受不到任何健康服务。也许更令人震惊的是,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状况几乎同样糟糕。这些数字可能夸大了通常受到地理环境限制的享有权。虽然在一些特定健康计划的覆盖范围显著扩大,例如腹泻性疾病的免疫和口服补液疗法,但是千百万人仍然不能享受世界卫生组织所呼吁的那些基本保健权利。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例如,美国有 3 500 万到 4 000 万人没有医疗保障(伦纳和纳瓦罗,1989)。

表 12.1 中的第 14、15 行是以与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和凶案受害人数估计的人身安全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争继续残害人的生命,至今已有几乎 2 200 万人惨遭杀害。人身安全受到的这类威胁非常明显,但是具有极强的区域性:在过去的 20 年中,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主要有尼日利亚、孟加拉国、越南、柬埔寨、伊朗和伊拉克。一些最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本来就生活在很低的需要满足水平上,这种高度集中的战争威胁使他们贫苦不堪的生存状况雪上加霜(参考西瓦德,1989,第 22 页)。凶杀案方面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出少数国家过高的发案率。危地马

拉、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泰国和美国的发案率非常高。中等收入国家不平等最为突出，国内安全问题似乎也最为严重。但是这个发现也许还要经过其他更为有效可靠的指标的检验，如果我们可以得到这些指标的话。

经济不安全作为一个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其最极端的水平 258 大致可以通过计算“绝对”贫困水平（第 16 行）以下的人口数量来衡量。绝对贫困水平通常被定义为收入不足以购买营养达到最低满意度的食品及非食物必需品。印度和其他低收入国家（除中国以外，因为我们无法得到中国的相关数据）有大约一半人口达不到这个绝对的最低标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实际人均收入是低收入国家的三倍以上，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家里，也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面临着长期的经济不安全问题，厄瓜多尔和马来西亚的比例还更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7，表 6；比格斯頓，1987）。在这种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标准上，有效地计划未来的生活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难题，因此，健康和自主都受到了伤害。如果以前就很低但是已经为人们所适应的生活水平再次大幅降低，也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在 80 年代经济极度不景气的时候，第三世界的许多群体就遇到了这样的困境。而 90 年代的前景看起来也不乐观。

大多数国家都有合理而具有一致性的数据可供衡量享有正式教育的权利之用。接受中等学校教育的机会尽管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第三世界里仍然是有限的，只有在第一世界中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再是极少数人的特权。第 17、18 行显示了这种以往模式对当前的影响，表明了在不同国家群体中成年人的教育状况。

虽然教育状况与人均收入存在关联,尤其是高度教育,但是仍然有许多例外。中国和印度的受教育人口较多,超过了依照其收入水平所推算出来的保障水平。几个中等收入国家则体现出高度不平等的(过去的)享受教育的局面,接受过任何中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相对较低,而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却相对较高。第二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能够享受最广泛的基础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也和西方国家差距不大。当然,这些有关正式教育投入的数据绝对不能代替直接的衡量学习的指标——无论这些数据是从正式渠道还是非正式渠道获得的。

最后,表 12.1 还提出了两个数据,关于生殖及女性因为怀孕
259 和生育在健康以及自主方面受到的具体威胁。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得到以下信息:获得避孕知识的便利性、女性自身获得节育器具以及绝育和流产的机会。来自《世界生育率调查》的避孕方面的指标(第 21 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替代指标,尽管这些数据可能低估了避孕的普及程度,甚至没有考虑到现有避孕技术的相对安全性。它们显示,在过去的 20 年中,采取避孕措施的人数稳步增加,但是各国之间,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之间(印度、中国和一些其他低收入国家除外)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

这些数据还需要另一个指标的补充,这个重要的生殖选择指标就是合法流产权。合法流产权(必要但不充分的权利)的比较结果表明,最自由的是中国和苏维埃集团的部分地区,大多数西方国家紧随其后。然而,在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里,这种权利不是非法就是得不到(狄克逊—米勒,1990)。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断定,缺乏生殖选择的权力对健康和自主构成的威胁,在大多数第

三世界国家里仍然非常严重,但是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里已经大大减少。但是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自由要放在特定的环境中来理解。苏联过度依赖于流产,把它作为一种控制生育率的措施。这种做法对女性健康构成了威胁,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实行的生育控制政策限制了女性在其他方面的自主(希利尔,1988)。

孕产妇死亡率的比较水平(第 22 行)说明了这些问题以及相关的生殖权缺乏所造成的直接影响。这些数据表明,孕产妇死亡在经济发达世界里已经几乎绝迹,但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仍然相当普遍,尤其在非洲。据估计,在埃塞俄比亚,每 100 个婴儿诞生就有两名女性死亡。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减少孕产妇死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诸多影响孕产妇死亡率的因素当中,有两个因素最为重要:每位母亲生育孩子的数量以及两次生育之间的间隔。总生育率是衡量前者的一个指标。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印度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这个指标出现了实质性的下降。然而,在大多数最贫困的国家里,这个指标依然非常高(世界银行,1988,表 33)。

对于我们的其他中间需要,可靠的具有可比性的数据非常稀 260
少或者甚至根本没有。环境质量没有统一的监控数据,却有大量不系统的数据可供借鉴(联合国,1987)。例如,空气污染数据显示,1973~1980 年间,大多数监控站的检测结果表明,二氧化硫和烟尘集中度下降,但是北方国家城市的下降幅度比南方国家城市更为明显。的确,在相当数量的第三世界城市里,这段时期的空气污染继续恶化。然而,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内部差距都很大:例

如,罗马和几个东欧城市的污染程度都非常严重。铅中毒是人类健康受到的另一个重要威胁。这方面的环境数据虽然有限,但是还是能够表明墨西哥城最为严重(室外靠近熔炉的地区),而英国和比利时比瑞典和日本严重。如果再加上河流、湖泊和地下水污染,我们很难创建一个简单的环境质量指数。但总体情况是,第二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污染水平通常是最高的,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第一世界国家中污染水平都在不断下降,第三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的污染水平正在迅速上升。我们在下文中还要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在大多数其他中间需要的领域,当今的全球指标不足以反映出客观福利。以下几方面的社会报告水平急需提高:残疾的发病率及其广泛程度、精神病、获取社会相关技能和参与重要社会活动的机会、自由时间的多少、工作环境的质量、儿童遭受忽视、虐待和粗暴对待的程度、首要支持群体的存在与缺乏以及经济不安全等。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在表 12.1 中,许多统计数据并非令人满意,不能作为精确指标来衡量我们实际上想要衡量的领域。例如,我们需要更好的衡量学习的指标,如掌握或缺乏某些具体知识(数学、科学、历史和比较文化)的人口比例。尽管如此,这些不足之处并不意味着任何有关世界社会状况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更不用说的不可能找到根据的)。我们在这方面的无知并不像相

261 对主义者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我们可以集中现有的涉及主要国家群体的证据,从总体上得出一些有关个人的基本需要满足的结论。比较人们的客观福利水平也是有可能的,尽管他们生活在相当不同的社会、经济、宗教和政治环境中。

社 会 前 提

基本需要满足的测度无论如何精确,也不足以证明任何社会群体提高和最优化自己需要满足水平的潜力。它必须依靠物质和程序前提指标加以补充,这些物质和程序前提可以合理而民主地保障各个群体提高各自社会参与和选择的能力。这些社会需要满足方面的信息甚至比基本需要方面信息还要匮乏,因此,所有审查工作的现实都远远落后于需要,令人感到非常可悲。尽管表 12.3 仅仅集中了 6 项指标,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指标是可靠的,而且具有可比性。

表 12.3 三个世界的最优化需要满足的社会前提

	第三世界				第二世界	第一世界	全世界
	中国	印度	其他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公民/政治权利							
1. 人权,1984	23	60	(38)	56	24	91	50
2. 民主,1985	0	3.0	0.7	1.8	0.3	4.0	1.7
物质							
3. 基本必需品 产量,1975	——	0.4	——	[0.6]	0.8	1.6	3.4
4. 20%最贫困者的 收入,1980	—	201	(189)	(582)	—	3113	(1353)
可持续性							
5. 人均能源消 耗,1985	532	208	88	767	4661	4952	1498
6. 碳排放量,1987	0.36	0.29	—	(1.82)	2.47	3.00	—

注释和资料来源(按行数排序):

除了特别注明之处以外,如同表 12.1,各国家群体都根据人口进行了加权平均处理。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我们只能得到该群体中不到一半国家的数据。

1. 休曼那的人权表现指数,1984(休曼那,1986,第 14~15 页)。
2. 韦森的政治制度分类,1985。分值:稳定的民主制度=4,不安稳的民主制度=3,部分民主制度=2,有限的独裁制度=1,专制制度=0。未加权平均数(韦森,1987)。
3. 科尔和迈尔斯计算的 1975 年基本需要满足物的总输出量,单位为万亿美元。此项中的国家群体与表中其他项目使用的分类并不完全一致。“第一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加上南非,去掉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这些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香港地区、以色列、韩国、墨西哥、波多黎各、新加坡、台湾地区和欧佩克成员国。中国和印度没有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分出来区别对待(科尔和迈尔斯,1984,表 5.16)。
4. “罗尔斯”最贫困者的实际收入指数,单位为美元,1980。这个数字等于以 1980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世界银行,1987,Box A. 2)乘以五分之一(20%)收入最低的家庭的收入份额(1970~1986 年间不同年度)(世界银行,1988,表 26)除以 20。
5. 人均能源消耗(公斤石油当量),1985(世界银行,1988,表 9)。
6. 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二氧化碳,甲烷和氟氯化碳(CFCs),单位为公吨碳数,1987,(世界资源研究所,1990 年 6 月 15 日《卫报》报道)。

我们已经介绍过休曼那的人权综合指数;表 12.3 中第 1 行为 1984 年的计算结果。数据表明,在尊重人民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西方国家做得最好,苏维埃集团做得最差。低收入国家在尊重个人权利方面往往也表现较差或者很差,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同样如此。然而,在低收入群体中,印度的得分相对较高,表现较好的还有塞拉利昂、塞内加尔和斯里兰卡。在中等收入国家当中,波多黎各、乌拉圭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得分高于许多西方国家。

如果想要详细描述提高需要满足程度的程序前提,我们还需要政治参与指标。表 12.3 采用了一项最新的调查,这项调查把政

治制度划分为五种类型，划分的依据是根据政治制度赋予公民影响国家政策的权利范围。代表制民主制度在 80 年代中期的第一世界²⁶³里稳固健全，在苏维埃集团不存在，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非常脆弱或者根本不存在。然而，印度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再一次成为值得关注的例外。库瑞恩(1979, 表 43)和德比希尔(1989, 第 3 章)也发现了大致相同的模式。根据西瓦德(1989, 第 21 页)的统计, 1988 年, 64 个政府, 也就是说, 半数以上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 处于军事控制之下, 这个数字至少在过去的十年中是最高的。

关于有效的社会和经济权利的物质前提, 表 12.3 提出了两个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水平需要满足的物质潜力。第 3 行提出了一个指标, 用以衡量我们提出的经济模式的生产阶段的成效, 这个指标采用了科尔和迈尔斯估算的“基本必需品”产量, 这个概念与我们的需要满足物非常相似。此项中采用的国家群体分类方法与其他项目不一致, 因此只能起到说明性的作用。尽管如此, 它们还是直观地说明了当今世界在需要满足的物质基础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全世界在“奢侈品”消费方面(表中未显示)的不平等肯定会更严重。

结合分配阶段, 由于我们还无法得到各群体的基本必需品消费的货币化测度, 所以我们不得不权且使用第 11 章中讨论的实际收入的测度。在 20% 最贫困者的收入与总人口收入之比这个指标上, 现有的数据表明, 收入和需要满足最不平等的国家是第三世界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这个结论为库兹涅茨特备受争议的倒 U

字形假设提供了支持。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倒 U 字形关系(1955;比格斯顿,1987;拉姆,1988)。地区性效应也很明显,拉丁美洲国家是最不平等的国家(瑟洛斯基,1981)。第 4 行采用了这方面的数据以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数据,计算出“罗尔斯”最贫困者的实际收入指标(根据各国家群体中选取的国家)。

当然,第三世界的最贫困者的物质资源和第一世界国家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1980 年印度最贫困者的平均年收入为 200 美元,瑞典为 4 400 美元,前者不足后者的 5%。另外,在高收入国家
264 群体内部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例如美国和瑞典之间(参看表 13.1)。为了克服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所造成的不可比性,我们在第 11 章中鉴选出一些总体收入水平较低但是成就卓著的国家。例如,这些比较结果表明,肯尼亚总人口五分之一的最贫困者的平均实际收入为 83 美元,而斯里兰卡为 355 美元(1980),前者不足后者的四分之一。在中等收入国家当中,差距同样很大——巴西最贫困者的实际收入为 336 美元,低于比自己贫困得多的斯里兰卡,仅为南斯拉夫最贫困者收入的四分之一。在生产效率高而且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里,最贫困者的日子最好过;反之同理。因此,再分配过程向贫困者倾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补偿经济总产量较低的负面效应(斯图尔特,1984,第 98~99 页;参看拉姆,1985)。

在我们提出的经济模型中,下一个阶段是需要的转化过程。我们已经注意到决定这个阶段的成效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家庭内部的收入分配。我们发现,全世界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女性的

收入通常几乎全部用于满足家庭的集体需要，而男性往往留出相当数量的收入用于个人花费(埃尔森,1990)。虽然我们仍然缺乏可靠的具有可比性的信息来比较各个社会家庭内部不平等问题

的异同。但由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一部分第一世界国家在 80 年代中实施了“结构性调整政策”，削减社会服务，提高食品价格，这种不平等问题很有可能更加严重。其结果妨碍了生殖，而且影响到儿童和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成员的生计，因为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女性的无偿劳动一直负担不起这些政策的所有成本(科尼亚等,1987)。一项针对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的低收入社区的研究显示了令人痛心的结果。大约 55% 的家庭女性勉强能够应付这些政策的影响，而 15% 左右的家庭女性入不敷出。她们“精疲力竭，家庭破裂，孩子失学后流落街头，卷入街头黑帮，面临着毒品的侵害”(埃尔森,1990,第 24 页)。但是这种证据仍然很零散，我们无法根据目前的了解来确定需要转化过程的成效如何。

最后，我们需要考虑物质再生产过程以及为了满足需要而进 265

行的生产所受到的全球生态限制。表 12.3 中的第 5、6 行对此提出了两个监控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以人均能源消耗来衡量不同国家群体满足需要的资源成本。这项指标显示，当今世界的资源利用存在巨大差异。在这一点上，工业化国家——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和整个第三世界泾渭分明。第二个指标采用了世界资源研究院计算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西方和东方的工业化国家赫然成为威胁全球环境平衡的主要因素。例如，西方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是印度的 10 倍。这样，这些物质再生产指标证明了我们先

前做出的关于基本需要满足的发现。它们揭示了当今北方国家政策给全世界,给贫困国家造成的代价,尽管这些政策为今天北方国家的生活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需要满足的性别差异

我们简要地审视了全球需要满足,在结束这项工作之前,让我们说明一下,如何运用同样的需要理论和同样的方法来评估特定群体的需要满足水平。我们将集中关注女性的需要。在表 12.1 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女性的生殖需要的满足水平问题。表 12.4 将从另一方面根据性别来分解几个普遍性需要指标。西格和奥尔森首先从生存/健康入手,把女性的状况总结如下:

266 从生理上说,女人比男性更强。但是如果女孩和成年女性的健康问题受到忽视,这种优势就会丧失。在贫困国家和农村地区,频繁生育、缺乏乡村级别的保健以及重男轻女的观念,使女性的生活危险性更大。女性比男性劳动更艰苦,时间更长,吃得更少更差,挣钱更少,没有控制资源的权利,即使在生育和哺乳期间也是如此,所有这一切使女性更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特别在贫困国家中(1986,第6页)。

森(1990)认为,一个国家人口中男女性别比是一个很好的衡量女性健康受到相对剥夺的指标。他指出,如果受到和男性同样的关怀,女性往往有更大的生存几率,女性和男性的比率大致为

1.05 : 1。如果大大低于这个比率,则表明由于各种文化和经济因素女性面临着严峻的不利局面。表 12.4 中第 1 行所采用的数据表明,南亚和西亚做得最差,印度的比率为 100.3,而巴基斯坦只有 0.90。比率最高的国家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中,然而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比率相对较高,表明仅仅是经济发展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

在自主方面,国际上有关文盲的统计数据非常明确:女性的读写能力尽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提高,但是在贫困国家中仍然明显地受到很大的限制,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斯里兰卡和越南。尽管几乎在每个国家里女性的文化程度可能都比男性低,但是差距特别突出的还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这种性别方面的不平等显然不适用于那些已经完全普及了读写能力的国家。然而,关于功能性文盲的更为复杂的数据表明,在美国,可能在任何别的国家也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女性与男性相比,处境更为不利(西格和奥尔森,1986,第 112 页)。当然,有关自主方面的性别差异,我们如果想要进行更多的评估,就需要更多精细敏锐的指标。例如,有人曾经对年轻的女性的婚姻观念进行过调查,结果表明,在非洲的部分国家、中东、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性问题上,女性的自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西格和奥尔森,1986,第 2 部分)。

表 12.4 从就业和政治代表权两个方面反映了在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机会方面的性别差异。两者均显示,在“三个世界”之间的差异要小于在其他需要满足指标上的差异。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女性的就业机会和有偿劳动力参与程度都有所提高,但是“回

报性就业”(所有家庭以外的工作,可能但并不一定有收入)的性别比表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远远高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森, 267 1990,第 64 页)。但这个指数忽略了女性的无偿家庭劳动,因此还

表 12.4 需要满足的性别差异

	第三世界			第二世界	第一世界
	中国	印度	其他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女性的得分,假设					
男性分值为 100					
健康					
预期寿命,1988	104.3	100.3	104.5	108.8	109.0
学习					
读写能力,1985	68	51	46	83	98
参与机会					
就业,1988	76	34	48	54	61
立法机关,1988	21	8	9	14	8
教育					
初等,1986~1988	89	72	79	93	99
中等,1986~1988	74	54	58	96	102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表 9、11、20、23、24

需要详细的时间预算研究加以补充。西格和奥尔森(1986,第 3 部分)收集整理的数据证实,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女性一直承担着“双重负担”。的确,一些对提高整体福利水平有利的趋势将额外

的责任和负担强加于女性。所有国家的女性都比男性工作时间长,但绝对工作强度最高的还是较贫穷国家的女性(莱斯利·多亚 268 尔,1990a;1990b)。

尽管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所有国家的女性都赢得了投票权,但是表 12.4 表明,她们仍然被在相当程度上被排斥在外,不能参与行使政治权利。只有在斯堪的纳维亚、东欧和中国,女性才在立法机关里真正拥有自己的代表。但是她们在政府执行部门中的权力受到严重剥夺;例如,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内阁中,女性成员的数量少得可怜。在这个需要满足领域,“三个世界”间不存在任何显著差异。女性在哪里都处于弱势。

至于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过去的 20 年中,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为女孩子提供初等和中等教育机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大多数第三世界的中等收入国家几乎已经达到了形式上的平等。然而,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里,性别歧视依然存在。例如在也门共和国,接受中等学校教育的女孩子的数量只有男孩子的 11%(世界银行,1988,表 33)。此外,近年来,“结构性调整”政策由于开始收取教育费用,在一些国家里女孩子受教育状况的改善进程正在受到破坏。

让我们再看看其他几个中间需要。有一些证据表明,在几个低收入国家里,女孩子的营养状况不如男孩子(森,1984,第 15 章)。我们也已经提到,在 80 年代中,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里,女性儿童的营养状况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在《世界生育率调查》中也可以找到翔实的证据,证明许多家庭重男轻女。在一些

亚洲国家,尤其是近东地区,男孩备受偏爱。这意味着女孩得到的食物较少(西格和奥尔森,1986,§3)。还有许多间接证据表明,女性的经济安全质量在总体上低于男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第22、110~111页)。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暴力构成了需要满足的性别差异的另一个普遍性因素。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搜集汇编了强奸方面的比较数据,但是两套数据都存在着大量方法论和测算方面的问题。这些数据提示我们,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里,强奸案的发案率是最高的(美国司法局,1988,表6)。

最后,提高需要满足所必需的程序和物质前提上的性别不平等状况也是可以监控的。《联合国女性问题回顾(1975~1985)》得出的结论是,在国籍权、法律能力、财产所有权、行动自由和姓氏选择权等方面,保障女性的法定平等权利的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联合国,1985)。但是有两个重要事实与此背道而驰。第一,仍然有许多国家在人权方面没有取得这样的进展。例如,在北非、中非中东和南亚次大陆的许多国家里,女性没有与男性同等的继承财产的权利(西格和奥尔森,§21)。第二,在劳动分工的性别差异、性别合同以及父权制度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法定权利未必能够保障实际权利。即使在第一世界中,“双重劳动负担”加上“贫困的女性化”,越来越多的婚姻走向破裂,这一切都在实际上严重剥夺了女性享受业已改善的法律权利的能力(司各特,1984;诺里斯,1987,第1~4页)。

结论：全球福利模式

我们希望，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证明，各国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及其物质和程序前提是可以比较和评估的，即使这些国家人口众多，政治和社会制度各不相同，信仰也大相径庭。相对主义是错误的：客观福利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可以比较和评估的。当然，这种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的缺陷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这些问题并不能否定谨慎利用手头最好的统计材料所得出的结论的有效性。人的需要是大家公认的，而且是永无止境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义务全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而不是追求完美。切斯特顿曾经写道：“如果一件事情值得做，那么即使做坏了也是值得的”。此外，定期编纂这样的社会审计将会不断发现数据中的薄弱环节和差距，更大的压力会促进数据质量的提高。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在三个世界中的发现。

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低收入国家

让我们暂时把两个巨人搁在一边。在我们有据可查的范围之内，低收入国家在基本需要满足的每一个领域中，需要满足水平都是最低的。此外，这些国家提高需要满足的程序和物资前提极度落后。特别是女性，在最贫困的国家里，处于最为不利的境地，尽管各国女性的境况也存在着一些很大的差异。总之，在第三世界最贫困的国家里，人类的繁荣发达面临着巨大的障碍，令人望而生畏。然而，有些国家的出色表现，特别是斯里兰卡（至少截止到最

近几年),支持了一种观点,即需要满足和人均收入之间绝对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或线性关系。从逻辑上分析,很有可能在那些信息稀少或者完全缺乏的领域中,例如儿童关爱,第三世界的水平(相对或者绝对)更高。但是,在没有可靠数据的情况下仅凭这一点就断言在此大量应用我们现已获得的知识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愚蠢的做法。

在满足基本需要方面,中国是低收入国家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在许多性别不平等指标上的表现也相对非常出色。

印度在满足某些普遍性满足物特点方面优于其他贫困国家,如清洁的用水、健康服务和教育。尽管如此,印度在其他领域中的记录非常恶劣。印度女性的基本需要满足的总体水平是最糟糕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印度在尊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表现得相当不错。

中等收入国家

这些国家在人均收入和需要满足方面差距很大。但是总体而言,需要满足水平位于西方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尽管通常更接近于后者。生存机会更类似于那些最贫困的国家,在大多数国家里,人民比中国人还要贫困,尽管平均健康状况也许比其死亡率所显示的状况要好。人均卡路里消耗量为需要量的110%,这说明营养不足的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绝对贫困的比例仍然很高,这又说明分配不公平导致了大面积的营养不良。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在水供应和健康服务方面表现仍然很差,群众的住房条件也很恶劣——接近第三世界贫困国家的标准,而距离第一世界的标准

还相当遥远。人身安全和经济安全状况普遍不佳,尤其是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里,人权基本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指标显示,这些国家里人民受教育和识字的机会位于最贫困国家和最富裕国家之间。然而,根据一些其他的指标分析,女性受教育和识字的机会以及平均自主水平通常比较高(中东地区除外)。数据表明,这个群体中的一些国家达到了较高的总体福利水平,如哥斯达黎加。

271

第二世界

尽管人均收入较低,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在营养、人身和经济安全以及最值得注意的教育机会等方面,达到了与第一世界不分上下的基本需要满足水平。然而,它们在身体健康方面做得不太好,在充足住房的提供上更要差一些。女性可以享受很好的受教育机会,但是也受到了和西方女性一样的权利剥夺,也许还有其他方面也受到了剥夺,例如沉重的双重负担剥夺了她们的自由时间。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尊重极少,在改善社会前提的其他任何方面也鲜有成就。毫无疑问,1989 年的东欧事变之后,这种状况将会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结果目前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第一世界

在几乎所有有据可查的领域中,西方的基本需要满足水平是最高的,也是提高需要满足水平的物质/程序前提最安全稳固的地方。在我们已掌握信息的许多方面(但不是所有方面),第一世界国家的女性福利是最高的,尽管还存在着一些根深蒂固的基于性

别的不利因素。然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还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但是程度相对较轻)占用了绝大部分地球资源,这种做法在空间上无法普及,在时间上不能持久。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表现其实并不怎么样。

在其他方面,北方国家所享受的高水平的、基本的、程序化的需要满足,可能也是以南方国家的较低水平为代价的。相比之下,第三世界的表现非常糟糕,而且在政治和经济上严重依赖于北方国家,这两者之间很有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尽管关于这种联系的性质有着很多激烈的争执。美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限制其他国家的
272 权利,如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这种“掠夺式的民主”的后果也不应该被忘记,尽管我们还无法得到很好的指标来衡量这种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参考乔姆斯基和赫尔曼,1979)。西方国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压制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权利,同时保护自己国家公民的权利。同样,前苏联过去也积极利用自己的国家自主权来剥夺其他国家的权利。然而,所有这一切不能对有关这些全球不平等问题任何特定解释或提高全球福利的任何具体战略作出支持或否定。这些让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应该是另外一项研究的内容。

当然,我们的审计工作仍然未能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把迥然相异的各个指数结合到一起,构建一个衡量人类福利的综合指数。我们在第8章中就曾绕开了这个难题。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提供水平高但婴儿死亡率也很高,我们该怎样衡量其成就?但在实际应用中,这种困境似乎不太紧迫,因为一般来说同一个国家在需要的各个维度和在人们普遍需要的各种满足物的特性上的排

名是相同的。在此，森提出的“支配性偏序”原则可以发生作用了（森，1987，第 4 页）：如果 X 拥有的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比 Y 多，而且任何其他东西不比 Y 少，那么 X 的生活水平就比 Y 高。关于我们的基本需要和中间需要，在很多（但并非所有）情况下，当我们比较当今的第一世界和低收入第三世界时，道理就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些重要的例外，现有的统计数据可能会掩盖其他排序不同的生活领域。在支配性偏序原则不适用的地方，我们有理由根据受剥夺最为严重的需要领域来确定某个人、群体或国家的排名，无论他们在其他领域里多么富有。正如我们在第 8 章中所论述的那样，后者无法补偿前者（彭兹，1986，第 171 页；里谢尔，1972，第 4~5 页）。

以上的全球审计并不是我们独创的，我们广泛采用了大量现有的最新统计数据。我们认为自己的独到之处在于把测度和理论联系到一起。尽管现有的数据与理想状态尚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仍然努力地证明了，我们的理论能够选择并且合理安排现有的数据信息，展现出一幅现代世界个人需要满足的图画，尽管是以高度概括的形式来展现成员数以亿计的群体的情况。与相对主义的观点正好相反，我们可以通过确定人类解放的共同前提，在信奉天主教、儒教、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之间进行十分有效的比较。

第四部分

人类需要的政治

第 13 章 建立需要满足的政治经济学

第 12 章描述了当代世界需要满足的现状：它并没有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这些发现对“三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世界都提出了问题。根据传统方式定义和计算的经济增长对于需要满足的水平和分配的贡献是什么？还有哪些其他政治和社会制度和过程在起作用？为什么更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未能实现其提高需要满足水平的明确目标而超过西方国家？如何解释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中各国所取得成就的巨大差别？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在本书中无法全面透彻地分析解决。在本章中，我们只是试图为“三个世界”分别列出一个提纲，列举其满足需要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因素，并且列出一个未来研究的日程表。

第三世界中的经济发展与需要满足

从第 12 章中提供的材料来看，在人类需要的许多领域中，满足水平显然与人均国民收入有关。例如，图 13.1 表明了预期寿命和人均收入之间非线性的关系。根据斯图尔特(Stewart, 1985, 第 62 页)的观点，各国 70% 的预期寿命差别可以通过人均收入的差

别加以解释。同样,穆恩和狄克逊(Moon and Dixon,1985)发现生命指数中的体质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①这种相关性似乎为(根据传统方式定义的)经济增长是提高客观福利的必要条件这种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种关系对于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对于现代化战略都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有的所有证据表明,关于经济发展和福利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得出这种简单的结论。这种情况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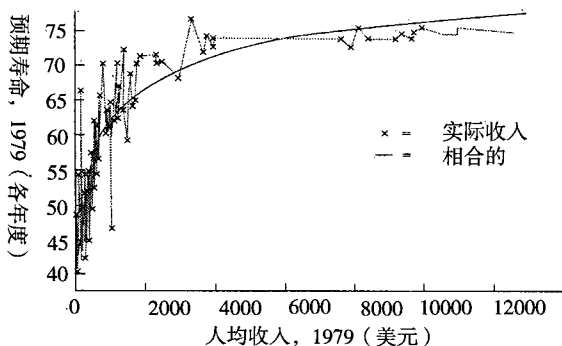


图 13.1 1979 年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关系图

资料来源:斯图尔特(1985),图 4.2,第 61 页。

第一,图 13.1 中的数字关系所依据的指数只涉及了人类需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已经注意到,对于一些需要满足的领域,我们没有相关资料,而在大多数其他领域中,我们尚需更加完善的指标。

^① 关于经济增长、各种工业化指数以及一些基本需要满足测度(通常是 PQLI 或其独立成分)之间的相关性,有大量文献可查。例如参看希克斯(Hicks,1982);拉姆(Ram,1985)。全面概述请参看斯图尔特(1985)第 4、5 章。辛格拉尼里(Cingranelli)和赖特(Wright)的几位撰稿人将这方面的分析加以延伸,包括了衡量政治和人权的测度。

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完善了这些指标,客观福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许不存在或者甚至相反。例如,老年人与世隔绝,“个别人”虐待儿童,这些现象在高收入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都非常普 279 遍。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得出结论时应该特别慎重,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第二,我们看到的这种关联可以用不同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一方面,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收入越高,食物消费水平越高、住房越好、公共产品更广泛——特别是饮用水、卫生、保健和教育计划。另一方面,疾病、营养不良和文盲的减少可以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需要满足物的产量,提高通过改善消费模式和抚养孩子的方式把这些转化为需要满足的效率(参看斯图尔特,1985;斯特里顿(Streeten),1981,第 348~351 页)。如果引进其他变量,如民主进程或国民经济的外部脆弱性,因果关系错综复杂的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总之,即使使用那些与人均收入紧密相关的指标,仍然存在许多令人困惑的异常现象。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在满足基本需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去甚远。一些低收入国家比我们预想的好得多,而一些中、高收入国家的表现却非常不尽人意。例如,南非的预期寿命仅有 61 岁——远远低于斯里兰卡(70 岁),尽管其平均收入水平是斯里兰卡的 4.5 倍。高增长本身并不足以提高人的福利,这种观点在我们分析“表现差劲的国家”时可谓昭然若揭。例如,尼日利亚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开始,经济增长迅猛,但是其预期寿命仍然很低(1985 年为 49 岁);婴儿死亡率非常高(182‰);妇女识字率只有 31%;营养不足和营

营养不良问题大面积存在,即使在城市地区供水污染现象非常普遍。巴西虽然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出现“经济奇迹”,平均收入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但是情况与尼日利亚大体相当。巴西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经济体之一:1972 年,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占有 67% 的收入份额,大约是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收入的 30 倍。即使在巴西最富裕的省份,营养不足和营养不良问题非常普遍。例如在圣保罗这样一个奢华的城市里,一半以上的人口卡路里摄入量低于最低健康饮食标准。以上两个国家人权状况也非常糟糕。

有些国家在实质上达到了高于根据其人均收入预期的需要满足水平,关于需要的政治应该从这些国家得到更多的启示。根据预期寿命和识字率,斯图尔特认为“表现较好的国家”大致有三种类型(1985,第 4 章)。第一类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和古巴。这些国家“通过进行有计划的生产以满足基本需要、通过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通过向所有国民(无论其收入水平如何)定量配给/分配基本需要产品”,成功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满足水平(斯图尔特,1985,第 71 页)。第二类包括东亚资本主义的“成功故事”,如台湾地区和韩国。尽管这个群体似乎支持一种观点,即较高传统意义上的增长速度是基本需要满足最可靠的途径,但实际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实质性的国家经济干预水平,如土地改革或人力资本投资,这些干预措施优先满足了一些我们提出的中间需要(参考森,1984,第 102~103 页)。第三类包括一些实行广泛国家社会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它们常常是通过国家控制基本食品的价格或分配,赋予满足基本需要一定的优先权。这类国家包括斯里兰卡(1977 年进行市场改革之

前)和哥斯达黎加。在这三种类型的国家中,每一个都有助于构建人类发展模式。似乎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基本需要战略”可供我们选择(斯特里顿,1981,第 348~351 页),但是一般来说,最成功的 281 国家都体现了一个共同之处,即国家对经济进行广泛的“操纵”,目的在于至少为基本需要满足的某些方面设置优先权。

考虑到现有的所有指标,我们把哥斯达黎加选为第三世界需要满足的模范。1984 年该国的人均购买力只有美国的 24%——略低于第三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人均能源消耗只有第一世界平均水平的 11%。哥斯达黎加是在大量需要指标上接近西方国家客观福利水平的最贫穷的国家:包括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营养、清洁卫生用水、健康保健、识字率、高度教育入学率、人权状况、产妇死亡率、避孕以及男女平等。哥斯达黎加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评估第三世界国家需要满足水平的准绳。在 1977 年以前,斯里兰卡为最低收入国家提供了一个类似的范例。然而,从 1977 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发展战略侵蚀了斯里兰卡的福利体系和政治民主,即该国建立高水平的基本需要标准的两根支柱,导致其需要满足的许多方面从 80 年代早期开始恶化(卢佩邢赫(Rupesinghe),1986)——持续不断的冲突无疑加剧了恶化的进程。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这些国家在定义需要满足的“限制性最优”(Constrained Optimum)方面能够起到的作用。

当然,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在合理地计划需要满足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们将会或者能够永远成功。这个结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涉及全球实力、不平等性、正义性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需要满足的现实可行的战略。尽管我们已经证明每个

人最优化满足需要的目标是符合道德规范的,但是仅凭这一点还无法决定哪个战略(如果存在的话)可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中,没有一个管辖世界的政府或联邦。因此而形成的局面导致了一种不稳定的体制,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力量是决定结果的关键因素(波格(Pogge),1989, § 19)。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政治上的依赖性。在战后时期,这种依赖性剥夺了千百万人最基本的人权和需要满足权——捷克斯洛伐克和尼加拉瓜受到的干涉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当今世界上,收入和财富巨大的差距还导致了经济上的依赖性,尽管关于导致经济依赖性的机制尚且存在激烈的争议。如果在目前的全球市场经济中,国力是一个提高福利的必要(尽管不是充分的)条件,那么因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而造成国力受到限制也可以说明第三世界国家在需要满足方面的一些差异(穆恩和狄克逊,1985,第 665~669 页)。

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复杂的问题和激烈的争议。在战后早期,关于发展的权威性观点是现代主义理论,认为断然挣脱传统
282 束缚的所有社会都有可能登上增长的阶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及 70 年代,这种观点遭到了依赖性学派的反对。他们认为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强行设置了系统性的障碍(布鲁尔(Brewer),1980)。两者尽管观点不同,但是都是在一个整体和全球性的层次上分析研究经济欠发达问题。这种方法与强调在特定第三世界社会里国家的作用与能力和/或群众动员的比较历史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埃文斯和斯蒂芬斯(Evans and Stephens,1988)认为这种碰撞产生了一种新的比较政治经济理论,把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不同国家、社会 and 地区的具体情况结合在一起。

显然,这种框架为我们理解第三世界国家在需要满足方面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希望。它综合了现代主义和依赖性学派关于全球经济的观点,同时将它们与导致或者阻止各国利用国际经济关系谋求私利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性因素联系起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第三世界国家成功的发展要求国家指导与市场导向相结合。此外,没有明显的证据支持积累与分配相互冲突的观点——经济增长要求或者必然伴随着不平等性的不断恶化。两者之间的平衡以及社会发展水平都将受到土地产权、劳动阶级的组织程度、国家的方针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相同的因素似乎可以解释第三世界中民主的存在或缺乏,以及核心国家(特别是美国)与边缘国家之间关系的地缘政治的性质。^①

因此,这个关于第三世界的新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可以开始解释第 12 章得出的结论。一份未来研究的议事日程需要搞清楚以下问题:如果使用范围更广的指数,基本需要满足的粗略指标(如 PQLD)中的相关性是否仍然能够成立?如何解释第三世界国家满足人民需要的能力受到不同的经济和地理政治限制?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动员形式能够说明在满足基本需要方面成功和失败的范例?什么样的当代世界经济特征把一 283 些第三世界经济体推向贫困和绝望的深渊?为什么?

^① 该段基于埃文斯和斯蒂芬斯(1988)提供的关于发展问题大辩论的精彩分析。他们的分析概述了一些全球问题理论家的著作,如罗斯托(Rostow),冈德·弗兰克(Gunder Frank)和阿明(Amin),斯洛科浦(Slocpol)等人的国家方式。

第二世界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需要满足

十月革命以后,崭新的苏维埃国家宣布其最终的目标是实现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计划生产取代了为追求利润而由市场决定的生产。我们可以因此期望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在满足人类需要方面比资本主义社会(至少在任何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做得更好。然而,随之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结束,东欧政治体制全面崩溃,经济向资本主义或混合型经济转型。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已经死亡,思想的历史到了尽头,民主资本主义独霸天下(福山(Fukuyama),1989)。无论这场辩论的结果如何,在 20 世纪中,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显然出现了一道裂痕。尽管我们无法对于这场失败提出一个系统性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对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社会主义制度在满足人民需要方面的是是非非做出一番评价,为这场辩论尽一些绵薄之力。

在此,让我们把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和发展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区别开来。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方面,如健康和扫盲,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大部分成就都是 1949 年以后在集体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取得的。其他发展中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如古巴和越南,也成功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预期寿命和识字率(相对于其人均收入)(斯图尔特,1985)。塞莱塞托(Cereseto)和威茨金(Waitzkin)(1986)证明,在同等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社会主义国家在一系列更加广泛的指标上,包括卡

路里供应量和受教育的机会,具有更加优越的需要满足水平。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导致的社会变革能够因此提供一条成功的提高福利的路线。然而,这种优越性存在两个重要的局限性。第一,所有 284 这些国家在尊重人权方面以及在满足一些其他提高需要满足的程序性的前提方面表现极差。第二,其他国家在革命以后,否定人最基本的需要,劣迹斑斑,令人发指,例如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还有埃塞俄比亚,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国家社会主义虽然从贫困剥夺的最低水平上为许多人赢得了真正的人类解放,但是显然存在一些我们尚未理解的反成本(counter-costs)和反例证(counter-examples)。从 1989 年开始的这些事件丝毫没有消除努力这么做的重要性。

对于东欧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什么样的研究发现呢?第 12 章提供了一些答案,但是数据并不十分完整,评估各国人均收入方面存在问题,因而在与其他国家相比较的时候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①它们揭示了一幅错综复杂的景象。东欧集团国家在满足一些实质性需要方面做得相当不错,特别是在提供教育机会方面。例如,其总体教育水平高于人均收入水平

① 无论是平均来说还是根据大多数个案,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都要比西方各国贫穷得多。因此,东欧国家包括前苏联应该与中上收入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而不是和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相比较(塞莱塞托和威茨金,1986,附件 1)。这一点清楚地驳斥了以往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很快就会“赶超”西方的观点。在 8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恢复了经济动力,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数据的修正,不仅仅是根据阿甘别吉扬(Āganbegyan, 1989, 第 89 页)这样的苏维埃经济学家,把官方增长率向下进行了调整。现在人们相信前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增长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每年 8% 逐步下降到 1981~1985 年的 0%——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均收入的下降。

与之相当的西方国家,而且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一直在不断提高。然而,这些积极的成就被消极的后果所淹没。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苏联的生存机会开始下降,波兰同样如此,只是程度较轻。苏联预期寿命的绝对下降在工业化国家中是史无前例的。1960 年左右,苏联公民的平均预期寿命比美国人还要长,婴儿死亡率接近西欧国家的水平。然而,到 80 年代中期,形势发生了逆转。总体死亡率从 1965 年的 7.3‰ 最高上升到 1984 年的 10.8‰——上升 48%。婴儿死亡率也从 1971 年的 22.8‰ 上升到 1976 年的约 31.1‰——上升 36%(戴维斯(Davis),1988;参看:库珀 Cooper,1987)。据我们所知,其他东欧国家,波兰除外(库珀等,1984),总体死亡率并没有绝对上升,只是原地踏步,而西方各国的预期寿命又猛增了 5 年。

这种史无前例的下降趋势反映了多种中间需要的缺乏。戴维斯(1988,第 315 页)研究了自 1970 年开始的这段时期,总结了有

285 关苏联健康问题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苏联公民在消费方面有几个积极的进展,例如,他们的饮食和教育水平有所提高。在消极方面,酒精和烟草产品的消费以及从食物中摄取的胆固醇数量出现了实质性的增长;人均缺乏维生素 30%~40%。健康环境方面的问题还导致了疾病的发生。这些问题包括住房供给不足,公共卫生标准低下,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分裂,工业机械化和化学化的速度过快,在缺乏安全计划的情况下公路交通不断增长,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加剧……结果,健康条件的消极恶化导致了所有四种类型的疾病,即退化性、事故性、感染性和

营养性。

在住房方面,绝对标准远远落后于西方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例如,苏联 17% 的家庭没有独立的住房或公寓,仍然必须和其他家庭混住在一起。1980 年,人均城市居住空间为 8.6 平方米,而“合理标准”应为人均 15~18 平方米(阿甘别吉扬(Aganbegyan), 1988,第 90 页;马休斯(Matthews),1986,第 67~75 页)。即使根据赫鲁晓夫的预算贫困线(人均月收入大约相当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 67 卢布),贫困问题仍然没有消除。各种研究报告表明,12% 到 57% 的家庭收入低于该贫困线,比较合理的数字至少应该在 40% 左右(马休斯,1986,第 1 章)。因此,社会无法接受的收入水平的影响面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广——只有美国接近这种社会贫困水平,当然美国的平均标准要高得多。最后,苏联的健康保健服务受到资源匮乏和效率低下的困扰。资源匮乏是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在苏联更加恶化。从 70 年代开始,苏联在健康方面的投资严重滞后。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提供、医疗器械和药品供应以及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水准的维护等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结果,苏联的平均医疗服务质量与盛行的西方标准相比,仍然十分低下(戴维斯,1988,第 317 页)。

个人自主的一些重要成分,如社会角色的参与机会,也受到了 286 严重限制。在此,有一个指标尽人皆知——缺乏许多讨论、组织和行动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然而不仅如此,公民的自由时间也受到了额外限制,尤其是妇女。她们承受着比西方妇女还要沉重的双重负担,一方面需要从事较长时间的工作,另一方面根据传统的性

别分工还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波德洛娃和安科尔(Bodrova and Anker),1985)。尽管政府提供了比较慷慨的儿童保育设施,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排队购买生活必需品所花费的时间。波兰的一项调查表明,每个家庭平均用于排队的时间从1966年的每天63分钟上升到1976年的98分钟(《经济学家》,1988年6月25日)。1986年苏联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出版的地下刊物十分精辟地描述了这些因素给个人自主造成的令人沮丧的影响(《卫报》,1986,7月22日):“商店里的货物和食品一次又一次地被抢购一空,人们疲于奔命,不停地寻找最基本的商品和生活用品。这种情况使人们唯一的兴趣就是无休无止地寻找,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满足自己的精神和文化需要,因而彻底消灭了他们做人的尊严”。

因此,对于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经济体制,我们的最后一个结论是一个混合的结论,其中消极因素控制着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它与戈尔巴乔夫以前的苏联官方意识形态没有相似之处,也不会真正悔过自新,结束费赫尔等人(1983)所说的那种“对需要的野蛮专政”。国家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过渡性地提高实质性的需要满足,并且为进一步提高奠定物质基础。但是,出于一些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原因,它未能建立进一步提高需要满足的程序性或物质前提,结果现在对公民的健康、自主和自我发展造成严重伤害。第二世界不仅受到了人们所熟悉的来自西方的批评,认为它们缺乏民主,而且还为其在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方面的失败受到了谴责。这种失败是根据其自己的内部标准而界定的。无论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还是根

解释 1989 年这些政权的迅速瓦解方面肯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我们可以粗略地总结一下导致这种失败的原因。其根源就是缺乏民主以及效率低下的集权计划(诺夫(Nove),1983,第二部分;迪崴因(Devine),1988,第 3 章)。在最基本的层次上,由于缺乏民主代表和参与的渠道,政治精英们受到了制约,无法合理识别需要以及普遍性满足物的特点。利用第 11 章中提出的物质生产模型,我们可以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在提供满足物以满足所有四个阶段需要方面的失败。在生产阶段,需要满足物享有优先权是为了反映相对不受限制的计划机构的利益,以维护其权力(费赫尔等人,1983,第 65 页)。在较低的管理阶层上,除了较低的发展水平以外,集权性的指令制度所造成的效率和动机问题阻碍了政策目标转化为满足物(诺夫,1983,第 32~45 页)。分配和需要转化领域,由于消费自主权和自发组织的生产联盟的自主权受到阻碍而变得面目全非。最后,还是因为缺乏代表性的民主和自主性的公民社会,物质再生产受到了利益分割的威胁。恰恰是由于缺乏自由权利和分散性的经济决策,需要满足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颇受推崇,但是在实践中却是阻力重重。

第一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需要的满足

我们在上文中得出的结论非常明确:“西方”国家平均的个人和社会需要满足水平是最高的。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结论,又进一步给我们提出许多问题。这些国家所享有的特权仅仅是其经济发展水平所带来的吗?是不是与其普遍存在的民主形式和其

他程序性前提有关？这些福利标准是不是寄生于贫困和对别国的压迫？并且因为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而无法普遍化？显然，
 288 这些问题引出了一些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问题。在此，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努力建立一个初步框架和数据库，以便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表 13.1 三个西方国家需要满足的比较

	英国	美国	瑞典
基本和中间需要满足			
1. 健康：预期寿命，1980	74	75	76
2. 婴儿死亡率，1980	10	11	6
3. 经济参与：有偿就业，1985(%)	65	68	80
4. 住房：拥挤程度，20 世纪 70 年代(%)	0	1	2
5. 环境：水，1985(%)	83	74	99
6. 健康服务：医院就诊资格，1984	99	22	100
7. 经济安全：收入维持，1989	23.4	13.8	39.1
8. 贫困，1981(%)	8.8	16.9	5.0
9. 人身安全：杀人案件	1.0	9.0	1.4
10. 教育：高等教育学生人数，1980(%)	22	57	38
11. 避孕率，1988(%)	83	68	78
社会前提			
12. 人权，1984	94	90	98
13. 最贫困者的实际收入，1979	3 300	3 300	4 400
14. 选举参与，1965~1980(%)	76	56	90
15. 人均能源消耗，1986	3.8	7.2	6.4
妇女需要满足的选择性指标			
16. 女性参与，1987(%)	63	66	79
17. 贫困的单身母亲，1980(%)	32	54	7
18. 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1987(%)	37	51	47
19. 妇女在国家立法机关的比例(%)	4	5	28

注释及资料来源:

1.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1980。来源如表 12.1。
2. 婴儿死亡率,1980,同上。
3. 适龄工作人口(15~64)占劳动力的百分比,1985。(OECD,1989,第 10~11 页)。
4. 居住密度超过每个房间 1.5 人的人口百分比,20 世纪 70 年代。(OECD,1986) 289 表 22.2。
5. 享受污水处理厂服务的人口百分比(初级加上二级和/或三级),1985 或最近一年(OECD,1987)表 3.2。
6. 有资格享受公共资金支付的医院成本的人口百分比 \times 平均成本得到支付的百分比,1984(OECD,1985)表 C1 和 C4。
7. “去商品化”指数——收入不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养老金、疾病和失业补偿收入的程度(埃斯平—安德森,1990)表 2.2。
8. 收入低于一个国家中间收入 50%的人口百分比,1981(OECD,1988)表 4.2。
9. 每 100 000 人中杀人案件的数量,1987。资料来源与表 12.1 相同。
10. 20~24 年龄组接受高等教育的百分比,1980。资料来源与表 12.1 相同。
11. 育龄妇女或其丈夫采用任何形式避孕措施的百分比(世界银行,1988)表 28。
12. 人权指数,1984。资料来源与表 12.1 相同。
13. 收入最低的 20%的人口的实际收入(根据美元的购买力平价估算),1979。计算方法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乘以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实际收入所占的百分数除以 20 的商。GDP 数字来自 OECD(1987a)表 13。收入分配数据来自奥希金斯(O'Higgins)等,1985。
14. 1965~1980 年期间选举参与率(科皮(Korpi),1983)第 56 页。
15. 以公斤石油当量表示的人均能源消耗,1986。来源与本书表 12.3 相同。
16. 女性活动率:参与有偿劳动力(包括失业)的人数占女性总人数的百分比,1987(OECD,1989,第 10~11 页)。
17. 调整后的收入不足中等收入 50%、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单身母亲家庭的百分数,1980(布赫曼(Buhmann)等人,1987)表 12。
18. 女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百分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表 1.4。
19. 在下议院国家立法机关中妇女的比例,80 年代早期(诺里斯(Norris)1987)第 116 页。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平均分值得很高,但各国之间在客观福利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表 13.1 只展示了英国、美国和瑞典三个国家的一些需要满足指标。其中一些指标与表 12.1、12.3 和 12.4 中的指标相同,但是其他一些指标采用了 OECD 国家更加丰富、

更具多样性的数据信息。

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国家,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需要
290 满足模式:美国在许多领域里分值较低,瑞典分值很高,而英国则常常介于两者之间。这个结论从表 13.1 中得出,也是所有 OECD 成员国之间的一种比较,相对落后的地中海国家和一些人口很少的国家除外。在这 18 个国家当中,美国的各项需要指标即使不是倒数第一,也几乎总是位于最后三名,而瑞典即便不是第一名,也总是位于前三名。此外,需要满足水平上的绝对差别在许多领域里举足轻重。

表 13.1 显示,在某些领域里,美国体现出较高水平的福利:最明显的是住房、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女性在教育和有偿就业方面的参与。然而,在许多其他需要方面,美国的基本需要满足水平是最低的,其中包括健康、健康服务的资格、收入安全和人身安全。在某些领域里,其标准相当于甚至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例如,一名出生于华盛顿特区的黑人婴儿在一岁之前夭折的可能性要大于一名出生于牙买加金斯敦市的孩子,而以遭到杀害的风险来衡量的人身不安全感则是全世界最高的。营养不足和营养不良、贫困和无家可归问题也正在不断蔓延(例如,布朗,1989)。此外,美国表现出相对较低的程序上的需要满足标准(尊重人权、经济平等和政治参与),并且根据能源消耗量来看是第二大浪费国。其满足妇女需要的记录也很复杂,尽管与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妇女陷入贫困的风险更大,更容易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因此,其失败是相当全面的,如果考虑到其巨大的经济实力,一开始确实让人感到困惑不解。

瑞典和美国简直是天壤之别——瑞典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是当今世界上最接近于最优需要满足的国家。在健康、住房、饮水质量、获得和利用健康服务以及收入安全等方面,瑞典的个人福利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或最高的之一。鉴于瑞典举世闻名的福利制度,这种程度是可以预料的。然而,和哈耶克(Hayek)《通往奴役制的道路》(哈耶克,1944)中的预言不同,瑞典在尊重人权、民主政治参与以及保障最贫困者较高的基本收入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至于特殊群体的基本需要,瑞典在经济和政治参与、教育和 291 获取经济资源等方面大幅度缩小了不平等差距。瑞典与其他北欧邻国一起,为当今世界提供了一条最佳的评估客观福利的准绳。当然,我们并不是断言这些国家做得十全十美,没有不公正、令人不满意的现象,没有任何痛苦可言;我们只是认为这些国家平均而言比任何其他社会做得更好。^①

这些如此不同的国家却有很多共同之处:较高的人均收入、代议制民主、生产方式私有制、市场过程、国家调控、法团形式的组织。因此,人们也许可以推断,发达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是提高客观福利的必要条件,我们显然不能认为它是一个充分条件。因此又一次出现了新的问题。其他因素——政治动员、继承而来的国家能力、经济制度——如何解释这些本应相似的政治经济体之间在需要满足方面的巨大差异?那些不仅希望提高西方的需要满足而且希望提高全世界的希望满足的人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教训呢?

① 关于“瑞典模式”的文献非常多。其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分析,请参看瑟尔本(Therborn,1991),有保留意见的评论,请参看古尔德(Gould,1988)。

要想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的需要满足模式,我们需要搞明白以下两点:第一,它们有普遍较高的福利标准;其次,各国在福利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让我们来逐一考虑。资本主义的成功经常被归功于市场的信息和激励机制。市场经济利用千百万公民分散的知识,人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聪明才智进行探索和发现,只是这种不断探索发现的过程使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创新,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发达资本主义有能力生产大量商品以满足想要(wants),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关于需要(needs)我们也能这么说吗?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缺乏调控的资本主义制度经不起这种考验。

尽管作为一种协调家庭和企业的预先给定的偏好机制,市场的效率很高,但是作为知识的源泉,其效率相差甚远。这一点加上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益个人化妨碍了人们认识普遍化利益的能力,而这种普遍化利益是人类需要的基础。例如,人们有机会使金钱从公共提供中“退出”从而削弱它们在民主的舞台上行使“发
292 言权”的意愿。此外,缺乏调控的市场在我们第 11 章中提出的物质生产模式的四个阶段都会造成问题。在生产阶段,由于垄断的出现,由于市场不能充分提供公共产品或满足对地位产品的需求,由于某些自我追求活动的自我否定效应(“囚徒”困境之类的问题),不一定能够生产适当质量、特征和数量的满足物。在分配阶段,许多人没有权利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物,而其他一些人能够满足所有奢华的愿望。商品的属性如同万花筒般变幻莫测,许多消费者对此缺乏必要的常识,这一点有可能破坏需要转化过程的有效性。此外,家庭劳动和劳动市场权力不平等的相互作用再现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在物质再生产阶段,缺乏调控的资本主

义制度似乎无力避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而且不能作出有效选择来保护环境。^①

这些不足之处只能通过公共调控加以克服。追求私人利益从来都不可能保护我们已经理论化的那种共同的美德。必须有某种核心的机构(在实践中就是国家)来防止市场狭隘的眼光和意料之外的后果。“混合经济”,或有管理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保障市场交换机制,限制前资本主义精英的行为,克服或取代上文所述的市场信号的缺陷,再分配收入,引导积累过程以及处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等都需要国家干预。从亚当·斯密到涂尔干(Durkheim)到波兰尼(Polanyi),许多学者都已经认识到市场社会是一个矛盾的术语——市场要求一系列坚实的规范性基础。从实证方面来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某种形式的发展性或法团主义国家是在现代世界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前提。^②

第二,国家可以把社会引向许多不同的方向,并非所有的方向都与本书确定的目标相符。只有国家的行为受到限制,使其追求与需要相关的目标,需要满足的最优化才可以获得成功。我们假

① 这一段主要参考了以下资料:霍奇森(Hodgson)(1984);鲍尔斯和金提斯(Bowles and Gintis)(1986)第5章;埃利斯和希思(Ellis and Heath)(1984);克劳奇(Crouch)(1983);欣迪斯(Hindess)(1987,第2、8、9章);森(Sen)(1984,第3章;1981);埃尔斯特(Elster)(1979)。我们希望在另一篇文章里能够更详细地探讨这些问题。

② 至于这方面的案例,请参看同名专著,特别是和鲁舍梅耶和埃文斯(Rueschmeyer and Evans)(1985)的论文。民主法团主义和连贯性工业政策个案分析是卡曾斯坦(Katzenstein,1985)做的。另请参看普法勒(Pfaller)(1991)等人的个案分析。埃斯平·安德森(1990)对国家社会干预作过精辟的对比和理论分析,他的分析深受波兰尼经典文本(1957,第2部分)的影响。

293 设只有在把最优需要满足置于优先地位的广泛的社会运动中,通过始终如一的公民动员才能追求这些目标。如果没有公民动员和国家行为,任何提高人民群众的需要满足的企图都将遭遇追求局部目标的法团利益集团的抵抗。因为通常它们有力量阻挠进步的政策,所以必须利用国家的力量与它们抗衡。但是如果没有在公民社会中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就无法做到这一点。瑞典在过去的60多年中,发挥这种社会动员作用的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科皮,1983,第3、9章)。在更低的程度上,英国的劳工运动在福利制度方面也起到了相同的动员作用(高夫,1979,第4章)。在别的国家,其他运动也可以发挥这种作用。但是无论是什么形式的运动,必须出现某种主观机构,具备实施有效战略的能力,破除阻碍人类进步道路的结构(安德森,1983,第105~106页)。未来的研究日程应该努力确定什么是最有效的动员形式,探明这些形式与现行的福利制度以及相关民众的需要满足水平之间的联系。

全球性的困境

以上有关三个世界的综述留下了一个未解的重大问题,使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优化人类福利的全球性(空间)和世代性(时间)问题上。最优化的西方需要满足水平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否能够推广普及?根据第7章中的论点,如果不能普及,那么它们就算不上普遍的人类需要。

这些战略在空间上推广普及的前提是,没有任何社会结构性障碍阻挠西方最优化的标准在全世界普及。这一点涉及许多问

题,如全球经济体系的性质问题,以及“核心”地区较高的生活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寄生于“外围”地区的贫困及其所受到的压迫,而不是代表了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某些核心西方国家选择的通往高水平的需要满足的道路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无论东方国家还是南部国家,是完全封闭的。可普及性在时间上提出的问题²⁹⁴是,当今世界上所能达到的最优化福利标准能否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所享受?这又涉及关于可持续性的物质生产水平和方式问题,以及其中哪些在现在以及未来不同阶段将会产生更高的需要满足水平?

两方面的问题都涉及一些异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无法在此进行详细探讨。然而,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全球通行的需要概念以及公正的满足需要的方式有一个充分的道德理由——现代世界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且也许是不可逆转的,这一点支持了以上的道德理由。我们同意波格(Pogge)的下述观点:“严肃地说,罗尔斯(Rawls)的正义概念使全球最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成为评价我们的基本制度的试金石”(1989,第 242 页,黑体字是作者加的)。换言之,我们应该根据如何影响世界上最贫困群体的需要满足来对政治经济安排作出道德上的评价。

第二,我们可以大致指出在实践中需要做哪些事。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需要满足的最优化最终需要某种全球性的权力体系来执行全球性需要满足的权利。但是作为过渡,必须要求有一种基于价值的世界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各国共同坚持某些蕴含在协调国际关系的制度中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在过渡期间,世界上处于特权地位的国家的公民必须意识到,“鉴于我们是这个秩序中处于优

势的参与者,我们帮助维持这种秩序也能够(运用集体的力量)改变这种秩序”(波格,1989,第239页),因此我们对于全球秩序负有某种责任。因此,我们那些第一世界中的人们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以某种方式参与拥有可行性战略的组织,挑战那些否认千百万人民最基本需要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

建立一种需要满足的政治经济学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发现了某些模式和主题。第一,笼统地说,平均需要满足水平和社会前提条件的质量随着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然而,第二,这个概括存在许多例外,表明一系列社会、政治、文化等错综复杂的因素也影响了需要满足水平。第三,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客观福利的差异揭示了后者在整体和平均水平上劣于前者。然而第四,西方国家之间在需要满足方面也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这一点再一次表明,民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以外的因素也与此相关。

所有这些结论提出了一些十分有趣的论点。从表面上看,这些论点支持了我们早先的观点。如果苏联和美国的记录有任何借鉴之处的话,显然中央计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缺乏调控的“赌场式的资本主义”都不是有效的最优化满足基本需要的社会框架。民主资本主义在程序的公正性方面以及——在发达世界中——在创造生产性财富以支持较高的需要满足方面优于国家社会主义。然而,缺乏调控的资本主义不能保证那些最低水平的需要满足,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自由对于许多人来说

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通常以提高广大群众的基本需要为目标,而且一开始在最低的水平上常常取得了成功。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否认人民行使批判性自主的民主化和其他程序化的前提,因此阻止他们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学习和协作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福利。

如果说两种制度都有各自的缺点,显然它们在总体上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本章里得出的结论表明,两种制度和原则的结合为实现人类福利最优化创造了最好的机会。^①这种倾向福利型的社会可以被称为“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它是自由的,因为它支持个人自主,而且正如我们所见,它承认(受到调控的)市场为实现这个目标所作出的贡献。它是社会主义的,因为经济组织、社会和国家把全体人民的需要满足的最优化置于优先地位。它是民主的,因为公民参与是决策程序化过程的核心。当今世界上,结合这些原则的最成功的典范就是瑞典和其他一些北欧国家的“民主福利资本主义”。这种制度把发达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动力和政治自由结合在一起。此外,社会动员把与需要相关的目标置于优先地位,指导着一套有效的公共调控方式。许多迹象似乎表明,这种结合在第三世界达到一种有限的最优化也 296 是最成功的。

然而,我们曾经提到,瑞典式的福利资本主义面临着严重的普及性和持续性的问题,并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模式。这一点对我们

① 这种观点与霍奇森的“杂交原则”相一致。霍奇森认为,为了整体的正常运行,任何社会经济制度实际上都必须包含至少一种其他的基于不同原则的经济结构(霍奇森,1984,第85~89页;第104~109页)。

提出了一些更为深刻问题。从长远来看,福利制度与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否相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代议制民主有没有必要的限度?是不是像安德森(1988,第35页)所说的那样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的混合物?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性的社会框架,一种真正的“第三条道路”?这些问题我们留给读者,留待将来的研究和社会探索。^①

^① 基于早期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有说服力的论点和社会模型,请参看鲍尔斯和金提斯(1986);赫尔德(Held)(1987)第9章;博比奥(Bobbio)(1987a和1987b);有关这方面的评论,请参看安德森(1988)。关于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以外的第三种经济制度的一些最新的观点,请参看迪威因(Devine)(1988)、埃尔森(Elson)(1988)和米德(Meade)(1990)。

第 14 章 双重政治战略

297

一个社会如果把优化需要满足置于优先地位,其经济组织必须具有双重性,其政治组织同样也必须具有双重性。如果人的需要绝对优先于其他政治目标,那么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基于我们现有的最充分的认识来优化需要满足。这个观点似乎支持专家的权威。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只有通过所有具备相关经验者之间的知情交流,才能合理有效地理解需要的含义。这种交流应该是精心组织的,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交流结果的合理性。在这场辩论中,专家只是所有参与者中的一个群体。在此,我们将证明,如果想要成功优化需要满足,中央计划和民主参与都是制定社会政策的必要成分。总之,优化需要满足需要一种“双重战略”,既包括国家的共性又包括公民社会的特性。

我们将会看到,两者合理混合的方式将会根据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而变化。不同于以前的章节,我们对于需要满足的政治双重性的讨论更加侧重于发达国家。这种脱离普遍性的做法并非偶然。与我们在本书中试图完善的美好愿景最为接近的一些因素都包含在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中,而且大多数我们熟悉的相关文献都是基于这些经历。因此,我们的需要政治概念在第三世界的适用性现在必须主要基于我们的论点在总体上

能够站得住脚。

理论上的双重战略

我们在本书中自始至终强调了个人能够以最佳方式探索其智力和情感能力的重要性。要想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有足够的自我决定的权利，只要他们不侵犯他人的基本需要。但是这意味着私人领域必须以某种方式受到公共权力的控制。要么由于教育水平低下而且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要么由于他们区别需要和想要的能力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个人并不总是他们自己需要的最佳裁判员。如果公民想要得到需要的满足物，就必须提供集体计划和组织的各种公共服务。此外还必须实行必要的法律保障公民安全地得到这些满足物。总之，在个人自己的短期个人利益与其可推及他人的利益不相容的时候，国家必须帮助个人维护其可推及他人的利益。

我们曾经证明，要想让个人优化需要满足的权利受到重视，就必须有一个有责任确保其受到尊重的机构——这个机构能够执行尊奉我们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解释的宪法和权力法案。从正面来看，这意味着保证对必需满足物的普遍享有。从反面来看，这意味着保证能够满足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全民参与公民生活中所必需的程序化前提。除了国家以外，没有任何制度性机构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承担这两个使命，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对地理领土行使管辖权的公共权力机构应该与当今的民族国家是一致的。

支持积极社会权利的观点证明了国家有责任提供健康、教育、

收入维持和许多其他公共服务(至于国家是否直接提供这些服务则另当别论)。同样,保护个人的消极权利,使他们的私人生活不受任意性的约束,涉及司法和警察等机构。公民拥有最优的需要满足的权利,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求公民承担应尽的义务,这种民主社会契约的执行将会受到极力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国家的经济实力、立法和司法权力才能²⁹⁹抵抗这些利益群体的力量。

但是,这种强大的国家当然必须是民主的,否则需要不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由于政治权力向来容易受到滥用,所以它必须通过民主过程加以监管。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一种具有控制和平衡体系能力的议会或国会立法机构,足以保证缺乏监管的权力不会变得过分集中,同时建立了竞争性政党制度和其他使公民在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上能够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机制。它还要求一种独立而且具有代表性的司法机构。此外,如果没有参与政治、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其他方面的机会,个人自主就无法得到优化。这种参与权利的宪法保证必须存在而且强制实行。否则,个人将不能在构成其社会环境的制度规则方面行使选择权,也不能保护自己不受国家权力的伤害。同样,少数派也将缺乏保护,听任多数派的无情摆布。

支持强大而民主的福利制度的这些笼统的论点虽然颇有说服力,但是它们仍然为我们在第一部分里提到的许多官僚主义的权力滥用敞开了大门——同样有可能“对需要实行专政”。无论我们多么需要集权,都应该同时相应地需要其对立面——一种极端的非集中化和民主化,其程度之深是现代社会前所未见的。需要满

足不只是从上到下应用技术性的知识,也不是以官僚主义的方式提供国家服务(即使这些做法已经在有效的民主议会制中得到了批准)。另外还有一个认识领域需要挖掘——人民在日常生活经验中积累的知识:作为工人、社区居民、病人、学生、老年公民、父母、移民等获得的知识。

任何提高(更不用说优化)需要满足的立法途径都必须利用这种认识,而传统的选举过程却很少这么做。在今天的福利制度中
300 许多人的生活饱受官僚制度任意性的毛病和专业人士无情的常规做法之害,如果不利用这种认识,这种毛病和做法将会变得更具侵害性和压迫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如此重视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自由意志论者、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团体对福利制度的评论。此外,某些普遍性满足物的特点在各种亲密关系中、在家庭和社区中将会得到增强。在某些需要满足领域中,它们比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市场和国家以外的其他替代性供给方式必须得到应有的认可。

因此,我们的立场是,提高人类需要满足的政策必须同时朝权力集中和权力分散两个方向发展!“福利国家”的作用必须扩大,然而同时,还必须培养公民社会中的合作和交流。这种双重性的任何“一条腿”如果缺了,另一条腿都站立不稳。我们认为应该更加清晰、更加合理地界定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区别。正如基恩(Keane)所说:“民主化……将意味着通过两个相互依赖而且同时进行的过程努力维护和重新定义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界线。这两个过程是:社会平等和自由的扩大,对国家机构进行结构调整和民主化”(1988,第14页)。

支持权力集中的论点

如果人的需要可以推广到全人类,那么正如我们所见,个人应该被视为拥有尽一切实际可能满足需要的权利。提供需要满足的两个相互替代的来源是市场和单方面的慈善(博兰尼(Polani), 1957, 第 4、6 章;蒂特马斯(Titmuss), 1970)。但是任何一种来源都无法保证所有人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即使是最低水平的满足,更不用说最优的满足水平(普兰特等人(Plant), 1980, 第 4 章)。只有国家具有这种能力。就是在最发达的福利国家里,国家能力的潜力也尚未得到充分认识。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权力将会遭到许多人的强烈反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为什么国家的存在对于我们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如此重要。

在自由社会中,权利是作为保护个人免遭国家权力侵害而出
301
现的。权利的获得是经过各阶级之间、各民族群体之间长期的(常常是革命性的)斗争,常常还是现代战争的群众动员效应的结果。起初,焦点集中在公民权上——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行动自由和陪审团审判制度。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注意力转移到了政治权利——选举权以及参与民选政府的权利。在最发达的政治体制中——显然英国是一个例外——这些权利现在受到宪法的保护,只有通过适当的政治程序才能加以修改,通常需要得到三分之二或更多的人同意。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如果以这些方式看待公民自由及其蕴含的消极自由,就会有无视积极自由的重要性的危险。积极自由指

的是机会平等地参与公民生活所必需的全面的社会权利和福利权利。在许多西方社会中,这是下一轮扩大公民权的斗争浪潮的主题——福利权利,包括最低收入、生活面临威胁时的保障、获得对个人富裕和社会参与至关重要的集体服务的权利。虽然通往现代福利提供的道路有许多条,而且各不相同,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某些社会权利在许多但不是所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已经得到完全确立。^①

我们关于人类需要的理论促使我们倾向于从根本上扩大(并且系统整理)目前在西方福利国家所看到的那种基于公民身份的福利权利。我们相信,它为福利权利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和详细的说明,这些理由和说明令人信服而且符合我们的愿望。确定A是一项权利意味着赋予这种权利再也不会受到变化莫测的政治观念、官方的随意性或个人施舍的影响。在不同的背景下(在一本关于民主的专著中)赫尔德(Held)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

^① 关于公民权利的历史发展方面的文献非常丰富。有关英国公民、政治和社会权利的进程,经典性的观点来自马歇尔(Marshall,1963)。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性的描述,对此有许多评论(曼(Mann),1987)。对于社会保险的演化过程的对比性历史评述,请参看弗洛拉和海登海姆(Flora and Heidenheimer,1981)。关于西方世界政治权利的对比斗争史,请参看瑟尔本(Therborn,1977);关于权利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开放性关系,请参看特纳(Turner,1986),鲍尔斯(Bowles)和金提斯(Gintis)(1986)。以上两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在实践中,社会权利既可以收缩也可以扩张。埃斯平—安德森探讨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以及它们的一些福利结果(1990)。德·斯万(De Swann,1988)运用福利经济学和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以上述市场失败的原因为前提,对于作为集体关怀的福利国家的崛起提出了一种复杂的解释。

珍视自主原则的宪法和权利法案……不仅包括平等的投票权,而且包括平等享受有效参与和开明地理解和安排政治议程的各种条件的权利。这种广泛的“国家”权利反过来又要求一系列广泛的社会权利,涉及繁殖、儿童保育、健康、教育以及确保民主自主所必需的、足够的资财的经济权利(1987,第 285 页)。³⁰²

但是这种议程在实践中是个什么样子呢?

优化健康和自主的权利要求中间需要达到第 8 章中所定义的“最低投入水平的最优”水平。我们的分类规定了营养、住房、工作条件、客观环境、健康服务、儿童安全、初级关系、人身安全、经济安全、教育和生育等方面的最低限度的最优水平。在原则上,对这种水平作出精确具体的规定是制定政策的立法机构的民主任务,必须根据资源状况和竞争因素而定(波格(Pogge),1989,第 144 页)。为了保证公民能够实现这些机会,需要赋予他们一些特殊的权利,以获得公认的、满足最优基本需要所必需的满足物。这些福利权利可以在以下两个关键领域得以实现:市场和国家本身。

要购买市场提供的满足物,人民需要享有获得足够的最低收入的权利。确定最低收入水平将取决于(1)应该以商品形式获得的各种满足物,(2)这些满足物的价钱,(3)最低数量的额外随意支配收入——应该是得到认可的向全体公民提供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想要。在第 8 章中,我们简要地讨论了能够最好地保证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达成合理决定的民主交流形式。以这种方式,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可以达成各方都同意的、满足基本需要的收入。我们必须区别不同的家庭规模、家庭构成以及特定群体所

需的额外满足物,例如残疾人。正如我们所见,近年来许多对贫困问题的研究都反映了这种方式。

这种基本需要所必需的收入一旦得到认同就必须提供给个人。在现代经济中,有两个途径可以提供最低收入:作为所有公民享有的权利而提供基本收入,或者保障充分就业,工资不低于一个合理的最低标准,并且向所有没有能力或不应该参与有偿劳动的人提供社会保障收入。支持前者——基本收入保证(BIG)——的人,就需要的政治做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他们提出打破所有的社会保障金和税收优待制度,赋予所有成年人享有正常的国家收入的权利,向所有儿童提供额外的津贴。这种做法也招致许多批评,理由是提供收入权利而没有相应的劳动义务有悖伦理道德,削弱经济实力,在政治上也缺乏逻辑上的连贯性。提倡就业保障的人支持瑞典的做法,把国家救济金转移支付与充分就业政策联系起来。然而,这种做法也受到了批评,理由是传统的男性充分就业不再可行,也不再受欢迎。我们认为,两种观点都强调了在优化需要满足战略中收入和就业保障之间的相容性。^①

第二种类型的权利将会保证人民能够得到那些最好由国家或

① 目前关于基本收入的文献数量庞大。珀迪(Purdy, 1988, 第9~11章)提供了一个最清楚的介绍,作为一个忠实的支持者,他还对支持和反对观点作了一个非常公正的总结。法定工作权利是拉斯廷(Rustine, 1985, 第7章)提出的。基恩和欧文斯(Keane and Owens, 1987, 1988)与拉斯廷(1987)就以上两个立场进行过辩论。另参看珀迪和利斯特(Lister)在阿尔科克等人(Alcock et al.)主编的著作中发表的论文(1989)。有关运用这两种方法的论点和建议,请参看阿尔科克(1985),参考阿特金森(Atkinson, 1989, 第92~95页)。范巴里吉斯和范德维恩(van Parijs and van der Veen, 1985)的论文把有关基本收入方面的思想置于一种更加广泛的系统理论和哲学范畴,掀起了一场广泛的讨论,发表于同期的《理论与社会》刊物上。

某种其他公共机构以一种非商品化的形式集体提供的满足物。在许多情况下,必须由国家机构直接提供。因为总可以把更多的钱花是提高需要满足水平上,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优先权之争,在实践中应该如何作出决定呢?这个重要决定最终再次成为立法和执法程序的任务,但是必须在特定宪法原则的指导之下进行。

以健康保健为例,一种方法是确定一系列核心活动,如医师服务、医院的住院和门诊服务、急诊服务、精神健康服务、化验和 X 光服务,在需要的时候赋予每个人得到这些服务的权利(普兰特(Plant),1990,第 27 页,引用恩托文 Enthoven)。提供这些服务的质量可以通过各种审查制度和上诉法庭监督和保障。另一种方法是根据一个群体的“平均医疗史”确定其标准水平的健康保护的費用。然后,可以根据某种水平的(高于中等水平)预期终身医疗费来确定“标准医疗保健”。波格建议,公民应该享有最低限度、充分的健康保护的權利,这个最低限度可以用标准医疗的(较高的)百分比来确定(波格,1989,第 178~179 页,第 185~186 页)。普兰特(1990,第 28 页)也提出,在西方社会中保障积极权利的水平应该位于平均水平和任何个人在该社会中能够到达的最高水平之间的某个位置。关于保健的权利,他提出达到“中产阶级”保健的平 304 均消费水平的权利。^①

① 带有合理性的福利权利的吸引力和可行性再次受到很多质疑,不仅仅是前文提到的新自由主义批评家(参看 N. 巴里(N. Barry),1990,他对此作过准确细致的总结)。蒂特马斯(1971)和马歇尔(1981,第 5 章)都认为,如果某些服务分配基于随意性原则,可以更好地弥补需要满足的亏空,避免过多的诉讼。然而,马歇尔本人后来对这个观点提出了批评和限制条件(1981,第 5 章,后来添加的想法)。

对于其他公共服务,我们也可以制定出各种形式的类似的权利。父母应该拥有切实可行的儿童保育服务的权利;残疾人应该拥有救护、援助和社区服务的权利;父母和学生应该拥有接受各种层次教育以及一定的课程和教学标准的权利;所有家庭应该有权拥有满意的住房以保障其健康、隐私和个人自主……等等。如果大家公认国家应该承担直接提供的责任,那么就有必要在全国、地区和地方层次上建立规划和资源配置的机构。如果没有一套按照我们在第三部分里提出的方针制定的、连贯的、关于需要满足的社会指标,这些机构就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沃克(Walker),1984,第9章)。

然而,即使这种需要满足作为一种权利得到正式的保障,我们还必须保证买来的或提供的满足物没有危害,而且一旦权利受到侵害,可以从法律上得到有效的纠正。只有国家才有发挥这种重要监管作用的权力和资源。在工作、家庭和自然环境中对有害满足物作出控制需要立法。立法可以采用“法令”或“授权”的形式,要么彻底禁止某项危害,要么规定指导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之下,通过协商谈判程序,相关的国家督察人员设法对付潜在的危害者,努力减少危害。一般来说,这种监管性立法范围能够而且应该包括在所有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以防止严重伤害。

一个纳提耶夫(Ignatieff)极力认为,有些需要无法以法定权利的形式表达:“正因为我们不能把友情、爱情、亲情、尊严和尊敬确定为权利,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确定为需要,运用受我们支配的制度程序,努力使这些需要的满足成为人类行为的惯例”(1984,第13~14页)。然而这个立场似乎自相矛盾,因为它暗示着当这种

“惯例”行为没有达到标准时,相关的法定权利是合理的。换言之,即使在生活最隐私的领域,经过系统化整理的知识也强调了民主制度赋予的防止严重伤害的重要性(赫尔德,1987,第 292~293 页)。在许多国家里,丈夫强奸妻子不构成犯罪,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现象无法容忍。这个事实表明了为私生活立法的合理性。在成年 305 人对待儿童(甚至动物)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同样强调了相关立法和司法支持的道德原理和重要性。

有效的司法制度至关重要,可以保证公共官员和公众共同遵守所有有关基本需要满足的法令和相关指导方针。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然而,有效监管和司法复审的总体联系大体相同——公正确地裁决有关立法规则的争议,看这些规则是否得到合理应用;如果大家公认没有得到合理应用,决定如何分配制度规定的惩罚和/或损害赔偿。这种联系的重要性非同小可,而且在司法程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得到体现。所有的律师都明白,停留在纸上的权利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毫无疑问,司法制度常常带有偏见,对财富和特权情有独钟,但是这丝毫不会削弱国家司法活动的必要性。相反,这意味着在聘用法律人员以及自由享用法律的制度方面需要实行各种改革措施(参考:德沃金(Dworkin),1985,第 1 章)。

我们提到的所有权利和相关的国家活动领域得到一个能够提供平等机会的计划的支撑。再一次,这个计划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才能有效实施。单独来看,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都不足以解除受压迫群体面临的限制以及严重伤害的根源,因而也就不能满足他们对特殊满足物的需要。许多妇女、黑人和其他弱势群体

的成员不断地受到歧视、境遇每况愈下的情况要求有法令来治理。这些法令可以明确司法程序和执法机关的规定,确立侵犯权利的性质并且确保惩罚得以执行。如果其中包含积极的歧视政策,那么国家的作用再一次变得至关重要。这种问题时常使公正性变得十分微妙,使得秉公执法(而且令公众信服)的司法仲裁机关的存在变得尤为重要。^①

支持权力分散的论点

然而近年来,传统福利国家优化需要满足的能力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来自新右派以外,构成了支持权利分散和参与观点的基础。

首先,职业化和官僚主义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伊利奇(Illich)和其他反对中央集权制的人认为,需要正处于严峻的危险之中,需要由职业人员确定,然后由他们来满足:“如今,医生和社会工作者——从前只有牧师和法学家——取得了造就需要的法定权力,而且依据法律这些需要只能由他们来满足”(伊利奇,1977,第14~16页)。这种做法使普通人“不健全”,给他们套上了日益沉重的枷锁,使他们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及其机构——沦为“技术法西斯主义”(technofascism)。其他人则认为官僚制度本身出了毛病。哈德利和哈奇(Hadley and Hatch, 1981)根据集中度、

^① 参看德沃金(1985,第五部分)和理查兹(Richards, 1984)。关于“区别”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请参看佩特曼(Pateman, 1989)和菲利普斯(Phillips, 1991)。

官僚化和垄断权力解释了“福利国家失败”的原因。大型等级化的集团组织社会服务,向被动的客户提供已经确定的服务。弗格森(Ferguson)认为,客户和官僚都把自己和对方看做管理的对象,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创造性行为的余地(1984,第14页;波利特(Pollitt),1986)。正是在这种没有灵活性的背景中,官僚权力得以行使,滥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官僚们不需要承担责任,不需要从客户方面得到一致的、连贯的、有代表性的反馈,那么合理评价并且改善他们责无旁贷的服务都是不可能的(普兰特等人,1980,第107~113页;参考巴克拉克(Bachrach)和巴拉茨(Baratz),1970)。

其次,女权主义已经表明,英国和其他国家战后的福利制度建立在一个鲜明的性别区分的前提之下,男人挣钱养家,女人依赖男人,充当妻子和保育员(如佩特曼,1989)。特定的服务可以把特定的角色强加给妇女。医疗卫生的职业化与男性化形影不离——例如,男性在医院里居于统治地位,包括妇产科。这种局面的后果可能是强化女性的自我形象,让她们永远处于从属地位,以便控制女³⁰⁷性的性别特征和生育(戴尔和福斯特(Dale and Foster),1986)。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如果漠视“区别”,那么公民权就可以行使特权。“在一个被群体压迫和从属玷污的社会中,普遍公民权的概念最终只是巩固了特权群体的统治地位”(菲利普斯,1991,第83页;参考扬(Young),1989)。

佩特曼从这一点出发,质疑自由理论所设想的正式自由是否适用于阶级、性别和种族不平等的真实世界;在现代资本主义法团主义国家里,是否可以坚持公民社会与国家泾渭分明这样一个自

由主义的概念。她的回答是否定的,同时她还提出了另外一些让公民直接参与那些关键制度的领域,特别是工作场所和社区,他们一生都生活在这些领域中(佩特曼,1970,第2、6章)。新左派也反对国家权力过分集中所导致的官僚主义权力滥用,他们强调参与、社区和群体自主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后期,许多社会主义者步莫里斯、科尔和汤尼的后尘,试图创造出一个新的“赋权政治”(politics of empowerment)(哈里斯,1987,第3~4章;古特曼,1980,第3章)。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种对“自上而下”的福利中央集权制的强大批评,要求采取一种替代性方法,制定并且实施经济和社会政策。有两个与此相应的政策含义:从国家政府到地区、地方和基层政府的所有政治权力分散以及新的公民参与形式。分散式的福利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包括赢利性私人提供、非赢利性自愿提供以及结构松散的社区自助形式。它还可以包括通过“街道办事处”和社区论坛提供政府服务的分权形式。福利提供还有许多参与性民主的做法,例如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尽管在不同的国家里具体形式有所不同。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取得了类似的但通常意义更加深远的进展,例如自助运动和农村社区发展计划。^①

根据这些路线制定的有效计划将会有助于利用人民在日常生

① 本段采用了哈德利和哈奇(1981)、约翰逊(1987,1990)以及费边社(1984)的材料和英国发生的辩论。另参看高夫和多亚尔等(1989,第269~271页)。赫尔德和波利特(1986)主编了一本不错的论文集,反映了许多这方面的问题——特别要参看波利特本人的论文(1986)。关于第三世界,请参看拉坦(1984)、梅塔(1984)和琼斯(1990,第10章)。

活中积累的源于经验的知识,发挥他们的能量,并且因此提高对于剥夺的认识,有助于创造新的、更好的需要满足物。现有的趋向分散和参与的举措,在必要的地方(似乎自相矛盾)应该受到中央政府 308 的立法和财政方面的鼓励。在这些方向上的步骤将会使福利服务——及其提供的满足物——对于人们生活的文化、社会和物质环境的多样性更加敏感。我们关于需要的理论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这种自下而上的评论福利制度的方法,也支持它提出的替代性方法,例如,在提供需要满足物所涉及的所有社会服务和发展计划中享有一种法定“参与权”。这个理论并非与相对主义可以接受的外表——即鼓励文化多样性的繁荣——不相容。

然而,尽管有这些论点,支持集权制的理由依然非常充分。孤立地来看,福利政治的参与和社区为导向的方式存在严重的局限性,需要保留强大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央政权。危险是众所周知的。在一个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而且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社会中,更大程度的参与最好只能作为一块掩盖软弱无助的贫困者的遮羞布,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却能够加剧他们被剥夺的程度,进一步限制他们的权利。过分强调“预示的形式”可以意味着挑战现有的国家政治结构和国际依赖性格局的失败。在全球经济国际化的形势下,地方经济政策通常很不尽如人意(琼斯,1990,第10章)。“福利多元化”还可以模糊私有化的不平等性,使富裕者能够“退出”集体提供,购买优于那些普通人都能享受的服务。此外,在现行的性别劳动分工的背景下,“社区提供”通常是依赖妇女的无偿劳动的一种隐晦的说法。例如,基于关怀体弱的老年人的“社区”关怀的计划,可能让从事关怀工作的妇女饱受多

年的近乎劳役之苦,也可能限制受关怀者的自主,即使受到慷慨的地方服务的大力支持。

更笼统地说,任何地方性、基于社区的、小规模的需要满足形式都可能滋生“局内人”的人类需要观念,并且抑制普遍性观念的发展,后者基于更加广泛的集体共性。授权政治可能意味着接受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政策或歧视局外人的计划。由
309 不同社区为自身提供的福利服务可以蒙蔽人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他们和其他人共享的共同需要,所以为了确保避免由于过分重视特定群体的观念和偏好而导致的严重伤害,监管是非常必要的。社区政治的梦想是能够团结利益各不相同的群体,采取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如果没有人类需要这样一个跨文化、跨群体的共性,这个梦想就无法得以实现。^①

实践中的双重战略

根据我们的理论,前文中所有关于国家福利的评论观点都有对有错。正确的方面,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需要满足方法常常忽视和贬低人民自身源自经验的知识,如传统的东欧集团。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篡夺了统治生命世界的权力体系。如果要实现需要满足的优化,群体必须有能力参与研究需要满足物,参与决策。例如,一项有关种族侵扰的政策,如果没有黑人参与制

^① 这些观点主要见诸于古特曼(1980,第7章);费边社(1984);科克伦(1986);罗博特姆(1986);约翰逊(1990);芬奇和格罗夫斯(1980),芬奇(1990)。

定,恐怕不会是一个好政策。

然而,一旦这些观点认为个人或群体利益,无论其来源是什么,都可以胜过经过系统化整理的、最科学的、关于需要满足的认识,它们就是错的。接受这种观点就等于屈从于我们在本书中自始至终极力反对的相对主义理论。人类需要决不能自动等同于个人的想要或特定群体的利益。需要的内容必须永远追求一种更高的客观标准。在决定特定的需要满足物时,参与和偏好表达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群体利益不能践踏现有的、关于基本需要和中间需要本身的最佳认识。这些对每一个人参与生活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他们的需要满足必须作为一种权利而得到中央公共权利的保障。

我们不断回到同一个两难的困境:运用基于经验的认识,承认生命世界特殊的重要性,为无权者授权,实现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民主化,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民主和理性的人类需要满足。但是孤立来看,它们都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使个人、群体、部门和短期利益破坏人类长期的普遍性利益的需要。然而认识这种危险的同时必须时刻注意另一种危险。虽然为了确保需要满足的提高,由强大的国家权力实施的社会和经济干预所支撑的宪法权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些权利又面临着相反的危险,即千篇一律,缺乏灵活性,解除授权以及家长式作风,威胁到文化的完整性和个人自主。显然,任何适当的优化人类需要满足的政治战略都必须兼顾以上论述的两种立场。³¹⁰

我们已经看到,关于需要的定义本身或者满足需要的基本供应方式,无论什么地方存在根本性冲突,都需要通过民主辩论、根据现有的最好的技术和实践认识而进行合理的评价。如果争义明确属于技术性的,那么运用现行的方法进行科学评估和实验比较

合适。如果涉及提议或业已实施的政策对相关个人产生的主观影响,则应该集中通过对消费者群体进行的舆论调查、咨询以及其他准确把握他们的自我感觉的策略而进行的有效交流。通常,在两种认识形式都处于争议之中的时候,涉及“专家”和需要者的对话就会不可避免,而且是以论坛的形式。这种论坛是实际情况所允许的最接近哈贝马斯倡导的那种理想的话语环境。当然,这种对话的成功通常并不意味着各方都对结果感到满意。妥协往往是最时兴的方式。然而恰恰因为情况常常如此,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把结果视为在能力范围之内最合理、最民主的结果。^①

我们已经论证,我们关于需要的理论导向一种双重政体,正如它导向一种双重经济体一样。双重战略来源于一种需要概念,这个概念是一种合理的共识,既是动态的又是开放性的。它力图促进通过学习取得进步的过程,而且正是对这个过程作出的反应。

311 尽管双重战略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战略,但是它扎根于我们论述的那种遍及全世界的新实践。

至于这个双重战略本身可以在多大范围内得以推广,这个问题目前难以定论,因为强大的全球势力依然反对它所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由于存在巨大而复杂的经济和政治问

① 证明双重战略的合理性要求受到更多的关注,不是我们在此能够做到的。在其他地方,我们和其他学者为英国勾勒出一份详细的社会政策处方和宣言(高夫和多亚尔,1989;阿尔科克等,1989)。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诸如利兹所做的那些“需要审查”(PRU,1990),这些是作为它如何在地方层次上指导研究战略的例证。我们希望在将来的著作中进一步拓展双重战略理论与实践。

题,双重战略的局限性尤为明显。在北方国家中,社会公民权的发展在提高局内人的福利的同时可能会进一步损害局外人的需要满足。公民权要求把排外作为成员资格的一个必要的对应物,而且可以加剧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泰勒,1989)。这种威胁适用于超越国家的公民权概念,如同有些人在欧共体中看到的那种情况(米汉,1991)。

此外,同意双重战略的粗略的轮廓并不意味着同意最有希望提高需要满足的具体的政治战略。没有任何一个“需要政治”符合我们的理论,在此我们也无意提出一种这样的政治。读者们可能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很失落: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致力于实现(或阻碍)本书所倡导的道德目标的具体的历史行为者和社会实践在哪里?例如阶级和性别、财产和特权、权力和压迫、冲突和战争在哪里?

我们对于这些差距太清楚不过了。在我们的论述中它们的分量相对较轻,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历史变革观。相反,困难和斗争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为了提高需要满足水平而荒唐地阻碍需要满足——却令人遗憾地成了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然而,我们也同意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联盟运动近年来为了短期优势和部门利益付出了过多的牺牲,而对于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则关注得太少。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人类需要的概念以及相应的赋予其效力的权利和义务,就无法组成人类持续进步所必需的政治联盟。

尽管存在这些复杂性,我们认为,双重战略构成了一个灵活而且符合人们愿望的优化需要满足的模式,即使它必须接受实际约

- 312 束的考验。这些约束并不否认我们在本书中描述的那种美好愿景。它们仅仅是强调了一项承诺的重要性,这个承诺就是克服这些实际约束,梦想并且努力寻求新的、更为有效的途径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参 考 书 目

328

(Place of publication London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 Åberg, R. (1987) 'Working conditions', in R. Erikson and R. Åberg (eds), *Welfare in Transition: A Survey of Living Conditions in Sweden 1968-8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Aganbegyan, A. (1988) 'New directions in Soviet economics', *New Left Review*, 169.
- Agarwal, A. et al. (1981) *Water, Sanitation, Health-For-All?* (Earthscan).
- Alcock, P. (1985) 'Socialist security', *Critical Social Policy*, 13.
- Alcock, P., Gamble, A., Gough, I., Lee, P. and Walker, A. (eds) (1989) *The Social Economy and the Democratic State: A New Policy Agenda* (Lawrence and Wishart).
- Allardt, E. (1973) 'About dimensions of welfare', *Research Group for Comparative Sociology* (Helsinki, Finland).
- Allsebrook, A. and Swift, A. (1989) *Broken Promise: the World of Endangered Children* (Hodder and Stoughton).
- Amnesty International (1983) *Political Killings by Governments* (Amnesty Publications).
- Amnesty International (1984) *Torture in the Eighties* (Martin Robertson).
- Anderson, P. (1983)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erso).
- Anderson, P. (1988) 'The affinities of Norberto Bobbio', *New Left Review*, 170, 3-36.
- Anscombe, G.E.M. (1957) *Intention* (Oxford, Blackwell).
- Anscombe, G.E.M. (1969)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in W. Hudson (ed.), *The Is - Ought Question* (Macmillan).
- Archer, M. (1988) *Culture and Agen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rkes, H. (1986) *First Thing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rmstrong, D. (1983) *Political Anatomy of the Bod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ronowitz, S. (1988) *Science as Power* (Macmillan).
- Arrington, R. (1989) *Rationalism, Realism and Relativ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rrow, K. (1963)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tkinson, A. B. (1983) *The Economics of Inequ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tkinson, A. B. (1989) *Poverty and Social Security* (Harvester Wheatsheaf).
- Avineri, S. (1972) *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29 Axelsson, C. (1987) 'Famil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R. Erikson and R. Åberg (eds), *Welfare in Transition: A Survey of Living Conditions in Sweden 1968-8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achrach, P. and Baratz, M. (1970)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Elitism* (Boston, Little, Brown).
- Badrova, V. and Anker, R. (1985) *Working Women in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Fertility Connection* (Geneva, ILO).
- Barnes, B. and Bloor, D. (1982) 'Relativism, ration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M. Hollis and S. Lukes (eds),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Oxford, Blackwell).
- Barrington Moore, J. (1978) *Injustice* (Macmillan).
- Barry, B. (1965) *Political Argument* (Routledge).
- Barry, B. (1990) *Political Argument: A Reissue* (Harvester Wheatsheaf).
- Barry, N. (1990) *Citizenship and Rights in Thatcher's Britain: Two Views* (IEA).
- Baster, N. (1985)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some issues and debates', in J. Hillhorst and M. Klatte (eds),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Level of Living Indicators and Social Planning* (Croom Helm).
- Baudrillard, J. (1983) *In the Shadow of Silent Majorities... 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New York, Semiotexte).
- Bay, C. (1968) 'Needs, wan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241-60.
- Beck, A. (1967) *Depression: Clinical,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Staples Press).
- Beiser, M. (1985) 'A study of depression among traditional Africans, urban North Americans and Southeast Asian refugees', in A. Kleinman and B. Good (eds), *Culture and Depression: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and Cross-Cultural Psychiatry of Affect and Dis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ll, J. and Mendus, S. (eds) (1988) *Philosophy and Medical Welf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nton, T. (1988) 'Marx, humanism and speciesism', *Radical Philosophy*, 50 (Autumn).
- Bentovim, A. and Vizard, E. (1988) 'Sexual abuse, sexuality and childhood', in A. Bentovim et al. (eds), *Child Sexual Abuse within the Family* (Butterworth).
- Berlin, I. (1969)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I.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nstein, R. (1969) *Philosophical Profiles* (Cambridge, Polity).
- Bettelheim, B. (1986) *The Informed Heart* (Penguin).
- Bhat, A., Carr-Hill, R. and Ohri, S. (eds) (1988) *Britain's Black Population*, 2nd edn (Gower).
- Bigsten, A. (1987) 'Poverty,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in N. Gemmell (ed.), *Survey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Basil Blackwell).
- Blaxter, M. (1983) 'Longitudinal studies in Britain relevant to inequalities in health', in R. G. Wilkinson (ed.), *Class and Health: Research and Longitudinal Data* (Tavistock).
- Bobbio, N. (1987a)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 Bobbio, N. (1987b) *Which Socialism?* (Cambridge, Polity).
- Boorse, C. (1975)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isease and illnes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5.
- Boorse, C. (1982) 'What a theory of mental health should be', in R. E. Edwards (ed.), *Psychiatry and Ethics*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 Bottomley, K. and Pease, K. (1986) *Crime and Punishment: Interpreting the Dat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owles, S. and Gintis, H. (1986)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Routledge).
- Bradshaw, J. (1972) 'The concept of social need', *New Society* (30 March).
- Bradshaw, J., Mitchell, D. and Morgan, J. (1987) 'Evaluating adequacy: the potential of budget standard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 2.
- Brandt Repor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1980)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 Braybrooke, D. (1987) *Meeting Need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rewer, A. (1980)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urvey* (Routledge).
- Brown, A. (1986)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rown, G. W. and Harris, T. (1978a) *Social Origins of Depression* (Tavistock).
- Brown, G. W. and Harris, T. (1978b) 'Social origins of depression: a reply', *Psychological Medicine*, 8, 577-88.
- Brown, J. L. (1989) 'The paradox of hunger in the world's wealthiest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19, 2.
- Brundtland Report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yman, Alan (1988)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Social Research* (Unwin Hyman).
- Buchanan, A. (1982) *Marx and Justice: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 (Methuen).
- Buhmann, B. et al. (1987) 'Equivalence scales, well-being, inequality and poverty',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115-42.
- Bull, D. (1982) *A Growing Problem: Pesticides and the Third World* (Oxfam).
- Burki, S. J. and Ul Haq, M. (1981), 'Meeting basic needs: an overview', *World Development*, 9, 2.
- Busfield, J. (1986) *Managing Madness* (Unwin Hyman).
- Callinicos, A. (1990) *Against Post Modernism* (Oxford, Polity).
- Cammack, P., Pool, D. and Tordoff, W. (1988) *Third Worl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Macmillan).
- Campbell, T. (1983) *The Left and Rights* (Routledge).
- Caplan, A. et al. (1981) *Concepts of Health and Diseas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Carley, M. (1981) *Social Measurement and Social Indicators: Issues of Policy and Theory* (Allen and Unwin).
- Carr, M. (ed.) (1989) *The Barefoot Book: Economically Appropriate Services for the Rural Poor* (Intermediate Publications).
- Carr-Hill, R. (1984) 'The political choice of social indicators', *Quantity and Quality*, 18, 173-91.

- 331 Carr-Hill, R. (1986) 'An approach to monitoring social welfare', in P. Nolan and S. Paine (eds), *Rethinking Socialist Economics* (Cambridge, Polity).
- Carr-Hill, R. (1987) 'The inequalities in health debate: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issue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 4.
- Cartwright, A. (1983) *Health Surveys in Practice and in Potential* (King's Fund).
- Cereseto, S. and Waitzkin, H. (198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16, 4.
- Channer, Y. and Parton, N. (1990) 'Racism,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child protection', i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Study Group, *Taking Child Abuse Seriously* (Unwin Hyman).
- Chomsky, N. and Herman, E. (1979) *The Washington Connection and Third World Fasc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Volume 1* (Nottingham, Spokesman).
- Cingranelli, D. (ed.) (1988) *Human Rights: Theory and Measurement* (Macmillan).
- Cingranelli, D. and Wright, K. (1988) 'Correlates of due process', in D. Cingranelli (ed.), *Human Rights: Theory and Measurement* (Macmillan).
- Clare, A. (1980) *Psychiatry in Dissent* (Tavistock).
- Clutterbuck, C. and Lang, T. (1982) *More Than We Can Chew* (Pluto).
- Cochrane, A. (1986) 'Community politics and democracy', in D. Held and C. Pollitt (eds), *New Forms of Democracy* (Sage).
- Cochrane, S. (1977) *Can Education Reduce Fertil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Cohen, D. (1988) *Forgotten Millions: the Trea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 A Global Perspective* (Paladin).
- Cohen, I. (1989) *Structuration Theory* (Macmillan).
- Coimbra, M. (1984) *Welfare Policies and Peripheral Capitalism: The Case of Nutritional Policy in Brazil*, Ph.D, Manchester University.
- Cole, S. and Miles, I. (1984) *Worlds Apart*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 Coles, R. (1967) *Children of Crisis: a Study of Courage and Fear* (Faber).
- Commoner, B. (1980) 'How poverty breeds overpopulation', in R. Arditti, P. Brennan and S. Cavrak (eds.), *Science and Liberati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Cooley, M. (1980) *Architect or Bee?* (Slough, Langley Technical Services).
- Coombs, P. (1985) *The World Crisis in Edu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oper, R. (1987) 'Has the period of rising morta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come to an e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17, 3.
- Cooper, R., Schatzkin, A. and Sempós, C. (1984) 'Rising death rates among Polish 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14, 2.
- Cornia, G., Jolly, R. and Stewart, F. (eds) (1987) *Adjustment with a Human F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ox, J. (ed.) (1986) *Transcultural Psychiatry* (Croom Helm).
- Cranston, M. (1973) *What are Human Rights?* (Bodley Head).
- Crouch, C. (1983) 'Market failure: Fred Hirsch and the case for social democracy', in A. Ellis and K. Kumar (eds), *Dilemmas of Liberal Democracies* (Tavistock).

- Crystal, D. (198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32
- CSO (1987) *Social Trends* 17 (HMSO).
- CSO (1989) *Social Trends* 19 (HMSO).
- Culver C. and Gert, B. (1982) *Psychology in Medic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ulyer, A., Lavers, R. and Williams, A. (1972) 'Health indicators', in A. Shonfield and S. Shaw (eds), *Social Indicators and Social Policy* (Heinemann).
- Cumper, G. (1984) *Determinants of Health Level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etchworth: Research Studies Press).
- Cutler, P. (1984)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12, 11/12.
- Dale, J. and Foster, P. (1986) *Feminists and State Welfare* (Routledge).
- Daly, M. (1984) *Pure Lust* (The Women's Press).
- Daniels, N. (1985) *Just Health C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sen, P. (1977) 'Are cognitive processes universal?', in N. Warren (ed.), *Studie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ume 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Davies, C. and Roche, S. (1980) 'The place of methodology', *Sociological Review*, 28, 3.
- Davis, C.M. (1988) 'Developments in the health sector of the Soviet economy, 1970-90'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ism, Leeds Polytechnic.
- Derbyshire, J.D. and I. (1989)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World* (Chambers).
- De Swann, A. (1988) *In Care of th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 Desai, M., Sen, A. and Boltvinik, J. (1990) *Social Progress Index: A Proposal*, Preliminary version (Bogota, UNDP).
- Devine, P. (1988)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Cambridge, Polity).
- Dixon-Mueller, R. (1990) 'Abortion policy and women's h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tudies*, 20, 2.
- Douglas, I. (1983) *The Urban Environment* (Edward Arnold).
- Douglas, M.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Douglas, M. (1966) *Purity and Danger* (Routledge).
- Douglas, M. (ed.) (1973) *Rules and Mean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Douglas, M. (1975) *Implicit Meanings* (Routledge).
- Doyal, Len (1987) 'Health, underdevelopment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Holistic Medicine*, 2, 1.
- Doyal, Len (1988) 'Basic human needs and objective well-being', *Revue de Sociologie Internationale*, 2, 133-89.
- Doyal, Len (1990) 'Medical ethics and moral indeterminacy',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17, 1.
- Doyal, Len and Lesley (1984), 'Western scientific medicine: 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prognosis', in L. Birke and J. Silvertown (eds), *More Than the Parts: the Politics of Biology* (Pluto).
- Doyal, Len and Gough, I. (1984) 'A theory of human need', *Critical Social Policy*, 4, 1, no.10.

- 333 Doyal, Len and Harris, R. (1983)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New Left Review*, 139, May-June.
- Doyal, Len and Harris, R. (1986) *Empiricism, Explanation and Rationality* (Routledge).
- Doyal, Lesley (197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Pluto).
- Doyal, Lesley and Epstein, S. (1983) *Cancer in Great Britain: the Politics of Prevention* (Pluto).
- Doyal, Lesley (1985) *Women and Health in the European regi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 (Copenhagen: WHO).
- Doyal, Lesley (1990a) 'Hazards of hearth and hom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3, 5.
- Doyal, Lesley (1990b) 'Waged work and women's well-being',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3, 6.
- Drakakis-Smith, D. (1979) 'Low-cost housing provision in the Third World: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lternatives', in H. G. Murison and J. P. Lea (eds), *Housing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Macmillan).
- Dworkin, A. (1980) 'Taking action', in L. Lederer (ed.), *Take Back the Night*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Dworkin, G. (1988)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workin, R. (1981) 'What is equality?',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0.
- Dworkin, R. (1985) *A Matter of Princip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ckholm, E. (1982) *Down to Earth* (Pluto).
- Edwards, R. E. (1982) 'Mental health as rational autonomy', in R. E. Edwards (ed.), *Psychiatry and Ethics*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 Eisenstein, Z. (1979) 'Some notes on the relations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in Z. Eisenstein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Ellis, A. and Heath, A. (1983) 'Positional competition', in A. Ellis and K. Kumar (eds), *Dilemmas of Liberal Democracies* (Tavistock).
- Elson, D. (1988) '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sation of the market?', *New Left Review*, 172, 3-44.
- Elson, D. (1991) 'Male bias in macroeconomics: the case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D. Elson (ed.), *Male Bia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 (1979) *Ulysses and the Sir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 (1985)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ngelhardt, H. T. (1982) 'Psychotherapy as meta-ethics', in R. E. Edwards (ed.), *Psychiatry and Ethics*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 Entwistle, H. (1979) *Antonio Gramsci* (Routledge).
- Enzensberger, H. (1976) *Raids and Reconstructions* (New Left Books).
- Erikson, R. and Åberg, R. (eds) (1987) *Welfare in Transition: A Survey of Living Conditions in Sweden 1968-198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Esping-Andersen, G. (1989)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Oxford, Polity Press).
- Estes, R. (1984) *The Social Progress of Nations* (New York, Praeger)

- Evans, P. B. and Stephens, J. D. (1988)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N.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Sage) 334
-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1973) *Energy and Protein Requirements* (Rome, FAO).
- Fabian Society (1984) *Socialism and Decentralisation*, Tract 496 (Fabian Society).
- Faden, R. and Beauchamp, T. (1986) *A History and Theory of Informed Con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her, F., Heller, A. and Markus, G. (1983)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Blackwell, University Press).
- Feinberg, J. (1973) *Social Philosoph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 Feinberg, J. (1980) *Rights, Justice and the Bounds of Liber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erguson, K. (1984) *The Feminist Case Against Bureaucra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Feyerabend, P. (1978)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New Left Books).
- Finch, J. and Groves, D. (1980) 'Community care and the family: a case for equal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9, 4.
- Finch, J. (1989) 'Kinship and friendship', in R. Jowell, S. Witherspoon and L. Brook (eds),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pecial International Report* (Aldershot, Gower).
- Finegold, D. and Soskice, D. (1988) 'The failure of training in Britain: analysis and prescription',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4, 3.
- Fishkin, J. (1982) *The Limits of Oblig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itzgerald, R. (1977) 'Abraham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an exposition and evaluation', in R. Fitzgerald (ed.), *Human Needs and Politics* (NSW, Rushcutters Bay, Pergamon).
- Flew, A. (1977) 'Wants or needs, choices or commands', in R. Fitzgerald (ed.), *Human Needs and Politics* (NSW, Rushcutters Bay, Pergamon).
- Flora, P. and Alber, J. (1981) 'Modernisation, democratis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in Flora P. and Heidenheimer, A. J.,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ransaction Books).
- Foster, G. and Anderson, B. (1978) *Med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Wiley).
- Foster, P. (1983) *Access to Welfare* (Macmillan).
- Freden, L. (1982)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Depression* (Wiley).
- Freire, P. (1985)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Macmillan).
- Freud, S. (1961) *Civi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Freud, vol. 21, trans. J. Strachey (Hogarth).
- Frosh, S. (1987) *The Politics of Psychoanalysis* (Macmillan).
- Fukuyama, F.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 Fulford, K. (1989) *Moral Theory in Medical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ltung, J. (1980), 'The basic needs approach', in K. Lederer (ed.), *Human Needs* (Cambridge, Mass, Oelgeschlager, Gunn and Hain).

- 335 Galtung, J. (1982) 'Why the concern with ways of life?', in I. Miles and J. Irvine (eds), *The Poverty of Progress* (Oxford, Pergamon Press).
- Gastil, R. (1978)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 Geras, N. (1983) *Marx and Human Nature* (Verso).
- Geras, N. (1988) 'Post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69.
- Geras, N. (1989) 'Our morals: the ethics of revolution', in R. Miliband *et al.* (eds), *Socialist Register 1989* (Merlin Press).
- Gewirth, A. (1978) *Reason and Moral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ewirth, A. (1982) *Human Righ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housoub, M. (1987) 'Feminism - or the eternal masculine - in the Arab World', *New Left Review*, 161.
-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Macmillan).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 Giddens, A. (1982) *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 (Macmillan).
- Gilbert, P. (1984) *Depression* (Lawrence Erlbaum).
- Gilbert, A. and Ward, P. (1984) 'Community action by the urban poor', *World Development*, 12, 769-82.
- Godfrey, E. M. (1986) *Global Unemployment: the New Challenge* (Brighton, Wheatsheaf).
- Goldstein, J. (1985) 'Basic human needs: the plateau curve', *World Development*, 13, 5.
- Goodin, R. (1985) *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odin, R. (1988) *Reasons for Welfa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rovitz, S. (1982) *Doctor's Dilemm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ugh, I. (197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Macmillan).
- Gough, I. and Doyal, L., with the Sheffield Group (1989) 'Socialism, democracy and human needs', in P. Alcock *et al.* (eds), *The Social Economy and the Democratic State: A New Policy Agenda* (Lawrence and Wishart).
- Gould, A. (1988)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Welfare Politics: the Swedish Experience* (Longman).
- Gouldner, A. (1971)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 Q. Hoare and G. Nowell Smith (Lawrence and Wishart).
- Gray, J. (1983) 'Classical liberalism, positional goals and the politicisation of poverty', in A. Ellis and K. Kumar (eds), *Dilemmas of Liberal Democracies* (Tavistock).
- Green, D. (1987) *The New Right* (Brighton, Wheatsheaf).
- Griffin, J. (1986) *Well-Be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imshaw, J. (1986) *Feminist Philosophers* (Brighton, Wheatsheaf).
- Grundy, S. (1987) *Curriculum: Product or Praxis* (Lewes, Falmer).
- Guntrip, H. (1968) *Schizoid Phenomena, Object Relations and the Self* (Hogarth).
- Gutmann, A. (1980) *Liberal Equ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tmann, A. (1982) 'What's the use of going to school?', in A. Sen and B. Williams (eds),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1970a) 'Towards a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quiry*, 13.
- Habermas, J. (1970b) *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Habermas, J.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 Habermas, J. (1974) *Theory and Practice* (Heinemann).
- Habermas, J. (1976)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 Habermas, J. (1981)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1,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 Habermas, J. (1981) 'New social movements', *Telos*, 49 (Fall).
- Habermas, J. (1988)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F. Lawrence (Oxford, Polity).
- Hadley, R. and Hatch, S. (1981) *Social Welfar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State: Centralised Social Services and Participatory Alternatives* (Allen and Unwin).
- Hardiman, M. and Midgley, J. (1982)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 (Wiley).
- Hardin, G. (1977) 'Lifeboat ethics: the case against helping the poor', in W. Aiken and H. LaFollette (eds), *World Hunger and Moral Oblig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Harris, D. (1987) *Justifying State Welfare* (Oxford, Blackwell).
- Harris, M. (1979) *Cultural Mat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Harris, R. (1987)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beyond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Radical Philosophy*, 45 (Spring).
- Haworth, L. (1986) *Autonom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yek, F.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Routledge).
- Hayek, F.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Routledge).
- Hedstrom, P. and Ringen, S. (1987) 'Age and incom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 2.
- Hegel, G. W. F. (1977)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 Mil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ld, D. (1987)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 Held, D. and Pollitt, C. (eds) (1986) *New Forms of Democracy* (Sage).
- Heller, A. (1976)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Allison and Busby).
- Helman, C. (1990) *Culture, Health and Illness* (Wright).
- Herskovits, M. (1972) *Cultural Relativ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Hicks, N. (1982) 'Sector priorities in meeting basic needs: some statistical evidence', *World Development*, 10, 6.
- Hicks W. and Streeten, P. (1979) 'Indicators of development: the search for a basic needs yardstick', *World Developments*, 7, 6.
- Hillhorst, J. and Klatte, M. (eds) (1985)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Level of Living Indicators and Social Planning* (Croom Helm).
- Hillier, S. (1988) 'Women and population control in China: issues of sexuality, power and control', *Feminist Review*, 29.
- Hindess, B. (1977)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righton, Harvester).

- 337 Hindess, B. (1987) *Freedom, Equality and the Market: Arguments on Social Policy* (Tavistock)
- Hirst, P. and Woolley, P. (1982) *Social Relations and Human Attributes* (Tavistock).
- Hodgson, G. (1984) *The Democratic Economy* (Penguin).
- Hoffman, E. (1989) *Lost in Translation* (New York, Minerva).
- Hollis, M. (1987) *The Cunning of Rea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mana, C. (1986) *World Human Rights Guide* (Pan).
- Hume, D. (1963) *Enqui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gnatieff, M. (1984) *The Needs of Strangers* (Chatto and Windus).
- Illich, I. et al. (1977) *Disabling Professions* (Marion Boyars).
-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1988) *A World of Differences: 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1988) *Science Achievement in Seventeen Countries: a Preliminary Report* (Oxford, Pergamon).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1976) *Employment, Growth and Basic Needs: A One-World Problem* (Geneva).
- Ireland, T. (1985) 'Antonio Gramsci and popular educ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Brazilian experience' (unpublished).
- Jacobs, M. (1989) 'What is "sustainability"?'', Paper presented to Green Policies Seminar, Nottingham, UK (May).
- Jacobs, M. (199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bian Society, Tract 538).
- Jaggard, A. (1983)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Brighton, Harvester).
- Jahoda, M. (1958) *Current Concepts of Positive Mental Health* (New York, Basic Books).
- Jahoda, M. (1982)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a Social-Psychological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hansson, S. (1976) 'Towards a theory of social reporting', Swedish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paper.
- Johnson, C. (1982) *Revolutionary Change* (Longman).
- Johnson, N. (1987) *The Welfare State in Transi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Pluralism* (Brighton, Wheatsheaf)
- Johnson, N. (1990) 'Problems for the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 in A. Ware and R. Goodin (eds), *Needs and Welfare* (Sage).
- Jones, H. (1990) *Social Welfare in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Macmillan).
- Jones, P. (1990) 'Universal and particular claims: from welfare rights to welfare states', in A. Ware and R. Goodin (eds), *Needs and Welfare* (Sage).
- Judge, A. (1980) 'Needs communication: viable needs patterns and their identification', in K. Lederer (ed.), *Human Needs* (Cambridge, Mass, Oelgeschlager, Gunn and Hain).
- Kabeer, N. (1988) 'Subordination and struggle: women in Bangladesh', *New Left Review*, 168.
- Kakwani, N. (1980)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nt, I. (1964)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N.K. Smith (Macmillan).
- Kamenetzky, M. (1981) 'The economics of the satisfaction of needs',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2.
- Katzenstein, P. (1985)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eane, J. (1988)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Verso).
- Keane, J. and Owens, J. (1986) *After Full Employment* (Hutchinson).
- Keane, J. and Owens, J. (1987) 'Reply to Mike Rustin', *Critical Social Policy*, 18.
- Keat, R. (1981) *The Politics of Social Theory* (Oxford).
- Kellmer-Pringle, M. (1980) *The Needs of Children*, 2nd edn (Hutchinson).
- Kennedy, I. and Grubb, A. (1989) *Medical Law: Text and Materials* (Butterworths).
- Kleinman, A. (1984) 'Indigenous systems of healing: questions for professional, popular and folk care', in W. Salmon (ed.), *Alternative Medicines* (Tavistock).
- Kleinman, A. and Good, B. (eds) (1985) *Culture and Depression: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and Cross-Cultural Psychiatry of Affect and Dis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orbin, J. (ed.) (1981)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orpi, W. (1983)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Routledge).
- Kuhn, T.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Kukathas, C. and Pettit, P. (1990) *Rawls* (Oxford, Polity).
- Kurian, G. (1984) *Book of World Ranking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 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1.
- La Fontaine, J. (1985) 'Person and individual: some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in M. Carrithers, S. Collins and S. Lukes (eds), *The Category of the Per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clau, E. and Mouffe, C.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 Laclau, E. and Mouffe, C. (1987) 'Post 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New Left Review*, 166.
- Lancaster, K. (1966) 'A new approach to consumer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4.
- Lane, J.-E. and Ersson, S. (1987)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Sage).
- Lash, S. and Urry, J. (1987) *The End of Organis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 Laurence, J. (1988) 'Statistics of a taboo',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1 July).
- Lawson, H. (1985) *Reflexivity: The Post-Modern Predicament* (Hutchinson).
- Lebowitz, M. (1979) 'Heller on Mart's concept of needs', *Science and Society* 43, 349-55.
- Lederer, K. (1980) 'Introduction', in K. Lederer (ed.), *Human Needs* (Cambridge, Mass., Oelgeschlager, Gunn and Hain).
- Lee, P. and Raban, C. (1988) *Welfare Theory and Social Policy* (Sage).

- 339 Lees, S. (1986) 'Sex, race and culture', *Feminist Review*, 22 (Spring).
- Leeson, P. and Nixon, F. (eds) (1988)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LeGrand, J. (1987)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inequalities in health', LSE Research Paper.
- Leiss, W. (1976)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A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Needs and Commodit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Lerner, G. (1986)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ssnoff, N. (1986) *Social Contract* (Macmillan).
- Levinson, D. (1989) *Family Violence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Sage).
- Lieven, E. (1989)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co-operation and caring', in R. Hinde and P. Bateson (eds), *Education for Peace* (Nottingham, Spokesman).
- Lindley, R. (1986) *Autonomy* (Macmillan).
- Lovell, T. (ed.) (1990) *British Feminist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 Lukes, S.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Macmillan).
- Lukes, S. (1982) 'Of gods and demons: Habermas and practical reason', in J. Thompson and D. Held (eds), *Habermas* (Macmillan).
- Lukes, S. (1985) *Marxism and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T. (1978)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 (Hutchinson).
- McInnes, N. (1977) 'The politics of needs - or, who needs politics?' in R. Fitzgerald (ed.), *Human Needs and Politics* (NSW, Rushcutters Bay, Pergamon).
- MacIntyre, A. (1983) *After Virtue* (Duckworth).
- MacIntyre, A. (1988) *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Duckworth).
- McKeown, T. (1976) *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 (Edward Arnold).
- MacPherson, C. B. (1962)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Pherson, C. B. (1973)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acPherson, S. (1987) *Five Hundred Million Children: Poverty and Child Welfare in the Third World* (Brighton, Wheatsheaf).
- Mack, J. and Lansley, S. (1985) *Poor Britai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Mallmann, C. and Marcus, S. (1980), 'Logical clarification in the study of needs', in K. Lederer (ed.), *Human Needs* (Cambridge, Mass. Oelgeschlager, Gunn and Hain).
- Mann, M. (1987) 'Ruling class strategies and citizenship', *Sociology*, 21, 2.
- Marsalla, A., Sartorius, N., Jablensky, A. and Fenton, F. (1985)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an overview', in A. Kleinman and B. Good (eds), *Culture and Depression: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and Cross-Cultural Psychiatry of Affect and Dis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shall, T. H. (1963)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Sociology at the Crossroads and Other Essays* (Heinemann).
- Marshall, T. H. (1981) *The Right to Welfare and Other Essays* (Heinemann).
- Marx, K. (1961) *Capital*, volume 1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 Marx, K. (1973) *Grundrisse*, trans. M. Nicolaus (Penguin).
- Maslow, A.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340
50, pp. 370-96.
- Maslow, A. (1954)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2nd edn (Harper and Row).
- Mason, J. and McCall Smith, R. (1987) *Law and Medical Ethics* (Butterworths).
- Matthews, M. (1986) *Poverty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uss, M. (1985) 'A category of the human mind: the notion of person; the notion of self', in M. Carrithers, S. Collins, S. Lukes (eds), *The Category of the Per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ade, J. E. (1990) 'Can we learn a "third way" from the Agathotopians?',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Review*, 167, 15-28.
- Meehan, E. (1991) 'Europea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policies', in M. Moran and U. Vogel (eds), *The Frontiers of Citizenship* (Macmillan).
- Mehan, H. and Wood, H. (1975) *The Reality of Ethnomethodology* (New York, Krieger).
- Mehta, S. (1984)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New Delhi, Sage).
- Meillassoux, C. (1972) 'From reproduction to production: a Marxist approach to economic anthrop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1.
- Melrose, D. (1982) *Bitter Pills* (Oxford, Blackwell).
- Meyers, D. (1985) *Inalienable Rights: a Defen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ezzicich, J. and Berganza, C. (eds) (1984) *Culture and Psychopath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idgley, M. (1979) *Beast and Man* (Methuen).
- Miles, I. and Irvine, J. (eds) (1982) *The Poverty of Progress* (Oxford, Pergamon Press).
- Miles, I. (1985) *Social Indicators for Human Development* (Frances Pinter).
- Miller, D. (1976) *Social Justice* (Oxford, Clarendon).
- Miller, D. (1989)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iller, R. (1975) 'Rawls and Marxism', in N. Daniels (ed.), *Reading Rawls* (Oxford, Blackwell).
- Moon, B. and Dixon, W. (1985) 'Politics, the state and basic human needs: a cross-national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661-94.
- Moore, H. (1988) *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 (Cambridge, Polity).
- Morgan, M., Calnon, M., and Manning, N. (1985)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to Health and Illness* (Croom Helm).
- Morris, M. D. (1979) *Measu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ld's Poor* (Oxford, Pergamon Press).
- Murie, A. (1983) *Housing Inequality and Deprivation* (Heinemann).
- Murphy, H. B. M. (1982) *Comparative Psychiatry: th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Distribution of Mental Illness* (Berlin, Springer-Verlag).
- Myrdal, G. (1960)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Nagel, T. (1971-2) 'War and massacr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

- Nagel, T. (1979) *Mortal Ques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41 Nagel, T. (1978) *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aroll, R. (1983) *The Moral Or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ituation* (Sage).
- Nevitt, D. (1977) 'Demand and need', in H. Heisler (ed.), *Foundations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Macmillan).
- Nickel, J. (1987) *Making Sense of Human Righ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ordic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1)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s on 14 Nordic Supported Projects* (Panos Institute).
- Norman, R. (1976) *Hegel's Phenomenology* (University of Sussex Press).
- Norman, R. (1983) *The Moral Philosophers* (Oxford, Clarendon).
- Norris, P. (1987) *Politics and Sexual Equality: the Comparative Position of Wome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Brighton, Wheatsheaf).
- Nove, A.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Allen and Unwin).
- Nozick, R.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Oxford, Blackwell).
- Obeyesekere, G. (1985) 'Depression, Buddhism and the work of culture in Sri Lanka', in A. Kleinman and B. Good (eds), *Culture and Depression: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and Cross-Cultural Psychiatry of Affect and Dis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Brien, M. (1981)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Routledge).
- O'Higgins, M., Schmaus, G. and Stephenson, G. (1985)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a microdata analysis for seven countries', *LIS-CEPS Working Paper 3*.
- Oliver, M. (1990) *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 (Macmillan).
- O'Neill, O. (1981) 'Nozick's entitlements', in J. Paul (ed.), *Reading Nozick* (Oxford, Blackwell).
- O'Neill, O. (1986) *Faces of Hunger* (Allen and Unwin).
- OECD (1976) *Measuring Social Well-Being* (Paris).
- OECD (1985) *Measuring Health Care 1960-83: Expenditure, Costs and Performance* (Paris).
- OECD (1986) *Living Conditions in OECD Countries* (Paris).
- OECD (1987) *OECD Environmental Data: Compendium 1987* (Paris).
- OECD (1987a)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Supplement* (Paris).
- OECD (1988) *Reforming Public Pensions* (Paris).
- OECD (1989) *OECD in Figures* (Paris).
- OPCS (1986) *Occupational Mortality, Series DS, no. 2* (HMSO).
- OPCS (1988a) *The Prevalence of Disability among Adults* (HMSO).
- OPCS (1988b) *The Prevalence of Disability among Children* (HMSO).
- Open University U205 Course Team (1985) *The Health of Nation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Osborne, P. 'Radicalism without limit?', in P. Osborne (ed.), *Socialism and the Limits of Liberalism* (Verso).
- Overing, J. (ed.) (1985) *Reason and Morality* (Tavistock).
- Pahl, J. (1980) 'Patterns of money management within marriag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9, 3.

- Pahl, J. (1989) *Money and Marriage* (Macmillan).
- Parfitt, D. (1984)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Parsons, T. (1958) 'Definitions of health and illness in the light of American valu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in E. Jago (ed.) *Patients, Physicians, and Illness* (New York, Free Press).
- Partridge, E. (1981) 'Posthumous interests and posthumous respect', *Ethics*, 91, 243-64.
- Pateman, C. (1970)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teman, C. (1988) *The Sexual Contract* (Cambridge, Polity).
- Pateman, C. (1989) 'The patriarchal welfare state', in C. Pateman (ed.), *The Disorder of Women* (Cambridge, Polity).
- Penz, P. (1986) *Consumer Sovereignty and Human Intere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tchesky, R. (1984) *Abortion and Women's Choice* (Longman).
- Pettit, P. (1980) *Judging Justice* (Routledge).
- Pfaffner, A., Gough, I. and Therborn, G. (eds) (1991) *Can the Welfare State Compe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ve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Macmillan).
- Phares, E. (1976) *Locus of Control in Personality*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 Phillips, A. (1991) 'Citizenship and feminist politics', in G. Andrews (ed.), *Citizenship* (Lawrence and Wishart).
- Piachaud, D. (1987) 'Problems in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overt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 2.
- Piaget, J. (1952) *The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Plant, R. (1971) *Hegel* (Allen and Unwin).
- Plant, R., Lesser, H. and Taylor-Gooby, P. (1980)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Welfare* (Routledge).
- Plant, R. (1986) 'Needs, agency and rights', in C. Sampford and J. Law (eds), *Law, Rights and the Welfare State* (Croom Helm).
- Plant, R. (1989) 'The neo-liberal social vision', in J. Elliott and I. Swanson (eds), *The Renewal of Social Visi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Centre for Theology and Public Issues, Occasional Paper 17).
- Plant, R. (1990) 'Citizenship and rights', in IEA (ed.), *Citizenship and Rights in Thatcher's Britain: Two Views*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 Platts, M. (1979) *Ways of Meaning* (Routledge).
- Pogge, T. (1989) *Realizing Rawl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olanyi, K.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Policy Research Unit (1990) *Finding Out About Your Community: How to do a Social Audit* (Leeds Polytechnic, Policy Research Unit).
- Pollack, S. (1985) 'Sex and the contraceptive art', in H. Homans (ed.), *The Sexual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Gower).
- Pollitt, C. (1986) 'Democracy and bureaucracy', in D. Held and C. Pollitt (eds), *New Forms of Democracy* (Sage).
- Prais, S. J. and Wagner, K. (1985) 'Schooling standards in England and Germany',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May).

- 343 Pritchard, K. (1988) 'Comparative human rights: promise and practice', in D. Cingranelli (ed.), *Human Rights: Theory and Measurement* (Macmillan).
- Purdy, D. (1988) *Social Power and the Labour Market* (Macmillan).
- Radical Science Journal Collective (1981) 'Science, technology, medicine an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Radical Science Journal*, 11.
- Ram, R. (1985) 'The role of real income level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fulfilment of basic needs', *World Development*, 13, 5.
- Ram, R. (1988)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World Development*, 16, 11.
- Rawls, J. (1972)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wls, J. (1982) 'The basic liberties and their priority', in S. McMurrin (ed.),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 3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 Raz, J. (1986)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iser, S. (1981) *Medicine and the Reign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nner, C. and Navarro, V. (1989) 'Why is our population of uninsured and underinsured persons grow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19, 3.
- Renshon, S. (1977) 'Human needs and political analysis: an examination of a framework', in R. Fitzgerald (ed.), *Human Needs and Politics* (NSW, Rushcutters Bay, Pergamon).
- Renteln, A. (1990)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Universalism versus Relativism* (Sage).
- Rescher, N. (1972) *Welfare: the Social Issues 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Richards, J. R. (1984) *The Sceptical Feminist* (Penguin).
- Rist, G. (1980), 'Basic questions about basic human needs', in K. Lederer (ed.), *Human Needs* (Cambridge, Mass, Oelgeschlager, Gunn and Hain).
- Roderick, R. (1986) *Haberma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Macmillan).
- Rorty, R. (1980) 'Pragmatism, relativism, and irrationalism',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53.
- Rose, S., Lewontin, R. and Kamin, L. (1984)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and Human Nature* (Penguin).
- Rowbotham, S. (1979)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organizing for socialism', in S. Rowbotham, L. Segal and H. Wainwright, *Beyond The Fragments* (Merlin Press).
- Rowbotham, S. (1986) 'Feminism and democracy', in D. Held and C. Pollitt (eds), *New Forms of Democracy* (Sage).
- Rueschemeyer, D. and Evans, P. B. (1985) '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wards an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underlying effective intervention', in P. B.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nciman, W. (1966)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 Rupesinghe, K. (1986) 'The welfare state in Sri Lanka', in E. Øyen (ed.), *Comparing Welfare States and their Futures* (Gower).

- Rustin, M. (1985) *For A Pluralist Socialism* (Verso).
- Rustin, M. (1987) 'The non-obsolescence of the right to work', *Critical Social Policy*, 18.
- Rustin, M. (1989) 'Post-Kleinian psychoanalysis and the post-modern', *New Left Review*, 173.
- Ruttan, W. (1984)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12, 393-401.
- Sahlins, M. (1974) *Stone Age Economics* (Tavistock).
- Salmon, J. (ed.) (1984) *Alternative Medicines* (Tavistock).
- Sandbrook, R. (1985) *The Politics of Africa's Economic Stag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utz, A. (1965) 'The social world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in D. Braybrooke (ed.),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 Scott, H. (1984) *Working Your Way to the Bottom: the Feminisation of Poverty* (Pandora).
- Seager, J. and Olson, A. (1986) *Women in the World: an International Atlas* (Pluto).
- Sedgwick, P. (1982) *Psychopolitics* (Pluto).
- Segal, L. (1987) *Is the Future Female?* (Virago).
- Seligman, M. (1975) *Helplessness* (New York, Freeman).
- Selowsky, M. (1981) 'Income distribution, basic needs and trade-offs with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9, 1.
- Sen, A. (1970)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San Francisco, Holden-Day).
- Sen, A. (1981) *Poverty and Famin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en, A. (1984) *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 Sen, A. (1985)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Amsterdam, Elsevier).
- Sen, A. (1987) *The Standard of Living: the Tanner Lectures*, ed. G. Hawtho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n, A. (1990) 'More than 100 million women are missing',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 December).
- Shah, N. (1989) 'It's up to you sisters: black women and radical social work', in M. Langan and P. Lee (eds), *Radical Social Work Today* (Unwin Hyman).
- Silber, J. (1983) 'ELL (the equivalent length of life) or another attempt at measuring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11, 1.
- Singer, P. (1979) '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 in P. Laslett and J. Fishkin (eds),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Sivard, R. L. (1989) *W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 1989* (Washington DC, World Priorities Inc.).
- Smith, B. and B. (1983) 'Across the kitchen table: a sister to sister dialogue', in C. Moraga and G. Anzaldúa (eds),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New York, Kitchen Table Press).
- Smith, D. (1983) *Barrington Moore* (Macmillan).
- Smith, G. (1980) *Social Need: Policy, Practice and Research* (Routledge).
- Smith, R. (1987) *Unemployment and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per, K. (1981) *On Human Needs* (Brighton, Harvester).

- 345 Soper, K. (1990) 'Feminism, humanism and post-modernism', *Radical Philosophy* (Summer).
- Spearitt, D. (1990) 'Evaluation of national comparisons', in H. Walberg and G. Haertel (ed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Oxford, Pergamon).
- Springborg, P. (1981) *The Problem of Human Needs and the Critique of Civilisation* (Allen and Unwin).
- Stacey, M. (1988)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Healing* (Unwin Hyman).
- Stankiewicz, W. (1980) *Approaches to Democracy* (Arnold).
- Stanley, L. and Wise, S. (1983) *Breaking Out: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Feminist Research* (Routledge).
- Stark, E. (1982) 'What is medicine?', *Radical Science Journal*, 12.
- Steedman, I. (1989) *From Exploitation to Altruism* (Cambridge, Polity).
- Stern, A. et al. (1984) *Fundamentals of Air Pollution* (Academic Press).
- Stewart, F. (1985) *Planning to Meet Basic Needs* (Macmillan).
- Streeten, P. (1981)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Macmillan).
- Streeten, P. (1984) 'Basic needs: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World Development*, 12, 90.
- Streeten, P. and associates (1981) *First Things First: Meeting Basic Human Need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zasz, T. (1961)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Szulkin, R. (1987) 'Political resources', in R. Erikson and R. Åberg (eds), *Welfare in Transition: A Survey of Living Conditions in Sweden 1968-198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Tang Nain, G. (1991) 'Black women, sexism and racism: black or anti-racist feminism?', *Feminist Review*, 37.
- Taylor, C. (1975) *Heg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D. (1989) 'Citizenship and social power',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6.
- Taylor, P. (1986) *Respect for N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ennant, C. and Bebbington, P. (1978) 'The social causation of depression: a critique of the work of Brown and his colleague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8, 565-75.
- Therborn, G. (1977) '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New Left Review*, 103, 3-41.
- Therborn, G. (1991) 'Sweden', in A. Pfaller, I. Gough and G. Therborn (eds), *Can the Welfare State Compe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ve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Macmillan).
- Thirlwall, A. (1983) *Growth and Development*, 3rd edn (Macmillan).
- Thompson, G. (1987) *Needs* (Routledge).
- Timpanaro, S. (1975) *On Materialism* (New Left Books).
- Tinker, A. (1981) *The Elderly in Modern Society* (Longman).
- Titmuss, R. (1970) *The Gift Relationship* (Allen and Unwin).
- Titmuss, R. (1971) 'Welfare "rights", law and discretion', *Political Quarterly* (April-June).
- Townsend, P. (1962) 'The meaning of pover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8, 3.

- Townsend, P. (1972)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the planning of hospitals', in R. Canvin and N. Pearson (eds), *Needs of the Elderl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Services* (University of Exeter).
- Townsend, P. (1979a)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Penguin).
- Townsend, P. (1979b)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Poverty', in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The Definition of Poverty* (HMSO).
- Townsend, P. (1981) 'An alternative concept of poverty', *Division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 (Paris, UNESCO).
- Townsend, P. (1985)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 a rejoinder to Professor Amartya Se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7, 659-668.
- Townsend, P. (1987) 'Deprivatio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 2.
- Trigg, R. (1984) 'The sociobiological view of man', in S. Brown (ed.), *Objectivity and Cultural Diverg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igg, R. (1985) *Understanding Social Science* (Oxford, Blackwell).
- Turner, B. (1986) *Citizenship and Capitalism* (Allen and Unwin).
- Turner, J. (1972) 'Housing issues and the standards problem', *Ekistics*, 33.
- United Nations (1975)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Family Planning* (New York, UN).
- United Nations (1977) *The Social Impact of Housing* (New York, UN).
- United Nations (1984) *Recent Levels and Trends of Contraceptive Use as Assessed in 1983* (New York, UN).
- United Nations (1984a) *Improving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Statistics and Indicators on the Situation of Women* (New York, UN).
- United Nations (1985) *Selected Statistics and Indicators on the Status of Women*,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Nairobi A/CONF. 116/10).
- United Nations (1987) *Environmental Data Report* (New York, UN).
- UNDP (199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ESCO (1974)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Paris, UNESCO).
- UNESCO (1989)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9* (Paris, UNESCO).
- UNICEF (1987)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S Bureau of Justice (1988) 'International Crime Rate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pecial Report* (May).
- Van der Veen, R. and van Parijs, P. (1987) 'A capitalist road to communism', *Theory and Society* 15.
- Veit-Wilson, J.H. (1987) 'Consensual approaches to poverty lines and social securit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 2.
- Vincent, R. (1986)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on Wright, G.H. (1963) *Varieties of Goodness* (Routledge).
- Waldron, J. (ed.) (1984) *Theories of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ker, A. (1984) *Social Planning: A Strategy for Socialist Welfare* (Oxford, Blackwell).
- Walker, R. (1987) 'Consensual approaches to the definition of poverty: towards an alternative methodolog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 2.

- 347 Wall, G. (1975) 'The concept of interest in politics', *Politics and Society*, 5, pp. 487-510.
- Wallace, A. (1986) *Homicide: the Social Reality* (Sydney, NSW, Bureau of Crime Statistics and Research).
- Walsh, A. and Warren, K. (1979) 'Selective primary health car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01, 967-74.
- Walzer, M. (1977) *Just and Unjust Wars* (New York, Basic Books).
- Walzer, M. (1983) *Spheres of Justice* (Oxford, Blackwell).
- Warr, P. (1987) *Work, Unemployment and Mental Heal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eale, A. (1983) *Political Theory and Social Policy* (Macmillan).
- Weigel, V. (1986) 'The basic needs approach: overcoming the poverty of *homo oeconomicus*', *World Development* 14, 2.
- Wesson, R. (ed.) (1987) *Democracy: A Worldwide Survey* (New York, Praeger).
- White, A. (1971) *Modal Thinking* (Oxford, Blackwell).
- White, A. (1984)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S. (1988) *The Recent Work of Jürgen Haberm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itehead, M. (1988) *The Health Divide* (Penguin).
- Wiggins, D. (1985) 'Claims of need', in T. Honderich (ed.), *Morality and Objectivity* (Routledge).
- Williams, A. (1974) '"Need" as a demand concept', in A. J. Culyer (ed.), *Economic Policies and Social Goals* (Martin Robertson).
- Williams, A. (1985) 'The value of QALYs',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 Journal*, Supplement (18 July).
- Williams, F. (1987) 'Racism and the discipline of social policy: a critique of welfare theory',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0 Autumn).
- Williams, R. (1965) *The Long Revolution* (Penguin).
- Williams, R. (1973) *Communications* (Penguin).
- Williams, R. (1979) *Politics and Letters* (Verso).
- Winch, P. (1974) 'Understanding a primitive society', in B. Wilson (ed.), *Rationality* (Oxford, Blackwell).
- Wisner, B. (1988) *Power and Need in Africa: Basic Human Needs and Development* (Earthscan).
- Wittgenstein, L. (197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Wolff, R. (1970) *In Defense of Anarchi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Wong, D. (1984) *Moral Relativ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orld Bank (1985)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198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1988)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Our Common Future (the Brundtland Repo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1973) *The International Pilot Study of Schizophrenia* (Geneva, Switzerland, WHO).

-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1978) *Primary Health Care* (Geneva, Switzerland, WHO). 348
-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1980)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s, Disabilities and Handicaps* (Geneva, Switzerland, WHO).
-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1982) *Manuals on Child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Geneva, Switzerland, WHO).
-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1983a)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Health Care Coverage* (Geneva, Switzerland, WHO).
-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1983b) *Depressive Disorders in Different Cultures* (Geneva, Switzerland, WHO).
-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1987) *Evaluation of the Strategy for Health for All by the Year 2000: Seventh Report on the World Health Situation* (Geneva, Switzerland, WHO).
-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1989)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Annual 1989* (Geneva, Switzerland, WHO).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87) *World Resources 1987* (New York, Basic Books).
- Wright, P and Treacher, A. (eds) (1982) *The Problem of Medical Knowledg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I. M. (1989) 'Polity and group difference: a critique of the ideal of universal citizenship', *Ethics*, 99.
- Young, R. (1977) 'Science is social relations', *Radical Science Journal*, 5.
- Yoxen, E. (1983) *The Gene Business* (Pan).

索引

Åberg, R. 阿伯格, R. 198, 200
abortion 流产 217, 220, 259
action *see* human action 行为 参见人类行为
Aganbegyan, A. 阿甘别吉扬, A. 285, 325
Agarwal, A. 阿加瓦尔, A. 196
aid 帮助 97—8, 104—8, 319
air pollution 空气污染 200—1, 260, 323
Alcock, P. 阿尔科克, P. 327
Allardt, E. 阿拉德特 152
Allsebrook, A. 奥尔斯布鲁克, A. 207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s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II)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病学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II) 181
Amnesty International 大赦国际 214
Anderson, B. 安德森, B. 64
Anderson, P. 安德森, P. 109, 296, 326
Anker, R. 安科尔, R. 286
Anscombe, G. E. M. 安斯库姆, G. E. M. 41, 42, 314
anti-racism 反种族主义 14—15, 313
anti-scientism 反科学至上主义 16
anti-sexism 反性别主义 15—16
Archer, M. 阿彻, M. 79, 81
Arkes, H. 阿克斯, H. 114
Armstrong, D. 阿姆斯特朗, D. 315
Aronowitz, S. 阿罗诺维茨, S. 16
Arrington, R. 阿林顿, R. 93, 314
Arrow, K. 阿罗, K. 320

Atkinson, A. B. 阿特金森, A. B. 323, 325, 327
Augustine, St 圣奥古斯丁 318
authority 权力 80, 88—9
autonomy 自主 170—171
 as basic need 自主是基本需要 54—5, 59—69
 capacity for choice 选择能力 52—3
 critical 批判性自主 67—8, 68—9, 170, 187—90, 216
 culture and 文化与自主 70—3
 enhanced by poor health 健康状况不好可以提高自主能力 316
 impaired 损害 53—4, 315; by education 教育可以损害自主 61; by work 工作可以损害自主 199—200
 measuring basic needs 基本需要的测度 180—90, critical 批判性自主 187—90; learning and cognitive skills 学习与认知技能 181—4; mental illness 精神疾病 180—1; social roles and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社会职责与参与机会 184—7
 measuring intermediate needs 中间需要的测度 192—3, 204—18, 220, 257—60; childhood security 儿童安全 204—7; economic security 经济安全 210—12; education 教育 214—16; physical security 人身安全 212—14; reproduction 繁衍 217—

- 18; significant primary relationships 重要的初级关系 207—10
 optimal 最优化自主 73
 social dimension of individual 个人的社会层面 76—80
 state socialism 国家社会主义 286
 women's 女性的自主 217—18, 266—8
 Avineri, S. 阿维内里, S. 89
 Axelsson, C. 阿克塞尔森, C. 208, 210
 Bachrach, P. 巴拉克拉克, P. 306
 Badrova, V. 波德洛娃, V. 286
 Baratz, M. 巴拉茨, M. 306
 Barnes, B. 巴恩斯, B. 314
 Barrington Moore, J. 巴林顿·穆尔, J. 65, 82, 88, 185, 210
 Barry, B. 巴里, B. 39
 Barry, N. 巴里, N. 25, 327
 Basal Metabolic Rate 基础代谢率 194
 basic goods/services 基本产品/服务 237, 261, 263, 324
 basic income guarantee 基本收入保证 302—3, 326—7
 basic needs 基本需要 49—75, 170
 preconditions for human action/interaction 人类行为/互动的前提条件 50—5
 satisfaction; measuring 满足的测度 153—4, 155, 171—90; problems in comparing 比较需要满足中出现的问题 69—75; relation to intermediate need-satisfaction 基本需要与中间需要满足之间的关系 162—4; standards 基本需要满足的标准 159—61; suggested indicators 建议的基本需要满足指标 190; in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中的基本需要 249—55
 societal preconditions for satisfaction *see* societal preconditions 满足的社会前提条件 参见社会前提条件
 also see autonomy; health 另参见自主; 健康
 Baster, N. 巴斯特, N. 321
 Baudrillard, J. 鲍德里拉德, J. 189
 Bay, C. 贝, C. 314
 Beauchamp, T. 比彻姆, T. 60, 315
 Bebbington, P. 贝宾顿, P. 322
 Beck, A. 贝克, A. 64
 Beiser, M. 贝瑟, M. 180, 181, 254
 Bell, J. 贝尔, J. 118
 Benton, T. 本顿, T. 37
 Bentovim, A. 本托文, A. 207
 Berganza, C. 贝尔甘萨, C. 62
 Berlin, I. 伯林, I. 78
 Bernstein, R. 伯恩斯坦, R. 318
 Bettelheim, B. 贝特尔海姆, B. 210
 Bigsten, A. 比格斯顿, A. 263
 biology 生物学 12, 28, 36—9
 biomedical model 生物医学模型 57—9, 176—8, 202—3
 birth control 节育 217—18, 220, 250, 258—9
 birthweight, low 出生体重不足 250, 253
 Blaxter, M. 布拉克斯特, M. 178
 Bloor, D. 布卢尔, D. 314
 Bobbio, N. 博比奥, N. 326
 Bogota River, Colombia 波哥大河, 哥伦比亚 201
 Boltvinik, J. 博尔特维尼克, J. 321
 Boorse, C. 布尔斯, C. 58, 316
 Bottomley, K. 博顿利, K. 213
 Bowles, S. 鲍尔斯, S. 224, 326
 Bradshaw, J. 布拉德肖, J. 168, 323
 Braybrooke, D. 布雷布鲁克, D. 44, 49, 158, 321
 culture and food 文化与食物 70
 priority of need-satisfaction 需要满足的优先权 119, 157
 social roles 社会职责 61, 81

- Brazil 巴西 279—80
 Brentano, F. 布伦坦诺, F. 316
 Brewer, A. 布鲁尔, A. 282
 Brown, A. 布朗, A. 26
 Brown, G. W. 布朗, G. W. 192—3, 207, 209, 322
 Brown, J. L. 布朗, J. L. 290
 Brundtland Report 《布伦特兰报告》 197—8, 235, 243—4
 Bryman, A. 布赖曼, A. 168
 Buchanan, A. 布坎南, A. 136
 Bull, D. 布尔, D. 199
 bureaucracy 官僚制度 306
 Burki, S. J. 伯基, S. J. 164
 Busfield, J. 巴斯菲尔德, J. 176, 180, 181
- Callinicos, A. 卡利尼克斯, A. 109
 Cammack, P. 坎马克, P. 143
 Campbell, T. 坎贝尔, T. 136, 213
 capital goods 资本财货 233, 234—5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124, 126, 135
 democratic welfare 民主福利资本主义 295—6
 Marxism and 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 12, 13, 27
 need-satisfaction and 需要满足与资本主义 287—93
 New Right 新右派 24—5, 26, 27
 see also First World 另参见第一世界
 Caplan, A. 卡普兰, A. 56, 172
 Carbon emissions 碳排放量 261, 265
 Carley, M. 卡利, M. 165
 Carr-Hill, R. 卡尔—希尔, R. 155, 165, 173, 183, 321
 Cartwright, A. 卡特赖特, A. 178
 centralization 集中 287, 300—5
 see also decentralization 另参见分散
 Cereseto, S. 切雷塞托, S. 283, 325
 Channer, Y. 钱纳, Y. 31, 206
 child abuse 虐待儿童 206, 207
 child-bearing 生育 217—18, 220, 250, 259
 childhood 儿童时期 37—8
 security 儿童安全 204—7, 220
 children, disability in 儿童的残疾 175—6, 190
 China 中国 249—70
 choices 选择
 autonomy and 自主与选择 53; opportunities 选择机会 66—8
 human liberation and 人类解放与选择 109—11
 needs as 需要就是选择 9—10, 38—9, 44
 Chomsky, N. 乔姆斯基, N. 272
 Cingranelli, D. 辛格拉尼里, D. 226, 227, 324, 325
 citizen influence 公民影响 229—30
 civic mobilization 公民动员 292—3
 civil rights 公民权 225—7, 245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公民权 261, 262—3
 women 女性的公民权 268—9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18, 31
 Clare, A. 克莱尔, A. 63
 Clutterbuck, C. 克拉特巴克, C. 194
 Cochrane, A. 科克伦, A. 327
 Cochrane, S. 科克伦, S. 244
 cognitive skills 认知技能 60—1, 172, 181—4, 190, 322
 Cohen, D. 科恩, D. 254
 Cohen, I. 科恩, I. 80
 Coimbra, M. 科姆布拉, M. 256
 Cole, S. 科尔, S. 237, 262, 263, 324
 Coles, R. 科尔斯, R. 65
 Commoner, B. 康芒纳, B. 244
 communication 交流 118—19
 Habermas and rational 哈贝马斯与理性交流 120—6
 patterns 交流模式 86—8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交流能力 124
 community welfare provision 社区福利提

供 307—9
 complements 补充 164
 “complex equality”, theory of “综合平等”理论 17
 composite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福利的综合指标 166—8
 constrained optimum 限制性最优 164
 consumer sovereignty principle 消费者主权原则 10, 24
 contraception 避孕 217—18, 220, 250, 258—9
 Cooley, M. 库利, M. 200
 Coombs, P. 库姆斯, P. 183, 215
 Cooper, R. 库珀, R. 284
 Cornia, G. 科尼亚, G. 153, 264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 161, 271, 280—1
 Cox, J. 考克斯 62
 Cranston, M. 克兰斯顿, M. 137
 crime 犯罪 212—14, 220
 critical autonomy 批判性自主 67—8, 68—9, 170, 187—90, 216
 critical optimum 批判性最优 160
 Crouch, C. 克劳奇, C. 326
 Crystal, D. 克里斯特尔, D. 188
 Cubatao, Brazil 库巴坦, 巴西 201
 cultural imperialism 文化帝国主义 13
 critiques of 文化帝国主义的评论 13—16, 29—30
 cultural relativism 文化相对主义 12—13, 313
 cultural transmission 文化传播 80, 86—8, 170
 culture 文化
 alien and need-satisfaction 异族文化与需要满足
 minimal 最低需要满足 97—9
 optimal 最优需要满足 102—3
 cognitive skills and 认知技能与文化 182
 critical autonomy and 批判性自主与文化 187—9

mental illness and 精神疾病与文化 62
 morality and 道德与文化 43—4
 as normative consensus 文化是规范性共识 79—80
 problems in comparing need-satisfaction 比较需要满足时出现的问题 70—5
 production and 生产与文化 81—2
 shared and need-satisfaction: 同一文化中的需要满足
 minimal 最低需要满足 93—6;
 optimal 最优需要满足 99—102
 Culver, C. 卡尔弗, C. 316
 Cumper, G. 坎普尔, G. 204, 322
 curative medicine 治疗医学 58—9, 316
 Cutler, P. 卡特勒, P. 164, 194, 195

 Dale, J. 戴尔, J. 307
 Daly, M. 戴利, M. 15
 Daniels, N. 丹尼尔斯, N. 118
 Dasen, P. 达森, P. 182
 Davies, C. 戴维斯, C. 322
 Davis, C. M. 戴维斯, C. M. 253, 284, 285, 286
 De Swann, A. 德·斯万, A. 326
 debate, democratic 民主辩论 123—4, 310
 decentralization 权力分散 300, 306—9
 deception 欺骗 54, 315
 decommodification, index of 去商品化指数 211
 democracy 民主 4, 119, 228
 critiques of Rawls 对罗尔斯的评论 138—9
 in dual political strategy 在双重政治战略中的民主 299—312
 rationality and 理性与民主 123—4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民主 261, 263
 see also civil righ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rights 另参见

公民权;政治参与;政治权利
 democratic debate 民主辩论 123—4, 310
 democratic welfare capitalism 民主福利资本主义 295—6
 dependency school 依赖性学派 282
 depression 抑郁症 63—4, 180—1, 190, 192—3
 deprivation 剥夺 20, 49, 314—15
 objectivity 剥夺的客观性 32—3
 see also poverty 另参见 贫困
 Derbyshire, I. 德比希尔, I. 263
 Derbyshire, J. D. 德比希尔, J. D. 263
 Desai, M. 德赛, M. 321
 Descartes, R. 笛卡尔, R. 52
 Devine, P. 迪威因, P. 287, 326
 difference principle 差别原则 129—31
 expanded 延伸的差别原则 132
 disability 残疾 321—2
 diseases causing 导致残疾的疾病 177
 measuring 残疾的测度 174—6, 190, 253
 mental illness and 精神病与残疾 180—1
 disaggregation of data 分解数据 165—6, 321
 disease 疾病
 measuring prevalence of 疾病发病率的测度 176—9, 190, 253
 occupational 职业病 199, 219
 see also mental illness 另参见 精神病
 distribution 分配
 material production model 物质生产模型 237—40, 245
 Rawls and 罗尔斯与分配 131, 137—8
 redistribution 再分配 142—3
 systems 分配制度 83, 87—8
 division of labor 劳动分工 82—3
 Dixon, W. 狄克逊, W. 277—8, 281
 doctor-population ratio 每位医生服务的人口数 204, 219, 250, 257
 dominance partial ordering 支配性偏序

272
 domination, unfair 不公平的统治 101—2
 Douglas, I. 道格拉斯, I. 158, 197, 198
 Douglas, M. 道格拉斯, M. 44, 314, 317
 Doyal, Len 多亚尔, 莱恩 49, 81, 209, 321, 327
 action and rationality 行动与理性 53
 biomedical model 生物医学模型 57, 59
 core activities 核心活动 81
 critical autonomy 批判性自主 68
 cultural differences 文化差异 73, 111, 317
 human liberation 人类解放 109
 indeterminacy in optimizing needs 最优化需要的不确定性 118
 individuality 个性 12
 language 语言 78, 183
 needs and wants 需要与想要 41
 political freedom 政治自由 67, 68
 private person 属于自己的人 60
 rules and choices 规则与选择 77, 78
 Western curative medicine 西方治疗医学 202—3
 Doyal, Lesley 多亚尔, 莱斯利 202—3
 abortion 流产 217
 biomedical model 生物医学模型 57
 bladder, cancer 膀胱癌 199
 women's double burden 女性的双重负担 267
 Drakakis-Smith, D. 德拉卡基斯—史密斯, D. 196
 drives, needs as 需要是驱动力 35—9
 dual burden, women and 女性与双重负担 186—7, 267, 269, 286
 dual political strategy 双重政治战略 4, 141, 297—312
 centralization 权力集中 300—5
 decentralization 权力分散 306—9
 in practice 实践中的双重政治战略 309—12

- in theory 理论上的双重政治战略
298—300
- duties 责任
- rights and moral reciprocity 权利与道德互惠 92—103, 317
- special and optimizing need-satisfaction 特殊需要满足与最优化需要满足 104—8
- Dworkin, A. 德沃金, A. 15
- Dworkin, G. 德沃金, G. 53, 66, 68
- Dworkin, R. 德沃金, R. 327
- equal opportunity 平等机会 131
- moral harm 道德伤害 314
- sexism 性别主义 15
- Eckholm, E. 埃克霍姆, E. 199, 201
- ecology 生态 28—9
- see also environment 另参见 环境
-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 277—83
-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 153
- economic rights 经济权利 261, 263—5
- see also income 另参见 收入
- economic security 经济安全 210—12, 220
-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经济安全 250, 258
- women 女性的经济安全 268
-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se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可持续性参见可持续性经济发展
- Economist* 《经济学家》198, 286
- education 教育 214—16, 220
-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教育 250, 258
- women 女性的教育 267, 268
- see also leaning; teaching 另参见 学习; 教学
- Edwards, R. E. 爱德华兹, R. E. 62
- egoism 利己主义, 98
- Eisenstein, Z. 艾森斯坦, Z. 84
- Ellis, A. 埃利斯, A. 326
- Elson, D. 埃尔森, D. 240, 264, 326
- Elster, J. 埃尔斯特, J. 12, 313, 326
- employment 就业
- guarantee of 就业保障 302—3, 327
- non-hazardous environment 无害工作环境 199—200, 219
- participation 参与:
- opportunities 参与机会 185—7;
- women's 女性的参与 266—7
- enemies' rights to need-satisfaction 敌人需要满足的权利 112—15
- energy consumption 能源消耗 241, 243, 261, 265
- Engelhardt, H. T. 恩格尔哈特, H. T. 62
- entitlements see rights 特权 参见 权利
- Entwistle, H. 恩特威斯尔, H. 61, 323
- environment 环境 234
- conservation 环境保护 143—6, 242—4
- non-hazardous physical 无害自然环境 200—1, 219
- non-hazardous work 无害工作环境 199—200, 219
- pollution 污染 200—1, 219, 241, 260, 323
- Enzensberger, H. 恩岑斯贝格尔, H. 28—9
- equal opportunities 平等机会 321
- programme 提供平等机会的计划 305
- Rawls and justice 罗尔斯与正义 130, 131, 136, 139
- Erikson, R. 艾里克森, R. 198
- Errson, S. 埃尔森, S. 228, 230
- Esping-Andersen, G. 埃斯平—安德森, G. 211, 289, 326
- Estes, R. 埃斯蒂斯, R. 167
- Ethnomethodology 人种方法学 19
- European Community 欧洲共同体 311
- Evaluation circularity 评估循环 23, 25
- Evans, G. 埃文斯, G. 208
- Evans, P. B. 埃文斯, P. B. 282, 325, 326

Exchange systems 交换制度 83,87—8
Experts 专家 123,125—6,310

Fabian Society 费边社 327

Faden, R. 法登, R. 60, 315

Feher, F. 费赫尔, F. 1, 286, 287

Feinberg, J. 范伯格, J. 39, 145, 315, 319

Ferguson, K. 弗格森, K. 306

Feyerabend, P. 费拉本德, P. 33, 314

Finch, J. 芬奇, J. 208, 210, 327

Finegold, D. 芬戈尔德, D. 102, 182

First World 第一世界

capitalism and need-satisfaction in 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与需要满足 287—93

indicators of need-satisfaction in 第一世界的需要满足指标 249—61

patterns of welfare 福利模式 271—2
societal preconditions 社会前提条件 261—5

women's needs 女性的需要 265—9

Fishkin, J. 费士金, J. 107

Fitzgerald, R. 菲茨杰拉德, R. 36, 43

Flew, A. 弗卢, A. 11

Flora, P. 弗洛拉, P. 326

food 食物 194—5, 219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食物 250, 255—6

women 女性的食物 268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 194, 194—5, 195

forbearance 宽容 95

Foster, G. 福斯特, G. 64

Foster, P. 福斯特, P. 20, 307

Freden, L. 弗雷登, L. 209

free time, lack of 缺少自由时间 187, 190

freedom 自由

of agency 能动自由 67, 68, 76—7

negative 消极自由 78, 225—30

political 政治自由 67, 68, 76—7

positive 积极自由 78—9, 230—41

see also autonomy 另参见自主

Freire, P. 弗赖尔, P. 183, 215

Freud, S. 弗洛伊德, S. 37, 66, 185

Frosh, S. 弗罗什, S. 38

Fukuyama, F. 福山, F. 283

Fulford, K. W. M. 富尔福德, K. W. M. 57, 174, 315

future generations 子孙后代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经济可持续性 242—4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to 环境责任 144—7

Galtung, J. 加尔通, J. 152, 154—5, 223

Gastil, R. 加斯蒂尔, R. 227

Genetic structure 基因结构 36—9

Geras, N. 杰拉斯, N. 213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27, 28, 313

war 战争 113, 115

Gert, B. 格特, B. 316

Gewirth, A. 格维尔思, A. 50, 314

duties, rights and moral reciprocity 义务、权利与道德互惠 94, 95, 96, 100, 102, 106

minimum force in welfare 在战争中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 115

Ghoussoub, M. 古苏布, M. 313

Giddens, A. 吉登斯, A. 78, 80—1, 87, 88

Gilbert, A. 吉尔伯特, A. 308

Gilbert, P. 吉尔伯特, P. 64, 322

Gintis, H. 金提斯, H. 224, 326

Glaxo 葛兰素 319

Goals, needs as 需要是目的 39—42, 45

Godfrey, E. M. 戈弗雷, E. M. 186

Goldstein, J. 戈尔茨坦, J. 162

Good, B. 古德, B. 62

good, collective 集体美德 96

alien cultures and 异族文化与集体美德 102—3

commitment to 集体义务 99—102.

- 318—19
 future generations and 子孙后代与集体美德 145—7
 Rawls and 罗尔斯与集体美德 131—2
 Goodin, R. 古丁, R. 33, 51, 143, 318
 duty to help 帮助的义务 95, 104, 105, 107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保护 145
 Gorovitz, S. 戈罗维茨, S. 61
 Gough, I. 高夫, I. 49, 81, 327
 Welfare state 福利制度 27, 102, 293
 Gould, A. 古尔德, A. 326
 grammar of “need” “需要”的基本原理 35—45
 drives 驱动力 35—9
 goals and strategies 目标和策略 39—42
 relativism and morality 相对主义与道德 42—5
 Gouldner, A. 古尔德纳, A. 88
 Gramsci, A. 格拉姆茨, A. 215, 323
 Gray, J. 格雷, J. 11
 Greek moral theory 古希腊道德理论 318, 318—19
 Green, D. 格林, D. 11
 greenhouse gases 温室气体 261, 265
 Griffin, J. 格里芬, J. 25, 42
 Grimshaw, J. 格里姆肖, J. 313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国内生产总值 151—2
 group relativism 群体相对主义 14—16
 Groves, D. 格罗夫斯, D. 327
 Grubb, A. 格拉布, A. 56
 Grundy, S. 格伦迪, S. 61
 Guardian 《卫报》 207, 286
 Guntrip, H. 冈特里普, H. 66
 Gutmann, A. 古特曼, A. 136, 307, 313, 32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政治参与 138—9
 Habermas, J. 哈贝马斯 119—20, 134, 320—1
 rational communication 理性交流 120—6
 understanding 理解 87
 Hadley, R. 哈德利, R. 306, 327
 handicap 残障 174
 see also disability 另参见残疾
 Hardiman, M. 哈迪曼, M. 198
 Hardin, G. 哈丁, G. 98
 Harm 伤害
 avoidance of 避免伤害 39—42, 50—1, 55
 deprivation and 剥夺与伤害 314—15
 moral 道德伤害 314
 Harris, D. 哈里斯, D. 307, 317
 citizenship theory 公民理论 79
 duties and rights 义务与权利 112
 social policy 社会政策 51—2
 Harris, M. 哈里斯, M. 316, 317
 Harris, R. 哈里斯, R. 53, 209
 core activities 核心活动 81
 cultural differences 文化差别 73
 language 语言 12, 78, 183
 needs and wants 需要与想要 41
 political freedom 政治自由 67
 private person 属于自己的人 60
 regulation 规则 31
 rules and autonomy 规则与自主 77
 understanding and human liberation 理解与人类解放 109
 Harris, T. 哈里斯, T. 192—3, 207, 209, 322
 Hatch, S. 哈奇, S. 306, 327
 Haworth, L. 霍沃思, L. 53, 66, 316
 Hayek, F. 哈耶克, F. 11, 26—7, 290
 health 健康 170
 as basic need 作为基本需要 54—5,

- 56—9; problems in comparing need-satisfaction 比较需要满足时的问题 69—75
- measuring basic needs 基本需要的测度 172—9, 190, 249—53; disease 疾病 176—9; survival and disability 生存与残疾 172—6
- measuring intermediate needs 中间需要的测度 191, 194—204, 255—7; food and water 食物和水 194—6; health care 保健 201—4; housing 住房 196—8; physical environment 自然环境 200—1; work environment 工作环境 199—200
- mental *see* mental illness 精神健康参见精神病
- optimal 最佳健康状态 73, 170
- poor and autonomy 身体健康状况不好与自主 316
-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健康问题 249—53, 255—7
- women's 女性的健康 265—6
- health care 保健 201—4, 219, 303—4
- culture and 文化与保健 111
- Soviet Union 苏联的保健 285—6
-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保健 250, 257
- see also* medicine 另参见医学
- Heath, A. 希思, A. 326
- Hedstrom, P. 赫德斯特罗姆, P. 211
- Hegel, G. W. F. 黑格尔, G. W. F. 28, 89, 101—2, 110
- Heidenheimer, A. J. 海登海姆, A. J. 326
- Held, D. 赫尔德, D. 301—2, 326, 327
- Heller, A. 赫勒, A. 13, 16
- Helman, C. 赫尔曼, C. 64
- Herman, E. 赫尔曼, E. 272
- Herskovits, M. 赫斯科维茨, M. 313
- Hicks, N. 希克斯, N. 173, 325
- Hillhorst, J. 希尔霍斯特, J. 321
- Hillier, S. 希利尔, S. 259
- Hindess, B. 欣迪斯, B. 31—2, 326
- Hirst, P. 赫斯特, P. 62, 313
- Hodgson, G. 霍奇森, G. 326
- Hoffman, E. 霍夫曼, E. 322
- Hollis, M. 霍利斯, M. 25
- homelessness 无家可归 197
- homicide statistics 杀人案件统计 213, 220, 250, 257
- housing 住房 196—8, 219, 285, 323
-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住房状况 250, 256—7
- human action 人类行为
- duality of structure 人类行为结构的双重性 80—1
- initiation of 人类行为的发起 59—60
- needs as preconditions for 需要作为人类行为的前提条件 50—5
- human-centered learning 以人为中心的学习 215
-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人类发展指数 167
- human development movement *see* social indicators 人类发展运动参见社会指标
- human interaction 人类互动 50—5
- human liberation *see* liberation 人类解放参见解放
- human nature 人性 36—8
- human rights 人权 261, 262
- see also* civil rights; political rights 另参见公民权; 政治权利
- Humana, C. 休曼那, C. 227, 229, 262
- Hume, D. 休谟, D. 101
- Huxley, A. 赫胥黎, A. 44
- IAEE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 184
- IAEP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

- ational Progress)国际教育评价组织 184
- ideal-regarding principles 注重理想原则 25
- ideal speech situation 理想的言论环境 121—2
- Ignatieff, M. 一格纳提耶夫, M. 97, 304
- Illich, I. 伊利奇, I. 306
- impairment 残损 174
see also disability 另参见残疾
- income 收入
measuring real 衡量实际收入 238—40
per capita and welfare 人均收入与福利 277—8
right to basic 基本收入的权利 302—3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收入状况 261, 263—5
see also poverty 另参见贫困
- India 印度 249—70
- individualism, autonomy and 自主与个人主义 76—80
- inequality, social 社会不平等 129—31, 133—4, 139—40
- infant mortality 婴儿死亡率 250, 252, 284
- instrumentality 手段 40
- interests, human 人类利益 55, 315
- intermediate needs 中间需要 157—9, 170
satisfaction: basic need-satisfaction and 基本需要与中间需要的满足 162—4; measuring 中间需要的测度 191—221; standards 中间需要的标准 161—4;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中间需要 250, 255—61
see also under individual names 另参见各单项
- international aid agencies 国际援助机构 107—8
-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国际疾病分类标准》176, 181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国际劳工组织 153, 186, 196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国际标准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SCED) 教育发展的国际标准分类 182, 216
- internationalization 国际化
common skills 共同技能 183—4
ecology and future generations 生态环境与子孙后代 141—7
- intuitionism 直觉论 127
- Ireland, T. 爱尔兰, T. 323
- isolation 孤独 208
- Jacobs, M. 雅各布斯, M. 234, 241, 242
- Jaggar, A. 贾戈尔, A. 85
- Jahoda, M. 雅霍达 64, 186
- Johansson, S. 约翰森, S. 154
- Johnson, C. 约翰逊, C. 213
- Johnson, N. 约翰逊, N. 327
- Jones, H. 琼斯, H. 198, 204, 215, 308, 327
women 女性 240, 244, 254
- Jones, P. 琼斯, P. 94
-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社会政策》321
- Judge, A. 贾奇, A. 159
- judiciary 司法 305
- juridification 法制化 125
- justice 正义 2
civil/political rights and 公民/政治权利与正义 225—6
Rawls and optimal need-satisfaction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与最优化需要满足 126—41
war and 战争与正义 112—15, 319—20
- Kabeer, N. 卡比尔, N. 313
- Kakwani, N. 卡夸尼, N. 325
- Kamenetsky, M. 卡姆内特斯基, M. 69
- Kant, I. 康德, I. 52—3, 141, 321

422 人的需要理论

- Katzenstein, P. 卡曾斯坦, P. 326
- Keane, J. 基恩, J. 18—19, 31, 300, 313, 327
- Keat, R. 基特, R. 123
- Kellmer-Pringle, M. 凯尔默—普林格尔, M. 205
- Kennedy, I. 肯尼迪, I. 56
- Klatter, M. 克拉特, M. 321
- Kleinman, A. 克兰曼, A. 59, 62
- Korbin, J. 科宾, J. 204, 206
- Korpi, W. 科皮, W. 229, 289, 293
- Kuhn, T. 库恩, T. 209
- Kukathas, C. 卡萨斯, C. 135, 321
- Kurian, G. 库瑞恩, G. 229, 263
- Kuznets, S. 库兹涅茨, S. 263
- La Fontaine, J. 拉方丹, J. 71
- labor, division of 劳动分工 82—3
see also employment 另参见 就业
- Labor movement 劳工运动 293
- Laclau, E. 莱克劳, E. 17—18
- Lancaster, K. 兰卡斯特, K. 156
- Lane, J. E. 莱恩, J. E. 228, 230
- Lang, T. 兰, T. 194
- Language 语言 182, 188, 190, 322
- Lansley, G. 兰斯利, G. 32, 49, 321
- Lash, S. 拉希, S. 189
- Laurence, J. 劳伦斯, J. 207
- lead, exposure to 铅中毒 260
- learning 学习
 autonomy and 自主与学习 188—9
 measuring 学习的测度 181—4
see also education 另参见 教育
- Lebowitz, M. 莱博维茨, M. 16
- Lederer, K. 莱德勒, K. 69, 155
- Lee, P. 李, P. 27
- Lees, S. 利斯, S. 30, 313
- Leeson, P. 利森, P. 154, 321
- legislation 立法 304—5
- legitimacy 合法性
 distributional system 分配制度的合
 法性 87—8
 domination 统治的合法性 102
- LeGrand, J. 勒格兰德, J. 173
- Leiss, W. 莱斯, W. 189
- Lerner, G. 勒纳, G. 84
- Lesser, H. 莱塞, H. 49, 91
- Lessnoff, M. 莱斯诺夫, M. 127
- “level of living” “生活水平” 152
- Levinson, D. 莱文森, D. 206
- liberal democratic socialism 自由民主社会主义 295, 296
-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5
- liberation 解放 170
 Habermas 和 哈贝马斯与解放 124—6, 320—1
 right to need-satisfaction and 需要满足的权利与解放 91—115; duties and moral reciprocity 义务与道德互惠 92—103; relativism 相对主义 108—11; special obligations 特殊义务 104—8
- liberties *see* rights; autonomy; freedom
 自由参见 权利; 自主; 自由
- Lieven, E. 莱文, E. 65, 206
- life expectancy 预期寿命 166, 167, 173, 190
 per capita income and 人均收入与预期寿命 277, 278
 Soviet Union 苏联的预期寿命 284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预期寿命 249—52
 women 女性的预期寿命 265—6, 267
- Lindley, R. 林德利, R. 52
- Literacy 读写能力 183, 190, 215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读写能力 250, 254—5
 women 女性读写能力 266, 267
- Lovell, T. 洛弗尔, T. 74, 317
- low birthweight 出生体重不足 250, 253
- Lukes, S. 卢克斯, S. 12, 78, 123
- luxury goods 奢侈品 233, 324

MacIntyre, A. 麦金太尔, A. 52, 314, 318, 318—19

Mack, J. 麦克, J. 32, 49, 321

Macpherson, C. B. 麦克弗森, C. B. 135, 138

Macpherson, S. 麦克弗森, S. 204, 207

Mallmann, C. 马尔曼, C. 158, 164

malnutrition 营养不良 194, 195, 322—3

see also food 另参见食物

Mann, M. 曼, M. 326

Marcus, S. 马库斯, S. 158, 164

markets 市场 291—2, 302—3

see also capitalism 另参见资本主义

Marsalla, A. 马萨拉, A. 180, 185, 254

Marshall, T. H. 马歇尔, T. H. 326, 327

Marx, K. 马克思, K. 283, 300

humanity 人性 12, 27, 110

material production 物质生产 83, 231

social relations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12, 13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12—13, 27—9, 121, 125

Maslow, A. 马斯洛, A. 35—6

material production model 物质生产模型 231—41, 245, 287, 292

maternal depletion syndrome 母爱消耗综合征 217

mathematical skills 数学技能 183—4, 190

Matthews, M. 马休斯, M. 285

Mauss, M. 莫斯, M. 71

McCarthy, T. 麦卡锡, T. 123

McInnes, N. 麦金尼斯, N. 11

McKeown, T. 麦基翁, T. 202

Meade, J. E. 米德, J. E. 326

measuring need-satisfaction 需要满足的测度 151—70

basic needs *see* basic needs 基本需要满足的测度 参见基本需要

intermediate needs *see* intermediate needs 中间需要满足的测度 参见中间需要

social indicators 社会指标 151—5; problems in devising 设计社会指标时出现的问题 164—9 *

medicine, curative 治疗医学 58—9, 316

see also health care 另参见保健

medical records 医学记录 178

Meehan, E. 米汉, E. 311

Mehan, H. 梅安, H. 19

Mehta, S. 梅塔, S. 327

Meillassoux, C. 梅拉索克斯, C. 84

Melrose, D. 梅尔罗斯, D. 319

Mendus, S. 门德斯, S. 118

mental illness 精神病 177, 316—17, 322

autonomy and 自主与精神病 61—6, 180—1, 190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精神病状况 253—4

Meyers, D. 迈耶斯, D. 135

Mezzicich, J. 梅齐克, J. 62

Midgley, J. 米奇利, J. 198

Midgley, M. 米奇利, M. 37, 38

Miles, I. 迈尔斯, I. 165, 321, 324

“basics” output “基本必需品”产量 262, 263

economic dependency 经济依赖 154

GDP 国内生产总值 152

ranking goods/services 产品/服务分级 237

Miller, D. 米勒, D. 51, 316, 320

Miller, R. 米勒, R. 135

minimal need-satisfaction 最低需要满足

alien cultures 异族文化 97—9, 318

shared culture 同一文化 93—6

minimum force 最低限度的武力 115

minimum optimum 最低投入水平的最优 162—3, 164

mobilization, civil 公民动员 292—3

modernization theory 现代化理论 281—2

Moon, B. 穆恩, B. 277—8, 281

Moore, H. 穆尔, H. 84, 86

moral harm 道德伤害 314

morality 道德 91—2

duties, rights and reciprocity 义务、

权利与道德互惠 92—103

needs, relativism and 需要、相对主义
与道德 42—5

moralnets 精神网 208

Morgan, M. 摩根, M. 57

Morris, M. D. 莫里斯, M. D. 166

mortality rates 死亡率 253

causes 原因 179, 254

as indicators 作为指标 173—4, 190

infant 婴儿死亡率 250, 252, 284

maternal 孕妇死亡率 250, 259

motivation 动机 35—9

Mouffe, C. 莫夫, C. 17—18

Murie, A. 缪里, A. 197

Murphy, H. B. M. 墨非, H. B. M. 181,
322

Myrdal, G. 米尔达尔, G. 142

Nagel, T. 内格尔, T. 115, 173

Naroll, R. 纳罗尔, R. 86, 161, 184, 208

Navarro, V. 纳瓦罗, V. 257

need-satisfaction 需要满足

advanced capitalism and 发达资本主义
与需要满足 287—93

basic see basic needs 基本需要满足
参见基本需要

charting objective 描绘需要满足的
蓝图 247—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经济发展
与需要满足 277—83

global dilemmas 全球困境 293—4

intermediate see intermediate needs
中间需要满足参见中间需要

liberation and rights to 解放与需要
满足的权利 91—115; enemies 敌
人的需要满足 112—15; minimal

and other cultures 异族文化的最低
需要满足 97—9, 318; minimal
and shared culture 同一文化的
最低需要满足 93—6; optimal
and other cultures 异族文化的最
优需要满足 102—3; optimal and
shared culture 同一文化的最优
需要满足 99—102

measuring see measuring need-satis-
faction 测度 参见需要满足的测度
need for standards 需要满足的标准
30—1, 314

optimizing see optimizing need-satis-
faction 最优化参见需要满足的
最优化

political economy of 需要满足的政
治经济学 294—6

problems in comparing 比较需要满
足中出现的問題 69—75

societal preconditions for see societal
preconditions 需要满足的社会前
提条件参见社会前提条件
state socialism 国家社会主义 283—
7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需要满足
状况 249—73; global patterns
需要满足的全球模式 269—73

see also satisfiers 另参见满足物

need-transformation 需要的转化 233—
4, 240—1, 245, 264—5

negative freedom 消极自由 78, 225—30

networks, primary 初级关系网络 207—
10

Nevelt, 内维特 9, 117

New Right 新右派 10—11, 24—7

Nickel, J. 尼科尔, J. 111

Nigeria 尼日利亚 279—80

Nixon, F. 尼克森, F. 154, 321

Norman, R. 诺曼, R. 28, 52, 98, 110

Norris, P. 诺里斯, P. 240, 269, 289

Nove, A. 诺夫, A. 287

- Nozick, R. 诺齐克, R. 11, 26, 95, 137, 138
- Obeyesekere, G. 奥贝塞克尔, G. 62
- objectivity of needs 需要的客观性 1—3, 9—21, 42—5, 49
measuring satisfaction and 衡量满足与需要的客观性 247—9
- O'Brien, M. 奥布赖恩, M. 83, 217
-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82, 289, 290
environment 环境 199, 201
health care 保健 204
time budgets 时间量 187
- O'Higgins, M. 奥希金斯, M. 289, 325
- Oliver, M. 奥利弗, M. 321
- Olson, A. 奥尔森, A. 187, 229
- O'Neill, O. 奥尼尔, O. 98, 104, 138
- OPCS 英国人口普查和调查办公室 175—6, 177
- Open University 开放大学 179, 197, 199, 203
- opportunities 机会
autonomy and 自主与机会 66—9
for participation *see* participation 参与与机会参见参与
- oppression 压迫 67
- optimizing need-satisfaction 最优化需要满足 116—47, 160
ecology and future generations 生态与子孙后代 141—7
- Habermas and rational communication 哈贝马斯与理性交流 120—6
- Rawls and justice 罗尔斯与正义 126—41
- rights and duties of; alien cultures 异族文化的权利与义务 102—3;
shared culture 同一文化的权利与义务 99—102; special obligations 特殊义务 104—8
- societal preconditions for *see* societal preconditions 最优化需要满足的社会前提参见社会前提
- orthodox economics 正统经济学 9—10, 22—4
- Osborne, P. 奥斯本, P. 31
- overcrowding 过度拥挤 197, 198, 219, 250, 256
- Overing, J. 奥弗林, J. 314
- Owens, J. 欧文斯, J. 327
- Pahl, J. 帕尔, J. 240
- Pain 疼痛 176, 190
- Parfit, D. 帕菲特, D. 53, 144
- Parsons, T. 帕森斯, T. 57
- Participation 参与 141, 171
dual strategy and 双重战略与参与 299, 307—9
health and 健康与参与 56—8
in measuring needs-satisfaction 参与衡量需要的满足 168
measuring poverty by 利用参与衡量贫困 211, 323
mental illness and 精神病与参与 63—4
needs as preconditions for 需要作为参与的前提条件 50—5
opportunities for 参与机会 66—9, 184—7, 190; women 女性的参与 266—7
political *se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政治参与 参见政治参与
- participation optimum 参与的最优化 160
- parties, political 政治党派 228—9
- Parton, N. 帕顿, N. 31, 206
- Partridge, E. 帕特里奇, E. 144
- Pateman, C. 佩特曼, C. 139—40, 306, 307, 327
- patriarchy 父权制 84, 139—40
- Pease, K. 皮斯, K. 213
- Penz, P. 彭茨, P. 10, 23, 24, 25, 272

- Petchesky, R. 佩奇斯基, R. 217
- Pettit, P. 佩蒂特, P. 135, 320, 321
- Pfaller, A. 普法勒, A. 326
- Phares, E. 费尔斯, E. 64
- phenomenology 现象学 19—21, 31—4
- Phillips, A. 菲利普斯, A. 307, 327
-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 (PQLI) 生活物质质量指数 166—7, 278
- physical security 人身安全 212—14, 220, 227
-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人身安全 250, 257
- women 女性的人身安全 268
- Piachaud, D. 皮亚乔德, D. 323
- Piaget, J. 皮亚格特, J. 182
- Plant, R. 普兰特, R. 49, 110, 132, 300
- bureaucracy 官僚体制 306
- centralization 集中 303, 303—4
- deprivation 剥夺 315
- diabetes 糖尿病 41
- morality 道德 91
- need satisfaction and duty 需要满足与责任 92, 106
-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27
- police/judiciary 警察/司法 138
- Platts, M. 普拉茨, M. 93
- Pogge, T. 波格, T. 114, 134, 302, 321, 324
- equal opportunity 平等机会 142, 143
- global system 全球体制 281
- health care 保健 303
- measuring real income 实际收入的测度 238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政治参与 228, 229
- poverty and freedom 贫困与自由 132—3
- Rawls and justice 罗尔斯与正义 134, 135, 294;
- rights and liberties 权利与自由 225
- Polanyi, K. 波兰尼, K. 300, 326
- Policy Research Unit (PRU) 政策研究所 321, 327
- political authority 政治权力 80, 88—9
- political economy of need-satisfaction 需要满足的政治经济学 282, 294—6
- political freedom 政治自由 67, 68, 76—7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政治参与 138—9, 170, 245
- negative freedom 消极自由 227—30
-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政治参与 261, 262—3
- women 女性的政治参与 267
- political rights 政治权利 225—7, 245, 261, 262—3, 286
- politics of difference 差别政治 74—5
-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赋权政治 307—9
- Pollack, S. 波拉克, S. 218
- Pollitt, C. 波利特, C. 306
- pollution 污染 200—1, 219, 241, 260, 323
- see also environment 另参见环境
-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增长 243—4
- positive freedom 积极自由 78—9, 230—41
- poverty 贫困
- freedom and 自由与贫困 132—3
- measuring 衡量贫困的指标 211—12, 220, 323
- research 贫困研究 159, 321
- Soviet Union 苏联的贫困问题 285
-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的贫困状况 250, 258
- see also deprivation; economic security 另参见剥夺; 经济安全
-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实际的 了解 122—3
- Prais, S. J. 普雷斯, S. J. 182
- preferences see choices 偏好参见选择
- primary relationships, significant 重要的初级关系 207—10, 220
- Pritchard, K. 普理查德, K. 226

- production 生产 85
 autonomy and 自主与生产 185—7
 model of material 物质生产模型 23—41, 245, 261, 265, 287, 292
 societal preconditions 社会前提条件 80, 81—3
 professionalism 职业化 306
 property, private 私有财产 84
 psychology 心理学 28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购买力平价 238—9
 Purdy, D. 珀迪, D. 326—7
- qualitative research 定性研究 168—9
 quantitative research 定量研究 168—9
 queuing time 排队的时间 286
 Quito, Ecuador 基多, 厄瓜多尔 198
- Raban, C. 拉班, C. 27
 racism 种族主义 14—15, 313
 Radical Democrats 极端民主主义者 16—19, 30—1
 Rainwater, L. 雷恩沃特, L. 289
 Ram, R. 拉姆, R. 263, 264, 325
 rape 强奸 269
 rationality 理性
 autonomy and 自主与理性 61—3, 316
 Habermas and communication 哈贝马斯与交流 120—6, 320
 Rawls and 罗尔斯与理性 127—8
see also mental illness 另参见精神病
 Rawls, J. 罗尔斯, J. 113—14, 119—20, 126—41, 142, 145
 justice and optimal need-satisfaction 正义与最优化的需要满足 126—32; critiques of 对罗尔斯的评论 135—41;
 operationalisation of principles of justice 操作罗尔斯的主义原则 225—7, 237—40
 revising 修正罗尔斯 132—5
- Raz, J. 雷兹, J. 67—8, 77, 96
 real income 实际收入 238—40, 261, 263—4
 rebellion, armed 武装起义 113, 114, 115
 reciprocity, moral 道德互惠 92—103, 318
 redistribution 再分配 142—3
see also distribution 另参见分配
 regulatory legislation 监管性立法 304—5
 Reiser, S. 赖泽, S. 316
 relationship, significant primary 重要的初级关系 207—10, 220
 relativism 相对主义 154, 314
 critiques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文化帝国主义的评论 13—16, 29—30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12—13, 27—9
 needs, morality and 道德与需要 42—5
 New Right 新右派 10—11, 24—7
 orthodox economics 正统经济学 9—10, 22—4
 phenomenological arguments 现象学的观点 19—21, 31—4
 prospect for human liberation 人类解放的前景 108—11
 Radical Democrats 极端民主主义者 16—19, 30—1
 Renner, C. 伦纳, C. 257
 Renshon, S. 伦肖恩, S. 43
 Renteln, A. 伦特恩, A. 33, 314, 317, 324
 reproduction 繁衍
 biological 生物繁衍 80, 83—6, 140—1, 250;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 250, 258—9
see also child-bearing 另参见生育
 material 物质再生产 241

- Rescher, N. 里谢尔, N. 272
- resource constraints 资源限制 117—18
- resource usage, measuring 资源利用的测度 241
- responsibility for optimizing needs 最优化需要的责任 104—8, 319
- Richards, J. R. 理查兹, J. R. 327
- rights 权利
- dual political strategy 双重政治战略 301—5
 - justice and 正义与权利 128—9, 132—3, 134, 136, 137
 - to need-satisfaction 需要满足的权利 92—103, 112—15, 317
 - universality 普遍性 222—5
 - see also civil rights; political rights 另参见 公民权利; 政治权利
- Ringen, S. 林根, S. 211
-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 207
- Rist, G. 里斯特, G. 14, 154
- Roche, S. 罗奇, S. 322
- Roderick, R. 罗德里克, R. 120, 123, 124
- role deprivation 职责剥夺 185—6
- role stress 职责压力 185, 186—7
- Rorty, R. 罗蒂, R. 19
- Rose, S. 罗斯, S. 38
- Rowbotham, S. 罗博特姆, S. 74, 327
- RSJ (Radical Science Journal) Collection 《激进科学杂志》320
- Rueschmeyer, D. 鲁舍梅耶, D. 326
- rules 规则 77—80, 317
- authority and 权力与规则 88—9
 - cultural transmission 文化传播 86—8
 - morality and 道德与规则 96, 318
 - reproduction 繁衍 84
 - trade 贸易 83
- Runciman, W. 朗西曼, W. 20
- Rupasinghe, K. 卢佩那赫, K. 281
- Rushdie, S. 拉什迪, S. 30
- Rustin, M. 拉斯廷, M. 17, 28, 327
- Ruttan, W. 鲁坦 W. 327
- Sahlins, M. 萨林斯, M. 83
- Salmon, J. 萨蒙, J. 59
- Sandbrook, R. 桑德布鲁克, R. 319
- sanitation 卫生 197, 198, 219
- satisfiers 满足物 69—75
- culturally specific 与文化相关的满足物 168
 - intermediate needs and 中间需要与满足物 155—9
 - material production 物质生产 233—6, 236—7, 238—9, 245
- schistosomiasis 血吸虫病 197
-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 181, 253—4
- Schutz, A. 舒茨, A. 19, 31
- science 科学 16
- Scott, H. 司各特, H. 269, 326
- Seager, J. 西格, J. 187
- woman 女性 228—9, 265—8
- Second World 第二世界
- indicators of need-satisfaction in 需要满足指标 249—61
 - patterns of welfare 福利模式 271
 - societal preconditions 社会前提条件 261—5
 - state socialism in 国家社会主义 283—7
 - woman's needs 女性的需要 265—9
- security see childhood; economic security; physical security 安全 参见 儿童安全; 经济安全; 人身安全
- Sedwick, P. 塞奇威克, P. 316—17
- Segal, L. 西格尔, L. 313
- self-defence 自卫 112—13
- self-determination 自我决定 77
- self-esteem 自尊 65

- self-reflection 自我反省 125
- self-respect 自尊 184
- Seligman, M. 塞利格曼, M. 64, 205, 210
- Selowsky, M. 瑟洛斯基, M. 263
- Sen, A. 森, A. 50, 167, 280, 320, 321, 326
- access to satisfiers 得到满足物 324
- deprivation 剥夺 33
- dominance partial ordering 支配性偏序 272
- food intake 食物摄入 195
- measuring welfare 10, 福利的测度 154, 155—7; orthodox economics 正统经济学 23—4
- poverty 贫困 155, 323
- production indicators 生产指标 237
- women 女性 267; nutrition 营养 240, 268; sex ratio 性别比 241, 266
- sexism 性别主义 15—16
- Shah, N. 沙阿, N. 14, 313
- significant primary relationships 重要的初级关系 207—10, 220
- Silber, J. 西尔伯, J. 173
- Singer, P. 辛格, P. 107
- Sivard, R. L. 西瓦德, R. L. 257, 263
- skills, cognitive 认知技能 60—1, 172, 181—4, 190, 322
- see also education 另参见教育
- Smith, B. and B. 史密斯 B. 和史密斯 B. 14
- Smith, D. 史密斯, D. 212
- Smith, G. 史密斯, G. 19—20
- Smith, M. and M. 史密斯 M. 和史密斯 M. 64
- Smith, R. 史密斯, R. 186
- social audits 社会审计 159, 321
- social change 社会变化 65, 88, 90, 110—11
- social indicators 社会指标 151—5
- basic needs 基本需要 190
- intermediate needs 中间需要 219—20
- problems in devising 设计问题 164—9
- composite indicators 综合指标 166—8; disaggregation and distribution 分解与分配 166—8;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research 定量与定性研究 168—9; validity 有效性 165
- social inequality 社会不平等性 129—31, 133—4, 139—40
- social policies 社会政策 51—2, 101, 117, 118—19
- Social Progress, Index of 社会进步指数 167
- see also social change 另参见社会变化
- social reporting 社会报告 152—3
- social rights 社会权利 261, 263—5
- social roles 社会职责 184—7
- socialization 社会化 80, 83—6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 liberal democratic 自由民主社会主义 295, 296
- state see state socialism 参见国家社会主义
- societal preconditions for need-satisfaction 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 76—90, 170, 222—46
- authority 权力 88—9
- cultural transmission 文化传播 86—8
-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and the future 经济可持续性与未来 242—6
- individual autonomy 个人自主 76—80
- negative freedom 消极自由 225—30
- positive freedom 积极自由 230—41
- production 生产 81—3, 231—41
- reproduction 繁衍 83—6
-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 261—5
-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人类权利的普遍性 222—5

- sociobiology 社会生物学 36—8
- Soper, K. 索珀, K. 27, 28, 313, 317
- Soskice, D. 索斯凯斯, D. 102, 182
- Soviet Union 苏联 272, 325
- Movement for Socialist Renewal 社会主义复兴运动 286
- need-satisfaction in 苏联的需要满足 283—7
- Spearitt, D. 斯皮里特, D. 183
- Springborg, P. 斯普林博格, P. 13, 36, 313
- Sri Lanka 斯里兰卡 161, 269, 281
- Stacey, M. 斯泰西, M. 56
- Stankiewicz, W. 斯坦基维茨, W. 212
- Stanley, L. 斯坦利, L. 15—16
- Stark, E. 斯塔克, E. 315
- state 国家
- intervention and need-satisfaction 国家干预与需要满足 280, 292—3, 326
- justice nuder 国家制度下的正义 135—7
- political authority 政治权力 88—9
- rights and 权利与国家 223
- role in dual strategy 国家在双重战略中的作用 297—313,
- violence 国家暴力 213—14, 220
- state socialism 国家社会主义 126, 280, 325
- need-satisfaction under 国家社会主义下的需要满足 283—7, 295
- see also Second World 另参见第二世界
- Steedman, I. 斯蒂德曼, I. 23, 236
- Stephens, J. D. 斯蒂芬斯, J. D. 282, 325
- Stern, A. 斯特恩, A. 200
- Stevenson, C. L. 史蒂文森, C. L. 315
- Stewart, F. 斯图尔特, F. 153, 231, 324, 325
- differential knowledge 不同的认识 240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经济发展与福利 277, 278, 279, 280
- health care 保健 204, 233
- literacy 读写能力 164, 167
- redistribution 再分配 264
- water 水 196
- strangers 陌生人
- minimal need-satisfaction 最低需要满足 97—9, 318
- obligations towards 对陌生人应尽的义务 104—8
- optimal need-satisfaction 最优化需要满足 102—3
- strategies, needs as 需要是策略 40—2
- ‘street children’ “流浪街头的儿童” 207
- Streeten, P. 斯特里顿, P. 153, 165, 321
- aggregation problem 汇总问题 167
-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 279, 280
- funerals 葬礼 209
- life expectancy 预期寿命 173
- participation in need-assessment 参与需要评估 168
- PQLI 生活物质质量指数 166
- production 生产 235
- subcultures 亚文化 79
- see also culture 另参见文化
- substitutability 替代性 164
- survival, physical see health 生存 参见健康
-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可持续性经济发展 164, 235, 241
- future generations’ rights 子孙后代的权利 242—4
- Sweden 瑞典 161, 239, 288—91 passim, 293
- Swift, A. 斯威夫特, A. 207
- Szasz, T. 萨兹, T. 62
- Szulkin, R. 肖尔金, R. 229
- Tang Wain, G. 唐文, G. 30
- taxation 税款 106

- international need tax 国际需要税
107—8
- Taylor, C. 泰勒, C. 89, 110
- Taylor, P. 泰勒, P. 144, 311
- teaching 教学 60—1
see also education 另参见教育
-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技术理解 87, 122
- technologies, effectiveness of 技术的有
效性 116—17, 320
- television culture 电视文化 189
- Tennant, C. 坦南特, C. 322
- Therborn, G. 瑟尔本, G. 326
-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basic needs approach’ ‘基本需要方
法’ 153—4
economic cooperation 经济合作 143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ed-
satisfaction in 第三世界的经济
发展与需要满足 277—83
housing 住房 197—8, 256—7
indicators of need-satisfaction in 第
三世界的需要满足指标 249—
61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对于第三世
界的道德责任 107—8, 319
patterns of welfare 福利模式 269—
71
societal preconditions 社会前提条件
261—5
‘street children’ 流浪街头的儿童
207
women’s needs 女性的需要 265—9
- Thirlwall, A. 瑟尔沃尔, A. 251
- Thompson, G. 汤普森, G. 49
consensus on normal human condi-
tion 对正常的人类状况的一致
看法 42
human interests 人的利益 315
needs as drives 需要是驱动力 35,
36
needs as goals 需要是目标 40, 54
objectivity of harm 伤害的客观性
50
time budget studies 时间量的研究 187,
199
- Timpanaro, S. 廷帕纳罗, S. 28, 29
- Tinker, A. 廷克, A. 208
- Titmuss, R. 蒂特马斯, R. 300, 327
- Townsend, P. 汤森, P. 321, 323
deprivation 剥夺 20, 49, 314—15;
measuring poverty 贫困测量 211
objectivity of need 需要的客观性
32—3
- Treacher, A. 特雷彻, A. 315
- Trigg, R. 特里格, R. 31, 38
- Turner, B. 特纳, B. 326
- Turner, J. 特纳, J. 196
- Ul Haq, M. 乌尔哈克, M. 164
- understanding 理解
autonomy and 自主与理解 60—1
technical 技术理解 87, 122
- UNDP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198, 252, 325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人类发展指数 167
literacy 读写能力 183
women’s needs 女性的需要 267,
268
- Unemployment 失业 185—6, 190
-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52, 289
education indicators 教育指标, 182,
216
learning 学习 214
-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76, 251,
252
child mortality 儿童死亡率 108, 173
economic insecurity 经济不安全 258
health care 保健 204
nutrition 营养 194, 195, 256
poverty 贫困 212
water 水 196, 198, 255
- United Kingdom 英国 288—91, 293

432 人的需要理论

United Nations (UN) 联合国 252

Declaration on Population 《联合国人口宣言》217

environment 环境 201, 260, 323

housing 住房 196, 198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152, 168

Review of the Decade for Women
《联合国女性问题回顾(1975—1985)》268

United States 美国 288—91

Bureau of Justice 司法部 268

predatory democracy 掠夺式的民主 271—2

universal satisfier characteristics *see* intermediate needs 普遍满足物特点参见中间需要

universality 普遍性

goals 目标 39—40, 170

human rights 人权 222—5

needs 需要 49, 73—5

Urry, J. 厄里, J. 189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127

validity of indicators 指标的有效性 165

values 价值观 99

Van der Veen, R. 范德维恩, R. 327

Van Parijs, P. 范巴里吉斯, P. 327

Veit-Wilson, J. H. 维特—威尔逊, J. H. 323

victim studies 受害者研究 213, 220

Vincent, R. 文森特, R. 109, 223, 324

virtue *see* good, collective 美德参见集体美德

vitamin model 维生素模式 161—2

Vizard, E. 维扎德, E. 207

Von Wright, G. H. 冯·赖特, G. H. 152

voting rights 投票权 228—9

see als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另参见

政治参与

Wagner, K. 瓦格纳, K. 182

Waitzkin, H. 威茨金, H. 283, 325

Waldron, J. 沃尔德伦, J. 317

Walker, A. 沃克, A. 304

Walker, R. 沃克, R. 323

Wall, G. 沃尔, G. 41

Wallace, A. 华莱士, A. 213

Walzer, M. 沃尔泽, M. 17, 112—13, 113, 313

want-regarding principles “注重想要”原则 25

wants 想要

as goals 作为目标的想要 39, 40—2
satisfaction of 想要的满足 10, 23, 24

war, justice and 战争与正义性 112—15, 319—20

war deaths 战争死亡人数 214, 220, 250, 257

Ward, P. 沃德, P. 308

Warr, P. 沃尔, P. 185

intermediate/basic need-satisfaction relationship 中间需要和基本需要满足之间的关系 163

mental health 精神健康 64, 181

role deprivation 职责剥夺 185—6

role stress 职责压力 187

vitamin model 维生素模式 161—2

work and autonomy 工作与自主 199—200

waste production indicators 产生废物的指标 241

water 水 195—6, 197, 219

pollution 污染 200—1, 260, 323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 250, 255

Weale, A. 威尔, A. 94, 315

Weapons, choosing 选择武器 115

Wigel, V. 韦格尔, V. 37, 321

welfare *see* need-satisfaction 福利 参见

- 需要满足
- welfare agencies, 福利机构
- international 国际福利机构 142—3
- welfare capitalism, 福利资本主义
- democratic 民主福利资本主义 295—6
- Welfare state 福利制度, 106—7, 134
- Wesson, R. 韦森, R. 229, 262
- White, A. 怀特, A. 42, 93, 317
- White, S. 怀特, S. 124, 125, 320
- Whitehead, M. 怀特黑德, M. 173, 178
- Wiggins, D. 威金斯, D. 39, 42, 50, 96, 315
- Williams, A. 威廉斯, A. 9
- Williams, F. 威廉斯, F. 313
- Williams, R. 威廉斯, R. 80, 87, 88
- Winch, P. 温奇, P. 43
- Wise, S. 怀斯, S. 15—16
- Wisner, B. 威斯纳, B. 153, 154
- Wolff, R. 沃尔夫, R. 77
- women 女性
- depression in 女性抑郁症 192—3
- distribution and 分配与女性 240
- dual burden 女性的双重负担 186—7, 267, 269, 286
- incomes 女性的收入 264
- need-satisfaction in Three Worlds 三个世界中女性的需要满足 265—9; reproductive needs 生殖需要 250, 258—9
- professionalism and 职业化与女性 306—7
- rights to abortion/contraception 流产/避孕权利 140, 158
- social importance 女性的社会重要性 84—5
- Wood, H. 伍德, H. 19
- Woolley, P. 伍利, P. 62, 314
- work *see* employment; unemployment 工作 参见 就业; 失业
-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153, 251, 252, 262, 289, 325
- contraception 避孕 218
- education 教育 268
- fertility rate 生育率 259
- life expectancy 预期寿命 173
- nutrition 营养 195
- population per physician/nurse 每个医生或护士服务的人口数量 204
- poverty 贫困 212
- real income 实际收入 239
-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143
- World Fertility Survey 《世界生育率调查》 259, 268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世界卫生组织 177, 178, 252
- child mortality 儿童死亡率 107—8
- children's needs 儿童的需要 205
- Collaborative Study on Depression 抑郁症合作研究项目 180—1
- curative medicine 治疗医学 59
- definition of health 健康的定义 172
- disability 残疾 174, 253, 321—2
- health care access 享受保健 203, 204, 257
- health goals 健康目标 240
- nutrition 营养 194, 195
- water 水 195, 196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世界资源研究所 241, 253, 262
- Wright, K. 赖特, K. 226, 325
- Wright, P. 赖特, P. 315
- Young, I. M. 扬, I. M. 307
- Young, R. 扬, R. 16
- Yoxen, E. 约克森, E. 117